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 教育文选

下 卷

卫道治 译
金世柏 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下 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下卷

卫道治 译

《丛书》责任编辑 肖云瑞
本书特约责任编辑 李月章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插页2 字数417,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88

平装本 ISBN 7-107-10124-2/G·837 定价5.86元

精装本 ISBN 7-107-10125-0/G·838 定价8.00元



克鲁普斯卡雅在1937年的一次
会议上发表演说



克鲁普斯卡雅和少先队员们(1928年)



克鲁普斯卡雅在教师们中间

目 录

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在全俄扫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的演说）	1
论电影	4
工人大学	6
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0
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学（1926年3月24日在教育 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会议讨论会 的报告和发言）	14
论学校的社会公益活动	19
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 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22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	35
谈流氓行为问题	39
苏维埃和学校公益工作	43
工厂的七年制中学	46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	51
谈儿童读物问题	55
论普及教育	61
少先队运动和学校（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 议上的报告）	64
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	74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77
国民教育的十年	78
庆祝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演说	82

在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88
少先队的纪律	90
论培养劳动力问题	92
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	97
论综合技术教育	106
《论综合技术教育》报告提纲(1928年5月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13
教育机关的阶级斗争(迎接党的国民教育会议)	116
论中学(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提纲)	120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务会议与第一届全苏少先队会议的代表们的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127
培养新生活的建设者(在全苏少先队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132
教育咨询	138
论培养教师(在高等学校校长会议教育分会上的报告)	140
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会员会议上的发言)	149
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在全苏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	169
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在保卫儿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75
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在综合技术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报告和闭幕词)	187
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问题	210
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对文化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言论	213
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	235
儿童读物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	237
论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	241

提高学校工作质量（在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46
论儿童的学前教育（在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259
《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与莫斯科教育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	272
为建立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奋斗	290
教师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苏维埃教育家	294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和学前教育的任务（1932年5月7日报告摘要）	296
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决定	305
评价教师的标准	311
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	313
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	321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327
自学须知	334
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沙茨基	336
列宁论儿童和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	338
谈自觉纪律（给少年少先队员和学生们的的一封信）	342
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	345
共青团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部分	350
谈学校图书馆	357
论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	362
论学前儿童的玩具	365
对学前教育材料的几点意见	369
致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书记）	373
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1937年2月15日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	376

辅导员应该懂得教育学	388
与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	392
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	396
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	400
应当学会动脑和动手	404
谈家长用书	407
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409
注 释	415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生平事迹年表	457

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

(在全俄扫盲协会^①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全俄第一次扫盲协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正值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日子，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来重温一下列宁对我国文化发展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1923年1月17日，即列宁逝世前一年，他口授了一篇题为《论我国革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驳斥了那些认为俄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人。他写道：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②

他在这篇文章的另一处又重复了这一思想：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③

他在同一时期写的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④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⑤。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写道：“……但这

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⑥

他接着写道：“……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说：“……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⑧

“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工农群众自己将以最大的努力取得知识，即通过我们的常规的战斗得到知识。

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农民将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们为提高文化水平而进行的斗争将具有空前的规模。这是当前极其必要、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

群众脱离文化生活，一字不识，这种沙皇时代的遗毒是很严重的。显然，光采用一般的行政方式是不能奏效的。不久前刚刚召开了一次普通教育会议⑨，决定建立一级学校网，而统计学家们却对此有争议，怀疑在七年或十年之内是否能把它建成。是的，如果只是采用行政方式，很可能十年之内也建不成。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搞革命时所采用的方式——发动千百万群众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使整个工作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了。

“如果群众自己能把工作担负起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列宁1920年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曾讲过这个问题。

“大家都在谈论扫除文盲。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

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一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人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就是要男女青年团员自己来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们要努力使青年们能主动地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你们知道，要很快地把俄国从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变成人人识字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团担负起这个工作，如果全体青年都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那时这个拥有四十万青年男女的组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青年团的任务在于要掌握各种知识，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摆脱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④

文化革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人民群众订报的越来越多，他们办起了红角、农村阅览室、农业研究小组。现在，农村里的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群众自己开办了少年学校、成人学校，一切经费概由自己筹措。我们欢迎群众自己办学，并就学校和教师的供给问题与各地国民教育处签订合同。应当支持这种主动精神，并将其引上正轨。

应该明确一点：如果不提高整个文化水平，就不可能单独做到扫除文盲。在既没有报纸，又没有书籍，没有东西可读的地方，是不可能扫除文盲的。如果不激发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不教他们学会把知识用于改善生活、改善对生活的安排，那是不可能扫除文盲的。如果不把扫除成人文盲的工作与对少年儿童进行普及教育的工作联系起来，如果不关心报刊的推广工作，不关心图书馆的组织和自学工作，是谈不上扫除成人文盲的。这些事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紧相联着的。

因此，要建立扫盲小组！

一般说来，扫盲协会的每个会员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一名文化战士，而扫盲协会应该成为反对愚昧无知的堡垒，是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革命的堡垒。

论 电 影

视觉形象对我们的感染力是极大的。因此，电影就成了影响广大群众(包括青年在内)的最有力的武器。当代电影制作的技术使我们能充分扩大观众的视野。他们可以“目睹”海底的景象，探视地心的奥秘，观察云彩的变化，也可以看到热带森林的景观，还可以领略北极的风貌，等等。通过电影，观众可以看到当代技术的一切奇迹，各种各样的工厂，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情况。

现代的电影使穷乡僻壤的居民能接触到全人类的生活，不再与世隔绝了。

我们对电影的这一重大意义往往估计十分不足。

电影不仅可以扩大视野，它还是使人们产生很多极其深刻的感受的源泉。

例如，目前正在上映的影片《波将金战舰》。应该看到群众，看到它对群众所激起的巨大热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电影所包含的深厚的教育意义。

但是……电影不只是反映现实，它还可能歪曲现实，它既能培养革命精神和团结友爱的感情，也可以歪曲现实，搞乱人的思想，使人变得很粗俗，养成人们的残暴性格、仇恨心理、利己主义，等等。

资产阶级深知电影所起到的作用，所以他们总是利用电影在群众中播下神秘主义的种子，制造民族敌对情绪，使人崇尚财富和权势；利用电影来灌输各种偏见，以此来分裂劳动人民的队伍。

我们应该广泛而又充分地利用欧美电影中的科学影片，就像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这种做法一样。但是我们更应该拍摄自己的具有革命内容的影片，这种影片要充满着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精神、渴望建设光明生活的精神。

影片与书籍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武器，不过影片的作用更大。我们应该掌握影片。我们应该借助电影来把列宁的思想变为群众的财富。

工人大学^①

我国的经济水平已经开始上升，工业日益发展。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也逐渐壮大和巩固。这不仅是指人数而言。我们政治教育工作人员无时无刻不感到工人阶级的需要在不断增长。

例如，今年莫斯科市自发地成立了许多夜校和工人大学。是谁开办的呢？谁能办就办。有一些得到了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帮助^②，有一些得到了工会的帮助，还有一些得到了党组织的帮助。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些学校是由于工人们的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费从什么地方来？国立第二莫大^③附属工人大学（130人）每月的经费为80卢布，其中30卢布由区委支付，20卢布由第二莫大支付，30卢布由区苏维埃国民教育科支付。但是也还有一些类似扎莫斯克沃烈茨基工人大学这样的学校，它的学员人数与上面差不多，每月的经费却达两千卢布。

工人大学能否称之为名符其实的大学呢？某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工人大学没有严格的招生制度，到实验教室听课的工人，尽管他们很成熟，但在学习进化论规律的同时，往往还得提高自己的识字水平。这些人认为，这不是“正规的”大学，因为其中开设的许多课程是普通教育课程，而且还经常根据学员的要求和水平而加以改变，“降低”。

在大量夜校中（这种夜校今年办了不少），参加夜校的工人达到84.064万人。工人大学共有四所：罗戈日斯克——西摩诺夫斯基工人大学，扎莫斯克沃烈茨基工人大学，国立第二莫大附属工

人大学，十月革命工人大学。这四所工人大学的入学条件比较严格，普通教育课程也开设得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招牌和校名，也没有必要把工人大学与工人夜校严格加以区分。有时有些工人夜校在本区比工人大学更受欢迎。

工人阶级渴望学习、渴求知识，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为工人自学设立高等院校。

并非所有的高等院校对这件事都是同样热心的。例如，国立高等工艺学院^④行政当局只同意在该院为工人开设一所工长学校，而工人们却想在该学院受到普通教育。

有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欢迎工人们来上学。例如，高等技术学校就为工人开设了学习班。参加工人学习班的有500多人，他们是鲍曼区各工厂的男女工人。学校的教授们担任教学工作，报酬极少，大学生们热心帮助教授，每位教授有两个助手，他们不取任何报酬。学习班每周学习三次，每次都是从晚上七点到十一点。工人们都很愿意来学习。学习班开设普通教育课程，但同时还开设了专业制图，电工学，机械学，纺织学等课程。高等技术学校的实验室一律对工人开放。工人们学习很努力，并能把自己学得的知识运用于本厂的生产。该校与本区各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校的大学生也从而加深了对工人的认识，学会了与工人们共事。一批工人成长起来了，一批红色专家成长起来了。

国立第二莫大附属工人大学的专业方向是自然历史方面的。该校的实验室向工人们开放。为了便于学习，科特斯创办的达尔文大博物馆^⑤也开放了。男女工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

无论是夜校还是工人大学，都不给工人任何特权，只是授予知识。

目前，每一所夜校，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附设于高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⑥、苏维埃党校^⑦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成立的夜校的特色，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它们究竟归谁管辖，招收

什么样的学生。另一方面，工人们也强烈要求学校应认真考虑他们的需要。

我不禁回忆起“幸福”的旧时代，即九十年代的一段往事，当时我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执教。我记得，1895年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招生，就是尽可能满足工人的需要。技术协会^①《章程》上有一项规定，可以按各门课程办班。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开办以下的班：几何班，物理班，化学班，地质学班，欧洲各国人民生活班，俄国地理班等等。然后通告各工厂：某一个星期天，什么时候，教员将讲他们愿意学习的什么课程；接着各班开始报名，谁愿意上什么班就上什么班。不少工人来了，有好几百，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全体教员都很努力，举行观摩课，讲授他们所担任的课程的内容。报名参加几何班的人最多，教员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工厂的工程师柯罗布科，工人们都知道他参与了工人运动。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②担任地理课（欧洲各国人民生活），她也讲得有声有色……但是，无论哪一个教员都没有明确地说……

如果说三十年前都能了解工人的兴趣所在（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那么现在就更容易找到这种办法了。现在，只要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工人的要求，就可以创造这样一些自学形式，与工厂建立密切的联系，使工人自学更为容易。

现在，工作才刚刚开始。到夜校和工人大学去学习的，并不是所有愿意去学习的人，而只是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及工厂保送的（顺便说说，上夜校的不是很年轻的人。例如，国立第二莫大就不招共青团员，只招工龄很长的人）。能上学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而想学习的却是所有的工人。

现在不必忙于去制订一个统一的教学大纲，因为这样会使各个夜校和工人大学失去其灵活性，不能适应工人的要求。目前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帮助各个夜校和工人大学去克服其明显的缺点，弥补其明显的不足。不要用一般大学的章程去束缚工人大学，要

制定一种能使工人在教学大纲、教学法等问题上充分反映其意见的章程，能与各个企业保持密切联系的章程。目前我们还未制订出这样的章程。

目前，最主要的，是对已经开展起来的学习运动加以支持，帮助它更为广泛地发展起来。

我们不只是在莫斯科看到了工人们这种自发的学习愿望。类似的工人夜大，在托木斯克、斯摩棱斯克、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等地也开办了起来。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目前只是拟定了一个章程，还没有开办工人大学，不过工人们已经与大学生有了接触。大学生们开办了收费夜校，去学习的工人们很多很多。省委起初没有把握，不知是否应该允许开办收费夜校，但是工人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种自发开办的夜校的。这些夜校的工作开展得很细。

1920—1921年时，由国民教育局开设的夜校很快瘫痪了，可现在不同了。一般来说，目前整个政治教育工作的规模更大了，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它。

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

会议上的演说^①

同志们，首先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最近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职业是否适当的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以及培养各个劳动部门所需要的能干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可是，同志们，只要我们注意一下科学对不同职业的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要求对许多种职业来说都是共同的。例如，对于许多种职业来说，都要求具备很强的视觉记忆力，对于另外一些职业又要求敏锐的听力，等等。一个工人具备什么能力，决定了他在所从事的职业方面专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他在这一劳动领域贡献的大小。因此，只要看一看工人应具备的是什么素质，我们就会自然而然想到我国的学校的状况，我国统一的劳动学校的状况，它授予了一些什么知识来培养工人的这种能力，来培养他们的这种视觉记忆力，来授予他们关于式样、花色的知识，培养他们合理调配几种劳动过程的能力呢？我们给了学生一些什么东西呢？应该说，只要我们一接触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承认，我国学校在这方面给予学生的东西太少了。但是，当我们研究儿童的某种能力是怎样发展的时候，却往往认为，儿童的一切都是天生的，一切都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然而，只要我们认真观察一下某种能力是怎样发展的，我们就会发现，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童年的某种感受。一

个小孩童年时玩过各种形式的积木，于是就对式样产生了兴趣，他把一种式样与另一种相比较，然后就会在周围的环境中寻找这种式样，有时我们就看到，他的某种为别的儿童所不具备的能力得到了发展。有时我们又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小孩常常玩小兵，这使母亲很担心，可别让他产生军国主义的思想呀！可是这个孩子玩的却是另一套：让小士兵如何排列队伍，如何互相配合协调；于是，他就从而培养了一种数学能力——排列组合。

由此可见，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安排儿童在童年时接触一些什么材料，因为这些东西将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当然，我不是学前教育方面的专家，我常常向我国的儿童学家^②请教这个问题：从童年起应该明确一些什么东西？给予儿童的应该是一些什么材料？什么玩具才能培养他们的某种能力，激发他们的某种兴趣？我估计，我们这次会上大概也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目前我们当然还谈不上个性的和谐发展问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学校和我国的学前机关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培养最大限度地适应劳动的人。这也是我想向这次大会提出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童年的印象到底如何。儿童是仅仅能接受一些最起码的东西呢，还是也能接受社会意义极其复杂的東西？我认为，那些对自己童年时代记忆犹新的同志，都知道童年时往往能理解许多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我至今还记得我童年时的一件事。有一年夏天，我和妈妈一起到一个地主家去，也就是常说的去做客，因为她以前在这里当过家庭教师。我常常与农村的孩子们一起玩，非常恨这个地主婆，因为她总是把孩子们赶出花园，并且骂个不停。冬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地主家，走的是雪橇道，我们的车夫把一副拖着空棺材的雪橇撞翻了，我至今记得这个车夫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情景。全村的人都骂地主们是一群恶棍，要把他们扔到冰窟窿里面去。这个情景使我终生难忘。当时我还只有

五岁上下。那时一点也不懂阶级斗争，不懂阶级利益的冲突，但是这幅情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以致后来我还不只一次地想到它。我认为，这对我以后理解马克思主义很有帮助，这是我终生难以忘却的一件事。

但是我认为，不能由于我们童年时代能接受一些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就得对孩子们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谈话。如果我们五岁的孩子讲什么阶级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会扼杀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因此，每当人们听到幼童们在唱什么有关牧师神甫等人的各种歌曲时，往往产生了一种怀疑：这种做法究竟是否明智，为了使生活中的印象不那样深刻，我们在做法上是否应格外小心？

我当然是竭力主张儿童应尽可能多从生活中获得一些印象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在幼儿园创造一些条件，使儿童们日后能消化这些材料，那我们走的路子就会更正一些。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能在幼儿园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使孩子们感到在那儿生活很美满，那他们就会留下许多与这个幼儿园有关的回忆。如果我们能这样安排幼儿园的生活，使孩子们能亲密无间地完成各种小任务；如果孩子们之间有一种团结友好的气氛；如果他们能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处理每一个问题，我认为，那我们就是为孩子们日后很好地理解这些印象，并从集体的观点来对待这些印象创造了前提条件。这就是我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昨天我正好看了我们督导员的一些报告，他们不久前到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莫托维里呼、卡纳维诺等一些大城市作了调查，他们一致指出：这些工人集中地区的女工都深明事理，很懂得学前教育的重大意义。不过，另一方面，由于经费拮据，在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每72000个工人只有两个半幼儿园。在莫托维里呼，每30000工人仅有两个幼儿园；在卡纳维诺，每22000人才有一个幼儿园。女工们迫切盼望开办幼儿园。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当地却缺乏经费来解决

这个问题。所以说，同志们，我觉得这次大会要认真考虑一下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各地最好也与男女工人们一起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全体工人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开办一些简易的幼儿室也好。但是，当我们遇到每72000人仅有两个幼儿园而与此同时女工们却渴望开办幼儿园这种情况时（我们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愿望是国民教育处和女工部^⑤进行宣传动员的结果），我们就该指出，出路就在于：工人们在这个领域也应进行必要的合作，正如在其他许多部门一样。必须让工人们懂得，出路并不在于他们跑到国民教育处去苦苦要求幼儿园收下他们的孩子，因为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幼儿园，所以这种要求不会有任何结果；而是要使他们团结一致，关心幼儿园，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幼儿园网，好让工人们的孩子脱离他们所生活的那种可怕的家庭环境。举例来说，伊凡诺沃——沃兹列辛斯克的居住条件很糟，所以那儿孩子们的处境很坏。必须找到出路。我想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会很好地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会找出一个妥当的解决办法来的。我只能粗略地谈一谈：必须团结一致，必须加强合作，至于怎样团结起来，怎样组织起来，您们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因为您们都在地方工作。这个问题很可能在许多会议上都要与男女工人们谈到，因为他们强烈要求多开办一些幼儿园。

这些问题都是最近以来生活所特别严肃地提出来的，也是我想向这次会议讲的一点个人看法的问题。最后，祝大家工作顺利。

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学

(1926年3月2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

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会议讨论会的报告和发言)

研究现实情况是二级学校社会课教学大纲的基础。在第一圆周阶段，即七年制学校，不开设历史课，只是进行一些历史方面的参观，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现实的理解。第二圆周阶段也没有开设历史课，只是对各个历史时期进行一些社会学的评述。

这种作法是否正确呢？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当然，应该以研究现实，研究实际生活为中心。而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历史，完全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现实生活，特别是为了理解现实的发展趋势，理解当代社会的成长过程，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要使历史课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就必须对历史与现实分开进行研究。它们两者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有机的、稳定的、内在的联系，但是，两者的教学应该分别进行，否则既不可能对现实进行认真的研究，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可以正确阐明并深刻理解现实的历史知识。这是因为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一方面它必须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还得指出一个时代如何为另一时代所替代，以及造成这种更迭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撰写整个历史。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在七年制学校给历史唯物主义下个定义。但是，我们要为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为掌握实际材料打下一个基础。

如果孩子们从一开始就这样研究历史，同时根据“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的原则，不去涉猎全部历史，而主要是了解与当前相近的时代，那么，历史就有助于他们对现实的理解。目前搞的一些历史参观活动，往往是脱离了任何历史时期而从具体的时代中抽出一些史实，堆积在一起让人观看，尤其是一些业务水平差、马克思主义修养浅的教师在教学中更是如此。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我们必须认识到，13—15岁的儿童还不具备任何历史的展望能力，他们把一切都加以现代化——他们心目中的列宁，就是工农速成中学所教的那样。那些对历史时期具有明确概念的人去进行历史参观，这是一回事；而那些对历史没有任何明确概念的少年儿童去进行这种参观，这又是一回事——结果只不过是离奇的方法往他们头脑中塞进各种历史情节而已。如果历史教学安排得妥当，少年儿童自己就会尽力去联系实际，进行历史与现实两者的自然对比，这样就能激发学生去积极地进行独立思考。当然，要使历史能为说明现实这一目的服务，那还需要在现实和历史的教学中有一定的适应性，需要有一种内在、明确的联系。

必须指出，由于研究现实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七年制学校应把现实和历史的教学分开进行。研究现实的方法不仅是参观实际的情况，而是积极参加实际工作，参加共同生活的建设工作。少年儿童不仅要观察现实，还要积极参与其事。而研究历史则不然，在这里仅仅是研究，而且十分之九是对书本进行研究，对各种文献、文学作品等等进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也要加以注意。

在第一圆周阶段，应该选学比较接近现实的时期，即从农奴制产生的时代开始，以农民改革为中心，直到现实为止。中心是俄国历史。如果这样安排教学，七年制学校的学生就能比较明确地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至于8年级和9年级(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的历史教学，它只占一年时间，带有明显的社会学性质。我认为，这样安排是错误的。要了解社会学的各种结论，需要具备明确的历史知识，

否则全部教学就会成为一些现成定律的灌输。在讲授社会学结论的同时，只应讲那些特别严谨的东西，这样才可以把注意的中心放到系统地学习历史上去，而且，这种学习应占两年时间。

同时，要特别注意阐明那些与二级学校专业方向有关的历史发展方面^①。如果是教育专业方向，那么历史课就要阐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教育问题等等。如果是合作化专业，那么重要的是特别详尽地讲述一下各种交换形式，小生产和大生产、手工业等等的相互关系。

据说，教育界有人认为我的建议是复古。我们的教学大纲不可能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要根据使用这一大纲的经验，不断对它进行修订，使之日趋完善。过去的经验恰好要求我们在上述方面对大纲加以修订。这是前进，而不是倒退。

说到文学教学，在这方面必须坚决而又明确地规定，不能根据当代的小说作品来学习历史，不能根据亚历山大·布洛克的作品来研究埃及，更不能根据艾别尔斯来研究埃及，不能根据安纳托里·弗兰斯来研究希腊，不能根据叶甫盖尼·肖和圣克维奇来研究罗马，不能根据维克多·雨果来研究中世纪。但是，在历史教学中，该时代的小说作品却有极宝贵的价值，因为关键不仅在于研究那个时代，而且还要研究那个时代所创造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和感受体验。

但是，正如历史应为现实服务一样，文学也应为现实服务。

文学不仅是研究过去的手段。文学还是创造新人的强大武器，是巩固一定的感[情]体验的武器，是影响人的行为的武器。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要放在首位的东西是什么，要唤起的“善良”感情是什么，要憎恨什么和热爱什么。所选读作品的作家应不是沉缅于过去的人，而是能反映具有前途的新生事物的作家。要善于做到这一点。

不能把通过文学作品研究历史时代与研究“风格”混为一谈。研究风格是研究感情作用的手段。这是完全不同的一项任务，它

与研究语言、科学和人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

米·尼·^②所说的凡是被当作普通教育的东西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意见是完全应该同意的。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大纲中还有很多现在用不着的知识，在这方面当然还应进行大量的修订。我们看到，在升入中等技术学校时必须具备许多预先规定的知识，升入大学时要求的更多。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做法表示同意。

下面再谈谈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有人说，最好闭口不要提“历史”一词，否则伊洛瓦伊斯基^③编的那套旧教科书又将死灰复燃，教师们还会采用老一套的方法。我认为，事情并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我们要把教科书编写成这样：即使旧时的教师想复古也做不到。我们应从编写这样的教科书着手，并且同意这样的观点。不过我认为，在目前强调现实与历史联系的情况下，某些人仍在想方设法按伊洛瓦伊斯基那一套来讲述史实的片断。

如果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要讲地方行政长官，这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因为他能够把这位地方行政长官与整个旧制度联系起来，但是，旧时的历史教师如果按伊洛瓦伊斯基的观点来搞“参观活动”，可能会得到很糟的效果。我们曾经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谈过这个问题，他说，由于孩子们忘记了什么是专制制度，因此应该详细讲讲这些问题。可见，我们一般地应把地方行政长官与专制制度联系起来讲。

日阿沃龙科夫同志^④说，孩子们年龄很小，因此不应该给他们开设系统的课程，开设系统的课程就必然会使这一课程很抽象。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并不是说：可以开设很具体的课程，讲得十分生动，自然地得出各种结论。

但是，我们对这种教科书，例〔如〕，特拉赫杰别尔格^⑤编的教科书，对各种社会学方面的特拉赫杰别尔格，应比对旧时的历史教师有更多的防范，因为如果出现了用社会学的结论来代替历史时，孩子们所得到的各种概念就会十分混乱。

现在的社会学没有任何生动实际的材料，一般说来，历史并

非这样的社会学。

是否有必要把普通的社会科学课程分为两段^⑥而把它称为一门课程呢？我认为，所谓两段乃是两门课程的婉转说法，是两门课程的客气称谓，但是对此不必担心和粉饰，不必担心因此会给单元教学法造成什么损失。

问题在于，我们在第二阶段采用的单元教学法不同于第一阶段。我认为，对各个历史时期搞“参观活动”是很危险的，因为只是从历史的某一侧面入手，而不与该时期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这样我们就会把各种概念混淆起来。如果某一整体缺乏联系，那在这儿就只能进行一些很肤浅的比较。所以，我认为必须让学生对旧制度有一个概念，而不只是讲个别史实。这是否会脱离现实呢？我认为不会。举例来说，如果在讲授现实知识的同时，让学生学习有关农民、农奴制及其更替的情况，那么，只要我们鼓励儿童提出各种问题，让他们进行比较，这时他们就会从自己对前一时代的理解出发，认识到这一时代如何演变发展成为当前的时代。如果不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而是无休止地进行历史参观，那是不会有任何益处的。

列列维奇同志^⑦也谈到了狭隘的“实践主义”。应该承认，目前的确存在这种东西。您们在我国儿童和共青团里都可见到这种东西。也许这种实践主义是出自生活的需要，其中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但是还是要使它与深刻地理解现实联系起来，而如果我们不系统地讲授以往的各个时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这种深度。当代青年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各种现象的发生、发展缺乏理解，因此我认为，一定份量的历史主义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谈谈8年级和9年级。当然，这两个年级学习的史实，应该从现代的观点出发进行研究，应该按目前要求的观点进行研究，但是我认为，如果对历史的全貌不了解，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这种了解是不可缺少的。

论学校的社会公益活动

在苏维埃学校所应授予学生的各种熟巧中，一个最主要的熟巧就是社会工作者的熟巧，而且这种社会工作者不是单枪匹马地开展活动的社会工作者，而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工作者。

我国是个农业国家，信奉“人人为自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信条的小私有者的心理、小农的心理极为强烈。如果我们想使我国走上合作化的道路，那么除了采取一些措施来促使各种合作制在物质上的繁荣之外，我们还应当广泛利用一切条件从思想上克服小私有者心理。学校应该成为进行这一斗争中的一个基地。教科书应该从头至尾贯穿着集体主义精神。要通过教科书来培养儿童这样一种习惯，即处理每一个问题都要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处理每一个最简单的和最复杂的问题，都要使儿童能把自己看成整体的一个部分，而这一点我们现在却做得不大好。我们应该学会做到这一点。

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提出学校自治应使儿童学会从全班、全年级、全校的利益出发来解决本校的实际工作。自治活动应养成学生齐心协力、共同解决生活所提出的任务的熟巧。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自治活动要能做到使每个儿童都能参加自治工作，使每个人都能担任对集体负责的一定的社会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局限于在学校提出用集体主义精神进行学习，同时使学校自治充满集体主义精神（尽管这两项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那就错了。我们应该教儿童从集体主义的社会工作者的观点

出发来对待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

首先应该激发儿童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深厚兴趣。国家学术委员会^①制订的教学大纲，就把让儿童正视周围的环境作为其中的一个目标，而且不只是正视。使用这一大纲的方法应该是，它能使学生在感情上受到陶冶。重要的不只是让学生能发现农村里的泥坑和水塘，而是要使他们对于农村肮脏、道路泥泞、坑坑洼洼感到不安。如果学校能使学生关心一切公益的事，这所学校就是办得好的。旧时学校对一切都不闻不问。苏维埃学校却应对一切都关心。

但这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要使学生养成一种积极地对待每个问题的习惯。要把道路平整好，因为路不好走。要使儿童们懂得这件事的意义，他们为此感到不安。下一步就要考虑：我们全校的人应该做些什么来搞好这件事呢？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对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要制定一个工作计划。可能力所不及，那么是否能获得呢？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体力行不行？怎样把分工搞好。最后得出结论：只靠一部分人不行。应该与谁商量呢？吸收谁来参加这一工作呢？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考虑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善于与别人一起工作，这就是摆在孩子们面前的任务。在这里，要让孩子们自己考虑这些问题，允许他们犯错误，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有的学校的教师一下子给孩子们布置一周的社会活动任务，然后再去检查；这样安排工作是不妥当的。教师可以提出倡议，给学生出主意，但他不应该成为主角。任务要由孩子们自己提出，他们要学会考核工作的成绩。宣传多区轮作制是学校常见的一种社会工作。假设教师给孩子们布置了这一任务，周末再去检查孩子们完成任务的情况。这样安排工作是否妥当呢？不妥当。首先要使孩子们自己认识到三区轮作制的害处，对它很不满意，想去干预此事。让他们检查一下自己对三区轮作制和多区轮作制的了解程度，充实一下自己的知识，互相

进行检查。要制定工作计划，进行分工。怎样进行检查呢？检查农民关于向多区轮作制过渡的决定，农民是否邀请农学家来讲解向多区轮作制过渡的问题和措施。用生活本身和所取得的成果来检查，而不是向集体或教师形式主义地做一个报告。孩子们看到灭火栓旁边放着一台弄坏了的水泵而感到不安，他们开始修理起来了。检查的内容就是水泵是否修好了，是否可以使用。

善于给自己提出社会任务并且善于集体地完成这些任务，吸收一些新的力量（例如懂技术的成年人）参加自己的集体，善于与关心解决所提出来的任务的其他集体商量办事，所有这些都是学校应该教学生学会的。学校提出来的社会工作的量有多大，这是无关紧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重要的是学校所培养的那种从事社会工作的熟巧。

我国的少先队员也不会做社会工作。他们往往比学校更多地把不计成果的宣传当作社会工作，他们更不会考虑自己的力量和进行分工，他们自以为是，过于自信，不善于与别的组织共事。学校所培养的社会工作熟巧，孩子们也会用到少先队里去的；还应该通过少先队员让大批没有参加组织的儿童也能养成这种熟巧。青年一代将成为善于齐心协力、集体地完成社会任务的社会工作者。

我们要在这方面做工作！

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

(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①)

同志们，最初一段时期，学校工作主要是摧毁旧的体系，既包括内容陈旧的教学大纲，也包括教科书。您们都会记得革命胜利后最初一段时期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当时有人主张：应该把旧的方法、旧的内容和旧的教科书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当时盛行一种主张，就是学校上课可以不要教科书。当然，在新式学校里，在苏维埃学校里，使用内容陈旧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要看一看“摧毁”时期之后的那段时期，就会发现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确定教学内容，即确定教学大纲的工作上。不过我觉得，教师代表大会^②上的情况表明，国家学术委员会^③制定的教学大纲基本上得到了教师的承认。

有关教学大纲的下一步工作，只是使之简化，更加适用，从教学法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已。但是教学大纲的内容，就一级学校来说，在全苏教师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完全确定下来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一新的内容要怎样才能最恰当、最经济、最简单易行地加以贯彻实行。当然，在这方面必须大力强调教科书的重大意义。

现在再也没有人主张可以不用教科书的了。特别需要教科书的是普通学校。美国人说得对，教科书实质上既包括教学内容，也包括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没有确定时，我们的教科书不可避免

地就是某种飘忽不定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就可以谈得上编写具有固定内容的稳定的教科书了。已经基本确定的教学工作方法就可以用于教科书了。如果我们编写的教科书无论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完全适用于我们的目标,那么这种教科书无疑会对广大教师有重大的帮助。

要了解普通学校教师的工作条件。如果教学中没有教科书,那每天教师们就得做大量的工作,而他们没有时间。教师如果要取代教科书,他就必须具备广泛的普通教育和教学法水平。教师手边必须有各种参考手册和书籍。

如果我们看看目前我国普通学校的情况,我们当然就会说,不能指望教师每天都深入地去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由于种种原因,教师是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的。视导员的调查和个别同志的巡视,弄清了普通学校教师目前在教学法上碰到的巨大困难。现在完全可以说,教师已经成了苏维埃教师,但是同时还应该说,他们的教学法水平很低,在这方面亟待给他们以认真的帮助。

对教学法水平不高的教师,不能让他们担任难以完成的任务,而应给他们以帮助。帮助的形式之一,就是编写一本在内容上和教学法都适合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能把我们目前认为在内容和教学法上所必需的东西编进去。除此之外,符合这一要求的教科书有助于教师深入广泛地搞好教学工作。

学生也需要教科书。我们在一级学校授予儿童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只能对他们进行一般的训练,而对大多数青年来说,下一步主要是自学。我们要在一级学校就开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阅读的能力,而一本符合要求的教科书乃是培养这种能力的起码的工具。如果我们把我国学校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那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学校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独立分析所阅读的材料的能力。我们对这一问题也应特别注意,从一开始就教儿童学会利用书籍。教科书也应根据这一原则去编写。

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我们目前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

很多旧的残余。它还带有实验学校即条件优越的学校的痕迹。这种教科书的内容往往很有趣，但是它要求教师做很多额外的工作。如果我们看看普通学校的教学工作情况，我们就会说，教师只能授予一般的观点，因此我们的教科书要写得简单明了，让孩子们感到亲切易懂。内容不应压缩，但形式应通俗易懂，否则，不经过额外的解释，孩子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我听说有人担心这样会降低对教科书的要求。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不会降低、而只会提高教科书的质量。

教科书还应使学生能记住许多事实，随时可以说出这些事实。我们虽然反对死记硬背，把一些不懂得的材料机械地记下来，但我们同时也应指出，学习不可能不以记住一定的事实为基础，这对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如果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学生，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孩子们能说会道，见多识广，可是基本的事实却弄不清楚。教科书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帮助。当然，有些事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记住的，不知道这些事实就很难进一步自学。特别要慎重的是，一些必须记住的有用的事实，不能采用旧的学习方式，即简单地把教科书背诵下来。

我国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起初是对旧教科书进行修订，使它能适应当时需要。这种做法是完全必要的，尽管当时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可以不用教科书。”但是实际生活很快表明，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在教学内容尚未固定的情况下，编写新的教科书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教科书方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使旧的教科书适应苏维埃的实际。在这项工作中也确实闹了一些笑话，例如把涅克拉索夫“按照自己和上帝的意志”这样的诗句^④改为“按照咱们庄稼汉的意志”，等等。如果我们看一看经过修订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修订后的教科书大多数并不大符合学校的要求。当然，这比没有任何教科书要强得多，因为没有教科书，没有儿童读物，没有任何阅读材料，那就不可能学习文化。即使有一本最简单的读物，这对于没有教科书的学校来说，也是

一大进步，因为没有读物显然就不可能学习阅读。这是不言而喻的。修订旧教科书只是权宜之计。

但是，下一步的问题就是编写一本内容新颖、符合教学法要求的教科书。早在1924年，教材编写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编写新教科书的计划。这个委员会认为，教科书不仅应是一种读物，将一些故事和诗歌编入其中；而且它同时还应是一本自学书籍。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理想的这类书籍。

我想稍为谈谈一级学校的教科书问题。

对于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大纲，应该说一级学校的大纲比较精练，比二级学校的要明确得多，因此这一大纲还要做大量额外的工作。这一额外的工作份量很重，因此很自然的，一级学校的教科书所要做的工作要比二级学校的多。我认为，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既要讲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又要讲二级学校的教科书，不过很自然的，我们更多地将要谈谈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现在已经开始按专题、按单元教学法来编写教材了。根据我的看法，我想谈谈应该怎样按单元教学法编选材料。最初必须选一些有感情色彩的材料，因为这种材料会引起儿童的兴趣，使儿童关心这一专题。如果翻阅一下我们的教材，往往就会发现开始讲的都是应用文或者读起来索然无味的故事。因此，正确地挑选这种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是十分重要的。这要求我们非常了解儿童的情况，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关心什么。所挑选的材料要确实能引起学生关心，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专题上来。当然，有时也可能不是一篇故事，不是一首诗歌，而是一种使孩子们感到激动的有趣的作业，在完成这种作业后，他们就想额外做些工作，想阅读一些有关这一专题的应用材料。但是我认为，应该通过某种形式用这一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先对专题作一说明，因此不妨有时也可以背诵一些诗歌。如果孩子们对这首诗歌有兴趣的话，他们就会记住的，并将会产生某种情绪。

接下来谈谈作业。我想稍为谈谈作业的问题。

在我想对教科书问题作些研究的时候，我案头上放着一本乌竟兰教材。我翻开一看，书中的作业内容令我大吃一惊。在一篇短文之后，好像布置了十道作业题，而且这十道作业题时空范围之大，孩子们根本不可能去完成它。例如：向老奶奶们、父辈和婶婶们了解过去的情况，调查研究，然后绘制统计表，——总之，作业题之多（而且都是很难完成的），连成年人也难以应付^⑥。

我认为作业应这样安排：首先，不能一下子就布置十道作业题，应该一个一个地布置。不能一下子让孩子们干十件事。要考虑到他们的力量和能力，等等。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批评列宁格勒市编的教科书把可以在课堂上做的作业布置到课外去做。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认为可以把作业分为三种：一种是在课堂上做的；一种是参照书本，根据大自然的生动情况去做（只是应有一定的标本）；一种是在校外做的。我认为，应该把作业加以区分。而目前却没有这种区别（哪些作业可以在校内做，哪些作业可以在校外做）。

现在谈谈在学校里做的作业。我觉得不能轻视与数学和俄语的有关作业。有时，语法作业可能与艺术作品有关。我不禁回忆起我童年的一件事情。我特别讨厌《三棵棕榈树》^⑦，因为要对这首诗进行语法分析。我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去了，怎么也记不住这首诗，虽然其他的人很快就记住了。前不久听说，有一个学校讲完有关列宁的事迹之后，接着把关于列宁的故事与语法练习“联系”起来。这种笨拙的做法和这样的练习只会把事情搞糟，并使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被挤到不引人注目的范围里去了。要善于选择作业。许多学校的作业选得很好，教师都能做到把所学的主题与本族语和数学的材料联系起来。这件事要处理好。

作业也应具有社会公益劳动的性质。不久前我收到基辅市的小朋友寄给我的一包儿童作品。孩子们从他们的课堂作业中编选

了一本读物。他们抄写得很工整，还有插图，最后决定卖给家长和一切愿意买的人，每本收费十五戈比。他们用卖书的钱买了一些布给流浪儿做衬衣。这种做法就带有明显的社会公益劳动性质。还有一些从具体生活中取材编写教科书，他们希望这种教科书能出版。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会出版，不过我感到他们是想使自己所做的工作对其他学校有帮助。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是否应该专门安排一些培养语言和数学熟巧的练习呢？有时连学生本人也有这种要求。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育文集中就已谈到，他所办的学校里的学生们往往患一种“特殊的流行病”：突然全体学生迷恋于书法了，于是好长一段时期全班的书写都很整齐干净。这一时期过了之后，又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完成某种任务的时期，等等。我认为，学生们这种醉心于某项工作的行为，说明他们想获得一定的技巧。所以我看目前学校常常会出现学生们想获得某种技巧的时期，这时就要对他们加以帮助。教科书应该编选一些这种练习。

至于说到校外作业，这里当然需要考虑到家庭环境及学生的生活条件。

我还想谈一个方面的问题：不应布置那种无法由全体学生或教师谁也不能检查其结果的作业。要使每一项作业及其结果都能得到检查。我们教育学生的办法往往不对头：孩子们开始干某一件事，但是没有做完，我们却不对已做的作业进行检查。这样，我们就在孩子身上养成了一种坏习惯，而在高年级去纠正这种习惯，就比一开始对作业进行检查要难得多。此外，既然我们要注意教科书如何布置作业的问题，那就应该指出，作业很少有集体完成的。诚然，教科书也给小组、班级、全体同学布置了作业，但未指明应如何完成。集体主义并不表现在三、五人、七、八人一起去干某件事，而主要是怎样去干这件事。要大伙一块地去拟定共同的目标，一起讨论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决定怎样分工才能达到目的。要讨论一下是否有必要大家都做同一件事，还是一部分人做这件

事，而另一部分人做另一件事，然后怎样把这项工作统一起来。我们所布置的作业对培养这种熟巧很不注意。

此外，还要提供一些带感情色彩的材料。所布置的作业要能吸引儿童，使他们感到清楚明了、饶有兴趣。再者，还要提供一些应用材料，这种材料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扩大他们的视野。我认为这是不应忽略的。我们发现，目前我们的教科书往往成了唯一的知识源泉。教师忙忙碌碌，不能给孩子们讲很多东西，而教科书却是应该对教师的讲授进行补充的。要让孩子们一开始就把书本当作知识的源泉。

我对一级学校教科书的意见就是这些。不言而喻，除了教科书之外，还应有教具。这当然不是指的旧时那种直观教具，也不是指整年挂在墙上的那种狐狸图像。孩子们迫切需要一些带插图的书。目前的情况是，许多学校的所在地往往不通铁路，没有工厂，孩子们（甚至老师）很多东西都未见过。因此，图片、插图就具有很大的作用，它能使他们了解国内和世界上的许多情况。这一点不应忽略。一位女教师在教师代表大会上说，她所在的那个村子，没有一个人见过镜子。所以，插图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应该给孩子们提供一些他们可以使用（锯、砍伐、修造）的材料。这种材料有很大的作用，过去制作教具时往往没有充分为之提供这种材料。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过于醉心于这种材料。除了这种材料之外，还应给一些可以扩大儿童视野的插图材料。

随着儿童开始利用书籍，他们就会产生对阅读的渴求。目前迫切需要儿童读物。学生们想读书，少先队员也想读书。少先队组织刚建立的时候，少先队员们什么书也不读，现在他们却极其渴望读书。据说，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市有一个图书馆拒绝接纳的儿童达三千人，因为没有儿童读物。是的，儿童书籍的出版工作正在进行，我觉得这项工作应该抓得更紧一些，因为目前急需书籍。儿童们学会了阅读，掌握了教科书的材料之后，还想读些别的东西。我收到大量的儿童来信，谈到许许多多问题。上星期

我就收到好几封信。有一个男孩在信里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书快一点出版。我们搞过宗教节日活动，玩拳头双手都弄得脱了臼。”写信的这个孩子叫瓦夏，只有十三岁，连他们都看出农村玩拳头很荒谬。他信中还谈到农民打架斗殴，谈到接生婆的活动——他希望通过读书把这些现象加以根除。

孩子们渴望知识，而我们提供的图书却不够，非常少。还要指出，我们出版的书籍往往对孩子们的程度估计不足。生活本身促使孩子们在思考许许多多问题，旧书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新书往往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出版的书常常讲的都是些英勇斗争的事迹。这当然很好，但这并不能完全符合儿童的需要。他们需要那种能使他们产生劳动情趣的书，需要那种能使他们产生技术爱好的书，需要那种能吸引他们，给他们以地理知识、历史知识的书。

令人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书还非常少。我认为可以把过去出版的地理、旅游方面的书加以改编，把欧洲文学、美国文学、东方文学的作品加以改编，选用其中能使儿童感兴趣的东西，扬弃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举例来说，孩子们非常爱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爱读印第安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往往把印第安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民看作没有前途的民族。这些故事多半是用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写的，把印第安人污蔑为注定受剥削的下等种族。孩子们读这种书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觉察到这一点，不过多少会产生一种不快之感。在改编这些书的时候，要把这些地方都删掉。这是一项重大的工作，工作量非常大。我觉得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吸收一些人来编书，来编教科书。我们正在发动全体教师参加这一工作。改编工作可能不尽完善，还需进行修订，但这项工作体现了一种很可贵的思想。

不久前我检查了《儿童教育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我们出版过儿童百科全书，但却没有出版过儿童教育百科全书，特别是按综合教学法编写的这种百科全书，因为它有助于儿童了解各种材

料。这种主张本身是很有意思的。这项工作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极难做到的。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了这种主张。要鼓励这种主张。编辑委员会应在该书发起人和其他许多教师的帮助下全面研究这一主张，并且制定一个进一步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总的计划。要成立一个由专家或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小组。这样工作就能取得重大的、有意义的成果。重要的是对这方面的任何主张都要支持。孩子们很欢迎儿童教育百科辞典。我曾经看到孩子们对拉霍斯^⑦主编的百科全书爱不释手，逐页翻阅，看里面的插图，等等。当然，我们不是想给孩子们提供拉霍斯主编的百科全书，而是更有用处、更有意义、更好理解的材料，不是什么徽章、旗帜、招牌等等，而是生动有趣、很有意义的材料。同时，一级学校学生使用的百科全书应该是介乎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之间的东西。我认为对编辑出版这种百科全书应加以研究。

现行的一些图书可能有很多疏漏，形式也不可取，但重要的是如何发动大家把工作做好，经常进行指导。目前，在编写儿童读物的时候，要考虑什么样的书才能使当代儿童最感兴趣，使不同年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儿童最感兴趣。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吸收教师参加这一工作，而且还要吸收图书馆管理员和儿童本人来参加这一工作。从儿童们寄来的东西中，从他们的练习本上，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进行研究工作的，他们是怎样做题、写短文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们对这项工作的兴趣，远比我们估计的要浓得多。

我国急需教科书、教具和图书。这项工作是很迫切的，必要的，因为它对教师和学生都很有帮助。现在大家议论纷纷，说是教学大纲与熟巧的培养脱节，这只是说明教师的负担过重，教学法水平不高。而主要原因在于教师没有时间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会议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我还想稍微谈一谈二级学校的教科书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
工作搞得很糟。我们今年了解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职业教育管

理总局^⑧向我们提出中等技校的最低知识量究竟是多少的问题。原来，我们几乎不可能提供二级学校所需要的社会学科的书来。当然，这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要特别重视集体活动、社会公益工作等这类问题，因为二级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的范围应该比一级学校的大得多。毫无疑问，集体劳动的熟巧在二级学校要比在一级学校牢固得多。而且，既然我们在一级学校里创造性地进行了编写教科书这件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我们对二级学校的教科书编写工作就更应该搞得深入扎实些，特别在社会学科方面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闭 幕 词

我想谈几点意见。许多同志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教科书必须与教学大纲保持极密切的联系。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是，有些发言的同志对教学大纲表示不满，说是大纲份量过重。情况也可能是这样，不过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里谈，而应在教学大纲编审委员会上谈，由该会加以删减。

自学用书(一级学校)是否应编入语言和数学课并使它与单元^⑨结合起来呢？我认为应该这样。拿数学作例子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单元都可以提供一些从数学上进行研究的材料，得到一些由生活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材料。我们要揭示其间的联系。这种做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不如此儿童们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学习数学。儿童们要做的许多练习，可以另编成册，作为独立的作业，但是要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让他们做这种习题，为什么他们必须背会乘法表。对语言课也要如此。每当碰到生动具体而且兴味盎然的材料时，儿童们自然就产生了一种愿望，如何更加明确清楚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利用这种要求，把它引上学习语言的正轨。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地方特点。每当翻阅地方文学作品时，常常听到一种意见，就是如果你要研究一个乡村，那就不要超越这个乡村的范围，——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离开这个乡村的大门。我认为这样来解释考虑地方特点是牵强附会、很不正确的。所谓考虑地方特点，就是要使儿童能够评价、分析周围的现象，并由此向前发展下去。由周围环境产生的印象可能相当深刻，可能唤起对类似现象的浓厚兴趣，但这决不是说，对别的东西就绝口不提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出发点而已。

再谈一下有关童话的问题。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说，锯末和凡士林是难于消化的食品，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难道周围的生活在其研究过程中会仅仅是一堆锯末吗？难道其中没有一点引人入胜之处吗？难道只有童话才是儿童们能够受用的食品吗？童话与童话各有不同。我曾经碰到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只有七岁左右，她读过很多童话。这个七岁的孩子问道：“女妖是什么样子？”她确信女妖是的确存在的。当你告诉她，母鸡发现老鹰飞来时，就把小鸡雏拢在自己的翅膀之下，她会问您：“这是童话吧？”她把现实的东西与虚构的东西混为一谈了。

有些童话就是把实际与幻想混为一谈的。童年往往令人终生难以忘怀，而许多童话中又含有一些神秘莫测的东西。儿童日后当然要证实这些东西，他要解开这些神秘之谜，办法是打破旧的看法，因此我们对待童话问题要特别谨慎。当然，如果童话里只谈小狗或小猫，那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为每个小孩都很清楚这是虚构的，但童话里往往没有这些东西。因为童话里有很多暗示的东西，而所暗示的东西可能冠冕堂皇，实际上对儿童的智力却极其有害。许多民间故事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儿童们很喜欢这种故事，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认

*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我国的教科书十分枯燥无味，毫不令人感兴趣，把这种教科书发给儿童，无异于把锯末拌凡士林当作食品发给他们一样。——作者

为儿童只关心小孩子、玩具和游戏，那就大错特错了。民间故事通常反映的是过去的事；现在生活大大变化了，而这种故事反映的不是现时，而是既往。我们很少从成人生活中给儿童提供一些鲜明的现代形象，儿童们往往在童话中去寻找，而童话里的英雄人物却是小私有者，损人利己的人。

现代的儿童不同于从前的儿童。环境改变了，儿童也在变化，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有农村的儿童、城市的儿童；有来自穷乡僻壤的儿童；有的儿童见多识广，他在国内战争所在地住过，见过很多世面；有的儿童所住的地方却没有经历过这些事。要善于判断、了解这个孩子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有时您问一个孩子喜欢读什么东西，他往往会说：“童话。”但他是否了解通过童话形式向他灌输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往往只是对一些生活情节感兴趣，而我们却向他灌输一些他不需要的虚幻的东西。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我认为，当代的教科书应该充满共产主义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每句话都要提到共产主义。举例说，有一本二年级的教科书中，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题：指出在哪些句子里可以使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坐在那里绞尽脑汁。“共产主义”一词不难找到：“共产主义万岁！”这道题算是做出来了。“共产主义的”这个词就比较难找了。“社会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妈妈，什么叫社会主义？”妈妈说：“先别管这个！”“我怎么能不管呢？这是做功课呀！”我当然坚决反对做这种枯燥无味的练习，反对去下定义、抠概念。所谓教科书应该充满共产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这绝不是说我们口口声声都要提到“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这些词，而且还要把它用于语法上的各种“格”。要使教科书做到这一点，就要通过歌曲、通过故事使集体主义真正成为儿童放在首位的东西。

我有时看到一些不怎么样的教科书。例如，我记得一个共产党员写的一本教科书。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共产主义”这个词，然

而与此同时却明显地散布了小市民的道德观。书里不谈斗争精神、大胆的探求精神和真正的集体主义，列在首位的却是“我的家”、“我的农庄”等等。总之，都是“我的这”、“我的那”。有一位从国外来的同志说到，他从美国到苏联后感到最为惊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美国无时无刻不听到“我、我、我”。而在俄国则相反，大家都说“我们，我们，我们”。例如，孩子们放学时说：“我们进行了某个单元。”红军战士也好，代表也好，他们总是讲“我们如何如何”。

我认为，这个小例子说明，编写一本书，很可能表面上^⑩都符合共产主义准则，可是内容上却充满小私有者精神、小市民习气。问题的关键在于书中是否体现了共产主义风尚。我们有很多书都以共产主义自诩。但是，真正充满了集体主义精神并且以儿童所感兴趣的材料来吸引他们的书，却是非常之少。我认为应该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而且周围的生活又不是那么平淡无奇，不要使人觉得必须在童话中才能做到超凡脱俗。莫斯科市的每个孩子目前肯定关心什么是工会，什么是英国工人的斗争。在解释什么是工会时，可能讲得枯燥无味，但是也可以用图片来说明，使孩子们很快就明白什么是工会。

我还想谈谈有关列宁的问题。教科书中总是把列宁描绘成一位热爱儿童的长老。我坚决反对这种“童稚化”的作法。它歪曲了列宁的形象，把他描绘成“适合”儿童口味的人，这种作法是很不妥当的。难道十岁、十一岁的儿童在学校里不了解工人和农民过去生活很苦，就会去参加斗争？为什么不提列宁如何参加他们的这一斗争？要向儿童介绍列宁的真实形象，而不是杜撰的、“适合”儿童口味的形象。

既然我们真想编写一本符合要求的读物，那我们就应该深入观察周围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量的材料来编写孩子们所需要的书。孩子们在期待！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 一级学校教学大纲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其方针是向学生介绍周围的生活环境。这些教学大纲旨在以集体主义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教育儿童，而这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学校所必需的。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订的教学大纲已普遍采用。来自乡村的农民常常谈到大纲，偶然聚集在救世主耶稣基督教堂里的群众也在热烈地议论大纲。这些大纲究竟是好还是坏？

对此还无一个肯定的共产主义的意见。经常可以听到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反映说：“应该教孩子们会读会写，不要在那里变戏法、玩花样，搞什么单元教学^①。”但是，如果你要问他是否见过或读过这些教学大纲，他会说，既未见过，更未读过，但是他知道，他的八岁的小女儿一点也不会读书。原来如此。要是这位共产党员把大纲找来看看，就会发现那里讲的都是些最基本的东西：一年的四季，儿童周围的自然界，水，空气，太阳能和阳光，土壤的特点，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人体构造和生命，保健知识。大纲中谈到了父母的劳动，谈到了周围的人的劳动，谈到了农民的劳动和工人的劳动，谈到了田野和工厂。大纲中还谈到了邮电交通，城市和农村，谈到了商品交换，合作社，苏维埃，农民互助会，革命节日。高年级的学生（11—12岁）通过学习本地区 and 共和国的情况，就了解了它的经济，了解了苏维埃政权和其

他各国的情况。

大纲里是否有孩子们不懂的地方，有他们不需要的知识？无疑，这些大纲不同于旧时的大纲。康·德·乌申斯基是一位老教育家，他对俄国整个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主张在初等教育阶段就必须对周围的生活有一个了解，必须通过周围的具体材料来学习语言、语法、算术。每一位老教师都知道教育上的这一真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大纲吸取了乌申斯基的观点，但与乌申斯基教孩子学习的方法完全不同。

区别并不在于乌申斯基认为孩子们应学习读、写和算，而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却否定识字教学。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乌申斯基的教学法在俄国教育界已是根深蒂固，每一个熟悉这种教学法的教师都很清楚，应该怎样把阅读、书写和算术的教学与研究具体的实际联系起来。一切有关培养熟巧的叫嚷，关于不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而要培养熟巧的叫嚷，都是想让我们回到过去的时代，甚至不是回到革命前学校的时代，而是回到改革前学校的时代^②。

但是，乌申斯基时代的教学大纲与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之间是有霄壤之别的。那时要上神学课，学斯拉夫文，现在则不用了。当时书本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劝告：“孩子们，好好念书吧！上帝不许人偷懒。”现在我们不这样讲了。当时还讲灵魂，它可以飞离人体。现在我们不这样讲了。当时常讲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和露西的洗礼。现在讲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十月革命。当时既没有苏维埃，也没有合作社，只有教堂、沙皇和地主。当时没有沸腾的新生活。

我们采用了乌申斯基的方法，而我们的教学内容却是新的。结果怎样呢？我试引用《教师报》转给我的一位女教师的来信。这封信引人注意的是，它是一位精通乌申斯基教学法的旧时女教师写的。信的内容如下：

“我执教农村中学四十三年之久。我极其热爱自己的事业和学

生，但是在过去的学校里，由于教学脱离生活，使我极为苦恼。因此我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很感兴趣，那是不足为奇的。1924年整个夏季我致力于教学大纲的研究。秋季开学时，我即按新大纲给一年级授课。最初几课我就发现，教学与生活有了联系。课堂教学经常进行得生动活泼，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效果极为突出。我校一年级和二年级^③学生的水平从来没有这么高。在过去的学校里，有一现象使我极为痛心：孩子们入学时兴高采烈，求知欲极盛。但是，时隔两月，生动活泼的气氛荡然无存。而在新式学校里，孩子们在第二学年仍与刚入学时一样生气勃勃。他们的观察力大为提高。旧时学校高年级学生无法说明的周围生活中的诸种现象，新式学校低年级的学生能讲得头头是道。不过我手边没有必要的教科书，也无必要的教具。如果我有教科书和教具，那我岂只是教一个年级！当然，成绩也很快会变得优异得多。”

当然，这位女教师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吧？不过，在教师代表大会上^④，我听到好几十位教师称赞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并讲了他们执行这一大纲的情况。

我知道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有许多意见。一些没有教育学素养的教师感到大纲很难。特别感到困难的，是因为往往没有教科书、纸和铅笔，没有儿童读物，而让教师们承担了他们以前从未承担过的任务——教学生阅读而没有书，教学生写字却没有纸，等等。我们学校所处的困难条件，自然增加了执行国家学术委员会大纲的困难。

现在，教师总的说来是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了，不过在有些大城市里水平较高的教师中间，偶尔（诚然，不是经常）还可听到这样的议论：“可以向孩子们讲列宁的葬礼，教他们唱《国际歌》，却不能向他们讲革命前还有剥削工农的地主和资本家，因为这些概念是当代儿童不理解的。”这些教师对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也是不满意的。当然，我要重说一遍，这种人为数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对国家学术委员会大纲的态度。不久前，这些大纲译成了法语。比利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中央机关报《火星》对大纲作了评述。该报对大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说：“苏维埃共和国的教学大纲使学校具有了革命性质和政治性质：大纲的这一部分应该坚决删除，因为它破坏了学校的气氛。相反的，大纲的教学部分却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在表述上往往不清楚，这使原文不够确切明了。不过应该承认，这个大纲是建立在可靠的心理学基础上的：它向教师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要激发和发展儿童对周围生活的兴趣；培养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此外，在这一部分都能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研究本族语、算术、自然学科。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件，因为把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加以对比总是有益的，即使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也无所谓。”

总之，摇摆于巴黎教师国际^⑤和阿姆斯特丹^⑥之间的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认为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教学大纲从教学法观点看来是值得称道的，但对它的革命精神却咒骂不休。这是很高的奖赏。

去年到我国访问的有许多外国教师——有共产党人，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也有非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态度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指出我国学校具有革命精神，学校与生活保持了密切联系，在教学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融洽无间；大家一致赞扬我国儿童朝气蓬勃，很有教养。德国、美国等外国教育报刊都对我国学校进行了评价。我们自己倾向于多看我国学校的缺点，少谈我国学校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以偏概全，要把我国学校变为旧时的读书学校，扬弃它的革命内容，抛开它的全部教学法上的成就，那就大错特错了。

谈流氓行为问题

农村青年渴求知识，但我们却很少去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无所事事，他们就游手好闲，养成了流氓习气。我们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要在文化上为广大青年服务。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了解了一下特维尔农村的生活情况。今天的农村已不同于旧时的农村。农村的兴趣变了，农村的要求也变了。因循守旧之风已成过去。农村的各级组织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工作。妇女代表们从邻村发现了一台地方自治会时期留下的缝纫机，通过乡执委会^①领来之后，立即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农互会^②开办了一个锯木厂，那台旧机器一开动起来就摇晃，随时都有可能伤害工人。但是他们用这台过时的机器赚了两千卢布，拿去买了一个新机架。乡执委会把一切都油漆粉刷一新，邮局改成了医院，办事员在地里走来走去，用卷尺丈量土地，口里说：邻村正在搞新的土地规划，咱们也得动手了。他们考虑必须马上修一条路通往伏尔加河，以便流送木材，一定要恢复制材厂，等等。农村的要求很高：几乎每家每户都订了报，全体农民都是统消社^③的社员，都是农业合作社（农民称为“部”）的社员。现在该村有十七个居民点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少先队员所见皆是。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农村的文化服务工作做得太差。学校的玻璃全是破的：流动电影放映队来了，在学校里放映了一场，于是窗子就被打破了。农村阅览室里都是一些从过去地主庄园里弄来的旧书。在乡教师大会上，农民说青年们无处可去，他们想学手艺，可是

没地方可学。目前农村的各种组织不少，却没有学习的场所。至多是共青团支部有一间好的房子，而其余的青年却无处聚会，只好在街头巷尾胡扯。结果，附近一个村子的几个小伙子把一个女孩子在谷物干燥室里强奸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干的，这几个小伙子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很能干活。这次都判了几年徒刑。没有房子供青年们开会学习之用。十月革命之后到处成立了戏剧小组，各地都在演戏。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曾说：“我国一个省的剧院比全法国还多。青年们当时是多么喜欢戏剧啊！戏剧里充满了力量和激情，它使青年们大受鼓舞！”克鲁普斯卡雅同志，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化妆用品都没有，可是我们剧本已写好了。”学校里开始演起戏来。这说明教师的生活已成了苦役，孩子们无处学习。现在，青年们撤出了学校，学校又成了孩子们的天下。学校可以整天学习了。可是青年们呢？他们没有地方可呆。艺术的组织作用在农村削弱了。流动电影放映队无处放映，没有房子，也无处听广播。农村修建群众文化馆^④的问题成了一个极为迫切重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村青年的流氓行为势将日益严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青年在农村无处学习。在特维尔省，孩子们念完四年制学校之后，不分青红皂白，都得到特维尔市去念七年制学校。女孩子们还好办，她们可以替别人看房子，照管孩子，小伙子却没有人愿收留。由于在农村学不到知识，进城的愿望日益强烈。我在莫斯科也看到了类似特维尔省渴望学习的情况。今年，农村热衷于上工农速成中学，而录取的人只有十分之一。于是有的成年人垂头丧气，甚至号啕大哭，因为他们认为上工农速成中学是一生中的大事。他们把自己积蓄的零钱当路费，忍饥挨饿，在街心公园露宿，就是不肯回农村。旧时的农村从来没有像新农村这样尖锐地感到自己的愚昧无知。按老样子过日子不行了，可是又不会按新方式安排生活。不久前，一个上工农速成中学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青年农民建立了《走向共产主义之

路》农业劳动组合，可是干起活来什么也不会，不知从何下手；于是《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就派我来上工农速成中学。我们什么也不会，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他却怀着绝望的心情读了这样的通告，说是工农速成中学名额已满，一个人也不再录取了。

农村的老太婆说：“青年们到哪里去？过去我们学手艺，经常被拧耳朵，终于学到了本事，可现在怎样呢？”这是老太婆们的议论。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民说：“我们农村的人会干事的很少，但现在的生活、农活却要我们比过去有更大的本事。我们得会做饲料槽，会修理农业机器，会磨工具，等等。”

当我们听到这些谈话时，就不禁回忆起列宁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所写的关于“地方流通的口号”，对于小工业的论述。“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恢复大工业。可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比较认真地有系统地着手恢复这种大工业，我们就需要恢复小工业。”^⑤只要看一看农村的日常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发展小的流通、提高地方手工业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对青年进行职业教育。但是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发展这种职业教育，在农村进行这一教育。

农村青年有流氓行为，这不好，不像话。但要避免发生这种事情，就得修建人民文化馆，使青年们能在那里学习、唱歌、看电影、听广播、演剧，能在那里有组织地从事艺术活动。目前政治教育委员会还没得到一点修建人民文化宫的经费，而这是极迫切的。

发展农村成人学校以利于识字青年学习，这笔经费是由地方支出的，因而工作进展很慢。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很慢，尽管共青团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尽管成年男女农民在这方面要求很强烈。

没有中央的帮助，地方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农民自己还在观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呢？不久前，平扎省、唐波夫省和撒马尔省的教师向我说明了原委。如果学校、

农村阅览室的水平太低，如果学校里的窗户都打破了，如果农村阅览室连电灯也没有，那么，谁也不会来帮忙的。一旦学校有了书，稍为走上了正轨；农村阅览室的状况有了某些改进，居民就会非常积极地乐于进行帮助。不过对待这种帮助要特别慎重，不要对这种活动进行行政干涉。

需要有一定文化机关的设备，有一定的条件，这样大家就会来帮助，就会热情支持。不幸的是许多地方的设备都很可怜，危楼险房使居民的热情受到挫伤。目前在居民的要求和满足这些要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青年人比谁都尖锐地感到这些矛盾。

农村青年向往城市，这往往是一部分最积极的青年。城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对他们的关心很差。我们没有地方接纳他们，不能对他们施加任何影响，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变态的情绪。由于无所事事，因此就产生了流氓行为。这部分青年的情绪不可能不影响城市青年。城市里的青年工人有俱乐部（不管办得好坏如何）可去，而属于工人阶级的青年手工业工人却无任何可以消遣的地方，更主要的是，他们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我觉得，青年中产生了流氓行为这件事，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在文化上为广大青年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共青团面前，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也摆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面前，而且不仅是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工作，需要各级党、苏维埃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单枪匹马是一事无成的。

关心农村青年，关心从农村来的青年，关心工人阶级各阶层青年，这是我们目前很薄弱的一环。

苏维埃和学校公益工作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①分析了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指出改进苏维埃机关的途径在于进一步吸引广大工农群众来管理国家。这并非是一种新主张，而不过是我国宪法原理的一个发展。

苏维埃学校不是平白无故地称为苏维埃学校的。它是苏联各种组织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我国学校不止是向儿童传授一定知识和熟巧的“机构”，我们苏维埃学校日益成为朝气蓬勃的社会组织，它与其他社会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还未能完全做到名副其实，但正在逐步做到这一点。去年一年我们热烈地讨论了学校社会公益工作的问题。教师已经成了社会活动家，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一前提，就不能使学校成为用社会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中心。发动学校参加社会公益工作又为实现这一目的创造了另一前提条件：社会公益工作可以使学校本身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成为一个社会组织。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是说我们只是在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等等。这只不过是我们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建设还在于把社会本身变为一个按计划、自觉行事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意味着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人们的愿望、意向和情感。人也在发生变化，它将成为一个把个人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融为一体的具有深刻社会性的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②社会主义就是组织群众；要使

人民中所觉悟到的东西和适于创造的东西都汇入到组织中去。“先进工人在没有学会组织几千万人以前，他们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还没有获得必要的组织知识。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要求我们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工作和具备我们现在还很缺乏的相当的知识。”^③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列宁是多么重视组织广大群众。所以，我们在建设苏维埃学校时，就不能忽略学校应该把儿童培养成新人，培养成社会活动家和优秀的社会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就特别重要，因为通过这项工作可以使青年一代受到社会的教育。

全部问题在于如何组织这项工作。

通过各级苏维埃是组织群众的一种途径。

如果我们认真考虑一下这一道理，那我们就会发现，对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也应得出同样的结论。这项工作应与苏维埃的工作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与其他的苏维埃组织并肩前进。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如果能与各级苏维埃的工作联系起来，它就不会是偶然为之的工作了。农村的学校与村苏维埃和乡执行委员会关系比较密切，早已走上了这条道路。市苏维埃的情况就比较差了。所以我想谈的正是如何加强学校公益工作与市苏维埃工作的联系的问题。

市苏维埃的各种措施和市苏维埃的工作应该让广大群众了解，连偏远的角落也不要漏掉；同时还应依靠群众的积极帮助。报刊要广泛宣传市苏维埃的各种决定，苏维埃代表要在所在的单位做报告来宣传这些决定。尽管我们知道报纸现在已发行到群众手上，但却不能说读报工作搞得十分理想。尽管代表们常常做报告，但这些报告并非总是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

学校可以做的工作是什么呢？首先，它应关心市苏维埃的工作——在这方面，二级学校、工厂艺徒学校^④、中等技术学校的工作特别重要。学生在学校的帮助下应该获得明确理解市苏维埃决

定所必需具备的知识。学生应负责在家中宣传这些决定，负责在最落后的居民中宣传这些决定，关心读报工作的进行情况，看看大家是否听懂了。

有许多工作是应该由居民去完成的。例如与卫生保健有关的工作，照看孩子，保持住宅清洁整齐，美化环境，安排学校的早餐，帮助合作社，等等。

在这方面，学校可以做许多实际工作。这种工作不胜枚举。

有时有些学校不与其他苏维埃组织合作而独自从事某项社会公益工作，而所承担的任务又是其力不胜任的。

学校应使自己的工作与苏维埃联系起来，只承担能够胜任的那一部分工作。与学校一起进行工作的，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学校应该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也会帮助学校进行工作。围绕苏维埃的日常活动(特别是市苏维埃的日常活动)来开展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这是由手工业方式向计划性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向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迈出的第一步。要立即实际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工厂的七年制中学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单位。工农速成中学是一种临时性的机构，因为它需要国家很多钱，而且使精力充沛的青年工人脱离生产，脱离正常的生活。过去由于没有开办七年制中学，就只好使工厂艺徒学校大大延长学习时期，结果仍然是花钱不少。执行节约的制度就要求我们迅速在工厂区开办七年制中学。

这种学校应该怎样建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谈谈顺利发展这类学校所必需的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种学校的教师要具备相应的素养。学校的负责人和教职工必须了解所在工厂的情况，必须了解该工厂所从事的生产，了解该厂的历史、日常生活、文化水平、男女工人所关心的事情。

为此，教师就必须对工厂的情况进行研究，阅读有关的书籍。此外，教师还必须参加全厂大会，出席生产会议，等等。

如果对全厂和厂内生产的情况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不可能正确地安排学校的工作。

因此，必须给工厂的教师发一些了解工厂情况的详细图表以及必要的书目，向他们介绍共产主义教育学院^②对教师进行生产培养的经验。

要向他们介绍诺沃兹布科夫中等师范学校的经验和其他师资培训班的经验。

另一个前提条件是，要让工人群众和厂内的行政部门重视学校。工人群众通常是关心学校工作的。必须形成一种习惯，定期就青年的发展问题、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如何通俗化的问题进行调查、座谈。在许多问题上，都要了解群众的意见如何，评价怎样。像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问题也应在成人大会上加以讨论，把它与全厂的社会公益工作联系起来。在这样讨论学校工作的过程中，就会涌现出一批直接承担学校一部分工作的工人，如：有的工人向孩子们讲工厂的历史，有的工人领导技术小组，有的讲解机器的使用、介绍产品的质量，等等。

与此同时，还必须让行政部门关心这项工作。它可能不会在物质上白白给予支援，但要让它卖给学校一点废料，拨给学校几间房子作工厂展览室用，准许学生去参观，等等。

要采取各种办法取得行政部门的支持，如：通过党支部、妇女代表施加影响，把问题提到市苏维埃去，把事情公诸于众，出售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刊等等。

至于说到教学大纲(亦即教学内容)，那么，七年制中学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也就是说，其目的是授予少年儿童这样一些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和能力是他们今后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需的。每个少年儿童都要学会读、写、算；都要了解周围的生活，懂得它与全国生活、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活的联系。每个少年儿童都要有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了解人类的历史，懂得地理。每个少年儿童都应知道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基本规律。每个少年儿童应该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应该知道如何建设新生活。

每个少年儿童都应学会会有组织地、集体地进行工作，会使用各种工具，等等。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不讲授专业知识。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按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般大纲^③进行教学工作，而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特点是要了解周围的生活，要研究、分析、思考少年儿童周围的具体环境。而工厂

附设七年制中学周围具体的现实就是工厂，就是工厂的劳动、工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要从工厂的生产、生活中补充一些事例来丰富大纲的内容。

下面举几个例子。

假设这所学校附设在一个纺织工厂内，那里纺织、印染各种亚麻布。不言而喻，研究亚麻和亚麻业及其发展条件在这所学校就特别重要。在学习有关农村的内容时，就要特别注意栽培亚麻的地区，注意这些地区土壤肥料的特点，手工加工的特点；比较手工加工与机器生产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占有特殊地位的还有当地农民和工厂的相互关系问题、相应发展榨油业的问题，等等。在进行劳动教学时，要特别注意纤维物的加工，注意纺织的过程，注意对织布机的分析，注意改变织物形状的化学过程，注意花色，注意妇女的劳动条件，注意劳保条件的实施，注意通风设备以及休息的安排，等等。

但是，教员在谈到亚麻业的时候，不仅要讲亚麻种植，还要一般地讲讲土地的翻耕，讲讲每种作物的生长如何受温度、土壤湿度、土壤翻耕等条件的影响。亚麻只是一个例子。关于卫生，关于人体的活动也要一般地讲一讲。打麻车间和染色车间不卫生的环境只作为一个例子。

当然，这种作法还不能算作职业培训，但它却为这种培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这种培训工作进行起来要容易得多了。

并非所有上七年制中学的孩子都要去上工厂学校的。有一部分孩子在学习花色选配、染织、绘图（这些都是纺织工业所需要的）后，他们不想上工厂学校，而想上美术学校了；学生们学了各种织物及其质量特点之后，可能不想上学习如何生产这种织物的工厂学校，而是想去当营业员，出售这种织物；女学生则想去当裁缝，等等。但是不管怎样，学校将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工作能力。

任何一种生产部门都包括许多种职业。全面地研究这一部门，而且研究得愈深刻，那么儿童(少年)就会对各种职业获得一个概念，就会了解这些职业的实质，各种职业的工作特点，这样，他将来就能比较自觉地选择职业。

熟悉工厂、工厂的工作、工人的生活对那些今后不在工厂工作的人也将产生教育上的影响。因为工厂使他们懂得了有计划地组织集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明白了组织劳动所具有的力量，更加认识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以及他们团结友爱的精神。工厂使他们懂得，人一旦学会了控制自然力就能做出多少事情。工厂使他们懂得了各种自然现象的成因。群众对不久前胜利结束的革命斗争的回忆，将大大激发少年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工厂生活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教育青年一代。

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应该使少年的劳动得到保护，不要让他们过度疲劳。

机器劳动是很单调的。单调的劳动容易使人疲劳不堪，并且扼杀人的首创精神。例如，纺织工人就存在这种情况。

有些局部任务与总的任务有着有机的联系，我想谈谈其中的一项，即选择儿童图书的事。图书的选择特别重要。对工厂区说来，特别要注意多收藏一些能培养对技术、物理、化学感兴趣的图书。工人要有技术情趣。还要有一些能使儿童了解工人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在当代的作用的图书。这种书目前很少。要编印一些这样的书。多少得有一些。

另一项任务就是在学生中开展建立青年技术知识普及协会的活动。

工人区的居住条件目前还很不好。母亲们整天不在家。家长从工厂下班回家后已是精疲力竭。发展全日制的七年制中学是当务之急。但全日制不应是整天读书，而应该合理地安排学习和游戏。特别要注意成立物理、化学的研究小组和培养各种技术能力

的小组。

例如，模型小组就特别重要。绘画小组也很重要。在工厂设立展览室早已列入议事日程，展览室可以反映工厂的组织机构，厂内的劳动组织，工厂的历史，全厂的生产情况，等等。工厂学校曾考虑过设立这种展览室，但是，由于领导上人手不足，工作安排不当，以及工厂学校的负担过重，因此工作进展不大。要发动七年制中学的教师、关心学校的工人和七年制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来参加，这样工作就会有进展。

发展工厂附设的七年制中学将给七年制中学的全部工作注入新的血液，使这类学校获得生命力，而这正是它们所欠缺的。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①的整个报告说明，这次普及教育会议上即将通过的决议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此外，您们每个人都与各地的农民、与广大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您们知道，劳动群众将把您们的决议当作一项政治决议。

工人和农民对国民教育问题十分关心，十分热情。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引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3年写的《日记摘录》^②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目前必须特别关心初级国民教育问题，整个国家预算应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考虑到国民教育问题的政治重要性，特别强调初等国民教育问题的政治重要性。

1925年1月召开的全苏教师代表大会^③显示了国民教育的力量，显示了初等教育的力量，因为参加这次全苏教师代表大会的大部分是国民教师。当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其他许多负责同志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演说，这些演说向群众充分表明了对国民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

那次大会到现在快两年了。因此现在还说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段时期对这一问题不够重视，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在文化领域不可能像在军事领域那样快取得胜利，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我们对工作还是抓得很紧的，但是，

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要想取得必要的成果，就必须使全国，使中央各部，还有人民委员会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并协助教育人民委员部开展这项工作。

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决议应该予以通过。但是我反对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在大会上的提案。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普及教育委员会，而又提不出这个委员会应该做什么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目标可能有二：或者是它担负教育人民委员部同样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有两个部门搞同一种工作；或者是它把宗旨定为支持劳动群众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巨大首倡精神。

应该指出的是，各地对这种首倡精神往往重视不够。常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农民想办学，自己筹集了一笔钱，可是国民教育处却说：“这笔钱太少，办不了一个好学校，还是别办了。”我们都很清楚，对任何首倡精神只有千方百计加以支持才对。

工农监察部提议设立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呢？怎样组成呢？它对下面的这种首倡精神能否加以支持，并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呢？我不知道此事该如何安排才好。如果工农监察部是想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那当然首先是把这笔基金用于支持居民的首倡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地推动普及教育向前发展。

在这里，我还应该再一次指出，相信群众，关心群众在日常工作中的创造，是我党的一贯作风。各级国民教育机构和地方执行委员会应该热情关心群众的这种首倡精神。如果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那我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它还是旧时识字委员会^④那样的机构，那么，尽管名称改了，不叫识字委员会，而叫普及教育委员会，那它的工作只不过是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雷同，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这种委员会。

其次，雅柯夫列夫同志^⑤在会上反对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⑥。我想谈点意见。教学大纲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问题不在方法，而在教学大纲，即需要讲授的内容。我曾不止一次地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这个问题，他对教学大纲是极其重视的，我们的教学大纲要培养青年一代具有深刻认识周围生活的能力，具有找到改善这种生活的办法的能力。

我们在讨论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教学方法(议论单元教学法是好是坏)上，而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合适，即教学大纲是否包括了我们想授予儿童的东西。只谈单元教学法容易把思想搞乱，因为很多教师不喜欢大纲的内容，原因是这个内容是新的，是革命的，所以单元教学法问题容易把他们搞糊涂。问题的实质不在方法，而在内容。当然，如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出面决定应该采用什么教学法，那是不可思议的。要作决定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应该作出必须建立我们所需要的新学校的决定。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个问题上会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诸位委员的大力支持。

工农监察部还有一个提议是我坚决反对的。这就是他们主张把我国学校从四年制改为三年制。我们必须明确，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目前我们不能在许多地区向群众宣布把四年制学校缩短为三年制。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缩短学制(尽管在个别情况下)是行得通的，那也只是说有些地方没有怎么反对而已。我们甚至应该把落后地区的学校延长为四年制。如果我们主张搞三年制，这显然会被人们认为是降低要求，而降低要求则是完全违背群众意愿的。

以特维尔省为例，那里的农村甚至对四年制也不满足。在特维尔省常有这样的事：四年制学校的毕业生带着户口进城去继续上七年制学校。

面对这种渴求知识的情况，我们却说无力开办四年制学校，只能搞三年制；我觉得，这简直令人难以理解。

当然，我国不同地区的国民教育状况是不同的。政治教育委员会不久前对各地11岁至35岁的文盲人数作了一个统计，具体情

况是：中央工业区11岁至35岁的文盲不到5%，而中央黑土地地区的却占20%以上，中部伏尔加地区的文盲占23%。由此可见，各地区有各地区的情况。

目前，我们应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首先要考虑每个地区的力量和条件。不应该把经费都集中使用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为这两地都能筹集到经费；但对沃龙涅什省或唐波夫省这样的省，我们却应该加以帮助，以便把那里的国民教育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人民委员会拨出了一笔专款资助中央黑土地地区。对其他地区的教育资助也应如此。不能使一种国民教育形式与另一种脱节。不能说我们现在只应关心改善一级学校而对其余的则不闻不问——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发展校外初等国民教育。托尔斯泰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知书识礼的母亲绝不会养育一字不识的孩子。”

要创造出一种群策群力，共同帮助，加强联系的气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即将通过的决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这一决定发布一个相应的通知，各地来的同志应把这一决定当作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向各地汇报，并协助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

谈儿童读物问题

1. 学龄前儿童读物

学龄前儿童是什么样的—种生命体呢？

首先，他是一种毫无阅历的生命体。他还不知道图片上画的女孩能不能跑；不知道小猫会不会说人话；有没有浅色的母牛，绿色的小狗。对他说来，世界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正是他力图认识的。

凡是为学龄前儿童写书的人，都应该帮助他们认识世界，而不应把他们引入歧途。因此，学龄前儿童读物应该极其现实，但它同时又不能太狭隘（不应该只讲小猫小狗），而应该反映实际生活。图片要反映大人的劳动和生活，反映不同地位和职业的人，以及乡村和城市的风貌，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扩大儿童的视野，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兴趣并不亚于杜撰的菲亚仙女，美人鱼公主以及其他胡编的东西。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的形象会阻碍儿童的发展。此外，童年的印象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因此不要让他们受一些恶劣形象的影响，如扑向儿童的恶狼或者妖魔鬼怪，因为儿童会梦见这些东西，不断在眼前出现这些东西。学龄前时期极易播下神秘的种子。

图片要用厚纸粘好，因为孩子们为了更好地认识所描绘的对象，很容易把图片撕坏。

还要考虑到儿童的模仿力很强。所以不要画打架斗殴、丑态鬼脸，等等。孩子们往往会去机械地模仿这些东西。最好画一些大孩子帮助幼童，这个幼童帮助另一个幼童的场面，等等。

至于说引人发笑的东西，那就不应忘了：成人感到可笑的东西，幼童可能感到完全不可笑，因为可笑的东西是一些违反自然的现象的综合，而小孩子还不懂得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违反自然的。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是认真严肃的。对幼儿说来，笑只是欢乐的表示。他们往往问正在发笑的大人：“你高兴什么？”

他们也不大懂得忧伤。他们知道冷，知道饿，挨打时知道疼，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大懂得。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词语的记忆力特别强。他们能记住大量的句子，整篇整页的诗，很复杂的短语，却不大注意这些词语的含义。为学龄前儿童写书的作家，不必故意迁就孩子的说法，去另搞一套什么专门的儿童语言，表达的形式应该合乎文学、艺术的要求。在这一年龄阶段，应该用一些新词语来丰富儿童的语言，这些词语表达的概念，儿童以后是会懂得的。他们目前感兴趣的只是形式。形式与内容对他们说来是不可分割的。学龄前儿童不允许随便更动诗歌中的词语，他不允许穿浅蓝色衣服的女孩子在另一幅图画上突然变成穿红色衣服的。

儿童喜欢在诗中有重复的诗节，喜欢听别人没完没了地讲同一条狗、同一个女孩子的故事。我们应该满足儿童的这一要求。学龄前儿童喜欢翻来复去看一本书，他们并不追求新奇。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为学龄前儿童编写几本装帧精美的优秀读物，数量不必多，但装帧要好，内容能使儿童感到亲切易懂。

2. 8—13岁儿童的读物

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已经有了生活经验。他们懂得了：小猫

小狗不会说人话，脸盆和刷子不会在房间里打滚。八、九岁的儿童是很讲实际的。讲马和狗的故事不会使他们感到茫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能了解所观察到的周围的世界，未来的东西，他们向往那些他们目前还不了解，但企图了解的东西。10—13岁的儿童很喜欢读儒勒·凡尔纳、曼·李德的书，因为这些书可以扩大他们的眼界。《森林之子》、《神秘岛》和各种游记常常使他们爱不释手。另一方面，他们也很喜欢更进一步认识周围的环境：观察动物的生活，进行各种试验，参加一定的劳动。在这一年龄阶段，儿童读物可能成为劳动的工具。《自己该怎么做》——这类题目对儿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重要的是要告诉儿童怎样两、三个人或五、六个人一起去工作，告诉他们怎样分工互助。

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对形形色色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还不理解，但他们对此又很关心。年龄大一些的儿童开始对动物的故事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人。他们认真地研究各种人及其相互关系。在这方面，儿童读物应该给孩子们一些帮助。对于8—10岁的儿童，儿童读物要塑造一些生动具体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儿童读物应该揭示基本的社会关系。在这方面，童话和寓言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这种童话不应该是杜撰的，而应该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并能说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关键在于选择童话。但是比童话更重要的是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生动的故事。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故事能适合儿童的要求，不要搞冗长的描写和议论，要提供鲜明的形象，活生生的形象。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不大注意形式，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容和情节上。重要的是典型和情节。儿童们还不会进行心理分析，还不会体察细腻的性格刻画，他们需要的是鲜明的典型及其在情节中的展现。对于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来说，读一些传记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些传记往往写得不符合儿童的需要，没有写出儿童们所关心的东西。最使孩子们爱不释手的传记，就是索菲雅·别罗夫斯卡雅这一类的传记。索菲雅·别罗夫斯卡雅童年生活在一个贵族家庭里，后来离家出

走，到乡下一家干酪作坊去干活。她亲眼见到沙皇政府与地主狼狽为奸、欺压人民。她参加革命后，奋不顾身，帮助刺杀沙皇，最后自己被杀害。在这里，性格鲜明完整，人物有血有肉，毫无含混不清之处。主题很庞大，但语言的表达却符合儿童的特点。再比如，某个小镇有一个犹太儿童。贫困的环境使儿童身心遭到摧残，备受凌辱。后来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个孩子成了一名医生，他遇到了过去侮辱过他的一个孩子。现在，他已是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了。他们共同回忆起那段往事，猛烈地抨击了旧的制度。孩子们对这种故事是十分喜欢的。

这种故事的情节曲折，基本思想明确，这正符合8—13岁的儿童的口味。

儿童们想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在这个年龄阶段已开始形成自己的道德观。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并不讨厌“带教训口吻的”故事。他们希望作者帮助他们从各种事实中得出结论，而不只是对那些不以事实为依据的简单判断作出孰好孰坏的评论。不过您经常可以听到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们说：“怎么一回事儿，这不是很好的吗？”儿童们不喜欢画他们不了解的人。这个年龄阶段，最危险的是小市民的、资产阶级的道德。他们自己还没有一定的主见，只是刚刚在形成这种主见。他们还不能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道德价值。

正因为如此，所以学龄前儿童主要应不让他们接触巫婆等污七八糟的形象，而对8—13岁的儿童，则要防止他们受资产阶级道德、受污七八糟的社会关系评价的影响。但是，要保证他们不受资产阶级道德的影响，不是通过口头上的批评，而是把它与共产主义道德（体现为鲜明生动、引人入胜的形象）加以对比。在目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这是很薄弱的一环，需要加强。

学龄前儿童几乎不能画漫画，而8—13岁的儿童特别喜欢笑话。他们也很注意区分那是坏的，那是好的。他们还很注意哪些人物和社会关系符合实际，那些不符合。他们喜欢读果戈里的作品，

他们喜欢读契诃夫、戈尔布诺夫的短篇故事，翻阅报上的漫画。他们对能看懂书中的内容，能看出所描写的东西令人发笑而感到十分满意。

在性成熟的年龄阶段，在过渡的年龄阶段，少年儿童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到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自然现象，并且也难于对人和人与之间的关系作出一定的评价。

3. 过渡年龄阶段的读物

这一年龄阶段，在其身体发育的影响下，产生了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情感和体验。他开始比较有感情地对待许多问题，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比以前严格。当然，不同的少年儿童有不同的表现，不过这个年龄阶段是最不沉着、最不冷静、最具批判性的阶段。在这一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特别害怕别人的影响，他特别喜欢独处、读书，而不愿与年龄大的人接触（即使他对之很好的人）。这是自立的年龄阶段，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儿童在以前阶段，即7—12岁所获得的知识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概念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一年龄阶段，少年儿童已不满足于对基本类型的人和关系的描写，尽管他们还喜欢读符合以前年龄阶段的文学作品，但他对比较复杂的现象很感兴趣。在自然学科方面，他对繁殖、遗传、变异等问题感兴趣，对大脑的工作也很感兴趣；在社会学科方面，少年儿童最感兴趣的是各种情绪的内部斗争，各种冲突的矛盾所在以及克服这种矛盾的途径；在社会方面，他们感兴趣的是社会结构以及体现在社会结构上的公正。少年儿童对剥削，对社会上各种不公正的现象感到愤懑，因此他准备对这种现象进行斗争，并且想从中找到出路。在这一年龄阶段，在有的不信教家庭里，可能显得突然（大家都会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有的小孩

开始读起福音来了，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偷偷地读，或者相反，干脆大摇大摆地上教堂。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各种社会小说的吸引，他在探索社会制度的出路。他在这一年龄阶段已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了。当然，过渡年龄阶段的儿童的这些兴趣，他们自己往往意识不到，在这里，很多东西取决于环境。

对于各种道德说教，对于强加的观点，过渡年龄阶段的儿童都极其反感，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年龄的儿童说：“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小孩子”，“别唠叨，您不说我也知道”。

在成人的言谈中，在少年儿童的读物里，只要他发现一点很小的不实在的地方，他由此就会产生对形式的要求。如果说8—13岁的儿童对形式很少感兴趣的话，那么，过渡年龄阶段的儿童却已对艺术性有要求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要求读一些严肃的书。少年是不轻信口头上讲的东西的。他要自己进行观察，他要掌握第一手材料。研究的方法最适合他们的口味。

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少年儿童读物的性质。是的，他们什么都想读，而不喜欢对他进行介绍，不过最好还是发给他一本编制完善的图书介绍目录。

论普及教育^①

普及教育的问题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各国的资产阶级无时不在周密地考虑广大居民的读写能力和教育水平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具有的意义。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并非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心，也不是由于某些崇高思想的影响，而纯粹是出于生意经。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会影响工业发展的速度。

我国是一个半文盲国家。这一点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只有彻底消灭愚昧无知的现象，只有尽快地实行普及义务教育，才能掌握我们全部的生产力和所有的财富，才能很好地发展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在这里不允许有任何疏忽大意和松懈，也不允许拖拉作风存在。必须在日常劳动中努力完成生活所提出的这一任务。

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的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尽快实行普及教育，还因为我们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前提条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能建设社会主义，而在这一建设工作中，半文盲状态对我们有很大妨碍。大家只要想一想：我们有苏维埃政权，每一个厨娘都应该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今后苏维埃政权将越来越广泛地吸引工农群众参加管理机关，——必须把整个生活加以改造，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愉快，可是我们是一些半文盲。我们的文化水平越高，我们在合作化道路上的进步就越快。我们整个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获得文化的程度。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最近写了不少文章。可是我们普及教育的工作还是进展得很慢。

我知道，困难是很大的，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我知道，这里牵涉的问题不少，经费不够、房屋和木材缺乏等等情况都对普及教育的实行有影响。

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一个学生(他是一个成年的纺织工人，刚刚摘掉文盲帽子)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说：“工人们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因此要学习是很困难的。但是必须使我们的‘恩人’不让我们工作十五小时，这是困难的，但一定要做到。”

必须获得文化，必须实行普及教育。

我想谈两个问题。

必须防止陷入老一套的泥坑。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制定学校网的计划^②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这些学校网很不完善，因为它很少考虑到当地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一般文化条件。所以我认为，还必须通过生活来检验所有这些学校网。请同志们原谅我对学校网的怀疑。当我看到各工业省召开的实行普及教育的会议^③记录时，我发现不只有一个例子可以证实我的怀疑是正确的。从地图上看，到学校去不到三里路，但那里有沼泽和洼地，必须绕着圈子走，这样就有八里地。——从地图上看，离学校只有一里路；可是过桥时很危险……

所以我建议在安排学校布局的计划时要更多地考虑居民的生活情况和要求。我们还存在着旧时的官僚主义的偏见——轻视居民的主动性，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种偏见。

每一个村子的人都希望本村有一所学校。这当然会把一切学校网都打乱。两里路远的地方有一所很好的学校，可是农民修建一所只能容纳30人的草房子学校，这种草房子学校很简陋，只能维持5—6年。这种做法很不恰当。这是“网”的领导人的看法。可是农民这样认为：村子很穷，儿童没有衣服鞋子穿。冬天室外很冷。让孩子到两里路外去读书不可能，何况幼童根本走不动。走路还要花时间。即或邻近的学校很好，可是儿童仍然是文盲。从

目前来看，这是不恰当的。由于后面这种情况，人们就修建了草房子学校……而教育行政部门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况就作出决议说：只有那些根据学校网的规定修建起来的学校，才能得到援助；为了预防修建草房子学校，规定只有在省工程师对修建计划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开工兴建。农民抱怨不已。他们之所以修建草房子学校，并不是由于愚昧无知，而是由于没有钱。对于每一项创举都要加以支持，而不应以官僚主义的态度轻率地加以禁止。

请原谅我的话说得过于尖刻，但是旧的作风还束缚着我们，妨碍我们去进行生活要求我们进行的工作……

修建校舍、聘请教师、解决经费问题以支付教师工资、起码的供应——所有这些都只是第一步。为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地实行普及教育，还要采取其他一系列的辅助性措施来使居民更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

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要有计划地进行普及教育的宣传工作。要在农村文化室、农民之家^④里报告本省、本县、本乡这一工作的进展情况。每一项创举（如穷苦农民利用公耕地来修建学校）都应该让大家知道，写在红榜上，等等。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展开竞赛，重要的是使普及教育的思想成为居民感到很亲切的思想，吸引他们参加这一工作，指出这一工作的必要性。

为了实现普及教育，必须进行集体工作。不是不要群众，而是要和群众一起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少先队运动和学校

(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的报告①)

在少先队运动中，永远要把少先队运动的宗旨放在第一位。儿童们往往对运动的宗旨理解不深。在我们偶尔召开的少先队大会上，少先队员讲话时总要说，“我们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甚至在学校里与小朋友谈话时，少先队员们往往也要表示：“我们誓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乍看起来，似乎对少先队运动的宗旨已经明确了；儿童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工人阶级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话每个少先队员都会说，但实际上孩子们往往并不明白“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的真正含义。他们的热情很高，但认识肤浅，即使就感情而言，我看也是不够深厚的。可是，十一岁至十六岁的少年儿童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了。我们且看一看旧时的革命者的成长情况。这个过程通常是：在少年、青年时代，一个人遇到了一件使他极为愤懑的事，看到工人怎样受到欺侮，军官如何虐待士兵，农民怎样遭到剥削，——于是这件事就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凡是见到过镇压农民起义的人，凡是目睹过国内战争的人，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感受，因为他们亲历了所见的事件。

托尔斯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舞会之后》，描写一个青年人为了讨好一个姑娘，就与她的父亲——一位将军在舞会上跳马祖卡舞，清早出门一看，一个士兵正在穿过棒阵（帝俄军队的一种残

酷折磨士兵的办法，使受罚的士兵穿过用棒打的队形——译注)，而下令进行这种处罚的，正是他与之跳马祖卡舞的那位将军。他马上充满了对这位将军的仇恨，同时对他女儿的温情柔意也随之一扫面空。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大为震惊。这是文艺作品中的一个例子。每一个革命者，当他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同时就会回忆起童年时代使他深受激励并促使他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的那些事实。有的人可能记不清他何时经历过何事，但是正是这一经历当时曾对他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影响。我国儿童现在所处的环境，已使他们看不到过去那种惨无人道、极不合理的现象了。他们看不到穿过棒阵，看不到剥削，看不到资本家如何压榨工人等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一切都尽善尽美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②的确，只要我们放眼一看，就会发现旧的残余还有很多很多。通常我们从农村的每一封来信中都可以发现，一方面，新生活的幼芽在农村茁壮成长：成立了各种机构，妇女们也组织起来了，新的生活日益巩固；但是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旧的残余，还有许多应该与之斗争的东西。举例来说，一位农妇来信说起她所从事的大量组织活动。这位农妇识字不多，但她的信却写得很清楚明白；她谈起她怎样把妇女们组织起来，起初她怎样不愿参加会议，她怎样弄到一本书之后就挨家挨户去宣读，农妇们怎么逐渐产生兴趣，开始聚在一起劳动并听她读书；她如何把她们按十人分组，而在召开会议时，没有一人缺席。这就是新生活的幼芽。在过去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量的组织工作。可是除此之外，这位农妇也谈到有的丈夫还打妻子，妇女们让她去告诉那些当丈夫的人，苏维埃政权不许丈夫打妻子。那些男人问她：“您在哪儿听说的。”

这使我们不得不经常想到列宁的话：“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要想消灭旧事物，就得在基层开展工作。不管中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如果不在基层开展大量的组织工作，我

们就会长期陷于旧的残余的包围之中。少先队员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要学会把新旧事物区别开来，要能分辨出什么是旧的残余，什么是新生事物。少先队员口口声声说誓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而具体行动却不了解，这要怪我们没有向他们讲清楚。如果我们看一看为少先队员写的书，那就会发现这些书写得不大得体。书上讲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对于成年人说来还可以通过切身的体验来理解，而对十一、二岁的少年儿童（国内战争和革命时期，他们只有两三岁，他们只是听别人讲过战争与革命的情况），我们不应该讲大道理，而要运用生动的形象。我们应该发动男女工人来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们少先队俱乐部是否有邀请老战士到俱乐部来讲历史的这么一个传统习惯。这些老战士在家里倒是经常讲的，他们的孩子可以听得到，可是在俱乐部和开会时往往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书本上往往把这一切描写得神乎其神，远远脱离了生活实际。我们笔下的少先队员们都是一些很自觉的人，即使调皮捣蛋，也很有限度，毫不过分，并且知过即改。不久前有人送我一本书：《同心相连》，写的是少先队员在夏令营的种种活动。书中描写少先队员去夏令营的情况，他们马上看出了一切缺点，发现儿童没有运动场，就拆除了那里的板棚，修建了一个少先队体育场，等等——总而言之，为居民造福不浅。我前不久对一些少先队员讲过：“孩子们，你们下乡时太爱吹牛了，你们想要为农村造福，不是要在那儿演戏，就是要给大家做报告，等等。”你们知道，我们的少先队员往往做有关多区轮作制的报告。不久前有人向我讲了一所青年农民学校的情况：“我们在进行农业宣传，我们走访了十八个乡村。”原来是有两个学生下乡去做了几次报告。可是列宁对共产党员讲的是，他们在农业方面应该多向农民学习，少向农民进行教育。我给《同心相连》一书的作者写信说，他的书并不坏，不过，最好让儿童自己去写他们去夏令营的经过，是否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孩子们去，如果同意的话，又向他们嘱咐了一些什

么话。这样就能看出儿童与家庭的关系，看出儿童经常在家里忙些什么以及少先队员如何去帮助自己的同学。最后，再让他们描写一下旅途的心情，他们原以为要去的地方有很漂亮的建筑物，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未安排就绪，只好迁就一下算了。可是书中的儿童却是一些少爷，不知道谁洗食具，谁擦地板，谁把一切安排好的，他们“业已到达，目击一切，取得胜利”。这就使儿童养成了一种讲排场、摆架子的习气。他们可以下乡，可以做报告，可是干活却不是他们的事。这就牵涉到少先队的宗旨了。他们以为，只要他们写了“誓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那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去做，怎样分辨周围生活中的好与坏，孩子们往往一无所知。对于许多儿童说来，“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这个口号只不过是一句漂亮话，至于怎样去做，孩子们却一无所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少先队运动的一项任务，就是要通过生动具体的形式，让儿童明确认识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而且不是按照枯燥的政治常识教材去讲；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谁曾为此事业而奋斗，这一斗争的经过如何。如果儿童善于对周围的生活进行观察，并能分辨好坏善恶，那他们也就会对这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想讲一件这方面的事。

我国的儿童总是谈到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是训练有素），他们对中国人^③深为同情。可是一旦碰到少数民族儿童的问题时，少先队员往往会轻蔑地说出“犹太鬼”，如果这个孩子是犹太人，那他甚至会受到迫害，这种事情已屡见不鲜。国际主义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遥远的东西，与当前周围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而对周围生活中的楚瓦什人、犹太人、摩尔达维亚人，孩子们往往瞧不起他们，完全忘掉了应该尊重这些过去受压迫的民族。而孩子们现在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得！举例说，很多人不懂得沙皇俄国时期的民族压迫。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支援邻近的一个工厂，有一次为这个厂的孩子放映一场电影。我与克拉夫琴柯同志^④一起前往观

看。电影里演的是对犹太人的蹂躏暴行，可是孩子们过去从未听说过这种事。电影里的暴行正在进行，犹太人遭到毒打，东奔西逃，尘土飞扬，可是孩子们却哈哈大笑，这并非由于他们心地残忍，而是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斗殴打架。这时克拉夫琴柯同志对他们讲，电影里演的是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沙皇政府是这种暴行的策划人。经她这么一讲，孩子们对电影的看法完全变了，同时全场鼓掌表示对克拉夫琴柯同志的感谢。现在，当他们再看到反犹太人的暴行时，他们就想起了她所讲的话。

在对儿童进行工作时，我们要把一些大道理尽可能变成儿童能懂的话，把这些大道理与某种生动的形象联系起来，否则全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孩子们将来也会变得光讲大话而不干实事。这是关系到宗旨的问题。现在也是关系到组织的问题。

当然，独木难成舟，孤掌不能鸣。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组织起来。但组织是指什么而言的呢？在我批评少先队的时候，我请你们不要见怪，这不是教训少先队，只不过是希望我国的少先队运动搞得“呱呱叫”。我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你们可以纠正。我想谈谈组织问题。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组织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你到农村走走，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新农村与旧农村有何不同？旧农村什么组织也没有，而现在各种组织都有。党支部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但共青团却是各地都有的，少先队每个村都有，还有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等。还有“扫校”^①和“儿童之友”^②。农村的组织很多，因此有人就主张工作中要齐心协力，少先队员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但是，光加入组织这还远远不够，还要使这个组织能正确地开展工作。有时对少先队组织的情况稍微了解一下，就发现各种集会、各种表面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我想向你们谈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一次争论^③。拉萨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政府为工人把一切都安排好，拨出一笔钱来进行帮助，等等。马克思不同意拉

萨尔的主张，他认为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给予真正的帮助，同时问题不在于帮助，而在于工人的自助，在于发展工人运动。列宁同志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也十分重视群众的独立精神。他写过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他认为，只有那种确实有真正的居民参加的合作社才有意义^⑧。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这一争论也与少先队运动有关，因为我们常常对我国少先队运动中的这种独立精神的意义认识不够。儿童们更多地是注意纪律和列队行进。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应当使每个少先队员确实参加这一运动并且尽可能充分表现自己的积极性。小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儿童独立精神的发扬。儿童们在大的集体里难于开展工作，所以建立了小队这一级组织。发扬儿童独立精神的工作总的说来搞得如何呢？我认为还须大力改进才行。我们往往看重表面工作，而没有给予儿童的首倡精神以应有的支持。我当然不是说对儿童可以撒手不管。必须要有领导，但领导不应只着眼于一些琐事，不应只是辅导员才有积极性。

一位老工人曾经描写过他亲眼所见的一件事。辅导员想把少先队带到几俄里外的村子里去帮助农民收割干草。孩子们答应了。他们去了，把活也干完了，农民想留他们吃餐饭，但是辅导员高傲地回绝了。孩子们都累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是这位辅导员说：“纪律到哪儿去了？原地休息！”接着又让大家继续前进。当然，我们要有纪律，但不应该是这种强制纪律。在这里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既有领导，而另一方面却不是强制儿童，而是发扬他们的内在纪律。

1919年，列宁写了《伟大的创举》一书^⑨。他在该书中说，纪律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纪律，它是靠外部纪律、扣除工资、处以罚款、开除和采用警察手段来强迫人们做这做那；另一种纪律则不是强制性的，它不强迫人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去做该做的事，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建立在这种内在纪律的基础上。少先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它是未来的幼芽。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织培养未来社会的人，这种人要强壮健康，有坚强的毅力，具有内在纪律，而培养这种内在纪律乃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少先队运动要千方百计发展这种内在纪律，这是很重要的，不过除了这种内在纪律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少先队培养集体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1918—1919年期间，人们把集体生活理解为，只要大家在一起，这就是集体。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集体的前提是一个安排得很妥贴的组织。过去，建党刚刚开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指出应该如何建党。他说，党好比一部机器，每个党员好比这部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如果这个小螺丝钉不起作用了，整个机器就会停止运转，要使每个部位正常工作，要使每个齿轮咬合密切，全部机器都能运转^①。我曾经读过一个工人写的回忆文章，谈沙皇时代一座工厂制造机车的情况。工人们为了捉弄工程师，就拔掉了一个小螺丝。到了机车试车的时候，却开不动了。这位工程师急得手足无措，只好把机车拆开检查，然后又重新安装上。但是两周的时间却白白过去了。工人们这段时期工资照拿，他们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位老工人的回忆文章很能说明问题。它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小的局部会影响到整个组织。少先队运动也是同样的情况。特别重要的，就是要使每个儿童认识到，他是少先队组织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或齿轮。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大大加强对少先队员的工作。某种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工作，这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对此却不重视，他们重视的是红领巾、大操练，等等。有时孩子们还来信说：“我们想成立少先队，可是我们没有红领巾。”我回信对他们说：“问题不在有没有红领巾。”我们俄国人的工作能力很差。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通常都是靠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工作，而组织本身则不够健全。现在的青年应该学会在集体中工作。他们目前还不会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要使每个少先队员都有事可做，每个人都完成一定

的工作任务，不要三五成伙地游逛，而要一起工作，即使每个人量力而行只干一点工作，但也得去干。

我还想讲的问题是：对于每一项集体工作来说，除了需要知识和能力之外，还要有愿望。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能力不强，成效很大。我今天刚好读完我的一位老朋友克利波维奇^①的传记。她起初是民意党人，后来和我们一起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她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她的突出特点是善于与每个同志相处，对任何工作都能积极去干。她很少在大会上发言，所以广大群众不大知道她，但是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都很了解她。为什么印刷厂能开工？因为她在那儿工作。为什么地下书刊的运送很顺利？因为她做了工作，帮了忙。当时这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因为干这种工作的唯一奖赏就是进监狱。她总是帮助大家，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者都在她家避过难。她是老一辈久经考验的革命者的楷模典范。今天，当我读到她的传记时，我心里想：最好给青年写一本描绘她一生经历的书，因为她过去对我们大家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她对人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每个人与她分手时，都决心加倍努力去工作去战斗。这样的人，这样的同志，在我们中间是很有影响的。她常常为同志做饭，照顾有病的同志就像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她没有架子，有的只是劳动人民的一双灵巧的手。

要想帮助同志，首先自己得有深刻的认识，同时要什么都会干，而不是依赖别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童子军^②学习。童子军的宗旨是要能从事实际工作，他们自己学习做各种事情而不要指导员的帮助，可是我国的儿童却是什么都坐等现成，指望别人来指导，来帮忙。

我还想谈谈有关学校的问题。恰好在获得知识和能力方面，学校是大有作为的。苏维埃学校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每个少先队员不可缺少的。对旧学校应进行不懈的斗争，而新式学校却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把新旧学校进行过对比。列宁格勒的几

个大学生问我：“难道一级学校的小孩子也得有世界观吗？”我讲了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举例说，我们怎么向孩子们讲述影响收成的原因呢？这取决于土、水、肥、种等等。可是从前是怎样讲的呢？柯里佐夫^⑩有一首诗，结尾两句是这样说的：

我耕地、播种时默默祈祷，
上帝，请赐我粮食——我的财宝。

在这里，用隐蔽的形式向孩子们灌输了一种思想：收成取决于上帝，而不取决于选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另外再举一个例子。乌申斯基编的一本教科书^⑪，大家认为编得很好，现在还有一些教师常常说：“从乌申斯基的教科书上举一个例子。”应该用这本教科书作范本吗？这本书上有一篇文章：《奇妙的小房子》，文中描写了人体，写得不错，但谈到身体为什么能动这个问题时，就不然了。文章认为人是受灵魂支配的，灵魂离去，人体就死亡。旧时学校就是这样教学生的。而我们则告诉孩子们大脑、神经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身体如何受它们的支配而行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前学校灌输的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而现在正如列宁说的，大家讲的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没有上帝我们也能行。再举一个例子。从前学校里教孩子们的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而现在农村的一些少先队员到我这儿来看图片时，他们指着其中的一张说：“这是冰河时代”，——他们已经知道了冰河时代，知道地球的历史了。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过去书上对英雄人物的描写是：抓住奔马，救人性命；挽狂澜于既倒，防堤溃于未然，等等。而现在重要的是在集体中埋头苦干，使整个集体和睦相处，愉快劳动。我们现在要突出的不是个人，而是友好的劳动集体。从前有一个人叫米海洛夫斯基^⑫，他写了一部著作《英雄与群氓》，书中描写群氓如何追随英雄前进。

他在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北方有一种“模拟”症，患此症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模拟别人的动作；群氓也正是这样步英雄之后尘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经常讲的是广大群众，讲的是团结一致，讲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别英雄。他认为个人实际上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现在少先队员在学校里应该干什么呢？当然，他们应该学习，要会写字，掌握学校所传授的知识，然后还要学会独立工作，不过这只是他们在校工作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少先队员赞成现代的学校呢？因为现代学校不讲资产阶级学校所讲的那些东西。少先队员在学校里要与其他许多儿童打交道，并且碰到许多不正确的现象。如果少先队员把自己与其他的儿童对立起来，把学校里的各种职务都担当了，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那就不对了。这样一来，往往使其他一些儿童为了享受特权而想加入少先队，而家长们也劝孩子入队，以便今后好找出路。少先队员在学校里不应使自己与别的儿童对立起来，而要尽量把他们组织起来。当然，具体应该如何去做，您们知道得更清楚，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种对立现象是很有害的东西。教师在这方面可以给予许多帮助。凡是在这方面作了帮助的教师，今后与他工作起来就省劲些；而凡是妨碍这样做的，就要向他进行斗争。好，同志们，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通过大会讨论，我们将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弄清楚……

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

列宁的父亲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教育家，多年从事初等学校的组织领导工作^①，因此列宁一向非常关心国民教育事业，并且对国民教师的作用评价很高。他在《日记摘录》^②一文中的观点大家都很熟悉，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注意到，绝大多数教师都是靠近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并且关心他们的。由于这一事实，列宁对教师总是很信任的。他在1919年1月举行的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③上的演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害怕扩大联合会的范围。他们认为，对于在一开始就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教师和一直站在旧制度立场上的教师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必须倍加小心。这一斗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列宁在那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一开始就表示他相信现在这场斗争应该结束了，相信这场斗争正在结束。他说：“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教师都靠近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现在都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有它深刻的根源，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扩展到全世界；因此我认为，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反对那些一直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站在旧制和虚伪的立场上、幻想可以把旧制度的一些东西保存下来的教师的斗争中，绝大部分教师是一定会真诚地站到被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方面来的。”^④

由于列宁相信国民教师将会和群众站在一起，并且和群众一道拥护苏维埃政权，所以他主张建立一个广泛的教师联合会。他

说：“……现在拥护共产国际、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部分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要设法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尽可能把一切教师都包括在内的教师联合会。”^⑥列宁对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说：“……你们的联合会的任务就是要把广大的教师吸收到你们的大家庭中来，教育最落后的教师，使他们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结成一个共同的组织。”^⑦这些话充分体现了列宁把工会看作“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的观点。他说，动摇的民主分子由于大势所趋不得不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因为他们深信，任何别的作法都会把他们推到保卫白卫分子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列宁当然不会设想教师联合会可能走“中间路线”。他毫不怀疑教师联合会在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斗争中会站在哪一边。他认为，“……只有那些承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的联合会，才能成为享有全部权利的工会团体。”^⑧

在这篇演说里，列宁还谈到了摆在教师工会面前的广泛的任务。教师联合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努力“……使知识和科学成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工具，不再是特权者的东西，不再是巩固富人和剥削者的阵地的材料……”^⑨

要想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学校，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教师联合会。列宁说：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及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现在大家都知道，只有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有密切的联系的、诚心诚意拥护苏维埃纲领的社会主义学校，才能成为这样的工具。”^⑩

列宁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就是只有社会主义的学校才能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这一思想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由于许多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苏维埃学校十分关心集体主义教育这一问题，也特别重视培养人格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即读书学校，实行的是强制纪律，压抑了儿童的独立

精神，妨碍了人格的发展，并且使它不断受到摧残。只有劳动学校才首先为人格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这种学校跟周围的生活和儿童的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为儿童施展自己的能力提供了各种活动场所，这种学校教学生学会集体生活，并向学生提出了崇高的目的。

全面发展的、具有内在纪律的人感情深厚、思想明确、行动有组织，应该把培养这种人与培养集体主义者联系起来。

目前，学校的教学内容已经确定下来，在这个时候，教育问题的位置已日益重要，并逐渐引起了教师的注意。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见解在当前就特别可贵。

就在这篇演说里，当列宁谈到学校必须跟政治保持密切联系的时候，他还指出：“当然，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然，在这方面犯过一些错误，有人企图粗暴地歪曲学校同政治联系的原则，硬把政治不适当地灌输到应该好好培养的年轻一代的头脑中去。无疑地，我们应该时刻同这种粗暴地运用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⑩

列宁是指什么而言的呢？从他的其他一些演说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歪曲学校同政治联系的原则，就是把共产主义教育曲解为一种新的学习，让儿童死记硬背许多他们不懂得的东西，不把学习和社会工作联系起来，不教儿童学会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互助，把共产主义曲解为跟真正的、实际的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一种东西。

列宁这篇演说发表至今不到九年。教师们早已站在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了，他们努力用列宁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培养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代新人。教师所面临的奋斗目标，不管就其意义来说，抑或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非常伟大的。列宁教导我们要信任教师。

教师要更加坚定地举起列宁的旗帜，要更高地举起列宁的旗帜。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不久前，《少先队员》杂志社寄给我一包儿童的作文，描写儿童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他们在作文里谈到了巨大的技术成就，谈到了生产力的发展，说今后不再有贫穷现象，人人都很富足，还说机器将会代替人去做工干活，人们都有明亮温暖的住宅……

有一点却是孩子们没有写到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变了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思想、感情、志趣完全变了，整个生活也完全变了——变得更加丰富多采了。生活不再有孤寂贫乏之感，人们不再为琐事而争吵不休，互相仇视。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强烈的集体主义感情代替了个人的悲愁和单枪匹马的探求。

目前出版的一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小说，只是说到人人富足，没有贫困，没有犯罪。然而，却全然没有谈到新人，没有谈到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没有谈到集体体验的丰富多采、集体思想的深刻广阔，没有谈到新的社会组织。

列宁目睹了新制度的建立。他曾说，应当把“……分散在辽阔国土上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①他谈到了团结一致的自觉纪律，谈到了共产主义道德。列宁说，共产党员应该通过自己的热忱努力去发动国民教师大军，去建设社会主义学校。列宁认为，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统一劳动学校乃是用共产主义新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一种工具。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学校时说，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在将来避免任何世界冲突和血腥屠杀。

国民教育的十年

列宁最后写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论我国革命》。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说，我们共产党在干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想在一个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里从事建设。列宁当时指出，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无产阶级只要夺取了政权，就能大大推动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把文化提到资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达到的高度。^①

现在，当我们对国民教育方面十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时，我们看到，列宁的话真是千真万确啊！

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工作刚刚开始的前五年的极其艰难的条件。当时我国在文化方面的确极其落后：有些地方的居民（如沃龙涅什省的旧教徒）甚至认为识字课本是魔鬼的读物，而幼儿园则是一种军事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六亲不认的士兵（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1919年就是这样看的），有些民族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经济凋蔽，加上国内战争以及民不聊生、破坏严重等等情况，大大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但是，革命的号角唤醒了巨大的创造力。有的工人刚从国内战争的前方回来，放下武器之后，立即拿起了识字读本。在窗户破损、没有取暖的学校里，孩子们穿着各种破烂不堪的衣服，用心学习着；教师们没有工资，照样进行教学工作。现在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说，我们在文化方面已阔步向前了。

当然，我们希望取得的成绩更大些，希望彻底扫除文盲，每

人都能得到一本书；我们想把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完全传授给群众，我们想让群众充分接触艺术。

但是，要想做到以上种种，就需要具备物质上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把工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必须提高技术，使男女农民、男女手工业者摆脱落后的小生产的束缚，因为这种小生产使他们没有空闲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群众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福利条件，日常生活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改变。

在我们对十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时，必须对已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加以肯定。我们还未实行普及教育，但是我们不久即将实行（学校发展的速度比预期的快，主要原因是居民的主动精神很强）。也只有实行了普及教育，我们才有可能扫除文盲。但是我们并不坐待（也不能坐待）普及教育的实行。我们要进行工作，全力以赴，去扫除成人中间的文盲。七年来，参加扫盲站^②学习的有50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人虽未参加扫盲站，但也在学习识字。只消对最近一次的登记^③资料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我们在扫盲战线上所取得的实际成绩。

不过，不是扫除了文盲就万事大吉了。还要让学会识字的人读点书。我国报刊发行的成就（如报纸发行量很大，地方报纸蓬勃发展）充分说明，能够读书识字已经成了一种进行教育的有效武器。工农通讯员密切了报纸与居民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报纸是欺骗群众的工具，而我们的报纸却是进行教育的有效武器。它讨论群众关心的问题。农村阅览室网以及日益扩大的红角网，使报纸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大大帮助了群众去了解形势。

由于群众中产生了许多实际问题，由于群众的思想极为活跃，因此他们渴望读书，对书籍的兴趣很浓。向广大群众供应图书，这也许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必须予以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必须加强。

我国建立了一些新型的成人学校，如农民短训班^④，工人大学^⑤。我国的工农速成中学起了重大的作用，它使工农受到了中

等教育，而在旧制度下，他们是无缘迈进中学大门的。由于设立了工农速成中学，我国高等学校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政治学校、苏维埃党校^⑥ 继成人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之后，继续进行教育工作。

戏剧、电影和广播把扫盲站开始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新式学校也日益成长。它已与宗教一刀两断^⑦，这是不可逆转的了，现在学校里的宗教教学已销声匿迹了。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都力图切实地奠定劳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从前，学校高墙耸立，与实际生活完全隔绝，而现在则与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学校告诉学生如何改善周围的生活，如何使生活更加光辉灿烂、富有理性。学校教孩子们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际去做一些事，教他们从事公益劳动。

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教师成了儿童的同志，他们帮助儿童组织起来，不打他们，不处罚他们。从欧洲到我国访问的资产阶级国民学校的教师，对我国儿童享有的自由，对我国师生之间的关系，无不感到惊奇。

儿童共产主义运动和少先队运动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组织起来。学校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校所培养的是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代人。诚然，并非每个学校都如此：还有一些旧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不少，但是这种残余正在被清除。

我国学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并且一定能做到。我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教育工作者工会坚定不移地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教师日益成长，不断学习，他们投入了我国的生活洪流，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懈努力。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居民对学校日益关心，他们与学校的关系日益密切，经常帮助学校。我们通过各级苏维埃密切了居民和学校的关系。

在非俄罗斯语言的民族中开展工作，这是一项具有特别意义的工作。这些民族占我们国家全体居民的半数以上。在沙皇时

期，谁要是提出必须用本族语教学这种主张，那就是大逆不道之举。少数民族备受压迫，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苏维埃政权奉行的方针是，对广泛发展的民族文化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强帮助和关心，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我们在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刚刚起步，不过这开始的步伐却已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这方面，正如在苏维埃建设中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正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

庆祝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

十周年的演说

当我们谈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就不能不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为他一向十分重视教育人民委员部。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经济上的成就。列宁的全部方针，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理解，都与上述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1920年1月24日，他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谈到：“我们要建设文明的、光明的生活。”^①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与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促进文化高潮的到来这一认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持的这种态度使他对教育工作特别关心。

我现在谈谈政治教育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位宣传鼓动家，他对这方面的工作特别关心，这是因为，如果不把政治宣传工作与一般文化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我国就不可能进行政治宣传工作。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政治教育工作一向关怀备至。他对通俗化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我至今记得，在革命活动的最初年代，有一次他曾把布哈林、奥辛斯基、索斯诺夫斯基等负责干部找到他的宿舍，一连讨论了两个晚上：怎样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一种主张，就是要把报刊文章汇编成册，发行到农村去，以便阅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过问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

我还记得有关图书馆工作的一些情况，他经常问阿瓦涅索夫同志^②（当时在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工作）是怎样对图书馆工作进行检查；怎样对图书事业的发展速度进行检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我国也能设置一些像瑞士那样的图书馆。当然，我国图书馆藏书的内容应不同于瑞士，但是管理技术应与欧洲各先进国家一样。他特别重视图书普及推广的办法。他对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很关心。他认为不仅应该向群众提供图书、开设俱乐部等等，他还经常打听有多少群众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的创造精神如何，他们是否关心这项工作并且积极参予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我记得战后部队复员时，有大量军事干部转业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③，他们把为群众服务这个问题局限于只是作些宣传鼓动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参加我们的一个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在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他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会议结束时他说，要把工作搞得更加深入一些，要发动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不仅要为他们服务，而且还要发动他们参加这一工作。这是列宁一贯的主张，他在历次对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指示时，都提出了这种主张。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与地方工作干部的谈话各地都无记载，甚至连速记记录也没有，因此只好根据回忆来追记其内容。

列宁写了一篇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文章，其中谈到了书报的分配问题；他还详细地谈到如何分配报纸，谈到如何张贴报纸才能使其不受损坏^④，等等。他特别关心宣传鼓动工作。他多次参加政治教育会议，并且发表了长篇政治演说。他认为“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事事关心”，同时提出了要同拖拉作风和贪污行为作斗争，而有些政治教育工作者却觉得这些问题与他们无关。他们听讲的时候感到纳闷，心里想：我们怎么去同这些现象作斗争？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应该与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应该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为争取新生活而进行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给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一些宝贵的指示，并且常常要我们报送反映这方面工作的材料。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生产宣传问题十分重视^⑥，他要我们把全部有关文件、材料、决议都送给他。

有一次，有一件事使我们政治教育工作者很恼火。事情是这样的，生产宣传工作最初本来是由政治教育委员会搞起来的，不久，在列宁参加的一次人民委员会议上，决定这项工作改由工会负责，当然，工会应与各级政治教育委员会一道进行这项工作。政治教育委员会感到很委屈，因为这项工作是自己搞起来的，逐渐打开了局面，可是现在却要以工会为主去搞。但是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生产宣传不能抽象进行，而要紧密联系生产，因此，由工会负责这一工作当然更为合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贯主张要把政治教育工作与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并在这方面给我们作了许多极其有益的指示。在他最后写的几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在农民中间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谈到了我国即将来临的文化革命。

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⑦。从代表们的报告和发言中看出，居民对一切有关政治教育工作的问題都十分关心。这就清楚地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文化革命的预言已接近实现。群众对教育问题如此关心，如此热情，使我们深感文化革命就是下一步摆在我们眼前的工作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谈到了政治教育工作。早在1897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的教育思想，指出必须把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同时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⑧。

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初几次关于劳动学校问题的讲话，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极其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的。1918年，他在讲到学校问题时指出，从今以后，我国统一的劳动学校将与摆脱了奴役枷锁的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

友爱和平等的道路，而且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将来避免战争^⑧。他如此重视学校，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特点。他特别注重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他经常找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同志谈建立新式学校的问题。应该指出，最初在对待建立新式学校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把它简单化了。即使到了现在，马克思关于综合技术学校的主张也未实现。为教育事业而斗争所处的整个形势，使我们不能普遍实行马克思所希望并为列宁坚持要实行的那种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但这绝不是说，这种学校看来不可能设立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彼此联系的，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萧条不振的时期，国民教育工作当然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认为一切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现在我们学会了一定的克制，在工作中常常不忘汲取革命初期艰苦年代所积累的经验教训。

我想谈一谈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一段往事。新经济政策实行初期，我国学校受到严重影响。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这里也谈到，当时我们所建立的一切很快遭到破坏，但是，后来我们逐步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上重建了一切^⑨。恰好是在这个经济萧条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强调了学校工作的重要性。他对这方面的细微末节都不放过。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与一个小学生谈话的情景。他问这个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干什么。“你们第一节是什么课？”“数学，讲十进位小数的乘法。”“然后呢？”“然后是历史课，老师给我们讲埃及的历史。”“然后又是什么呢？”……他根据这个小孩的回答来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和过去的情况一样！”此后，他不只一次地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关心教学大纲的制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主张成立国家学术委员会，因为它可以摆脱许多琐碎工作而致力于制定教学大纲和研究教学方法。您们大概都还记得1918年—1920年期间对教育上的一切问题所持的冒进态度。当

时我们认为，中央应该支付儿童之家全体儿童的伙食费。而且，那时中央集权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买好了腌西红柿之后，要先运到中央，然后再分发给全苏的儿童之家。不言而喻，这样来安排工作，当然就会让西红柿挤掉了教学大纲。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修复校舍，这些校舍在国内战争时期备遭破坏；一切进到城市的部队首先是到学校去，在那里驻扎下来；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和各种各样的会议都在学校召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些小事也不放过，尽一切可能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搞好工作。根据列宁的意见，研究教学内容应由一个摆脱了行政琐事的机构来负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内容，应该通过教师的工作，使它简单明了能够为儿童所理解。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战士和自觉的干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父辈不善于斗争，我们稍微学得好一些，而我们的下一代将把我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定将取得胜利。”^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他一直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部工作。他经常找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谈话，既谈政治教育工作，也谈职业教育；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整个工作。他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教育问题将日益提到首位并且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他在生前最后写的文章中，曾经谈到初级国民教育应占首要地位^⑪。由于他一向从群众利益出发，他自然就特别重视国民教育的群众形式。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习惯于什么小事都向他请教，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解释。

不久前，卢那察尔斯基曾经在一个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⑫，我是从广播中听到他的讲话的。我一边听他的演说，一边就回忆起教育人民委员部所经历的途程。我想起我们是怎样通过集体的共同努力逐步开展我国的教育工作的，这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力量，而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有关单位和教育工作者集体的力量。谈到教育工作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说，要善于用自己

的热忱去发动他们，向他们指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全部意义。在1925年举行的教师代表大会上^⑧，我们已经可以说，教育工作者已为这种热忱动员起来了。他们大都已经踏上列宁指引的道路，可以与他们一起把当初艰难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并且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全体居民的参加下把这一工作推向前进。今天，在我们欢庆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令人不禁回忆起它所遇到的难以言状的困难以及我们并肩战斗并齐心协力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同事。今后，只要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清除旧的遗毒。我们要多想到缺点，少想到成绩。这样，在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考虑到：这一点还需要纠正，这一点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还搞得不好，等等。成绩主要是向外宾讲……这样，在总结工作时，你就会发现我们做了不少事情。

最后，我要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要齐心协力，与全体教育工作者一道，力争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 上的演说^①

在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②上，大家都说我们正在对我国的整个生活基础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所以，这次代表大会充分地提出了我国的文化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上的巨大进步，那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必须认识到，我们应当对培养新人，即培养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感情的人的工作加以改造。

我国目前的学校不同于旧时的学校，我们的教科书已重新改编。但是，有一件最基本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到，就是我国儿童的知识还掌握得不牢固，而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在教学方面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学校在授予儿童知识时，怎样做到既不加重学生负担，又使他们能把所学的知识实际加以运用。我们经常看到少年儿童显得精疲力竭的样子，这说明我们还不善于合乎要求地授予学生知识。

据说我们的教学方法很多，为什么不可以对某一种方法加以探讨呢？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利用某种教学方法来促进儿童的发展。在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应该懂得这一年龄的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是什麼。这次代表大会重视了这些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

代表大会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劳动教育问题。我

国的学校是劳动学校。我们希望我国学校所培养的不是寄生虫，而是劳动者。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呢？

我记得，1919年的时候，有些人曾主张要教儿童学会担水、糊纸袋，等等。现在我们当然已经懂得了，不能让儿童软弱的双肩去担水。我们不是要教他们从事奴隶的劳动，而是要他们从事目的明确的劳动。这里有许多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建立劳动学校。

大会的议题中，关于集体的问题占了很大的位置，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集体的问题、集体创造的问题和集体经济的问题在现代生活中日益尖锐。这个问题我们是提出来了，但未彻底解决。这里存在着许多漏洞。

还想稍微谈谈所谓的劳动童年的问题。只有彻底解决了我在上面指出的那些问题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劳动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已经设立了许多流浪儿集体组织，但是什么成果也未获得，只有把这种集体变为劳动集体才行。

切实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妥当地安排培养新人的工作。重要的是这次会上能对劳动问题和集体问题作出尽可能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将使这次大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少先队的纪律

现在随处可以看到许多杂乱无章的现象。

从前人们寄希望于上帝，指望上帝给人降福。现在连小孩子也懂得，上帝是靠不住的，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的生活，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按新的精神改造生活。

为了实现既定的目的，必须齐心协力地行动。有时本来不愿意去做某件事，可是不得不去，因为不允许单独行动。

必须齐心协力地行动，这一点是全体儿童都懂得的。有时个别少先队员不服从集体的决定，其他的小朋友以及辅导员都很生气，对他大肆训斥，甚至还把他开除出队。

这样一来，少先队的纪律成了强制纪律，少先队员服从决定只是由于害怕开除。这种现象正常吗？

列宁在他写的小册子《伟大的创举》中曾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只是为了挣钱谋利而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的是强制纪律。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就不再有强制的纪律，只有自觉纪律^①。列宁之所以极其称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由于它乃是自觉纪律的典范。工作一周，到了星期六本可休息一下，但他们却不去休息，而是同心协力地去劳动，干那种往往是极其繁重劳累而且枯燥无味的活儿。谁也没有逼着他们去干活儿，然而他们还是要去，因为他们深知，恢复备遭破坏的经济是当务之急。

少先队是一个要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的儿童组织。正因为

如此，所以少先队组织重要的是培养自己队伍的自觉纪律而不是强制纪律。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怎样才会形成自觉纪律呢？只有明确地认识到正是应该这样去做，而不是按别的办法去做，才能产生自觉纪律。

有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病了。她得弄药吃。买药要到十俄里以外的地方去才行。室外夜色如墨。这个孩子很爱自己的母亲。谁也没有派他去。但是他揣起药方，独自一人在黑夜里，一会儿也不停歇，穿过一片树林，去给母亲买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的呢？是因为他爱母亲，知道药能救母亲的命。少先队员也应当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件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形成巩固的自觉纪律。

在车间或俱乐部工作的，只有年龄比较大的少先队员。年幼的儿童是不准上工作台的。他们乱拉小锯，打翻胶水。别人骂他们：“你们这算什么少先队员？简直是些小无赖，应该把你们都开除才好。”这种态度对吗？不对。上面的情况说明工作安排得不妥当，应该让年龄比较小的儿童也参加活动——让他们熬胶水，干点不太费力的活儿，等等。这么一来，小朋友们就不会再打翻胶水，乱拉小锯了，也不会调皮捣蛋了。他们调皮捣蛋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那些对他们不关心的年龄大一些的人的不对。如果我们关心他们，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内在纪律，不仅不会去妨碍大家干活，而且还会积极参加这种活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你们自己也可以找到大量这样的例子。

论培养劳动力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这是很自然的。在我国的过渡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培养劳动力问题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善于在现象的发展中研究现象，所以他具有一种预见能力，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以他所特有的这种预见力谈起这个问题。马克思异常生动地描写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经济进步都会变成社会的不幸，“……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①在谈到这种情景之后，他指出打破这种局面的出路就是改变培养劳动力的性质：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有形式看作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②他接着又说：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

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③

马克思认为，虽然学校里已经自发地有了某些综合技术教育的因素，但是工人的普遍的综合技术教育就其目的和性质来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制度以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完全矛盾的，所以要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之后才有可能。

“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人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④

工艺教育是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

“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种形式中进行，正像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⑤

列宁是儿童和成人综合技术教育的热烈拥护者。他曾在自己所写的“生产宣传提纲”^⑥中谈到采用一些什么方法来在群众中推广综合技术教育。列宁认为在成年工人和农民中推广综合技术教育是工业和农业合理化的前提。列宁在我打算在党的会议上作演说而写的提纲^⑦的评注中写道：

“（1）补充一两个论点，说明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性的意义

根据马克思
根据我们俄国共产党的党纲

(2) 说明白，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

(3) 把立即过渡到综合技术教育，或者确切些说，立即实现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

……我们是穷人。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大家都应当成为细木工、钳工等，但是同时必须具有最基本的普通知识和综合技术知识……

要使这些‘手工匠’……

……有综合技术的见识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初步）知识。”^⑧

在讨论培养大量的劳动力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究竟是想恢复旧的劳动分工制，把工人培养成狭窄的专家（这种专家只精通本专业的业务，掌握这门专业的熟练技巧，但也仅仅是了解这一门专业的业务，因而也就永远固定在这门专业上）呢，还是用马克思和列宁的精神去培养专家。

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完全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有一位鼎鼎有名的专家，他所坚持的观点正是把培养劳动力限制于一种狭隘的专业，这种培养只限于一种训练。

这个大名鼎鼎的专家就是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创办人加斯帖夫同志^⑨。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一方面他利用了工艺学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利用了反射学来创造出一种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授予工人劳动技巧的方法。

加斯帖夫同志的伟大功绩还有：要求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与纪律松弛的现象作斗争。他的方法是脚踏实地的方法，所以就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就。“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

但是加斯帖夫同志后来举起了一面应该受到批评的旗帜。

他开始把根据自己的方法进行的训练与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对立起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几年前，加斯帖夫同志对普通教育问题，对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劳动学校的问题漠不关心。现在他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在学校进行劳动教育是有益的——根据他的意见，在一级学校里，这种教育只应该授予一些综合技术的技巧，在二级学校里则授予一些“个别的综合技术的”技巧。学校里要进行训练工作，要有严格的训练，“严肃的纪律”。至于理论和综合技术眼界，加斯帖夫则只字不提。

加斯帖夫的这一理论目前是很危险的。在多加多夫同志领导的委员会^①里，讨论了把工厂艺徒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问题，目的是使它“合理化”，同时还解释说，这种合理化就是要从工厂艺徒学校中排除一切综合技术教育的影响。尽管工厂艺徒学校有很多缺点，尽管由于企业部门的忽视而使学校的境况非常困难，尽管到企业去的学生的培养工作水平很低，等等，——但工厂艺徒学校毕竟是以综合技术教育为基础的学校，而且一般说来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青年一向是奋勇前进的人，他们自己不可能对这种“合理化”工作采取平静的态度。教育人民委员部也不可能对这件事采取平静的态度，因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年复一年地都是根据列宁直接交给他们的任务，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力实现着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的。

那么，加斯帖夫的主张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手工业在我国的工业中目前还起着极大的作用。加斯帖夫对于比较迅速地培养出一批手工业者的工作做了很多贡献。各个工厂艺徒学校都应该运用中央劳动研究所的成果。但是除了“技巧”之外，工厂艺徒学校还应该使学生具有综合技术眼界——工艺学的知识，力学和化学的知识。如果不具备这种知识，工人就绝不可能自觉地去参加我国的工业建设。

现在，随着许多新工厂的建立，工人干部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他们操纵机器，好像成了机器的附属品一样。加斯帖夫认

为，可以对他们进行两周和一月的教育。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一点。我国的工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今天他是一个执行者，明天他可能是一个发明者，后天他可能成为自己生产部门的一个著名的组织者。后面这种情况是加斯帖夫所不愿看见的。

他不往前看，不在工业的发展中来看工业。他对改造时期的动态不大感兴趣。他坚决相信，现代工业可以精确地确定它需要多少劳动力，需要什么技能。好像工业只是站在原地不动而不发展似的。加斯帖夫认为，全部问题在于从工业得到准确的订货，然后用机器去完成订货。订货是需要的，完成订货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我国的建设应该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可是，如果工人没有受过广泛的普通教育、政治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训练，那么我国的建设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

就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所作报告
《党的会议的主要问题》的发言

首先谈一谈我国学校的阶级面貌。会上大家对我国学校的成份问题讲了很多意见。我认为，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观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因为我们讲话要从阶级观点出发，而不能从等级观点出发，可是现在我们往往滑到中世纪的等级观点上去了，出身问题成了一大障碍。所以说，我们党纲上谈到要进行改造，要对所有的人进行改造，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应根据出身来看人，而要从工人阶级事业上的需要出发来作评价。我们往往把有些孩子赶出学校，原因是他的父亲或者爷爷当过诵经师。这是毫无道理的。我前些时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有个孩子的爷爷过去是诵经师，父亲是红军，但因为爷爷当过诵经师，所以把这个孩子赶出了学校。这简直是胡闹。我向政保局^①问起这件事，他们答复说，已经下达了一项妥善的命令。我不知道，只是这么一般地作一个指示是否有效。我认为，今后凡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处理办法。既然有人认为，阶级观点就是等级观点，那就显而易见，所通过的决定再好，到地方上也不会认账，不会研究执行。

另一个问题：我国学校是否真正称得上是合乎要求的学校？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说得对，重要的是要在工人区开办足够

的学校。而我们在这方面却没有做什么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所应当关心的，是怎样尽可能在工人区多开办一些二级学校，并且要办得好些。

再谈谈工厂艺徒学校^②。我曾经到过皮尔姆的一所工厂艺徒学校，我对这所学校的工作深感怀疑。学校附近有一个大工厂，如果我们对工人进行过一些宣传工作的话，那学校就会办起一个工场，并且办得很好：校办工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由这家工厂提供。我到这所学校去参观的时候，只看到一个雇来的木工在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刨什么东西。我问学校的人：是否邀请过附近工厂的工人到学校来干活，回答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我发现，我们没有发动广大工人参加学校的建设，而这恰巧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说说青年农民学校^③，同时一般地说说农村学校。现在，好多地方还没有开展建设公社和集体农庄的宣传工作。

常常有人发牢骚，说是学校有时对公社的教育任务毫不理解。在这里，我认为不管是国民教育处，还是教师界，重要的是让学校懂得根据新的原则对整个农业进行改造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如果教师和各个学校不关心这件事，那我们就不能使学校成为阶级学校。

这个问题要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因为我们要讨论我国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要修改学校的教学大纲，使全部工作能做到：学校能成为阶级学校，其他阶级入学的每一个孩子也能受到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很多人都谈到反宗教宣传和国际主义宣传问题。当然，这两者都是重要的。不过全部的教育工作并不局限于进行反宗教宣传，并不局限于妥贴地安排国际主义教育。遇事采取阶级的态度，这个范围要大得多。

关于校内纪律问题。几位视导员同志谈到了学校常常采用的一些处罚。这并非什么好事！搞好儿童工作的问题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要培养集体主义者？如果从上面那种观点出发来处理问题，那我们的学校自治归根结蒂就成了盲目之举了。有一位代表说，如果我们的二级学校，尽管阶级成份很好，一个异己分子也没有，但孩子们互相告状；不去建立同志式的纪律，而是经常抱怨儿童，并且把这种情况告诉家长，那么仍然是什么好结果都不会取得的。从前，教师经常把家长找来，向家长讲孩子们在校的表现，然后孩子们在家里就挨揍（这是九十年代的事了）。现在教师不处分孩子，可是孩子们却向家长责怪自己的同学说：“您的儿子违背纪律，干了什么什么事。”这种做法对吗？这是什么同志式的教育？这是什么阶级教育？这说明，我们汽车开的方向不对头。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如何使我国学校的工作内容本身成为具有彻底阶级性的。

谈一谈调查结果。我们的调查总是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情况。但是，让孩子们去填写是否信仰宗教，这算什么调查？孩子们可以按您的口味填写。那这种调查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毫无意义。说说反宗教工作问题。有人责骂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骂得对。但是骂我们的人常常提出一些我们过去极力反对过的意见。在教师代表大会^④上，大约有60位教师提出了一些迫切的问题。他们谈到反宗教宣传。一位男教师问一位女教师：“您们怎么样，搞了反宗教宣传吧？”那位女教师回答说：“是的，刚开始搞。”

我们是怎样搞共青团圣诞节活动^⑤的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对列宁说起，我们花了好几千卢布搞共青团圣诞节活动。列宁说：“您们怎么有权这样做？尽管是进行反宗教宣传，是个好主意，但这是苏维埃的钱，要用苏维埃的方式去花。”

我是知道我们是怎样过这种圣诞节的。画一些挂着十字架的各种各样的神父，有的扭捏作态，有的道貌岸然，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是游行，仅此而已。这算什么反宗教宣传？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

我们的社会公益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一

工作与反宗教宣传联系起来？工作如何着手？我们是否向群众讲过怎样自力更生建设生活，而不是依靠上帝老爷？

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各地情况不同，条件各异，需要各地考虑自己的特点，并从这一特点出发来安排本地的反宗教宣传。此外，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考虑和研究。

再谈谈教师。是的，我们在师范学校和师范院校培养的青年人，并非人人都热爱教育事业。这里应该比较尖锐地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要热爱教育事业，就学下去；你要不喜欢，就另谋出路。现在我们不能要求全体教师都能进行反宗教宣传，因为他们中间很多人就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所以对他们说“去进行反宗教工作”，这是做不到的事。我们有共青团，还有少先队组织、政治教育机关可以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本可以抛弃那些不能进行反宗教宣传的教师的，但这样做将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当然，如果有人来顶替，最好是把这些教师弃而不用。等我们培养的不信宗教的教师成长起来之后，我们是会这样做的。可是现在我们却拿不出人来顶替这些既精通农业、又善于组织儿童的有经验的老教师。

会上很多人谈到，我们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⑥不太称职，但是我要说，这些管理员在政治上多少受过一些训练，而别的人连这一点也不具备。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既要从事粮食收购工作，又要在农村小屋里工作，所以说，要是有时阅览室关门了，并不能说明管理员什么工作也没干，他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干另外的工作去了。我很清楚，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的工作还有很多缺陷，不熟悉业务，但他们的工作还是开展得很好的。诚然，在改选运动中，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落后于一级学校，而一级学校在改选运动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知道，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在进行改选工作时，应该突出阶级路线，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所以卡卢什省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下戈罗德省也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一名管理员被杀害，而原因都是由于

他们贯彻了阶级路线。在这里不应该只是讲他们不讲当地所没有的那种文化力量，而是要使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与教师团结得更紧密一些，并且创造一种有利于管理员开展工作的气氛。阿夫克申基耶夫斯基^⑦同志讲了托尔斯泰乡的学校取得了什么成绩，却一字不提全县农村图书阅览室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们知道，学校是早已有之的，而农村图书阅览室却是革命后才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应对它关心才是。我们要提高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的业务水平，同时要在省委和州委会内大力反对那种给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找麻烦的现象，要给他们工作的机会，而这应该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我们已使工会的情绪有所转变，因此我相信，只要我们同工会和其他进行政治教育的机构一起，就一定能克服这项工作中的困难，而不能认为这项工作已毫无希望了。

就米·尼·波克罗夫斯基所作报告 《国民教育制度问题》的发言

一级学校年龄阶段中的半数儿童(不含莫斯科省和列宁格勒省^⑧)，即8岁至12岁年龄阶段的半数儿童是文盲。我认为，我们应在落后的农村开办一年制学校。我们曾经一度甚至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害怕我们的四年制学校会降为三年制，二年制，等等。但是，现在居民渴望获得知识，因此就不应顾虑缩短学制的事情了。我们听说，在黑土地带省^⑨有许多农村，不管是成年农民还是小孩子，都是一个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这些地方就应该开办一年制的学校。这丝毫也不会降低我们的四年制学校，相反，还会对它有帮助，因为孩子们在一年制学校学了一年之后，第二年就会学得更多些。

不能说我们十年来一事无成。最初几年，许多学校开展了各

种有意义的劳动活动，形势很好。当外宾参观我们的学校时，他们都认为，我国的学校的确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现在由于学习上的压力，很多学校都做不到这一点了。以前，布基科夫工厂^⑩曾经开办过一所学校，它与纺织生产以及许多有关的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该省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创举。现在我们更多地是注重学习一些事先规定好了的知识，而不管是否能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真正的劳动学校。我认为，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⑪强调指出了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认真地抓好建立综合技术学校这项工作。鉴于我们与加斯帖夫同志^⑫的争论，这项工作尤为必要。加斯帖夫同志是这样提出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他说，所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熟巧，某些熟巧，某些手艺。而我们认为，需要懂得技术，能掌握各种机器的运转要点，需要掌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之为见识的东西^⑬，需要综合技术的见识，需要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在正在对农业和工业进行改组的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对我国比对其他某些国家更为重要。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执行者，一个会操纵机器的人，而是一个自觉地参加建设新的劳动国家的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乌托邦，但我认为，现有的一些学校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能利用周围的一切的技能。如果有一副犁，那就要在学校生活中充分加以利用；如果有一个发电站，那就要学会利用它来发电。对乌克兰沃叶沃丁那的参观提供了关于乌克兰一所学校的材料，这所学校制作了许多水电站所用的仪器设备，而这所学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条件。例如，莫斯科省有许多水电站，足够不少学校在教学中加以利用。此外，还有拖拉机、簸谷机，一个明白的教师是知道怎样使这一切与学校生活联系起来的。

我们只是图名求大，而不去授予学生农业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熟巧。美国学校在这方面要灵活得多。他们教学生如何焊接水管、修理灯具，等等。这就是说，美国学校授予学生一些一般的知识。我完全同意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如此明确地提出这个

问题。

下面谈谈中学。我们在这方面的处境很困难。地方来的同志都很清楚我国中等教育面临的困境。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中等职业教育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看一看比如说煤炭工业的情况，或者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处处都缺少中等专业人才。莫斯科一家五金工厂竟然出了这么一件事：由于技术员水平不高，弄错了图纸，结果全厂一周内生产出来的齿轮全部报废了。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些图纸，没有一个业务水平高的技术员。我国中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的问题极其严重。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的建设事业就会垮台，因为我们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已多少有些过时了。如果一个美国人谈到他们的中等职业学校时，他首先要抓的事情，就是授予一个专业技术工人从事工作所需要的那种实际知识，以便他将来能担当起这项工作。我国革命前的中等学校都是培养工程师，而不是培养专业技术工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在二级学校会议上，来自奥列霍沃祖耶沃和斯大林格勒*的同志说，他们根本不办职业学校。斯大林格勒办的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它办的是七年制的工厂艺徒学校，而别的地方的工厂艺徒学校却是四年制的。列宁格勒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必须扩大我们职业化学校的范围，要使它增加教育学的和合作化的内容，并且突出技术方面。职业化学校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各种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都应根据当地条件办理。我从一个报告中听说，有一个煤矿区本来有两所中等矿业技术学校，后来由于改为地方支付经费就停办了，而另外办了师范学校，结果采煤工业没有一所中等矿业学校，没有中等技术人员。在中央黑土地带区，在唐波夫省，没有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而只有一所中等育

* 原文如此。——译注

马技术学校。所有这些情况说明，每个地区都要根据该地需要开办一所职业学校。我认为这是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工人的子弟开办补习学校，以便培养他们上中等技术学校。加强中等技术学校的工人成份极为必要。这种学校不需要像工农速成中学^④那样附设宿舍和发放助学金，但是要采用一些相应的措施。我国对中等学校的理解之肤浅，简直使我吃惊。我国农村的每一个男女青年农民，不是想到中学去学专门知识，而是一心要上高等学校。我们收到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信。有一个小伙子来信说，他在四年制学校毕业了，早就毕业了，结果现在几乎是一字不识。后来他去建设公社、集体农庄，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做不出什么贡献，因而需要学习。他听说罗蒙诺索夫曾徒步走到莫斯科求学，于是他弄了五卢布就动身到莫斯科去了。他到了莫斯科之后，各个学校都满员了。而且由于他一字不识，任何学校也上不了。他说他到过职业技术教育总会^⑤，还谈到他怎样在小客栈过夜，最后只好回家。当地没有给他一点帮助。这个小伙子看来是很有毅力、渴望学习的，但一点常识和办法也没有。应该扩大入学须知、学校介绍的发行量。要让这种有才能的青年能到中等师范学校去学习一两年。

中等技术学校应该同时教学生学会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在生产单位工作，如何把实际工作提到相当的高度。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谈谈青年农民学校。对青年农民学校的成份我们应该是满意的。我们要把这种学校当成一种工具，用以培养建设集体农庄和公社的人才。青年农民学校必须特别注意此事，否则就会变成一走一过的转运站。鉴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农村青年留在农村，而且还要吸引城市青年到农村去。

再谈谈工厂艺徒学校。我不知道这种学校实际上办得怎么样，但我知道从理论上它们应该怎么办。工厂艺徒学校的每个学生不应仅仅懂得自己狭隘的专业，而且还应懂得这门专业在整个

生产中的作用。他要学会以自觉的态度对待生产；不要当一个盲目的执行者，而要当生产的自觉参加者。但是，我们的工厂艺徒学校往往办得不合要求。这就使某些经济工作人员找到了借口，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口实，去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来取消和代替工厂艺徒学校。他们主张必须采用中央劳动研究所的方法：操纵机器，迅速有效地使用机器，仅此而已。在这方面，我们与工会是有争论的。工会认为，按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培养办法既有利、又经济。但是中央劳动研究所只主张教如何操纵机器，而我国工人所处的状况是，他们应该懂得如何改建、如何安排生产。何况我们不是把工人培养成一个单纯的执行者，而是要培养成生产的主人。工厂艺徒学校应该进行广泛的职业教育，而不只是授予某些熟巧。当然，熟巧还是应培养的，但不止于此。

最后说一下我国中等学校是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还不能说它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曾经看过一份高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材料，其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干活的是机器而不是人。”这话显然是某个教员讲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一年级学生不明白，而且高年级学生也搞不清楚。不过，不能把现在的学校与旧时学校相提并论了。

论综合技术教育

全国工业化和农业改造的问题又一次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培养劳动力以及综合技术教育在这一培养工作中的作用问题。

在教育界，已经平息下去了的对综合技术教育以及应该怎样安排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的争论又开始了。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党提出工业化问题当然不是偶然的。越来越广泛的居民群众都认识到必须放弃旧的耕种方法和作物栽培方法。全国必须工业化只不过是反映了我们非常迫切的要求，以及我们对这种要求的认识。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亨·施塔尔肯堡的信中说：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液体静力学(如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①

对技术的需要不断把科学推向前进。对技术的需要不仅引起了科学界人士对技术的兴趣，而且也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技术的兴趣。现在，群众对技术的兴趣非常浓厚，不过我们要善于培养这种兴趣，善于把它纳入正轨。成人对技术的兴趣也能感染少年儿童。

不久前，我碰到一个5岁的小孩子(他的父亲是个工程师)，他对技术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常常用木铲在石头上铲。

别人对他说：“你怎么啦，沙列奇卡，快别铲了，要不地就弄

坏了。”这个孩子毫不在乎地说：“铲子是木头的，可是地是石头的，我怎么能把地弄坏？”

我还看见这个孩子非常惊奇地站在风磨前面问：“这是什么东西？”人们讲给他听了。到了晚上，他已入睡，突然从梦中惊醒，说：“这个风磨怎么会转动呢？”

应该从小就养成对技术的兴趣。这种兴趣本来很早就产生了，但是我们往往千方百计地压制它，扼杀它。学校在这点上比家庭表现得更严重。

如果我们想认真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那么我们就需要出版父母(男女工人)读物，讲讲怎样引起儿童对技术的兴趣；我们应该审查一下幼儿园的教学大纲，并且看看幼儿园怎样引起儿童对技术的兴趣；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观点检查一下我国四年制学校和七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我们也应该采用适当的方式来安排全部校外工作。

各种劳动的学习或者可能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或者可能具有综合技术教育的性质。

就拿最普通的学习项目——缝纫——来说吧。学习缝纫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一连几小时学习如何缝合得均匀或者学习如何缝纽扣孔。这是手艺学习。但是这种学习也可采用另外的方法。可以使这一学习跟材料和工具的学习联系起来，让儿童明白由于材料不同而同一生产过程就需要不同的工具：缝细布用一种针，缝呢子要用另一种针，缝皮子要用锥子；纸不能缝，要粘；木头不能缝，要钉，等等。这就是用综合技术的方法学习缝纫。也可以不只是让一个人去工作，还可集体地工作：两个人，三个人一起有节奏地工作，一会儿慢些，一会儿快些，然后再做其他许多动作，也打拍子，唱着歌。学习机器缝纫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只不过需要指出怎样转动轮子，怎样装梭子；或者也可以把学习机器缝纫跟学习缝纫机和类似的机器联系起来。由此可见，可以把缝纫当作一种手艺来学习，也可以使学习缝纫跟学习

材料、工具和发动机等等联系起来，这就成了综合技术教育。

不用说，对待教学的态度取决于教师的综合技术水平，取决于他能否把最简单的劳动行为跟比较复杂的联系起来，能否生动地分析劳动过程的一切要素，而不是仅仅取决于设备。当只有手工业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有综合技术教育，因为在各种手工业之间有一道墙隔着，各种手工业之间究竟有何共同之处也不清楚，对各种手工业也没有进行过分析。只有机器生产的发展才使我们得以理解、分析手工业的劳动过程，知道其中的共同之处。技术越向前发展，那么就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每一劳动过程的实质。但是，为了利用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这一分析结果，完全不必要非到设备最完善的工厂里去不可。可以领儿童去参观最先进的工厂，但是如果事先没有进行一些工作来培养他们对技术的兴趣，使他们养成自觉地对待每一劳动过程、每种机器的技能，那么这种参观所得到的益处就非常少；反之，如果进行了有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即使是到一个比较落后的工厂里去参观，也可能对扩大儿童的综合技术眼界有很大好处。

我国当前的技术情况决定了综合技术教育可能达到的深度。但这决不是说，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就不能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因而在这些地区我们就只能束手等待全国工业化后再说，目前暂时只好在少数工业先进的城市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忘掉了一个事实，就是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工业化的工具。综合技术教育应该是群众性的，无一例外的。只有在群众的帮助和参预下，全国才能工业化。

这就是列宁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他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通信中谈到全国电气化计划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应该吸引群众，激起他们的主动性。

列宁在1920年1月写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说：“不能补充一个计划吗？不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或国家的计划，即无产阶级的任务。”

“大概：在10年（5年？）内修建20—30个（30—50个？）电站，使全国布满以400俄里（或200俄里，如果不能搞更大的）为半径的发电中心，其中有的用泥炭，有的用水力，有的用页岩，有的用煤，有的用石油（把整个俄国大概地、粗略地划分一下）。现在就开始定购必要的机器和样品。10年（20年？）以后，我们就能使俄国‘电力化’。

“我想，这样的‘计划’——再说一遍，不是技术的而是国家的计划——计划草案，您是能够提出来的。

“计划应该现在就提出来，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以使用清晰明确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远景来吸引群众：干吧，在10—20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不论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电力化。……

“再说一遍，必须用10—20年的伟大纲领来吸引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群众。”②

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列宁很为关注的问题。他写信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说：

“格·马·！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必须宣传电的知识。如何宣传呢？不仅是口头的，而且要用实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是把电的知识普及起来。为此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每一幢房屋用电照明的计划。

“这要很久才能做到，因为无论是2000万（—4000万？）个灯泡，无论是电线或其他器材，我们在长时间内都会感到缺乏。

“但是目前仍然需要一个计划，尽管要许多年才能实现。

“这是第一。

“第二，应当立刻制定一个简略的计划，然后，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应当善于激起群众的竞赛和主动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

“为此能不能立即制定这样一个计划(大略的)：

“(1) 所有的乡(10000—15000)在一年内都有电灯照明；

“(2) 所有的镇(50万—100万，大概不超过75万)在两年内都有电灯照明；

“(3) 首先是农村阅览室和苏维埃(两盏电灯)；

“(4) 电线杆立刻如此如此准备；

“(5) 绝缘体立刻自己准备(陶器厂，比如说，地方的和小型的?)。如此如此准备；

“(6) 电线用铜？自己到各县各乡去收集(巧妙地暗示铜钟等物)。

“(7) 关于电的教育如此如此进行。

“能不能把这方面的事情考虑研究一下，并发出指示？”^③

这是列宁在1920年写的。

我之所以摘引这样长一段话，首先是因为这段话最好地说明了列宁对群众的态度；其次，这段话也说明了列宁为什么这样重视综合技术教育。他在1920年末对我的提纲所作的评注就是论述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他在评注中写道：

“决不能这样来谈综合技术教育：从抽象的观念出发，针对遥远的未来，而不考虑当前的、迫切的、糟糕的现实情况。”

应当“说明白，我们决不能放弃原则，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接着又说：“把立即过渡到综合技术教育，或者确切些说，立即实现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④

接着，他发挥了自己的可贵的思想，即如何利用我们所有的不多的一些机构；同时应该指出，在这不多的一些机构中，还有国营农场，因为列宁是把农业也包括在综合技术教育之内的。^⑤

我不打算继续摘引列宁的话了，——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研究列宁的这一提纲。^⑥这一提纲清楚地说明了列宁是怎样理解综合技术教育的。

列宁所关心的不只是“劳动力”，“人力”，他还关心培养新的技术基础的自觉的建设者，因为这种基础能把我国变成一个富强而有文化的国家。列宁从来不把培养劳动力跟培养新的技术基础的自觉的建设者分隔开来。

综合技术教育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因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特别激烈。

列宁一般地总是把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跟新的劳动态度、跟纪律问题等等联系在一起的。

就在1920年，列宁写文章论述了星期六义务劳动，论述了新的自觉纪律。

列宁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劳动问题：

“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是需要做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

“这是最能收效最高尚不过的工作。

“幸好我们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平服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是说，我们已经夺得了使这种工作有可能进行的基地。”^⑦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劳动。“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造福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⑧

我国现在已经有了统一劳动学校。但是如果我們想把它办得符合列宁的希望，我们就不仅要关心授予儿童一定的劳动技巧，而且还要培养儿童能够从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动。由于各种

奇怪的情况的凑合，由于我国很穷困，不能给学校各种设备，又不善于教学生学会用别的方法工作，我们就越过了一级而在我国学校里进行共产主义劳动教学就比社会主义劳动教学多些。我们的公益工作就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小部分，不过这种公益工作往往变成组织群众集会，变成了上演戏剧等等。其所以变了，是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劳动作它的基础，缺少技能，缺少爱好工作和认真工作的习惯，缺少真正的劳动锻炼和对工作与技术的兴趣，不善于集体地工作，不会检验自己工作的成果。

正是由于我们教育中还缺少社会主义劳动基础，综合技术教育对我们说来就具有如此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能使我们懂得怎样从事各种劳动，它不仅能使我们懂得应该从事这一劳动，而且还使我们懂得怎样用最好的方法、最合理地完成这一劳动。

《论综合技术教育》报告提纲

(1929年5月在国家学术委员会^①第一次
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 我国至今还是一个最落后的工业国家。现在我国已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世代相传的落后的劳动方法正趋于死亡，而被以最新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大的现代工业所替代。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正在进行。

2. 尽管我国很落后，但是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的大的现代工业却是很稳固的。这种工业的特点，如马克思早就指出了的，就是生产过程不断变化，生产的技术基础不断变化，也就是生产的永恒改组。这就要求现代工人能够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生产条件，掌握新的生产方法。在我们国家里，由于要尽可能快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生产基础，由于在改造工作中居民的合作化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没有群众的参加就不可能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列宁经常指出这一点)，所以群众的综合技术眼界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3. 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激发了群众(其中包括儿童)对技术的兴趣，这就给进行综合技术教育、发挥这种兴趣并为它打下科学基础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4. 我国各级机关，从幼儿园开始，都不应扼杀这种兴趣，而应通过对有关事实的概括，通过对这些事实的科学思考，通过出版有关读物，通过参观和观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等等来

千方百计地培养这种兴趣。应该用现代技术的理想来吸引儿童。

5. 为了实际地了解现代技术，应该利用每个电力站、铁路工厂，利用每一台拖拉机、缝纫机，利用每一个小型工厂、重工业工厂和轻工业工厂。

6. 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认为它的内容只是局限于获得一定的技巧……或者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只是会从事许多种手工业，或者只是研究现代的、而且最高的技术形式，那就错了……综合技术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基础是在各种技术形式中、根据技术的发展及其全部中介来研究技术。这里还包括对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的工艺学”的具体的自然界的研究，对材料工艺学的研究，以及对生产工具及其构造的研究，对力学的研究。这里还包括对经济地理的研究，开采加工方式对社会劳动形式的影响以及社会劳动形式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②

7. 综合技术教育不是一门什么特殊的学科，它应该贯穿到各门课程里去，体现在物理、化学、自然课和社会概论的选材上。这些课程互相之间应有联系，特别是这些课程要跟劳动教育联系起来。只有这种联系才能使劳动教学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

8. 不言而喻，根据综合技术教育的精神制订的教学大纲跟其它的教学大纲比较起来，就要求学生更多地进行观察，并且通过试验，通过实践，特别是通过劳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观察结果并使它深化；就要求学生能够确定自己的观察结果并且从中得出结论。

9. 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里，劳动的学习一方面应该授予学生一般的劳动技巧（例如：能够给自己的劳动提出一定的目的，给自己的工作订出计划，能够计算，会制图，合理地安排互相之间的工作，能够集体地工作，能节约材料，爱惜工具，在工作中能做到该年龄时期所能做到的一定的细致程度，等等）；另一方面，能从技术、劳动组织及劳动过程的社会意义来理解劳动过程（当然，仍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生活经验）。

10. 授予劳动技巧有助于学校公益工作的深入开展，而这种公益工作对培养集体劳动的技巧以及培养儿童用集体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劳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1. 绘画班和制图班、实验室、小型工厂和实验园地等是学校必需的设备。不过学校应该尽量在生产过程中组织儿童。

12. 不言而喻，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面貌。在第一级学校里，劳动教育必然具有共同的性质。但是在七年制学校里，作为起点的已经是某种生产部门了（例如我们在少年学校、农村青年学校和工厂七年制学校所见到的情况一样）。但是在七年制学校里还没有专业化。这种专业化的目的是让学生懂得生产的基本原理，帮助他们了解该生产部门同其它生产部门在技术和经济上的相互关系，使他们能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在二级学校第二阶段时，就可授予学生一定的专业了，不过授予这种专业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传授某一职业所必需的技能而同时扩大学生的综合技术眼界。

13. 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跟职业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里，重点是理解劳动过程，发展把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发展理解一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能力，而在职业学校里，重点是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巧。

14. 但是，现代大工业的性质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专家，这种专家能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生产条件，所以即使是在职业学校（至少是在一些包括大生产的部门）里，目前也逐渐开始为传授技巧奠定综合技术的基础了。

15. 但是，安排妥贴的综合技术教育可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工作人员是资本家所不需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综合技术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16. 大工业的基础薄弱影响了我们苏维埃国家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的发展。但是，这一困难将逐渐消失，苏维埃学校将越来越具有综合技术的面貌。

教育机关的阶级斗争

(迎接党的国民教育会议)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一段话^①。

现在，八十二年过去了，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历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工人阶级已经牢固地结成了一个阶级，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来消灭旧的生产条件。但这些条件是否已全部彻底地被消灭了呢？当然没有。我们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向农业集体化过渡。这种集体化正是为了消灭旧的生产条件，因为旧的生产条件乃是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现在，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之后，集体化已具有了群众性，它已在自发地进行着了。现在正在摧毁旧的生产条件，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不仅农业不能转向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而且大工业也不能建立相应的基础，而没有这种基

础，大工业也就很难具备真正的社会主义形式。

如果以为向集体化农业过渡不会导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且往往是极残酷的斗争，那就十分天真可笑了！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在放火烧集体农庄，谋害工人通讯员等等；教派又在死灰复燃；农民中的“坚强”阶层、市民中的某些阶层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但这儿有着特殊的辩证法：为了铲除阶级存在的根子，为了终止阶级斗争，却必须走激化阶级斗争的路子。目前的阶级斗争比前几年激烈。阶级斗争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阶级斗争各有不同。有的阶级斗争是自发的、盲目的，而有的阶级斗争是自觉的、有组织的、经过缜密考虑的。无产阶级破坏机器，这也是阶级斗争，不过其形式极其幼稚而已；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就是缺乏自觉性和组织性。还有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那是有组织的，例如1905年10月大罢工，抗议连拿枪杀事件的罢工，以及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斗争。

我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已经十一年多了。这个政权是通过顽强斗争取得的。我国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人数众多、内在纪律严明的强大政党；他们成立了工会。不言而喻，他们目前所领导的阶级斗争就会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通过适当形式体现出来的。

应当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国民教育方面的阶级斗争，其经常表现的形式似乎使人觉得我们一点革命经验都没有。似乎我们在这方面刚刚起步一样。

举例来说。我们对富农、私商、神甫、被剥夺公民权的份子^②……进行斗争。

我们又是怎样做的呢？往往是在学校里整那些小娃娃——被剥夺公民权分子和神甫的孩子。这是易如反掌之事，因为不像对成年人进行斗争那样。往往不让他们去参观，说：“你是神甫的孙子；别人可以去参观，你就呆着吧。”有时在高年级说：“你是被剥夺公民权分子的女儿。我们不管你学习成绩如何优异，一心

想入团，是一个好同志，经常做社会工作，双手很能干，有一颗火热的心，富有首创精神，意志坚强……一年后毕了业，可能为国家作出不小的贡献……我们不管这些。因为你是被剥夺公民权分子的女儿，就该滚出学校去！”

党纲规定，学校应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全体儿童，影响儿童，组织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啰，话是这样说，但这件事却是很复杂的，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孩子赶出学校，于是就不断地把他们赶走。教育人民委员部说这样做不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⑨赞成……但是还有人坚持这种意见，认为把神甫和被剥夺公民权分子的孩子赶出学校，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然而，正是那些忙于收拾出身不好的孩子的学校，往往旧的底子很厚实；苏维埃学校的思想很难得传播到那儿去，那儿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方法，与生活毫无联系；学校领导人很少考虑如何为儿童奠定共产主义教育基础的问题。

我听说，许多图书馆不让被剥夺公民权分子、神甫及其子弟借阅图书，剥夺了他们接触唯物主义和反宗教内容的书籍的机会，也使他们无法了解我国如何日益强大的事实……这种做法荒谬绝伦。难道这就是斗争，难道这就是捍卫阶级斗争观点？

不让异己分子借书是轻而易举之事，要比为了贯彻真正的阶级路线，从图书馆里挑选出一批恰当的书容易得多，要比让贫雇农能借到书，让图书馆千方百计贯彻党的路线容易得多。

社会主义意味着科学和文化的蓬勃迅猛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求人人识字，而且要使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教育素养和综合技术素养。这一切，联共（布）党纲都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主义为每一个人开辟了通向知识的道路。

1918年，在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曾说：“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

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④ 共产党员如果剥夺了别人受教育发展的权利，那是毫无道理的。资本家总是堵塞工人通向知识的道路，而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能堵塞任何人通向知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时间越往后推移，共产主义的火炬就燃烧得越明亮，它就不仅会给工人和农民，而且给全人类每一个人更好地照亮前进的道路。

禁止读书，不许某些居民入学，这并不是阶级斗争。

问题不在出身，而在本人的表现。当然，对其他阶级出身的人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因为童年的回忆、周围的环境都会产生影响，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学校滑到中世纪泥坑里去了，从而扼杀了一切发展的动因，一切趋向共产主义的动因：不管你学习成绩如何，不管你工作好坏，不管你进行何种社会工作，反正你是神甫家庭里出生的，你到死也是外人……

不言而喻，首先应该接纳工人的孩子、贫农的孩子、雇农的孩子入学。这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他们当然应该比其他居民阶层享有一切优先权。从前，他们的各条道路都被堵塞了，为了使他们处于与别的阶层平等的地位，应该为他们制定一些优待的录取条件。要用知识武装他们，以便他们能把已经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并且带领广大群众前进。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而是为了按自己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为了消灭一切阶级，为了把整个人类提到最高的水平。

阶级斗争是我们教育机关一定要进行的，而且也正在进行中。我们应该经常注意阶级斗争，但不要使它具有阻碍明确的发展进程的形式。

论 中 学

(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提纲)

中学的一般状况

1. 国家的工业化以及工农业的改造，既要求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也要求培养相应的中等技术人才，这种人才能够从生产上把群众组织起来，领导他们前进，指导他们工作。

旧的中等技术人才是沙皇时代培养的，他们越来越不适合需要，首先是由于他们不能领导现代的群众(他们仍然以主子的态度来对待群众)，不能与群众一道工作；其次，由于他们的技术训练是在完全不同的技术水平上进行的，他们不了解今天的建设任务，也对它不感兴趣，因而很难适应日新月异的生产条件。同时，我国劳动者的素养还很差，集体劳动的技巧刚刚开始培养，一切经济工作都得重新做起，所以中等技术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培养工业和农业中等人才的工作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学。中学应该培养新型的中等技术人才，这种人才一方面要具备相当的教育和社会素养，另一方面要能从实际上和理论上了解自己的专业。

在改造时期，使这种新型的中等技术人才具备较为厚实的普通教育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了。

工厂艺徒学校^①的经验生动地表明，四年制的基础远远不够，由于缺乏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知识，迫使你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基本的东西，不然就要严重影响学习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②和共青团都主张，工厂艺徒学校应以七年制为基础。职业学校也是如此。

因此，培养中等人才的基础应该是七年制学校。改善这种学校的现状应是国民教育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2. 就七年制学校现状而言，尽管最近几年无论在工作范围方面，还是在工作内容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改造时期所提出的任务要求。七年制学校及其毕业生人数还是微不足道（据1927—1928学年的统计，一年级入学的学生念到七年级的仅占7.4%，包括青年农民学校和七年制工厂学校^③在内）。七年制学校的社会成分也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被淘汰的学生主要是低工资工人的孩子和贫农的孩子（工人和雇农的孩子在七年级总共只占23.6%）。

七年制学校的方针是：1)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今后进行普通教育学习所不可缺少的；2)教学生学会把知识运用于生活；3)授予学生一般的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体工作的能力；4)给儿童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5)养成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目前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最近几年来，七年制学校注意用普通教育的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今后还应更加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在使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方面，青年农民学校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些；至于其他七年制学校，一般说来，要比四年制学校要做得差些。

至于说到一般的综合技术技能以及有计划地、合理地、集体地工作的能力，大多数七年制学校都搞得很不好。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没有校办工场，毋宁说是由于舆论对综合技术教

育不重视，因而使之难于与周围的生产单位建立起联系，此外，缺乏能干得力的劳动指导人员也是一个原因。

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问题，教学大纲对此要充分加以强调，但是由于七年制学校教学内容过多，教学大纲份量太重，加之教员水平不高，就把这个问题推到次要位置上去了，结果共产主义世界观问题在学校里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

教育学生懂得必须以共产主义道德原理为准则的这项工作，在一般七年制学校往往蜕变为采用旧学校那一套教育方法了。这表现为在很多方面采用与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相同的学校自治的形式，表现为不善于在儿童中培养同志式的气氛，不善于激发儿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3. 七年制应该是第二(即职业化)圆周阶段的基础，也是部分中等技术学校、工厂艺徒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基础。

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工厂艺徒学校、职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应该成为给工业和农业输送中等水平劳动力的最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学生的最重要渠道。但是，这类学校远远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的状况——职业学校只有16%的学生(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统计)受到生产训练，而其余的人则是培养他们从事教师或职员职业。因此人们往往把职业学校主要看作是升入高等学校的一个梯子。就社会成份而言，第二圆周比七年制学校还差，它实际上是职员子弟的学校，生活拮据的工人、贫农和雇农的子弟根本进不去。

中等技术学校授予的专业技能更扎实一些，不过，授予生产技能的只占中等技术学校的48%，医学教育方面的占11%，艺术教育的占11%，其余都是培养师资的。中等技术学校不大注意普通教育，甚至取消它；此外，有些学校还未进行生产实习，办学方针往往不能适应生活的要求。部分中等技术学校只招收年满18岁的学生。这些中等技术学校急于办成十年制的，而不是七年

制的。

职业化圆周和中等技术学校之间往往互不协调，而且不能满足该行业对它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中等技术人才的要求。

现在我们又在七年制的基础上办起了工厂艺徒学校。这种学校实际上是一种享有优待的学校，它与其他学校不同之处，就是它的学生是领工资的。工厂艺徒学校的境况比其他中等学校强些，不过它的工作还须大力改进。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培养中等职业人才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职业圆周阶段学习的只有1/3的中学生时，就更会感到这一点）；中学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改造时期日益增长的需要。

改进中等学校的若干措施

1. 随着苏维埃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七年制学校将成为普及的义务学校（1920年召开的党的国民教育会议^④即已指出此点），并将成为培养专业技术劳动力的教育机构的基础。有鉴于此，必须：

第一，增加七年制学校学生的数量，办法是建立更多的七年制学校，首先是在工人中心、大的国营农场、公社、集体农庄建立这种学校，从而消除现有学校网点的旧的痕迹，因为现有学校的布局都在中心城市和从前的商业城镇，由于七年制学校的建设与工业和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必须发动经济机关参预这项工作。在发展七年制一般网点的同时，还需要开办一些补习学校，比如在中等技术学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技校）里设七年制训练班，招收不能上七年制学校的工人子弟，雇农、贫农、集体农庄庄员和公社社员的子弟入学。还要开展七年制的函授教育，由学校 and 中等技术学校组织辅导答疑。

第二，大力提高工人、雇农和贫农子弟在七年制学校的比重，办法是采取专门措施，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如发放助学金，免费供给衣服鞋子、教科书、热早餐等等，广泛发动社会团体进行这种资助。在一般七年制学校为贫农、雇农的子弟，为低工资的工人子弟以及尚未巩固的集体农庄和公社的孩子们设置宿舍。

第三，要使七年制学校成为综合技术学校。为此，青年农民学校(农村学校)不仅必须更好地面向集体农庄建设，而且还要更好地面向工业劳动；为此，最好把这种学校设在各村联合拖拉机站。工厂七年制学校必须与生产保持更紧密的联系，为此就要对各企业下达指示并发动工厂基层组织参加这一工作。最好让企业出面组织儿童参加企业的某些劳动，为学校开办一些工场。其他七年制学校最好在与市政企业、饮食行业、化学工业和建筑业加强联系的基础上，体现其生产性质。

七年制学校的整个教学大纲要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加以修订。据此，高等师范院校要为综合技术学校培养一批新型的教师。要注意使培养师资的工作具有综合技术性质，因而要相应地修订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改变高等师范院校的设备，改变其生产实习的内容。开办不久的七年制学校教师劳动讲习班应该加强。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学大纲与培养学生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一任务的联系，一方面应适当减轻七年制学校教学大纲的知识份量；另一方面必须补充如下一些材料，如：五年计划，国家的工业化，集体农庄建设，等等。要特别重视教学大纲中关于世界观的部分，比较详尽具体地向儿童介绍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是阶级斗争，以及宗教起着何种作用，要突出国际主义思想，等等。

由于自治问题、学校社会公益工作问题、禁止体罚问题以及培养自觉纪律问题都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讨论，所以目前的任务主要是贯彻执行，以便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全部的工作。

2. 为了保证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即培养生产的组织者和群众的指导者，要采取以下的基本措施：

1) 要使第二圆周的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联成一气，共同满足各个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

2) 需要劳动力的单位要对劳动力实行特殊的“订购”。培训工作不应只顾眼前，而要考虑到该部门的发展趋势，考虑到升入高等学校以及改行等等情况。

3) 教学大纲中要充分突出培养具有中等专业技能工作人员的各类中等学校所具有的那种广泛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特点。对第二圆周、中等技术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也应如此。

4) 上述各种学校都应和生产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学生能在他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参预一定工作；这项工作要计算成绩和报酬。如果是师范教育为主的学校，那学生就应去教多少个文盲识字，当多少天图书推销员，在幼儿园干多少天活，进行多少次参观，等等。中等医学技术学校有自己要干的事，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和以农业为主的学校也有自己要干的事，工业学校则有另外一些要干的事。

不管是哪种专业，都得具备一定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熟巧和知识。实习生的劳动，一定要在确有效益的条件下才能付酬。凡此种种，都使我们的中等技术学校和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具有务实的性质。

5) 还要像中等技术学校那样，要逐步实行下述办法：凡在二级学校职业化圆周阶段毕业的青年，以及在工厂艺徒学校毕业的青年，在升入高等学校以前，必须在相应的部门工作两年或三年。在这段时期内，他必须与学校保持联系并根据学校的任务完成某些工作。

6) 必须大力从物质上加强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段，因为它在物质基础上远远落后于所有其他学校。

7) 要特别重视改善社会成份，特别是二级学校第二圆周阶

段的社会成份，可采用与七年制学校相似的办法。

8) 要大力发展业余教育和提倡自学(办职业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班，等等)。

为了使改进中等学校状况的一切措施得以贯彻执行，必须进一步明确文化五年计划^⑥对培养中等技术人员的要求以及各省和州的要求。

由于现在许多学校在工业技术和农业方面都有新的侧重面，因此这一点尤为必要。

保证上述措施贯彻执行的另一必要条件，就是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尤其是共青团和党组织)关心中学的工作。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
与第一届全苏少先队会议的
代表们的联席会议上的演说)

同志们，几年以前，许多小朋友还认为，重要的是少先队运动，至于学校，那是次要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少先队员，年轻的列宁主义者，我们干我们的，学校干学校的，各不相干。同志们，我想对你们说，十月革命爆发后，我们的整个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特别担心，都在想：今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十月革命刚一胜利，人们纷纷议论，工人们在工厂里应该怎样组织起来，农村应该怎样改造。当时也谈到我国的学校应该办成什么样。后来召开了国民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①，列宁在这个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谈到了学校。他说，我国的学校现在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国外来的少先队员同志也许会告诉你们或者已经告诉你们了：各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学校是如何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如何强迫儿童去念那种把他们培养成资本家的顺从奴仆的书。西欧和美国的少先队员会详细地对你们讲：由于他们的想法不符合教师的讲法，他们在学校里怎样挨打受罚。而教师的所作所为，则完全是按资本家的命令行事。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学校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从历史上得知，过去我国学校的情况也是如此：命令我们干这干那，强迫我们做各种祷告，为沙皇的健康长寿祈祷，等等。我国旧时的学校也是完全掌握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的。所以列宁说，十月革命后我国学校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不光是学校如此，全国人民也成了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自由的人了。现在，我国的学校正同摆脱了奴隶枷锁的人民一道沿着新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他们将在平等友爱的原则上进行自己的建设工作。列宁在结束讲话前，说了下面一段话：“必须竭尽全力和运用一切知识来尽快地建立我们未来的劳动学校，因为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将来能避免目前这种已持续了四年多的任何世界冲突和战争。”^②列宁1918年发表这篇演说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屠杀正在进行。所以列宁说，我们应该建设新的劳动学校，这种学校据以建立的原则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孩子们将会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并能自觉地对待周围的一切。他说，这种学校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消灭各种战争。列宁殷切希望，在新学校的帮助下，青年一代能组织起来，能深刻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殷切希望青年一代成长起来之后，能够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希望青年一代能够团结一致，并在自己内部建立这样一种同志关系，这种同志关系将成为不可战胜的，是任何资产阶级所不能破坏的。这就是列宁十一年前讲的话。

走过的道路

所以，必须建立这种劳动学校。您们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是多么困难。当时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学校的事几乎无人过问，部队调动频繁，校舍被占用，甚至遭到破坏，尽管都知道学校所具有的意义。当时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心要为捍卫

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而斗争，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学校是遭到了破坏。后来，您们知道，随后几年我们又为恢复一切被破坏了的东西而斗争；为了开垦荒芜的土地，为了使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而停工的工厂重新投入生产，我们花费了多少人力和资金啊！当时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所以我们不能按我们的要求那么快去建设学校，以致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学校来接纳全体儿童入学。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有教养、有文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可以真正地建设新生活。我们迫切需要学校。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務却是恢复一切被破坏了的东西。

后来，在完成恢复任务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样建设这种新学校以及孩子们在学校学什么？应该说，对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也弄不大清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虑并全力以赴的，是从教学中剔除旧学校所教的那些无用的东西。当然，我们一开始就已知道，类似神学课这样的课程是不应该在学校开设的。我们所培养的儿童，要能用正确的观点理解整个周围世界，也就是说，要认识这一世界的本来面目；要向儿童讲述科学的最新成果，讲述科学是如何解释各种现象的。这样，我国学校很快就停止讲授神学课了。您们知道，旧时的古典中学学习的是远古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语言，而毫不注意当代人的生活情况。现在谈起这种情况甚至都使人感到好笑，因为儿童们已经非常习惯在学校里学习周围的生活，这是由于我国学校是与生活相联系的，是与校外发生的一切事情相联系的。从前的中小生成天攻读希腊和拉丁语法，研究帝王将相的生活，而现在我国学校的学生首先研究的是周围的生活，了解的是当代人的斗争目的和方式。新式学校已不再开设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此外，旧时学校实行男女分校。男孩子学的是一种内容，女孩子学的是另一种内容。教育女孩子应服从男人，让她们在普通中学或古典中学毕业后能成为丈夫的百依百顺的妻子，等等。我们很快改变了男女分校的做法，我国学校现在是男孩与女孩一起学习。

我们竭力在男女同学之间建立真正的同志关系。

与周围生活步调一致

我们从一开始就想把我国的学校办成劳动学校。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因为我们学校里不仅没有劳动工具，甚至连纸张、铅笔和书本都没有。因此，最初我们学校的劳动原则表现为洗地板、刨木头、缝补衣服。但是，同志们，这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学校。几年之后，国内战争既已结束，我们开始从贫困状态中摆脱出来，我国学校的情况也开始好转。但是很多事情实际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旧制度的偏见和旧的习气，遗留给我们的还有一批旧的教师，最后，家长本人往往受旧的偏见的主宰，要求按老办法教育他们的孩子。我们过去还有过这样的事，一个没有觉悟的母亲到学校来，带着遗憾的口气问道：“您们为什么不处分我的孩子？”可见旧的生活习性的影响之大。特别困难的是在农村推行新的制度。

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学校，就会发现它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可以高兴地说，现在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就是应该怎样理解周围的生活，应该怎样工作和学习。儿童随着大人一起前进，经常帮助大人。大人建设社会主义，儿童也根据自己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不久前我到过北高加索，在那里参观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国营农场和公社。公社的孩子都过着新的生活。我经常收到生活在公社和国营农场的少先队员们的来信。可以看得出，孩子们在这些按新原则建立的经济单位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亲眼见到集体的事业日益发展壮大。同时家长们也开始以新的态度来从事工作和考虑问题，所以到学校来的时候，不再要求按老办法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了，而是希望多给他们讲讲什么是集体经济，怎样建设集体经济，以及如何在其中工作。我们的生活朝前

发展，孩子们也在逐渐成长。

七年前我们还未建立儿童组织。我们当时还在争论是否需要建立这种组织。当时许多同志认为，孩子们只要学习就行了，没有必要建立任何组织。只是到了后来，主要由于共青团的努力以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支持，才成立了庞大的共产主义儿童组织。少先队组织终于建立了，儿童们纷纷当了少先队员。

什么是“少先队员”的本意？

什么是“少先队员”的本意？“少先队员”的本意就是开拓者，即新事物的创建者，新道路的开辟者。从前把最先到达美洲，在一片荒芜之地经营农业并开创新生活的人叫作开拓者。这就是说，少先队员乃是新事物的创建者，新道路的开辟者。我们的少先队员应该向别的儿童指出走向新制度的道路。每一个少先队员都应该明白，他不能把自己封闭在学校里，封闭在自己少先队组织里，而要关心全体儿童，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不久前曾经同一些没有参加组织的小朋友谈话。我问他们：“你们学校的少先队中队做些什么工作？”他们说：“少先队员从不跟我们谈起他们做什么工作，我们不搭理我们。”孩子们，我希望这只是个别情况，而大多数少先队员都能与全体同学保持密切联系。学校少先队中队应该成为把全体儿童组织起来的倡导者。

小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今后能把校内其他小朋友都组织起来，因为你们是最有觉悟和最先进的儿童。我再一次祝你们在这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祝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成列宁所说的那种学校——这种学校要能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培养在我国和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建设者。

培养新生活的建设者

(在全苏少先队代表会议^①上的演说)

提倡集体主义

提倡组织性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共产党人都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是组织性。列宁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组织性。”过去，每当谈到未来社会的组织工作时，主要考虑的是把成人组织起来，把穷人组织起来，而很少想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还要把儿童组织起来，把少年组织起来。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很少有人谈到，也很少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谁也想不到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如果你们读一读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力图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情况的书籍(这种未来生活的远景称之为乌托邦)，那你们就会发现，这些老一代的乌托邦主义者的笔下，写的都是大人，而儿童在未来社会则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十月革命之后，甚至于二月革命之后，我们就已发现，儿童也渴望组织起来一显身手。当时维堡区有一个小孩子，只有十二岁(现在他已长大了，可能入了团)。我记得1917年五一节他在工厂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五一节资本家也应给我们发工资，这是我们的节日，工人的节日。”

列宁格勒的青年工人渴望组织起来(别的城市想必也是如

此),而且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几乎自发地组织起来了。党已开始过问这件事,但起初这种活动却是自发的。如果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青年一代,再来看看正在成长中的一代,那我们就会发现,不仅年龄大些的青年参加了共青团,而且现在已有200万儿童参加了少先队组织。

少先队组织的源起

我们当然知道,这200万儿童当中,很多人工作能力很差,只不过是参加了组织而已,但是我们发现,你们少先队员已经完全懂得了组织的重要性,都想尽力共同参加党和全国正在进行的那一重大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到处都遭到破坏,成人的组织也比较弱,我们刚刚开始按新的方式,即按社会主义方式安排我们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建立少先队只不过是七年以前的事情。最初,孩子们主要是被少先队的气派所吸引——鲜红的领巾,咚咚的鼓声,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气派也是一种组织手段,特别是检阅这种形式,它对那些还未参加组织的小朋友很有意义。气派使整个组织显得井然有序、整齐划一。现在国内有些偏远地方才刚刚开始建立少先队中队这种基层组织,那儿的孩子们常常来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来,目前最吸引他们的还是红领巾和队鼓。但是,仅仅依靠一些表面的东西来吸引人,只是刚开始时,现在孩子们的认识逐年提高,他们关心的不仅是表面的东西,更关心能使他们的工作成为有用的工作,重要的工作。同时我们发现,凡是周围都组织起来了的地方,孩子们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开展。

生活走上了新的轨道

全体小朋友都知道，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农村整个生活的变化。从前，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并且持有这种见解：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可是现在农村里的看法已在改变。我们发现，农村的生活走上了新的轨道。在北高加索，在西伯利亚以及乌拉尔等地的农村，都在建设大的集体农庄，涌现出一些大规模的农业单位。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共产党人就在谈论大规模的集体农庄经济，但当时很难组织起来，因为农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可是现在我们却看到，很多地方甚至整个地区都开始考虑怎样过渡到集体经济上去，而且是过渡到有计划的集体经济上去。

一代新人在成长

公社的青年也在成长。有些公社几乎全体儿童都是少先队员；公社的成人社员经常讲到，公社的孩子比成人更支持新制度。中央黑土地带省^②有一个公社，名叫伊里奇公社，这个公社的负责人写来一封信，谈到这个公社的种种困难：成人互不谅解，经常争吵，但他们那儿加入了少先队的孩子却比成人组织得更好。就是现在，在你们这次大会上，也令人突出地感到新的一代正在成长。我高兴地看到这次集会，看到这么整齐的队伍，看到你们都具有组织性。我和高尔基同志坐在一起，我们谈到，在我们那个时代，这样的事当然是做不到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只有在苏维埃制度下，在居民普遍有了组织性的情况下，在全体居民的觉悟有了提高的情况下，像你们这样一代的人才能成长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景况

同志们，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我国农村正走上大规模集体农庄经济的道路，这样它就能与城市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是文化提高的保证，是使我们得以指望（我们共产党人也殷切期望）你们青年人将在比较有文化、比较幸福的环境中成长的保证。这种环境当然不像不久前几个二级学校学生所想象的那样。大约在三年前，有人给我看了莫斯科市二级学校几个学生的作文。有人问这些学生：“你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会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回答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什么活儿都由机器干，人不用做任何事。”我想，你们少先队员们，还有上面那几个写作文的学生，现在都完全懂得了，社会主义并非不用做任何事，而是人人富足，或者如列宁所说的，就是要使俄国成为文明的、光明的、健壮的国家^③，而主要的，是要使人与人的关系不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弱肉强食的关系，而是一种同志友爱关系，要使强者帮助弱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处处都是团结友好的气氛，人们习惯于合作共事，合作解决存在的问题，奔向同一个目标；人与人的关系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亲密得多，而这样的生活才会是真正光明幸福的生活。

与旧的残余作斗争

但是，小朋友们，你们同样也很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凭空产生，要一砖一瓦地去建设，它得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进行斗争。所以，尽管你们将生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里，将会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社会主义，但是你们还要进行很多斗争，斗争

的形式也许不同于老一代，但是为了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还要进行很多斗争。列宁曾经写道，十月革命胜利后，我国的旧事物已被打倒，但还没有根除，还有很多旧的遗迹。而这种旧事物将会妨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旧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可看到，表现在各种小事上。小朋友们，你们要与这种旧的东西进行斗争。你们现在正在进行斗争。每当与少先队员交谈时，就能了解到他们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每当他们发现某些不合规矩的现象时，他们自己就知道，应该与这种现象进行斗争。昨天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与一部分小朋友座谈了国民教育问题。座谈会的第二部分，是分组进行的，分组会给我们教育工作者留下了极愉快的影响。小朋友们发言很热烈，而且他们不仅是口里讲讲，还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认真考虑过少先队中队所进行的工作。

要有自己的见解

我特别喜欢一个小朋友的发言，他在一个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在讲话中说，小朋友们应当表现出首倡精神，如果他们只是按教师或辅导员的命令行事，这并非十全十美的表现，他们应该主动找工作做，他们自己应表现出首倡精神，提出各种建议，把自己的工作搞成自觉自愿的集体工作。这时，那个不同意我的看法的少先队员就说：“我们也应该重视老师或辅导员的经验，要认真倾听老师或辅导员的意见。”这个小朋友有独立见解的发言，使我感到他是认真考虑问题的。要让孩子们学会考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深入思考每一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觉得，目前的少先队组织，少年儿童组织，已经是一个巩固的组织了。毫无疑问，它将日益发展壮大，而你们，小朋友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怎样吸引更多的孩子参加你们的组织。

要更加关心你们的同志

有一段时期，少先队中队只考虑本中队的事，只顾自己的工作，而对那些没有参加少先队活动的孩子，对那些还不明白应该参加少先队组织的孩子，——对这些孩子却很少关心。我认为，现在少先队员都相当有觉悟了，可以吸收全体儿童参加活动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要让全体儿童把少先队组织看作他们应努力以赴加入进去的组织，要让加入这一组织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我讲话快要结束时，我祝愿你们的工作一年比一年搞得深入扎实，你们的组织一年比一年更加巩固；希望党向全国提出而由共青团协助完成的那些任务也能成为你们的任务。最近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日益发展，希望你们更好地帮助大人搞好这一工作。孩子们，祝你们诸事如意。

教育咨询

男女工人都有很多有关子女教育的问题，他们感到很有必要找懂行的人谈谈。所以应该开展教育咨询工作。

这种咨询工作要非常方便才行。要在各个工厂的红角经常举办座谈会，同那些对子女教育问题感兴趣的男女工人讨论这个问题。座谈最好安排在工人方便的时间，比如安排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或交接班之前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负责咨询工作的教师要认真听取所提出的问题。往往由于提问题的人牢骚满腹、说话激动，使您不能马上弄清楚他的问题所在。要善于对待他，有条不紊地问清情况。最初，这项工作可能具有答疑的性质。他们会问，怎样安排孩子上学，等等。但是，逐渐地，座谈就会深入下去。

我们常常在家长促进会上讨论孩子的行为和表现，家长们对此非常急躁不安，因而讨论就很勉强。讨论儿童的行为时，最好两人面对面地谈，而且时间要略为充裕一些。负责咨询的人要认真地研究问题。他还应该挨家挨户访问那些不在工厂工作的母亲。他既要经常到学校去，也要经常到少先队中队去。他还要帮助孩子们安排好阅读，组织儿童小组，发动家长参加教育工作。如果他能把自己的工作预先安排好，定期与学校的老师谈话，同老师们，同图书馆管理员们一起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那他的工作就很有益处。这种咨询人才应该专门培养。他们还应帮助青年小组，在职业的选择上，在有关学校、家庭生活和少先队组织的问题上

进行指导答疑。这种咨询人员要到弄清哪些问题男女工人对它感兴趣，并在俱乐部就此问题举办座谈会。

我希望《当代儿童》杂志的读者能发表发表意见，看看企业里是否应开展教育咨询工作，并且怎样才能把这一工作搞好。

论培养教师

(在高等学校校长会议^①教育分会上的报告)

当然，如果不讲讲我们目前国民教育的情况，就无法说我们应该怎样改组高等师范院校，给这些院校灌输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工作——向全面的集体化过渡，改造农业的各种形式——当然它在农民的整个世界观上也有反映。它将摧毁一切旧的传统。

现在国民教育的范围非常之大，而我们的文化工作人员又非常之少，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我们通过了许许多多决议，决议里谈到这种和那种情况：派遣了多少多少文化战士，做了什么什么工作。所有这些都不错，可是再来看看我们应该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那我们不能不说，我们对各地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没有认真予以重视。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还不能去为群众服务，能够去为广大群众服务的社会活动家式的教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战士的新的工作人员，为数还非常之少。

现在正在改选文化战士^②。莫斯科省和整个俄罗斯联邦都将选举文化战士，也就是居民中最关心这项工作的代表。但是对他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要把他们全部组织起来。而我们的教师和政治教育人员首先应该成为这些居民代表的组织者，成为唤醒社会人士的组织者。应该说，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虽然在各地积极参加了群众工作，但是他们对这件事却缺乏充分的考虑，

因而把它当成了一种额外的负担。这件工作往往没有纳入教学计划，而是某种附加的任务，是生活所提出的一种强制要求，既不能回避，但又不能列入我们的教学大纲。

目前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所具有的这一巨大规模，决定了我们要采用新的形式来组织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拿政治教育工作来说吧。我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过，在那个部门我工作的时间最长。我们发现目前的网点简直微不足道，完全不能满足要求。正在拟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中，已试图把所应做的工作规定了一定的数量。但是它对这些网点所应发生的质的变化，对工业和农业发生的转折所引起的质的变化，却反映得非常之差！非常不够。我们在这里定计划，可是生活已经提供了新的工作形式。例如，我们在议论办集体农庄大学^③，讨论怎么去办这种大学，考虑这种大学的教学计划，然而实际上许多这样的大学早已成立了。我们还在讨论怎样改革苏维埃党校^④并修订党校的教学大纲，然而成千上万个培养农村工作人员的学校早已出现了，并且其布局早已调整好了。我们刚刚在说工农速成中学应该接近群众，工人们却早已着手建立工农速成中学了——在某一个大工厂办起一个这样的中学。

如果我们想培养符合生活要求的教师，我们就要注视未来，同时也要重视过去的情况。这当然应引起这次校长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各省大学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特殊关注。

我们现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呢？高等师范学校的现行教学大纲对此没有充分反映。大纲上当然列有《马列主义原理》课程，但马列主义的份量是否符合必须的要求呢？因为整个大纲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列宁主义的精神。重要的不是在课堂上让学生把马克思和列宁有关国民教育的论述都学完，而是要使每个学生都能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懂得在某一具体的环境中怎样把这些原理与整个国民教育工作联系起来，懂得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整个精神体现了什么，大学生由此应得出

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看到，现在的速度真是一日千里。没有根据认为，两三年后这一速度会放缓，生活会步入常轨。恰恰相反，有充分根据可以断定，很长一段时期内速度都是飞快的，并且眼下还不能预见这个方面会出现暂时的平静。而速度决定着每天必须独立地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培养大学生就必须使他能适应每一种新情况，而不要在他刚开始工作时，突然挠着脑袋说：“哎呀，我得上研究生班，我什么也不懂，我还得从头上培训班”——然后又到某处学习去了。应该这样来培养，使之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应各种新的形势。我们根据经验知道，马列主义有助于我们弄清最复杂的问题和最复杂的情况。所以说，这些问题，也就是指马列主义的问题，当然应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占有比现在更重要的位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这些原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重要的不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负担如何，而是他应该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真正的社会活动家。可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却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不是让学生成为善于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并能急国家之所急、能对各种问题进行分析的人。同培养理论人才一样，我们当然要培养能把理论与实践、与整个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学生。

我几年前在共产主义教育学院^⑤工作时，曾经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既然每一个大学生都应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教育工作人员，那么他从一年级起就应成为一个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几年前，我曾经给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的学生开过一门导论课——政治教育工作引论，为期半年。我认为，各个高等师范学校都应开设这门课程，因为要想成为一名教师，成为国民教育活动家，就得掌握宣传鼓动的方法，就得学会组织群众。不管他念的哪个系，也不管他在哪个科，当教师也好，当政治工作人员也好，或者当国民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也好，有一个方面，即善于做群众工作，

应该成为他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他不会做群众工作，不懂得这项工作，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活动家，更谈不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培养学生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乃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再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办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当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理解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要使全体居民人人都成为劳动者，人人都能在各个不同的战线工作。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肩不能挑担、手不会拿锹的人。不用说，现在已经谈不到用锹了。在国家计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工人说，现在实行的是没有休息日的工作制度，他觉得应该这样安排：让他在机床旁干四天活，第五天能到农村去用锹干干活。这时大家朝他喊道：“不是用锹，是用拖拉机。”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用拖拉机，菜园子里的每一种蔬菜都可以用拖拉机栽种，这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受过综合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训练的人应当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包括城市劳动技能和农村劳动技能。这种劳动技能现在非常差。只要你能想到这种情况，并且了解一下美国的现状，你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在用原始的方法对待这个问题。美国开办了各种劳动短训班，这种短训班都是从该地区的特点出发举办的。比如说，如果某个村庄或者某个农场、某个地区敷设了自来水管，那么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 and 每一个老师都到那儿去学如何修理自来水管。如果没有自来水管，那就采用别的劳动教育形式。这种自来水管教学，以及别的一些小事情，都充分说明美国人多么重视城市劳动技能和农村劳动技能，说明应该怎样去做工作，并且促使我们认真考虑并且严肃地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培养我们的教师，使她们能掌握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加斯帖夫同志的劳动研究所，也就是中央劳动研究所^⑥，那我们会发现，中央劳动研究所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不能否认，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劳动熟巧，一定要懂

得怎样使用某种工具，开动某种机器。这种起码的技能与一定的修理技术，正是我们高等师范学校所应授予学生的。

不过加斯帖夫提出的劳动技能，主要是工厂的劳动技能，可是还应该农村的劳动技能。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个机关、有哪个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讲的不是拖拉机手。拖拉机工作与这种劳动技能有一些关系，但是它另外还有专门的农业劳动技能，所以就必须把机械劳动与农业劳动的教学结合起来，使两者密切联系起来。这就需要拟定这类训练班的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大纲，还需要使每个教师，不管他是学什么的，也不管他是哪方面的科研人员，必须同时掌握这种劳动熟巧。我们专门为教师、为学前教育工作者设置了各种工场。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像一个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人，刚开始时，要想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每次都得去听一个专门的报告，或者到哪儿去学习学习。同样，一个没有掌握综合技术劳动熟巧的人，总得不断地学习。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未彻底解决，但是，这个问题无疑必须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不要只是在系里，在学前教育部门，在一级学校去研究这个问题，而必须使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获得这种劳动技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儿童的问题。这可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向儿童进行宣传鼓动的能力，把儿童组织起来的能力。在这里，必须懂得年龄特点，同时还要掌握一视同仁地对待儿童的方法。这个问题在大纲上要比别的突出一些反映出来。最后，我们要谈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对劳动的态度，对有计划地安排劳动的这种能力的态度。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能够有计划地安排工作的问题应该列入教学大纲，使之在大纲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还缺少这种能力，即有计划地安排本单位劳动的能力，有计划地安排整个集体、地区劳动的能力，有计划地安排教育工作以及国家规模的工作的能力。

现在大家都在谈五年计划，不管您到哪儿去，到处都可以听到“五年计划”这个词。甚至学龄前儿童也想学这个词。但什么是五年计划，它与什么有关系，这个五年计划的含义何在？这是每个人肩负的重任。必须弄明白的是：每个组织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每个儿童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这个计划是什么意思，我们对这个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统一的教育计划负什么责任，怎样负责任。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我们还毫不了解。

我曾在政教总局^⑦工作过，那里有负责各地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种机构，既有工会文化处，也有各种合作社，还有各种自愿组成的协会，以及谷物托拉斯，跨村镇拖拉机站，总之一句话，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机构中，每个单位都要花钱进行政治教育工作，都要放映电影，关心收音机的设置，进行扫盲工作，等等。但是，这些机构中有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真正弄懂了我们要对这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和统一的教育计划负什么责任呢？一个也没有。我们在工作中总不能协调一致。要知道，我们正在执行并且应该百分之百地执行的这一经济计划，不仅牵涉到经济，它也涉及到教育，可是这方面的计划技能我们一点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修订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大纲时（在使用过程中它肯定要不断修订），必须使这些大纲具有灵活性，否则它就无法与生活步调一致。在拟定大纲并进行适当修订时，仍然需要时刻注意这一点。大纲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加深。

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更加有步骤地、自觉地吸引政治教育工作者去做群众工作，搞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还有就是研究城市劳动和农村劳动的各个方面，大学生的综合技术训练，最后就是研究儿童，善于按计划办事。

我认为，应该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待教学大纲。我想举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作例子。就拿修订大纲来说吧，当我们最初提出综合

技术教育问题时，我们曾说（而且大家一度都同意），作一个教师（不论过去干什么——计划工作者也好，组织工作者也好），他必须在机床旁边劳动一段时间，在国营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的这一经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后来这一经验却无人理睬了，不照此办理了，于是就产生了消极效果。现在我们在谈大学生的实习，而且这种实习的范围比过去大得多，我认为，在进行别的实习的同时，一定要到企业和集体农庄去实习。这还不够。实习应该分几个方面：有宣传鼓动实习，有组织工作实习，有儿童工作实习，有口头的和实际的生产宣传工作实习。

现在我想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23年就已提出来了。现在常常把一些过去提出过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因为当时解决这些问题缺乏前提条件，而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却能够解决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等师范学校，以及一般地说还有其他各种高等学校，都应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重要的不只是在学校学习，重要的是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大学生们和整个学校都要参加劳动，参加国家所需要的那种劳动。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阔绰，能让我国的青年只是学习，只是掌握某些知识，我们还需要他们参加国家的建设。

那么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能做些什么工作呢？目前教育方面正在进行有计划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是形式主义地，不是官僚主义地对待有计划的教育工作这一问题，那我们就应该明白，要使这一计划得到贯彻执行，必须对工会、对合作社、对经济机关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真正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不光是经费的集中使用，而且是要联合经济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参加制定计划，各个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要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一工作，我认为这乃是一项最重大的任务。有一个受援地区，就是奥列霍沃祖耶沃。我们派安·格·克拉夫琴柯同志^⑧到那儿去（她不久前去过美国，研究美国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她在那儿推行图书馆工作

的统一计划。要知道，我国每一个单位都希望运用自己的权利，独立进行工作。她恰好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谈谈怎样做说服工会的工作，要开多少次会，如何制定这一计划，现在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开始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这时大家发现，实际上人力财力都有，因此可以把工作搞得很好，搞得超出大家的所设想的，甚至还要修建房子。他们曾经自我解嘲地说，他们创办了“第一号图书馆集体农庄”。现在，那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在地区提出，不仅应该开办“图书馆集体农庄”，而且要开办“教育国营农场”，以便整个的教育工作能按一个统一的计划安排。但是，最好不只是奥列霍沃祖耶沃一个地区要这么做，而且到处都能这样做才好。为此就需要对那些正在进行这一工作或者打算进行这一工作的单位做大量的工作，这是工作量很重的工作。

现在谈谈计划问题。这一计划应交给某一高等学校负责。

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对高等师范学校说来永远是主要的，这就是关于培养干部的问题。当然，重要的是要培养大学生。不过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现在应该不仅仅是只考虑培养大学生即未来的教师。我国中等师范学校的情况很糟。你只要到中等师范学校看看，就会发现它们一筹莫展，步履艰难。我总是问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你们与中等师范学校建立的联系怎么样？”我这些话已经对大学生说腻了。我不知道，也许莫斯科其他的高等师范院校与莫斯科所有的中等师范学校建立了联系，但是，我看，现在各地高等师范学校都未能做到对中等师范学校的工作负责；不仅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与中等师范学校建立联系，而且应该开展某种共同的活动；高等师范学校要负责对中等师范学校的工作安排。当然，没有计划，对某一工作没有分工负责，那是做不成的。

以培养师资为主的二级学校，十年制学校又怎么样呢？要知道，这些学校也是培养教师的呀。这里的工作如何？当我谈到必须对它们负责时，我并不是主张对一些琐事也进行干预。当然，如

果高等师范学校这样来理解自己的责任，认为它应该连小事也管并且干预大家的工作，那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不过，它应该从工作上加以帮助。要明确对机关部门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机关部门人数很少。它忙于对付日常工作，要求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这是力所不及的事。在这里，应该让那些关心这项工作的干部与国民教育局保持密切的联系。我认为，对高等师范学校说来，这项任务要好解决得多。这样一来，它就不会另搞一套，不会干涉琐事，却可以通过自己职工的力量和本校大学生的力量对中等师范学校进行帮助。

我国的文化战士是城市和农村最大的一支干部队伍。扫盲工作人员，图书推销员，现在由于要搞流动工作，因此又有了指导员，还有苏维埃各部门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要受到教育学的训练。我们甚至还未意识到我们干部队伍现在多么庞大，他们愿意并且认识到在国民教育部门工作的必要性。要把他们好好组织起来。谁来组织呢？国民教育处怎样去组织他们呢？这需要人力，所以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可以通过中等师范学校，通过二级学校，通过许多教育机关和工农速成中学对这些文化战士，对这支文化大军从教育上给予帮助。在任何一个教育系内开办短训班，可以部分地完成这项工作，不过我觉得，这项工作需要更有系统性、更有强制性、更有责任感。最后，它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力量，开办教师的轮训班。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应该团结一批有用的教育人才，这样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生产单位而对整个国民教育工作产生影响。那时也就不会讲应该怎么做，怎样拟定教学大纲。朝气蓬勃的生活将因此而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还有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问题还会一再产生，但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机构总是植根于生活深处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把高等师范学校变成马列主义教育学的教育实验室。

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①会议上的发言)

2月7日的发言

同志们，目前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比如工业的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发展以及我们耳闻目睹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进步，不可能不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有所反映。我国的制度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有霄壤之别。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适应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需要，在资产阶级国家，整个这一制度的阶级性质也特别露骨地表现在国民教育制度上。

革命前，我国的制度乃是末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翻版，这种制度甚至还带有前资本主义时期、封建时期的深刻烙印。现在，虽然十月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这种烙印仍未消失，以致我们至今未能实行普及教育，因为旧的国民教育制度还统治着我们，还妨碍着我们，并且捆住了我们的手脚。

党纲明确指出了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制定的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路线，而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对我党党纲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不打算再讲党纲这个问题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制度还远未得到贯彻执行。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现的各种问题，现在又极其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末和1918年曾经出现的那些

问题，现在又提出来了，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别的方法和别的条件来解决。

1918年，很多问题只是作为未来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许多既定的任务究竟怎样完成，当时并不清楚。然而，十二年之后，经过长年累月的斗争，依靠这些年来新成立的组织，现在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把它当作遥远的未来的问题，而是立即就可着手解决的问题。当我们着手解决不仅是国民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对所走过的道路有着一种特别的感受。

那些从前被看作是遥远的未来的东西，目前看来已成为眼前的事了，只不过被革命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而已。只要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国民教育制度，那我们就会发现，我党党纲提出了要使整个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项工作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做得很不好。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水平，甚至连资产阶级国家也未超过。我们至今未能实行普及教育，学前教育工作也很可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类型的学校还很少。可见我们在这方面是极其落后的。

不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方法来吸引居民参加文化建设。文化进军^②的方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央黑土地带省^③的例子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我们要讲一讲中央黑土地带省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在那儿接收下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摊子。这里原来是地主分子的一统天下，居民中文盲充斥，可是现在，中央黑土地带省开展了文化进军活动。这在一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当时那儿还不具备开展文化进军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大约两年前，那儿的一位农妇还在来信中说：“我们连‘集体农庄’这个词都说不上来。”我至今记得这封有趣的信结尾是这么写的：“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对地界连看都不能去看一眼。”这是

两年前的事，可是现在那儿已完全实行了集体化。

那里的居民中绝大多数是贫农，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出路，因而那儿的旧心理已被彻底摧毁。随着旧心理的被摧毁，我们看到那儿有了很大的进步。我经常读《奥勒尔真理报》（当然并非很有系统地去读）。该报每一期都报导说，那儿正在进行真正的文化革命。

另外还有几个例子。文盲扫除之后，那儿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他们把缝纫机集中起来，成立了修补车间，还派了裁缝队去。再如学前教育工作，一下子就成立了500个学前教育站。他们自力更生实行了普及教育。他们在全省开办了2500所学校，这就是说，他们让年满八岁的儿童全部入了学。凡是到过那儿的人，都一致认为，那儿成人的热情极高。值得一提的还不止于此。

就拿儿童之家来说吧。那儿现在特别重视儿童之家（而我国各地近来对这一工作都不闻不问），他们在儿童之家之间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我从最近一期的报纸中了解到，各个方面都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工作。

几年之前，我们开始设立了若干省的“档案卡片”（当时还没有地区的建制）。档案卡片记载着有关自然条件的材料，有关当地从1861年以来的历史材料，当地的历次群众运动的情况，以及当地工业、农业和整个建设工作的情况。最近突然在《奥勒尔真理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是奥勒尔州正在拍电影，影片既包括典型的自然条件的资料，还包括该地的历史状况：邓尼金匪徒是怎样窜入奥勒尔的，当地人民是怎样与之斗争的等等。影片还反映了目前的生活：沙基洛夫车站，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企业，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像扫盲这种低级形式的教育工作得到了推动，而且在各个方面，甚至在拍摄电影这一方面也有了进展。

现在，当我们听取下伏尔加地区的代表的发言，讲起他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时，那我们就明显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跨入了速度完全不同的另一时期。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已经能够办到了。我们的建设必须保持这样一种速度，要使我们的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我国学校和政治教育机关的质量。我党党纲明确指出，我国学校应该成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学校。此外，它还应该是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

如果谈到这个问题，那就要问：这十二年来，我国的学校是些什么类型的学校，它们的教学内容如何呢？比如说，社会公益工作这个主要问题是怎样处理的？这个问题过去曾经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一点也许就是我国学校与资产阶级学校根本区别之所在。我国学校所进行的公益工作，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工作。也许，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青年农民学校^④。如果你们去参加青年农民学校代表会议，就会听到学生们谈到他们的这项活动：他们如何参加扫盲活动，如何参与苏维埃的改选工作；同时，他们还会讲到，他们怎样参加精选种子的工作，怎样宣传正确的饲养家畜的方法。

一级学校(主要是农村的一级学校)也是如此。它们同样做了大量的社会公益工作；这种做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社会公益工作可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

不过，如果我们看一看城市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城市是远远落后了，一级学校也落后了，但最落后的是二级学校。在农村，青年农民学校几乎是人人都参加社会公益工作，而城市的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却完全不能这么说。

当然，农村的情况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发现，有的学校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创举，而另一些学校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偶尔搞一点社会公益活动。许多省最近作了一些调查，证实各校在社会公益活动上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

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认为学校必须进行社会公益工作呢？每个人都会说，这是能够做到的，它不需要大规模的建筑，也不需要设备，只要求明确的方针，做起来并无特殊的困难。不过，要注意的是，各校的社会公益活动必须要求一致，使之能教人学会读书写字，并且授予一定的普通教育熟巧。我国学校必须培养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熟巧。

常常有人说，要搞校内的社会公益工作，实际上在学校里从事这项活动的只是少数学生头头，大多数学生都持消极态度，再不然就是一位教师或者一位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去干，而不是整个单位都参加。

我主张，必须让整个学校（全体学生，全体教师和全体技术职员）都来参加社会公益工作。

如果整个学校都参加这一工作，那它就应该认真制定一个生产计划，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大问题。

我们常常以五年计划自豪。在苏维埃代表大会^⑤上，我听到，当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刚刚做完的时候，全场就激动地唱起了《国际歌》，显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但是，什么是五年计划？经济计划不光是国家计委搞计划，而是意味着全国、每个人都对本机关、本企业的工作做计划。学校工作也要有明确的计划。当然，制定这种计划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而要发动全体学生参加。这将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安排工作的熟巧，而这种熟巧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培养我国的青年一代时，应该使他们懂得，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要通过这一工作实际地培养他们制定计划的能力。计划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是我国经济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区别所在。这也是我国经济工作与资本主义经济工作的本质区别所在。

既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学校，那我们就要培养学生的计划能力。当然，学校的计划不能随意制定，在制定计划时，一定要做到：把社会公益工作这一项很必要的工作纳入计划。学校和

农村图书阅览室的工作计划应该从属于地区的计划。现在各个地区都制定了生产计划。学校不仅要制定政治运动方面的社会公益工作计划，也要制定日常社会公益工作计划。通过这项工作，让学生（特别是二级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学会理解并研究本地区的计划。制定计划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善于精确地估计一切条件，能够把计划付诸实行，而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学校的计划、每个机关的计划都要与地区的总的计划相联系。

当然，我国的一切教育机关都应互相帮助，他们之间应有一个分工，不要大家都去干同一件工作。一级学校的工作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条件上都与中等技术学校或二级学校有质的不同。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分工，而分工的依据也包括年龄状况在内。

我们讲到我国教育机关的工作要依附于社会任务和文化生活任务，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一系列新问题。

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少年自然科学家和少先队员中央局代表大会^⑥。大家都谈到要在农村开办儿童集体农庄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他们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大办儿童集体农庄”。但是，现在少年自然科学家们和少先队中央局已经明确认识到应该怎样安排儿童的劳动。他们打算，在一般的成人大型集体农庄里，组织孩子们在儿童集体里劳动。“儿童集体农庄”将完成各种任务，参加一定的经济工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在集体农庄里就会有一些儿童工作负担过重，妨碍他们成长，而另一些儿童却无所事事，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正经的地方。

我曾经对提出儿童劳动问题的集体农庄庄员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组织儿童劳动，哪怕让他们干点轻微的活儿，哪怕是让他们喂鸡，毕竟是干了点活儿，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自己是集体农庄的一员。

我们都听说过中央黑土地带省的某些集体农庄，其中有一个名叫“列宁的火星”的集体农庄，很有意思。这个集体农庄的教师参加农庄的组织工作，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儿童干活。现

在，不管是青年人还是成年人，大家都认为必须组织全体儿童参加劳动，根据集体农庄的原则组织这种劳动。怎样组织这种劳动呢？这个任务明摆在那里，每个教师都得考虑。

《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通过不同的形式涉及到这个问题。有的文章写得生动有趣，认为：如何组织集体农庄儿童劳动，特别是组织儿童参加能学会集体工作、学会劳动分工的那种劳动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现在，城市里的工业日益发展，日常生活服务的形式（比如各种食堂）也有了很大发展。现在，住宅合作社提出了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服务方面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日常生活服务的问题都是从下面涌现出来的，它展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就拿日常生活的机械化和社会化来说吧。学校应该与之保持联系，正如它应该与生活保持联系一样。我们开办了七年制工厂学校^⑦。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当然，同时存在重大的失误。

有这样一种学校，它们只是在校办工场里安排劳动，而完全不把这种劳动与工厂和企业的劳动联系起来。它们只是在理论性的教学中涉及某一生产方面的问题，却从不参加企业的劳动。这些企业往往也特别脱离儿童，脱离学校。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不过，现在对学校的看法在很多方面已有改变，特别重要的是工人中这种观点的改变。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进步。我今天曾和劳动人民委员部^⑧的一位同志谈过话，使人感到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现在劳动人民委员部花在失业救济上的资金少了，因为失业人数大大减少了。随着这种新局面的出现，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同志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劳动人民委员部一定要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搞好青年一代的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要把我们的青年一代培养成个个都能劳动的人，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工农群众是很了解这一任务的。而在这方面我们

却做得很少，如果单靠劳动人民委员部来抓这项工作，它本身的力量也是很有限的。

今天，我翻了一下《统计评论》^⑨第九期，其中有篇文章指出，从1918年以来修建的校舍中，校办工厂仅占校舍总面积的1.9%，而校舍中衣帽间甚至都占有大约5%的面积。

可见，尽管党纲中说的是办综合技术学校，而在修建校舍时，却把校办工厂塞到角落里去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角落，才发现都在地下室，等等。

如果单枪匹马抓这项工作，那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必须使劳动人民委员部、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都能懂得青年一代劳动教育的意义。现在，劳动力的问题极其尖锐；由于参加生产的新工人缺乏最起码的劳动技能，因而劳动战线经常出现完不成任务的现象。在这种时候，经济工作人员对劳动教育所具有的意义比以前领会得更深刻了。

如果一个工人打开水阀就走了，因而机器被水浸泡，全厂只好停工，整个企业停产修理，那就是缺乏劳动素养的结果。

资产阶级各国都认识到必须在学校培养劳动技能和素养，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它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尖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年还是几年后)才能解决，不过我国的经济工作人员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国家的工业化急需劳动力，这已是燃眉之急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对“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解还应更深一层。我们不仅要教儿童学会主要的、基本的劳动形式，而且还要使他们把将要获得的技术知识和农业知识在各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加以运用。

如果把综合技术教育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来讲授，那是死气沉沉的综合技术教育。生气勃勃的综合技术教育是与企业、与社会公益工作相联系的综合技术教育，而现代生活所要求的，就是要进行这种生气勃勃的综合技术教育。

现在大家都明白，在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因而整个问题已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了。儿童组织建立之后，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组织的因素纳入到儿童整个的劳动中去了。我们大家都看过少先队集会^①并且发现人数如此众多的少先队员都养成了组织性，有了组织能力和熟巧。这对我们的综合技术教育和儿童的教育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影响。这是因为儿童习惯于独自学习和工作，这是一回事；而儿童习惯于与其他的儿童一起来组织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活动并在这种组织工作中获得一定的熟巧，这又是一回事。

我觉得，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有可能使我们去实现党纲中国民教育部分所提出的任务，即：使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使劳动居民人人都能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加强我国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培养儿童的组织熟巧，意识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养成一定的集体主义熟巧和文化熟巧，——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有可能去真正实现改造时期的任务。我们面临着广阔的前景，无论在计划工作方面，抑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是如此。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一向非常重视的问题，即使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劳动教育，因为他们正在建设劳动共和国，并将生活在劳动共和国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新的角度提出来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某些带争论性的问题将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澄清。我们曾与共青团争论得很激烈。共青团主张中等技术学校应办成七年制。社会教育总局说，要办二级学校；共青团说，要给生活出路。

二级学校能否给生活出路？围绕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应该说，只有那种与经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学校，才能够培养具有把理论与实际生活知识结合起来的能力的人，因为这种学校能使学生受到实际锻炼，从而使他们获得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所以说，是应该授予普通教育知识还是综合技术教育知识的

问题，或者说，是否可以像中等技术学校那样，把普通教育知识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及如何进行劳动实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已失去其尖锐性。既然我们即将实行七年制普及教育，那就可能开办一些别的类型的七年制学校，这种学校将兼有中等技术学校和二级学校^⑩两者的优点。在这种学校里，理论将密切联系实际，所培养的一代人，由于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将通晓实际生活，而不是光从书本上通晓。他们将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至于说到成人教育机关，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打算详细谈了。今天我着重谈的是学校。当然啰，我们也可以举出波罗金斯克的一个农村图书阅览室作例子。这个阅览室曾与一些积极分子计划把教堂改建成磨房。在那些常来阅览室借书看报的积极分子的热情帮助下，由于积极分子们亲自动手修建，同时阅览室经常公布工程进度，于是磨坊就建成了，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磨坊立即把宗教信仰磨得粉碎，这时，居民们就会把另一座教堂改建成社会主义文化馆。——如果我们举出这个例子，那我们就会看到，这项有计划的工作推动了农村整个文化的发展。

要是这个农村图书阅览室只是借书(这种倾向是有的，例如列宁格勒省就是如此，那里希望农村图书阅览室少干预生活，然而它却干预了生活，并且不能不干预生活)，那我们就会取得上面说的那种的效果。凡是阅览室管理员多少受过一些训练的地方，凡是阅览室管理员善于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建设任务联系起来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取得极好的效果，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教育机关看作是一个穷亲戚，而看作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单位。邻近的工厂，本来不想拨给农村图书阅览室一点水泥，现在却乐于提供，因为你把教堂改建成了全体居民朝思暮想的磨坊嘛！

我们就应该这样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应该这样来安排教育工作，做到上面帮助下面，大家按一个计划办事，这样就能使我

国的学校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学校，真正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3月4日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开了整整一个月。因此我担心很多人恐怕已经记不清我们讨论过一些什么问题了。此外，今天出席会议的同志，有一些可能以前没有参加过这次会议。所以我想简略地概括一下我们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及其宗旨。

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应该怎样反映到我国国民教育制度中去。我在报告里曾经讲到，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把学校办成真正的综合技术学校，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广义的综合技术学校（在这种学校里，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一个方面。我讲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把学校办成社会主义的学校，也就是说，不是一般的劳动学校，而是可以从事社会劳动和集体劳动的学校。这就是使我国学校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现在我们最多不过是一些劳动学校，而我们特别需要的，是要创办社会主义精神的学校。

最后，我想讲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曾讲过。这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每一个教育机关办成能够完成一定文化任务和经济任务的机关了。我国现在的国民教育制度应该而且也能够比以前更好地依靠整个经济制度，与这一经济制度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因为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建立，应该能使各个机关互相联系，结成一个整体。这使我们得以用略为不同的方式、更加深刻地提出我们过去提出过的基本思想：建立统一学校。现在各级学校都可以变为真正的统一学校。这就是我的报告的内容，围绕这一报告，大家展开了讨论。

上个月，在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种会议上，同志们互相

交谈时，都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因此我想对过去的讲话稍作一些补充。

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感到我们面临的条件很好，因而常常开始幻想，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按新办法去做，做得更加深入一些，范围更加广泛一些。举例说，有人主张消灭学校，说什么学校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现在实际上可以从教育制度上规定不需要设立学校。而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这样一种理论，主张从童年起就规定儿童必须参加劳动。比如，我就听说过，有人主张儿童从七岁起就必须劳动。这样就完全忽略了儿童学方面所强调的各种问题^⑩。把七岁的孩子与成年人同等看待，这就完全忽略了儿童的年龄特点。这样一来，这方面就出现了很多过火的行动。

同时还有这样一种主张，就是儿童的劳动应按集体农庄的任务和命令去进行。这就应该考虑一下了：儿童劳动按集体农庄命令进行，它意味着什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管理处并非一个能从教育学的角度处理这种问题的单位。集体农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对儿童的看法就像小农经济时对儿童的看法一样。一会儿该在那儿看守小牲畜了，一会儿又该在这儿薅草了。该看守瓜地了，儿童就去看守瓜地。总之，都是一些极单调乏味的劳动，儿童参加这种劳动得不到一点提高。按集体农庄命令下达给儿童的也正是这种劳动，而且儿童还必须完成。这当然与综合技术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此外，我们还特别迷恋实践。甚至共青团员也常常主张搞什么“分类”劳动，说这样可以给青年打下一个烙印，让他们知道如何组织集体农庄的经济。于是，有的人去挤奶，有的人去喂牛，还有的人负责养鸡，另外还有人干这干那，一句话，实行劳动分工。人们发现，这样分工效果很好，因此深感满意。有人就开始讲话了，说是儿童也要学习“分类”劳动。分类劳动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分工很细，各干一行；女孩子从七岁起就只学如何挤

奶。这不是综合技术教育，而是狭隘的职业教育，这种狭隘的职业教育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上面说的这种过头做法，虽然是很自然的，却极其有害。

问题刚刚开始讨论时，往往有很多地方提得不妥当，这是常有的事。我希望今天要发言的同志，能够多谈一谈您们所看到的儿童在集体农庄劳动的情况，并且谈一谈您们认为如何在集体农庄安排劳动。不过不只是儿童在集体农庄劳动的问题，现在还有在企业劳动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厂办高等技术学校，工人在这种学校里要接受各阶段的教育。我们打算让青年在这种高等技术学校里接受一定的综合技术训练。

最后，第三点，今年冬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如整个经济的社会形式问题，集体饮食问题，幼儿社会教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谈得很多。而在讨论比如说公社住宅问题、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住宅问题时，有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在那里应使用儿童的劳动。但是，如果我们不谈在有2000人居住的公社住宅里应该怎样有效地利用这种劳动，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要利用儿童劳动，那将出现什么结果呢？结果就会是：孩子们听人差遣，他们将一层楼一层楼地去送开水，投信件，当传达；于是我们就说：我们在搞有组织的劳动了。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儿童的家务劳动（即使是在国营部分）。我们应该考虑，在这种比家务繁重得多的劳动中，孩子们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他们是否可以起任何作用，怎样起这种作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应放过可以对儿童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新机会，不应放过可以对我国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新机会。我认为，一个月来，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同志们能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意见，那就太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经济战线取得的成就，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使青少年一代人人人都能受到劳动训练、受到综合技术教育训练的问题。

当然，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可能开办足够的提高型的学校来接纳全体青年入学。学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辅导站，是一个机关，在它周围还有许多辅助机关。但是，有了这样一些有组织的单位（如学校），我们就应该对我国的青年（甚至未入学的青年）施加我们的影响。要让这些青年受到综合技术教育。其他一些国家（如奥地利）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是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当然，他们不是主张对工人的子弟进行劳动教育，不过毕竟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我们知道，德国很重视青年人的劳动教育。在德国，劳动教育是义务的。我认为，现在我国也提出了对青年一代进行义务的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不光是对工人的子弟，而是对全体儿童，对整个青年一代人人都进行这种教育。如果我们在最近的将来能做到这一点，即我国的一级学校能接纳全体儿童入学，那我们立即就要执行普及七年制教育的方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这样努力，这已不是遥远的远景，我们一定能够在最近的将来使一级学校的教育成为义务教育）。

现在年满14岁的儿童就可以进企业工作，他们可以领工资。工资分等级，按一定办法调整。不要使集体农庄青年的劳动流于自发，而要预作安排；也不要把这种劳动搞成什么分类劳动；不要只授予青年狭隘的职业熟巧，而要授予他们在各个不同部门劳动的熟巧，使他们掌握综合技术技能。这是一项任务。我认为，不能只是寄希望于开办足够数量的学校来帮助青年学习，因为这在最近几年是很难做到的；而是要建立完整的国民教育制度，开办各种训练班、讲座，向他们推荐必读书目和函授教科书。

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建立在这种意义上的为青年进行文化服务的制度，认真考虑如何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角度来安排城乡少年的劳动，认真考虑用必要的知识武装青年，那么，我们就能完成生活所迫切提出的任务，即在学校经常的帮助下，在学校的辅导下对校外青年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

这就是我想在讨论开始之前讲的几点意见。

闭 幕 词

我想先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上一位发言人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城市的讨论^④究竟有多大效果。

当然，如果对社会主义城市只是纸上谈兵，而不了解我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那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事。但是问题在于，有关社会主义城市的讨论对我们的日常工作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这种讨论可以使我们自己作一番检验，看我们究竟能怎样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观察周围的事物。

所以说，尽管这种争论对我们说来极为突然，但却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每一个参加讨论的人都能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主义城市是什么样，认清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哪里——只是表现在楼房上，还是表现在什么别的地方。

当然，在国家计委这样的机关讨论这一问题时，多半都是讨论建筑本身的问题。对于教师来说，这个问题当然提得更广泛一些：这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教育工作怎么安排？这种城市如何满足居民的要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都是些什么要求？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空谈：成天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大家都以为，我们早已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通过这次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城市才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认真加以思考。就拿社会主义城市这个问题作例子来说。在这种城市里如何安排生活？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在该市的中心，耸立着苏维埃大厦，这是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经常开会的地方。它旁边是一个大剧院，那是群众开会的地方。这个位于市中心的苏维埃大厦乃是吸引全市群众的中心。勃良斯克并非一个社会主义城市，而且与社会主义城市极少相似之处，因为除了这个苏维埃大厦之

外，其余的建筑物都是一些典型的旧式省城的房屋。但是苏维埃大厦和整个的景观却使您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后修建新城市时，似乎一定得有这么一个中心，使它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

后来，每当我听到有关讨论社会主义城市这一问题的情况时，我总要想到整个城市生活要有一个中心这件事。当然，这些城市不一定修建得跟勃良斯克市完全一样，也可以是另一种样子，简单得多，比如说，有宽阔的街道，等等。

很明显，当时勃良斯克市修建这幢苏维埃大厦时，未必会有人想到社会主义，而只是考虑到怎样更方便些。这一新建筑的幼芽说明，必须使一切结合成一个整体。

社会主义城市乃是集体的城市，城市的全体居民之间要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不是独居一隅的普通市民，他们有的人住在这栋好房子里，另一些人住在别的好房子里。他们有如汇聚在一起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时刻关心着共同的利益，考虑着共同的利益。

有时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城市时，谈论建筑面积时，总是考虑不要违背标准，每间房子得花多少钱，——所有这些都是死东西，听不到生活脉搏的跳动。按这种计划修建的城市，往往都是一个面孔：有多少多少人口，大家都在工厂干活。关于儿童的问题有过很多争论：儿童们在何处定居？是在市郊还是在市内？后来作出让步，孩子们都住在城里，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儿童们具体说来住在何处并且他们将怎么生活，却回避了。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城市怎样保持与农村、与别的地区的联系？我们总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乡之间的差别正日益缩小，城乡将逐渐接近，而我们在修建城市时，周围却好像是一片真空地带，无人居住，有如荒漠。

城乡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比目前还要大大加强，然而我们恰好忽略了，而且也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从建筑物、从建筑布局的合理化、从城市外观开始的讨论，却使我们明白了我们应该怎样搞好建设。经过一番讨论之

后，再回头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更多过去没有发现的东西。一个工人参加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会议回来后，就觉得他现在住的集体宿舍或房子简直让人呆不下去，使得他立即动手重新修造。

如果我们只是开会议论一下社会主义城市，那就是在做十足的表面文章。我们应该与此同时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日常生活运动。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现在常常谈到，而且不仅是谈，还直接取得了某些具体的效果。这种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与改进日常生活的联系的讨论具有重大的意义。

每当我们谈起日常生活的时候，我总是想起约翰·里德写的一篇小说《革命之女》，也许您们很多人都读过。这篇小说谈到巴黎公社一个社员的孙女后来当了妓女。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小市民的庸俗日常生活。在这种家庭生活中，父亲是一家之主，妇女只应干家务活，对妇女的态度极其陈腐，还有另外一些影响，即作为巴黎公社社员的父亲在家庭中起着压抑的作用。尽管父亲是巴黎公社社员，参加过革命运动，尽管如此，这个公社社员的孙女，革命之女，却始终对革命感到格格不入，因为日常生活是旧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约翰·里德提出来的这个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现在还很有现实意义。

目前群众会议上提出来的各种日常生活问题，当然都与我們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有着直接联系。

近年来我们常常说“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说的只是经济建设，然而社会主义建设却不只是经济建设，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全部改造，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很多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革命初期早已提过的。克鲁平尼娜同志^⑥告诉我，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内部在1918年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一般说来学校是否还有必要，尤其是在列宁在一篇演说中谈到了学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后。列宁曾说，只有学校才能使青年一代免受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的

灾害，避免我们亲眼见到的这种人力的浪费^⑩。

列宁对学校的这一论断遭到了某些同志的反对，之后在《国民教育》杂志上就刊出了我们的一位同事、沙皮罗同志^⑪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需要学校。这种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学校是不可缺少的。学校是一个组织中心，它可以帮助青年一代和全体儿童按新的方式组织起来，按新的方式掌握知识，它是全体青年的一个中心，这样的学校当然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组织。

列宁一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于组织，因此，有人认为工会过一段时期就会消亡，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消亡，而是在很近的时间内就会消亡，这当然是错误的。无论是纺织工会，还是五金工会，以及其他一些工会都是需要的，它们各有其特点。要根据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方面把居民组织起来。

如果我们把现在的居民与1917年的居民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组织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我至今还记得，最初很少召开妇女大会；只有一些女工参加过妇女代表会议。上面掌管一切，基层只是出席开会，并不积极参预其事。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会发现已完全不是从前那样了。我们不能说1917年列宁格勒市的积极分子很少，恰恰相反，那儿的群众在革命和政治活动中是非常积极的。但如果谈到日常生活问题，那我至今记得，我们维堡区曾经开过一次会，讨论开办俱乐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全体进步工人都成了两位厨师的俘虏，这两位厨师是掌权人物，他们大谈特谈俱乐部应该准备食品，并且应该烹调得尽量可口一些。由于谁也不知道办俱乐部从何着手，不知道工人俱乐部应该办成什么样，结果很有觉悟的工人也只能洗耳恭听厨师的烹调经。那次会议令人感到，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要按新的办法组织起来。

再拿农村来说，1917年农村的组织情况是很糟的，而现在呢，一大批组织者已在农村成长起来了。作为一个组织者，农村的组

织者更明显地表现出他懂得群众工作的方法，懂得怎样把群众组织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问题按新的方式提出之后，我们也就有了新的可能性来依靠群众自己的双手去建立整个国民教育制度，而这在1918—1919年期间是根本办不到的。

特别是现在，工业建设和农业集体化正在进行，这就创造了一些新条件，而这种新的经济形势，经济本身的新组织，以及群众中的组织才能，——所有这些汇合在一起，就为我们能更加深入地按新的办法组织整个国民教育制度，提供了无比广泛的可能性。

在座谈中，同志们还简略地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主要是要学校改变一下方向，使之更加综合技术教育化。大家讲到，现在已经具备了新的前提条件，可以使全体少年（甚至未入学的少年）人人受到教育。还对新的教学法发表了很多意见。

就拿儿童之家来说吧。如果我们看看1920年以前那段时期，那时对儿童之家的看法与现在完全不同。现在我们都习惯于这样看，我国的儿童之家是为流浪儿设置的机构，所以我国的儿童之家已成了一种收容流浪儿的机关，接纳不幸者的单位。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1918、1919、1920这三年的情况，那时谈起儿童之家，是把它看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新形式的。

我们与儿童之家一起度过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我国刚建立儿童之家时，曾经发展过一段时期，到1921—1922年时，儿童之家收容的儿童达到54万人，而从1921—1922年以后，儿童之家收容的儿童人数急剧下降。现在只有136000人了，儿童之家收容的人数大为减少。大家现在已一致把儿童之家不仅看作收容流浪儿的机构，而且也看作有助于对儿童进行一般教育的地方。

我们看看目前集体农庄的情况。公社在修建房子的时候，首先是修牲畜棚，其次就是儿童之家。诚然，往往把儿童之家修建在牲畜棚旁边，以致医生来了也只好把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的神情。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给予真正的帮助，也没有相应的

指示。我们延误了，没有看到当前存在的需要，可是我们必须了解，这种需要是很迫切的，因为已经开始自发地修建新式的儿童之家了，这些儿童之家就在集体农民眼前，他们的孩子就在其中受教育。

现在迫切需要讨论一下儿童之家问题，让儿童之家对全体儿童开放。儿童之家的这一事例说明，人们对所有问题的态度都改变了。儿童之家应该成为国民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环节。

当然，对职业教育所有问题的态度也改变了，出现了种种新的形式，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个制度也有了变化，等等。

我们讨论国民教育新制度这一问题的三次会议，进行得有些分散拖拉。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刚刚成立，会员还不太稳定——我们还未形成核心，没有基本干部。不过我认为，我们三次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国民教育制度问题，而没有讨论某个抽象的、纯理论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您们知道，今年4月25日将要召开党的教育会议^⑧，会上将讨论国民教育制度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记录，当然会提供一份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国民教育制度问题。

我们这个会议与党的会议有一定的联系，委员会还未确定这次会议的下一个主题。也许应该通过别的问题来提出列在党的会议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会议，往往某个同志的一句话、一点意见就可以使整个问题得到一定的阐明。

所以我觉得，今后还应召开这样的会议，不过要比这次会议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但我认为，我们这次对国民教育制度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不是没有益处的。

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

(在全苏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①上的演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到综合技术教育时，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培养共产主义者。我认为，这一任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毫不次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不能离开了这一基本任务来谈综合技术教育问题。我不打算详尽地讲述这个问题，但我想指出的是，必须特别注意我国学校和训练班的教学大纲。

我们往往在谈到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学校、改进我国学校时，只是简简单单、草草率率地把教学大纲修订一下了事，而不认真讨论应该怎样修订并且从哪个方面进行修订。可是我们面临的任務却是，要使学校(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并把我们所授予的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然而，恰好是在世界观的培养上，我们做得很差。只要浏览一下某些教学大纲，就会发现我们没有做到这种联系，没有进行这种培养，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可缺少的。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慎之又慎，一方面不要使我们的教学落入旧的教学的窠臼；另一方面也不能使我们的教学变成空洞无物的宣传。可是，如果我们看看目前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反宗教宣传问题，另一个是国际主义宣传问题)，我就想说，我经常的印象是，我们在对待这两个问题上，采取的都是一些极其表面的做法，没有把这两个问题与世界观联系起来。对这两个问题，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注意的。

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群众教育问题。当然，必须在最短时期实行普及教育，扫除成人中间的文盲并用最必要的知识武装他们。要想开辟自学之路，就得这样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制度变得更灵活机动一些，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

我国的学校现在是四年制，而且我们坚持这样做。可是，在实际开办这种四年制学校时，还得采取一些辅助办法。比如说，现在有许多农村，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小娃娃们有困难，那就要在这些人口不多的小村子里开办低年级班次，还要对学习差的孩子补课，就像瑞士学校那样。这么一来，就不会有留级生了。所以，应当考虑怎样使我国学校更灵活机动一些。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考虑得非常不够，这就是不久前上过学或者干脆没有上过学、识字不多的少年的问题。要让他们赶上来。我们对成人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对少年的工作，社会教育局^②和政治教育总局却不大管。这些孩子都是些超龄生，因此一般的学校不收他们，而扫盲班又因为他们是儿童而不要他们。他们从年龄上看不属于政治教育制度的对象。这就需要办一些特殊的学校。没有这种灵活性，我们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已发动全体居民投入了这项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进军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基本的方面。为了使工作搞得更快些，必须这样做。不过，现在做得还不够，也不普遍。许多省至今仍在原地踏步不前，只好搬用鲍曼区、下伏尔加边区^③和中央黑土地带省的经验。我们要让各地都能搞得很好，对此必须特别重视才行。

当然，开办七年制学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为建立七年制学校而努力已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

二级学校的问题是个难题，我们现在已对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我开始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谈，我国的工业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我国的工业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我不打算讲学校，只讲“劳动力”。我国正处在改造时期，旧的工厂正在改造，新的工厂不断建立。新工厂与旧工厂有何不同之处？旧

工厂的工作有一部分是靠手工劳动完成的，那里的机器需要有人专门看管，这种看管带有半手工性质。旧工厂的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来自手工业。至今还有很多工厂的设备是陈旧的，再过几年之后，所有这些工厂都将走上新的轨道。这些工厂需要既有较好的半手工艺熟巧，同时又很熟悉机器的专业技术人员。新工厂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分两类，一类实际上不能称之为专业技术人员，这类工人通常叫作“操作工”，他们同传送带打交道，等等。这只需具备一般的劳动技能，专门学习一两个星期到半年就行了。

但是，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技能的工人，他们不属于半手工艺类型，而是掌握了管理整个机器的技能、懂得生产全过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人。技术不是停滞不前的，它是不断发展的，每次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因而就需要一些受过充分训练、了解生产过程、善于管理机器、能够适应各种条件的工人。目前的新生产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专业技术人员。

中等技术人员的问题目前也极其尖锐。我们需要技术员，需要专家，这些人能够指导各种行当的专业技术人员。然而这种中等技术人员我们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我们现有的中等技术员，都是过去在旧工厂工作的，而能够适应新工厂的需要、能够按新的方式工作的中等技术人员，目前还极少。我们曾经由国家学术委员会^④ 科教部出面召开过一些专门会议，邀请了一些精通生产的工程师参加。他们说，培养技术人员是我们生产中的一个燃眉之急。这里的症结何在？在于我们不能从国外招聘，因为要招聘的量太大了。个别人可以招聘，而这种中等技术人员，具有专业技术的技术员的需要量的确太大了。另一方面，技术员必须了解群众，了解下边的工作人员。否则，工程师制定的计划就无人能够执行。但这一环节我们却有故障，而这一点却是目前最重要的。

现在再来看看我国学校。先谈职业学校吧。这种学校自古以

来都是培养半手工艺型的工人。这种学校的工作很不好搞，因为生产稍有一点改进就使职业学校培养的工人失业。工厂的设备一改装，需要的就是另一些掌握了比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工人。尽管如此，在一定时期内，这种职业学校还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应该使这种职业学校在培养学生掌握手工艺和半手工艺型熟巧的同时，也掌握一些别的熟巧；使这种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能很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至于说到那种半专业技术的工人，他们都是加斯帖夫同志^⑤所培养的。加斯帖夫的错误不在于他从事了这样的工作。我们不能说这种工作是不必要的。加斯帖夫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看作（而且仅仅看作）是一种出路，他完全没有看到必须培养另一种具有高度专业技术水平的工人。此外，他还没有看到必须把这种教育同一般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以及社会工作联系起来。

最后，谈一谈我们在理论上称之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那种学校，即工厂艺徒学校^⑥。实际上，工厂艺徒学校往往不能做到符合要求。这当然是以生产性质为转移的。不过，工厂艺徒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现代的专业技术工人。从为生产提供劳动力的观点看，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但是，如果不从培养劳动力的观点看问题，而从提高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的文化的观点看问题，那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工人不仅是一个执行者，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者，是每个工厂的主人。他还应该是他所在工厂的社会活动家，懂得技术发展的方向，明白工厂整个的生产过程；他还能参加旨在改进该厂的生产的创造性的工作，他已养成了自觉的纪律。加斯帖夫恰好忽略了培养这种工人，职业学校往往也忽略了这一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

现在谈谈生产实习问题。我们有时对此非常笼统含混：组织了生产实习，于是就洋洋得意了。但是一般说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组织实习，而在于组织了什么样的实习。我曾经了解过一些学员，问他们经常参加的是什么样的实习。工厂接纳了他们，付

给他们一定的报酬，等等。然而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一天三次去看车间的温度有多高！这难道也是实习？可是却认为他们是在实习。怎样组织实习，如何使实习具有连贯性，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应由实践来解决，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解决。我觉得，组织实习的问题还未提到应有的高度。

现在来谈谈二级学校这个迫切的难题。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只是为工厂培养人才，也要为农业培养人才。要搞农业集体化不能没有一定的准备。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知道应该怎样办。在这里，农村童工劳动的问题极其尖锐。应该指出，在劳动保护上，我们集体农庄恰好搞得最糟，同时，农村一般说来也是如此。不久前，《友好儿童》杂志^⑦刊登了一个小征询：儿童们在集体农庄如何劳动。于是一位小朋友写道：“你问我们怎么劳动。那我就谈谈自己的情况：我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没有马，靠人力耙地，等于白耙。父亲有病，他已经六十岁了。我们的村苏维埃根本看不到：小孩子干活，庄稼汉睡觉。”“小孩子干活，庄稼汉睡觉”这句精彩极了的话说明，学校和少先队组织固然是把少年发动起来了，但是从大人方面看，从各个文化机构看，却未注意劳动保护、劳动组织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可惜我不能详尽地讲这个问题。不过应该指出，综合技术教育给农业工作提出的，就是实际地了解农业的机械化并且实际地研究农业经济。所以，我们在谈到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时，要把这个问题完整地提出来，并且应该认识到：综合技术教育不仅是指培养在工厂企业劳动的人，而且也包括培养参加农业工作，参加社会工作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以及各个工作部门的人。必须培养教师、艺术家、作家、各种工作人员，各种各样的工作部门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技术力量。

我认为，我们这次党的会议将会取得一定进展。应该指出，如果说教师能把综合技术教育背得滚瓜烂熟，但在教育界这个问题还未得到充分认真的讨论。社会教育司已决定在五月十五日召

开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⑧。大会负责人请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⑨派代表参加，因为这次代表大会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经济工作人员的代表与会才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我们谁也没时间管这事儿。”我要说，有些经济工作人员根本不懂什么是综合技术劳动以及它对生产有何意义，对经常出现的劳动力危机有何意义，对消除生产中不断出现的缺点有何意义。这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中等技术学校的问题。当然，我国现有的中等技术学校作用不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多大贡献。所以我认为不应把它看作理想的东西。我们要致力于建立综合技术教育机构，让它提供目前需要的中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无论是我国的二级学校还是我国的中等技术学校，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具有中等专业水平的现代工人。

我们对综合技术教育的这一切问题，以及一般地对技术训练的问题，往往采取极其简单的态度。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工人教育和工农速成中学代表会议。这次会上明显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普通教育摆到了次要的位置，而且只有在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时才承认它。我们不能许下这种诺言：念完一级学校，你就可以得到学徒的称号。当然，文化程度的确是当学徒的必要条件，是必要条件，但非唯一的条件；除了一般知识之外，还需要有专业知识，生产知识。没有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就不可能获得目前技术条件下所必须的那种专业技术，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真正的专业技术。这一点必须认清。

我认为，这次党的会议之后，必须深入研究一下综合技术教育的有关问题。要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搞明确。这次党的会议必将在这方面起着推动作用。

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

(在保卫儿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我的报告的题目是：《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目前，广大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17年，革命胜利初期，我们一开始时曾力图通过个别实验示范学校、实验示范儿童之家来生动具体地说明应该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教育，不是用旧时孤儿院的方法，而是用新的教育方法。当时开办了一些儿童之家，而且数量很大，但是只有少数儿童之家真正称得上示范儿童之家，儿童们在这里多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从全局看，那么应该承认，我们这项工作搞得是不好的。

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对广大儿童进行教育的问题近来特别尖锐地提了出来。目前，经济方面的变化(小农个体经济向机械化集体经济过渡)引起了其他种种变化，更不用说工业化的广泛发展了——工业化为教育提供了许多崭新的机会。我认为，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的关键在于组织他们参加劳动。我们都很了解组织劳动对成人的教育意义。

拿农村来说。在农村，农民个体经济使人们养成了一定的世界观、一定的性格以及人们处理一切问题的一定的态度。我们常常说：“小私有者心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懂得各种现象的普通原理，不明白一些基本的问题，只看到自己鼻尖底下的一点事情，衡量一切事物用的都是小农经济的标准。

我们知道，农村里常有这样的事：这家当家的与另一家结下

了仇；妇女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翻了天；他们的思想非常狭隘，超不过自家庭院那大的天地；小农的信条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就是小农经济养成的世界观。他们不了解新的劳动形式和新的组织形式。每个人只顾自己，这样一来，上帝当然就开始起作用了。年成不好“怪老天爷有错，我们只能各顾各”。

一个农民偶然来到工厂。他见到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劳动组织井然有序，劳动分工十分明确。他发现，所有这些都是按一定的计划精确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一个人的工作与另一个人的工作扣得很紧。每个人都开始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一个小齿轮。于是，这个到工厂来的农民，如俗话说过的，经过工厂大锅炉的一段时期的熏烤，看问题的眼光开始变了，看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是个人的蝇头小利，而是集体的利益了。工人阶级为什么是领导阶级？因为大生产本身的条件和工厂的劳动把他培养成了集体主义者。所以在宗教问题上，进厂多年的基本工人，一般说来很少有人信教，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看到对原料、生铁进行机械加工的成果，看到机器生产的成果。他们比较容易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

我刚参加工作时，曾在一所星期日夜校^①当了五年左右的教员。我亲眼看到，有的农民刚进校时，甚至都怕听学校讲的东西。他随身带来一本旧约，总想找时间去读读，可是在工厂干了一年下来，你再看，到了春天就不知道他把旧约扔到何处去了，斋戒也不搞了，在复活节前的大斋戒，他却大吃大嚼起腊肠来了，对上帝鬼神的态度也变了。这种情况在机械、冶金生产部门更为明显，因为机器的威力在这儿看得更清楚。当人们亲眼看到怎么把一块铁做成了小巧的工具、精密的机器时，他就会认识到技术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工厂经受过锻炼的工人阶级能够比较深刻地认清各种社会关系，并且成为领导阶级，不断巩固加强这种

地位。

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情况。全国的工业化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威力。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全力以赴搞集体化，其结果如何呢？它使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的小农经济的旧的劳动形式瓦解了，新的大集体经济开始按新的方式改造着农民整个的世界观。现在已经具备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来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种条件今后将越来越好。但是，为了弄清楚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进行这种教育的各个环节。

从前，在手工业生产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时，家庭起着巨大的作用。农民家庭里的每个小孩，从小就看到父母和全家人的劳动情况。他学大人的样子，不过他不懂得如何解释这种或那种自然现象。他从小就掌握了熟巧，也就是说，八岁的儿童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劳动熟巧。我们且拿手工业生产作例子。儿子看父亲怎么干活，这样他就学会了。从前的家庭是进行劳动教育的。现在呢？现在工人的劳动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尤其是高级形式的集体农庄运动（如公社）的劳动，都是在室外进行的；我们发现，家庭不再是一个经济单位。工人在工厂干活，孩子们就看不到干活的情况。在家里，他经常受到老奶奶的影响，她常常对他说些假话来哄他；或者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母亲也不在工厂干活。要是母亲也干活，那他就完全受到街头巷尾的影响。

由此可见，成年工人在工厂所受到的那种教育影响，儿童是受不到的。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也开始发生于农民家庭。当农民参加到机器生产的大型集体农庄或大型国营谷物农场去之后，家庭也不再起从前它所起过的那种劳动教育的作用了。如果我们看看职员的家庭，也就是城市里非工人家庭，那么这种家庭即使进行劳动教育的话，也无非是搞些家务劳动：擦洗地板，帮忙做饭烧菜，到市场或小铺买东西，等等。可见，这种劳动教育往往局限于自我服务。而现在我们是到工厂的食堂吃饭，因此这种劳动

教育也开始解体了。

现在，不仅是我国，就连资本主义各国（例如德国）都说，由于工业化和妇女参加劳动的结果，家庭的影响大为削弱，因为家庭已不再是从前那样的劳动单位了。这并不是说家庭正在消亡，但它已不是从前那种类型的劳动单位了，所以它的教育影响就削弱了。

目前利用儿童劳动的情况如何？只要我们了解一下农村儿童劳动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与富农展开的斗争，我们对目前个体经济中采用雇佣劳动的限制，使得仍在自己经营的中农不敢采用雇佣劳动，他又没有机器，只好一切都靠自己利用原始的工具去干。结果我们发现，儿童就担负了力所不及的劳动。你如果问问孩子们的劳动情况，就会发现：他们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六点。这种劳动完全是孩子们不能胜任的。结果有的孩子往往离家出走。凡此种种都再一次证明，家庭在劳动教育上的影响正逐渐削弱。

这种影响在别的方面也有所削弱。我们面临着一些家庭影响削弱的情况，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合乎心愿。就拿富农作例子来说吧。从前，富农在家里是想用“自己的精神”来熏染孩子的。托尔斯泰写得好，有个富农不愿送自己的孩子上学，因为他想“用自己的精神熏染孩子”。现在这一点办不到了。因此富农及其家庭对儿童和青年一代的影响日益削弱，而学校和环境的影响却在不断增强。

家庭影响和劳动教育的削弱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流浪现象因此严重了。儿童往往想离开家庭，因为他在家里受不到从前那种教育。家庭影响不断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从前，家庭可以进行教育（尽管它是手工业者、手艺人或小农家庭），那时学校只有一种职能，即教学职能。就像过去人们常说的：老师教，学生学。学校教学生读、写、算等等。但学校不教学生劳动。群众学校不教学生劳动（只有职业学校才教劳动），这一情况以及所有

群众学校都不是劳动学校，既给学校本身、也给我们所有的儿童机关打上了一定的烙印。所以，当时的学校并不具有现在这样的教育意义。

当前，由于生产性质的变化引起家庭影响的削弱，因而学校开始具有了重大的教育意义。我们面临着如何组织学校的劳动，组织我国儿童机关的劳动。我们要实行普及教育的方针。现在这种普及教育已不是什么遥远的事了：它已近在眼前，可以看得到了，已成为一种现实。而普及教育意味着学校将对广大儿童产生影响。不过，重要的是不仅要估计到学校的影响，不仅要授予学生大量知识，而且要使学校成为劳动学校，要使劳动的安排能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学生。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党党纲中关于教育和学校的部分讲到，必须建立劳动学校，而且不仅是劳动学校，还是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这种学校是按新的方式进行劳动教育的学校。

那么它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劳动教育，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教育呢？我不想谈目前已形成的实际情况，而只想讲一讲原则方针。这种学校要怎样进行劳动教育呢？它要了解目前工厂、大型国营谷物农场和大的生产单位需要什么样的劳动，这些生产部门需要工人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

从前的情况颇有不同，那时，要学会这门手艺，掌握有关工具。当然需要进行长期的手工教育。如果我们看一看集体农庄的情况，就会发现庄员们往往缺乏劳动技能，他们不会使用劳动工具，不会计划自己的时间，不会分工，不会采用工作所需要的速度，等等。

大老远来到集体农庄的工人对下面这件事感到非常吃惊。一台拖拉机停放在那里。冬天到了，拖拉机还在雪地里，谁也没有想到要把它放到棚里去。没有人想一想机器是否会坏损，没有人考虑怎样妥当地分工。现在出版了《爱护拖拉机》报。为什么要出版这份报纸？因为集体农庄庄员还缺少这方面的劳动技能，而工

人们是有这种技能的。所以现在我国的劳动学校要继续培养学生会使用各种劳动工具的一般熟巧，让他们懂得劳动的过程：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不那么干，等等。

在这方面，工人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工厂受到了相应的锻炼，所以我们应努力使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机关与广大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保持联系，以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经验带到学校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进行教育。现在必须发动各个工厂，大型的、条件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人群众到学校进行劳动教学，因为我们如按旧的模式安排儿童在学校的劳动，那就会一事无成。

从前的一些儿童之家既有设备，也有劳动指导员，一个在那儿学习的女孩子抱怨说：“我在儿童之家工场里干了六年活，学的始终是一个东西：锁边。”手工学校也是如此：教你一种劳动，几年都干同样的活儿。男孩子们成年累月地在图片上涂色，或者干一些零活。

然而，重要的是让儿童能适应各种形式的劳动，并使学校的教学有助于儿童掌握劳动技能。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机构和学校不要成为旧式的学校，要使它们成为一种生产单位，但又不同于家庭和小农经济那种类型，也不同于小手工业经济那种类型，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生产单位。

学校应该与工厂或大型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挂钩，让学生参加一部分劳动，从而使学校本身成为一个生产单位。以后我还要讲这种生产单位的特点，不过目前需要做的是改造学校的类型。

如果我们认为全部工作就是按老样子在学校里教手艺，那我们就没有把教育劳动摆到应有的高度。如果只是找一个装帧工人坐在那儿自己糊纸盒，而孩子们坐在一旁观看，这就毫无作用，也不可能进行劳动教育。要按现代的方式安排劳动。而我们往往没有这种认识。

工厂艺徒学校^②自以为它是附属在厂内的，可是它与工厂往

往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工厂出钱，让工人的孩子上学，只此而已。工厂是工厂，学校是学校，各不相干。学校设置的是木工手工工场，而工厂却是大型机械化设备，产品完全不同。

所以说，我们的教育机构、校办工厂都应该与大生产建立联系，这样它们才能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机械化劳动对人的教育很大。我们不妨看一看按新的方式正确安排的劳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就拿设在科斯金纳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办的学校^⑤来说吧。这里收容的青少年都是劳动家庭抛弃了的人。他们流落街头，走上了犯罪道路，是一些难办的孩子。

怎么办呢？那里的做法是：开办劳动学校，设立机械化工场，邀请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当师傅，这样一来，孩子们都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孩子们知道应该怎样干活。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产生了学习的愿望，并有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凡是到这儿参观过的人，都一致公认这所学校是一个强大的教育基地。

这类学校还有一些。例如，雅罗斯拉夫尔区有一所儿童之家，负责人是一名共产党员。刚开始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说，对孩子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们开始通信了。他成功地进行了劳动教育，办了一些机械化工场，管理很完善。后来他来信说，他的学生变得让他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处处都听话，干什么都很乐意。”劳动发生了变化，劳动组织发生了变化，学校的教育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问题还不完全在这里。共产主义教育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教育。小私有者看待一切事物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这对我有利，这是我的”，等等。然而工人是怎样看待工厂的呢？就拿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或社会主义竞赛来说吧。这对工人起了什么教育作用呢？在十月革命胜利十二年之后的今天，工人群众已把工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他们感到自己应对工厂的生产负责，这也就是说，形成了列宁同志称之为自觉纪律的东西，这种纪律不是棍棒纪律，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的纪律。没有这种自觉纪律就

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纪律。

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看到，目前集体农庄还没有这种纪律。必须以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为榜样进行长期的教育，这种教育将使广大集体农庄庄员养成对劳动的自觉态度。这正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关键所在。如果对劳动采取自觉的态度，我们会懂得，每个人的劳动乃是共同劳动的一部分。在这里，互助是建立在另外一种原则上的，即：认识到为了搞好劳动必须进行互助。互助是和集体劳动不可分割的。集体劳动可以培植团结感情。

通过集体劳动，我们能够把他们培养成自觉的集体主义者。这样的人，这样的少年，他们将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对他说来上帝是一文不值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教育是深刻的反宗教教育。小私有者无所不怕，他对一切都感到不可理解，突如其来。而集体主义者却懂得，问题的实质在于劳动的组织，上帝对他毫无用处。他需要的是工程师，是同事，是正确地组织劳动，没有上帝照样行得通，所以他对上帝不感兴趣。

集体主义者对社会问题也开始持新的见解了。

受过集体主义教育、具有内在自觉纪律的人，在社会关系方面也是恪守纪律的，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态度迥然不同。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教育任务。

此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有何不同之处呢？

它不像资本主义经济那样：一个资本家与另一个资本家竞争，并且拼命想多占他一些，以便夺取更大的利润。

我国不存在这种资本主义竞争。这一点我们都清楚。我们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制定整个经济的统一计划。对这一重大的前进步骤不能估计不足。但是对这一计划我们还可提出更多的要求。同志们，问题不在于我们在哪个大剧院里对我们的计划鼓掌欢呼一番，说什么计划性是一个好东西。我们要以适当的方式把我们的整个教育引向这个方面。所以现在我国教师都十分重视计划了。

拿一级学校来说。我们要做一件小事，假定要在一天之内完成。给您一个八岁的孩子，他不是一个人去干，而是几个人（比如说，五个人）去干。这几个人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呢？孩子们不会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总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他们热情很高，却不知量力而行。但是如果他们头一次碰了钉子，第二次又失败了，那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计划是不合式的。

在这里就需要高年级的出面帮助。对于二年级说来，可能不只一天的工作，而是一个五天的计划；并且干活的不是五个人，而是十个人。对二级学校来说，可能就要布置复杂得多的任务。整个学校生活都需要计划性。这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因为这既可以培养工人，同时又培养生产的主人，也就是说，当他日后参加生产时，他就不仅是一个只会摇把手的执行者，而且同时也能胜任厂委会的工作，不会出现差错，等等。集体农庄也是如此。他不仅应该会使锹，而且还要会开拖拉机，拖拉机再也不会停在雪地里，集体农庄庄员将成为一个会当家理财的主人，他关心一切，并能量力办事，懂得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具有什么意义。

应该指出，劳动教育必须适合儿童的体力。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对待不同年龄的儿童。绘画的过程很好地反映了儿童劳动的能力。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是这样画画的：开始画的是一个东西，结果画出来的是另一个东西。他们干活也是这样。开始时想用粘土捏人，后来在干活的过程中又转念一想：“不，我最好还是捏一栋房子。”于是就改捏房子。所以，他们既不量力，也没有固定的目的。

八、九岁儿童的劳动不同于成人的劳动。成人（甚至少年）的劳动都有一定的目的意图，而儿童劳动的目的却只是认识环境。所以他的劳动经常变化。儿童劳动是一种很有个性特点的劳动。儿童往往不注意劳动的各个方面。刚开始做一件事，突然被另一件事吸引住了，或者发现了什么别的东西，他就忘了劳动的事。

一只蝴蝶落到手上来了，他开始观察它的翅膀，至于他刚才想干什么，他早忘了。他已醉心于这种观察了。

这就是儿童年龄的特点。我们必须考虑这些特点，因此给八、九岁的孩子安排劳动时，要使他们通过劳动能学到东西，有所进步。可是我们往往让他们干一些纯机械性的劳动：看守瓜地，喂鸡，等等。

现在再来看看三年级和四年级。他们画的完全不同。他们能把握整体。

不过他们只对某些方面感兴趣，他们希望全面把握这些方面。九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这种想把握整体的愿望，说明这时最好安排综合技术性的多方面的劳动，以便说明劳动的各个部分之间是怎样联系在一起。

拿少年的图画来说。他画的不同于十岁孩子。他已经不把头画得大于身体了。他感兴趣的是细节。他想把每一部分都画得合乎要求。这是过渡年龄阶段的特点——注意细节，希望集中注意力。这是这一年龄阶段的特点。

为了正确对待这一因素，就要在前一阶段给予正确的训练。

在谈到劳动的时候，要注意儿童比大人容易疲倦得多。所以要慎重对待和估计不同年龄儿童的力量。如果我们让儿童担任力所不及的劳动，那我们就会培养一批懒汉，培养一批对劳动马马虎虎的人。要使劳动既有兴趣又能胜任，同时还是创造性的劳动，而不只是机械性的劳动。

我还想谈谈劳动的选择问题。现在有这么一门科学——技术心理学^④，这门科学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飞行员、拖拉机手、甚至组织者的，等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他的机体有关。有的人可能一下子就能把握全部，另外的人可能有自己特殊的办法做到这点。有的人朗读效果好，有的人则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掌握得更牢，还有的需要看了才能记住，等等。机体的所有这些不同特点十分重要。只有每项工作都有相应的人负

责，这时劳动才能成为有效的劳动。资产阶级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很关心为每一个职位安排一个合式的人。德国、美国的学校都设有劳动顾问，那里，技术心理学有了广泛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些顾问，那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他们对不同的社会阶级提出不同的建议。如果是工人的孩子，他们就派这些孩子干某一种工作，他们总是建议工人的孩子去当一个执行者，而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孩子则说，这些孩子可以当工程师、农学家、医生，等等。顾问们不管工人的孩子可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们也不建议这个孩子当领导人，而认为他只能当执行者。于是就建议他去干执行者的工作。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在职业的选择上给予不同的建议。

我们不这样对待这个问题。此外，资产阶级不管某项工作对机体的影响如何，而只看这项工作能给资本家带来多少利润。我们将来有了顾问之后，不仅要注意这项工作对生产的重要程度，而且还要看它能否教育人并提到很高的发展阶段。

我在这个报告中是想讲讲综合技术劳动的巨大教育作用。现在，家庭的影响正在削弱，社会教育提到了首位，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需要改造我国的儿童之家。儿童之家现在已不合式了。这点必须直率指出。最近几年来尤其不行。也许个别儿童之家不错，但总的说来儿童的生活过得不好，这不是他们期待的那种生活。我们听人说，孩子们经常从儿童之家逃走。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也可以说是由于儿童之家不能满足孩子们的劳动要求。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怎样使所有的教育机构具有劳动性质，使它们的规模更加扩大，因为它们将日益取代过去在家庭中进行的那种教育。

怎样安排这种劳动教育？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我们需要许许多多机构，而不只是儿童之家。我们需要设置工场、技术

站、儿童劳动组合，我们需要彻底搞好组织儿童劳动的工作。这是基本的一环。它有助于我们把整个教育工作提到最高的阶段。

儿童之家为什么搞得怨声载道呢？因为那儿或者是没有安排劳动，或者是安排得不好。没有围绕这个问题把儿童组织起来，等等。

我觉得，这次代表大会应当特别重视这些问题。必须记住，没有男女工人的帮助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在扫除文盲上，我们有一批文化战士，他们是专门对文盲进行帮助的人。没有这样一批来自工农的广大文化战士，我们是不可能真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

我的报告的目的就是反映这些情况。请允许我就此结束我的讲话，我希望这次代表会议能认真地注意这些问题。

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

(在综合技术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报告和闭幕词)

开 幕 词

……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你们大家都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曾经非常尖锐地提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现代大工业为全面发展的人进行崭新的劳动教育创造了条件。我现在不打算详细讲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国出版的书籍中已经谈得很多了。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特别着重指出，这—问题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恩格斯还指出，城乡之间的矛盾的彻底消除，只有在全面发展的、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才有可能。现在这—问题就是像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所阐述的那样提出来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工业的发展为我们俄国莫立了工人运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因此获得了牢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小组纷纷成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先提出了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列宁在他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①一文中曾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实施综合技术教育，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列宁还把这—问题

同普及教育问题和全民义务劳动问题联系在一起。只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从前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于这一方面、对于综合技术教育与普及教育的这种联系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注意，而现在，当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决定之后，我们就非常自然的，而且也特别明显地把普及教育的问题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极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同志们，这是我们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九十年代谈论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第一阶段。后来过了很多年，直到世界大战在许多国家引起劳动力缺乏的危机的时候，在产生了变世界大战为国内战争的问题以及工人阶级胜利的问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才重新变得迫切起来。只要注意一下1915年和1916年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刊，那么就可以看到，由于劳动力缺乏的危机，它们是怎样重新提出了培养劳动力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了这一问题的正确提出，使它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脱离开了。正好那时要详尽地研究学校综合技术教育这一问题的情况，所以在十月革命爆发后，我们立即制订了有关普及义务教育的明确方针，同时也制订了有关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明确方针。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恰好也指出，我国的学校应该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在1920年末国内战争刚刚结束，1921年初开始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又非常尖锐地提出来了。当时，党内极其热烈地讨论着生产宣传、扩大成年工人的综合技术眼界等问题。在当时进行的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列宁同志特别强调了生产宣传的重要性，他希望这种生产宣传能带有综合技术的性质，能扩大工人的综合技术眼界。他看到了工人阶级面临的巨大任务，即在社会主义的新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因此，他强调指出了发动群众参加这一建设工作的必要性。列宁在给克

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②曾说，要用电力化的计划来发动群众，实际地进行电力化的宣传工作。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正是在对群众的态度以及发挥群众积极性的方法问题这两方面进行的。1920年和1921年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首先是从对成人进行工作这一观点上提起的。

同时，这一问题也在当时举行的党的讨论学校问题的会议上提出过。列宁那时写了评注来论述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并在《论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一文中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指出用单一技术教育去代替综合技术教育是不正确的。^③

当然，在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顺利地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因为当时经济备遭破坏，条件非常困难，不能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企图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个别实验学校，以及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点点滴滴的成功的创举，在当时毕竟是“实验性”的；至于群众性的学校，根本没有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里，在恢复时期，我们看到在我国群众性的学校里已经显露出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一些迹象，不过这种迹象还很不够。当时我们只有两类学校比较近似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第一就是工厂艺徒学校。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学校，它表明了怎样把教育与生产实际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找出工厂艺徒学校^④的许多缺点，但是应该指出，工厂艺徒学校的基本思想是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思想，是教育与生产紧密联系的思想。应该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是为了建立工厂艺徒学校而奋斗的战士，它对这项工作是很关心的。

其次是另外一种群众性的学校，这种学校实施的教育也接近综合技术教育——这就是农村青年学校。在这种学校里，教育也是与生产紧密联系的。不过我国的农业是落后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学校有所影响。只是现在，由于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机械

化，农村青年学校才呈现出新的远景，它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但是，如果我们拿所有的学校的情况来看，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些试验和尝试，就所有的学校来说，不管是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都没有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如果我们有时把我们的小型工厂叫做综合技术工厂，那往往也只是为了聊以自慰。可是现在，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条件完全改变了。

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指出了我国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根本性的变化，揭示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建设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实质。

工会已经面向生产，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于是就从另一方面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并且使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同时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的蹊径。

诚然，旧的影响还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某些经济工作人员，某些专家，教育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某些工人还往往不去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很多人还认为，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完全是政府部门的事，只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事，但是现实生活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现实生活教育了人们。现在举行的代表大会，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它的召开是十分适时的，因为目前正要充分提出学校综合教育化方面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过去一段时期，我们仅仅是宣传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思想，这一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要使我国各级群众性的学校(从一级学校开始到高等学校为止)都实际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这是生活所绝对要求的，也是生产所绝对要求的。必须对学校进行巨大的改造。

不消说，单靠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力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里不仅需要党的帮助(党一直是赞成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不仅需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持(它对此事是非常关心)，而且还需

工会的大力帮助，需要经济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因为只有依靠共同的力量才能建立这种学校，而这种学校的建立又意味着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一大步。

报 告

我的报告的题目是《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⑤。同志们，我们所亲眼看见的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这项改造工作的特点，这项改造工作充满了社会主义的精神。

问题不只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扩大了，而在于整个组织是根据新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在于改造国民经济的宗旨是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

当然，我国的国民经济改造工作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改造工作。在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国民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使一小撮资本家发财赚钱。

其次，我国的改造工作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这种改造工作是靠人民群众的双手进行的；如果人民群众不积极地、自觉地参加这一改造工作，那么这一工作也就不可能完成。

列宁在他所写的《伟大的创举》^⑥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谈到经济改造方面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是在1919年他看到当时自发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景而写的。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方面的特点就在于这是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各国是一种什么社会关系呢？那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地主和为他工作的农民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各国，天下是地主和资本家的，那里的全部社会关系，都是由此决定的。在我国，政权是苏维埃掌握的，所以这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这种由苏维埃掌握政权的社会关系就为群众的工作、群众的首创精神及其主动性的

发扬创造了条件，而这种条件是资本主义各国所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群众才能产生一种创造力以保证大踏步前进成为可能。当我们说，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时候，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宣传口号，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在我国的情况下，在苏维埃国家的情况下，有一种新生的、巨大的力量，即组织起来了的有觉悟的群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主义各国没有的。而正是这种力量能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口号变为最现实的口号。这也不单纯是一种宣传方式，而是对我们耳闻目睹的事实的一个证实。

当列宁在《伟大的创举》这本小册子里谈到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中表现出来的自觉的劳动纪律时，他同时也谈到了这种新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种自觉纪律怎样在新的情况下形成起来。我们亲眼见到了这种自觉纪律在工厂里形成起来的情况，这种纪律不是资本主义的纪律，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里形成的纪律，而是由人的内在觉悟形成的纪律。

其次要谈及新的劳动组织。如果我们现在到工厂去，我们就会看到正在开展竞赛的工作队，看到紧张忙碌的工作情况，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我们真的参加了新的劳动组织。如果我们看到目前集体农庄正在进行的建设，那么我们会发现，在那里全部生产工作都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的。这种组织不同于从前的组织，这是一种集体化的组织，它是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一股巨大的创造力。

列宁所强调指出的这种关系中最后一点，就是必须使“……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的普遍联合结合起来”。⑦

列宁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成就，要把这一技术成就都拿过来，但是拿过来之后，应该按照新的方式运用于我国的新情况。

1918年，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

曾经说：“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②他接着指出，这些技术上的奇迹和科学成就有助于把群众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列宁在世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全部实际地解决了。

现在正进行着社会主义竞赛，它所具有的规模与过去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完全不同。社会主义竞赛日益深入，它已发展到各个大生产部门去了，新的工作形式正在建立。每天，当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们都可读到一些关于新的工作形式的消息，有时是关于协作的，有时是关于混成作业班的，有时是关于其他一些新的工作形式的。我们读到了关于工作队公社的消息，这种公社是根据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这种公社里，工人们在工作时互相帮助。所有这些情形使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建设。

例如，我们现在提出了向浪费现象作斗争的问题。《在计划工作战线上》^③这本杂志的第9期和第10期里，刊登了鲁达柯夫写的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他说，根据统计，我们每年的浪费总值达40亿卢布。当我们向工人阶级提出向浪费现象作斗争的任务之后，他们立即认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根据统计，十个重点选择出来的工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进行了一项生产改造，立即节省了300万卢布，同时还提出了许多建议——工人一共提出22,000条建议——说明怎样用最好的方法去进行生产、改造生产。它也说明工人阶级正以新的态度积极参加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工作。这也创造了使我们能够大踏步前进的新力量。但是，如果工人的技术修养越好，他对全部生产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越深刻，他的综合技术眼界越广阔，那么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就能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这里需要的不是一些狭隘的专业技巧，不是某一小范围的知识，这里需要的

是无产阶级敏锐的眼光，这种眼光能看见生产中的一切缺点；这里需要的是综合技术的眼界。

当然，绝不能说工人提出来的每一条建议都应该采纳实行。由于技术水平低，不会计算，等等，有些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切合实际的。如果工人的技术水平更高一些，他所提出来的建议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不消说，人民群众的综合技术水平越高，那么他们的创造能力就越能发挥效果。正因为如此，列宁在他所写的生产宣传提纲和他所写的应该如何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评注中说，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但是他们必须具有综合技术眼界。列宁经常指出综合技术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发现，我国正在自发地对工人进行着各种非常广泛的综合技术训练。就拿初级生产训练班来说吧，仅乌克兰一地在1929年就有36,000工人参加这种训练班。

当我们到一个工厂去的时候，往往会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厂设有初级生产训练班”，——但这种训练班的情况如何，它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却没有说，也没有统计材料。必须指出的是，这项工作完全是自发地进行的。

再拿长期生产参观来说，仅仅今年一年就有15,000名五金工人进行长期生产实习。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比较落后的工厂的纺织工人要到设备比较好的大纺织工厂去看看各种成就，获得进行比较的材料，扩大自己的综合技术眼界。

比如说，如果您现在到莫斯科的一个工厂去参观，往往有人会对您说：“我们厂有一半工人都在学习。”但是在哪里学习呢？他们通常是在工农速成中学预备班、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中等技术学校的、高等学校的预备班学习。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预备班与生产的联系都不密切，多半是讲一些抽象的道理，但是除了旧的学习形式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形式，比如工厂学校就是。在这种工厂的每一个车间里，围绕着每一生产过程分出许多专门训练班，从各方面来阐明生产情况。整个教学工作是以工厂为中

心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从生活出发，根据新的办法来开设各种训练班，这当然不是一条很普通的道路，注意考核这种企业学校的工作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教学形式：展览、讲座、与生产有关的流动展览，——所有这些形式都大大扩大工人的眼界。由于生产需要而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这毫无疑问地也可以扩大工人的综合技术眼界，工人的综合技术认识毫无疑问是提高了。

列宁在他所写的《生产宣传提纲》^⑩中曾指出生产宣传应该采取非常大的规模。例如，他曾强调说，扫盲站应该同生产宣传、同综合技术宣传联系起来。这当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的扫盲工作的规模很大，如果把它同生产宣传联系起来，这将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人中间最落后的一部分人将要得到提高，从而自觉地去对待生产工作。

使工人的广泛的综合技术眼界变得特别重要的另一原因，就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改造工作是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我们拿各个民族省、拿个别地区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那里需要在新的地方进行建设。列宁曾经谈到五种类型^⑪。这对我国国民经济改造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判明方向，考虑到工人参差不齐的水平，考虑到整个情况，因此这里不能按死板的公式办事，需要发动群众参加这种建设工作。如果群众不参加这一工作，我们的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达到目前生活所要求的那一深度和规模。

我们经常谈起综合技术眼界以及成年工人掌握技术知识的问题。这与学校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在于，成人教育的这种综合技术教育化是与我国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有密切联系的。大家都知道，党纲中曾经谈到国民教育委员会^⑫的问题，列宁在世时也曾谈到这种委员会的重大意义。这不是家长委员会，而是另一种东西，是群众直接参加学校建设工作的一种组织。不言而喻，如果群众的眼界扩大了，如果他们具有综合技术的眼界，那么这

些受过综合技术训练的群众就一定能够非常积极地参加我国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

同志们，我们用不着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校舍很差，我们拨来作为小型工厂用的地方也非常狭小。据一个统计材料说明，十月革命胜利后所修建的新校舍里小型工厂仅占校舍面积的2%，而衣帽间却占5%。这说明，目前我国群众学校里小型工厂所占的地方是多么狭小，不过我们也不应幻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整个局面改观。我们应该注意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列宁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们所有的那不多的东西。列宁在给斯切潘诺夫著的一本关于电气化的书所写的序^⑧里曾经说，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发电站变为一个特殊的技术宣传点，使每一个发电站成为宣传全国电气化知识的中心。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只是发电站应该利用，还有每一台拖拉机，每一座工厂，周围生活中的一切，与技术有关并能使人们了解技术工作、了解技术机器和工具的一切——这一切都应该加以利用。

拿我们的一个区来说。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区的一切可能利用的东西(包括很小的东西在内)都加以利用。如果有汽车，那么就要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加以利用；如果有拖拉机，就应该从展示拖拉机的整个内部构造的角度加以利用，说明拖拉机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们要把每一个火车站变成一个特殊的学校。

马克思曾经谈到磨、钟表及其在技术史上的作用。这些东西也应该用来为综合技术教育服务。^⑨

比如说，在伏尔加河中游有很多制粉机和碾谷机，——那里需要利用制粉机，那么就要在附近进行初步的综合技术宣传。现在，技术已经日益深入农村。每一个机器拖拉机站无疑地都应成为技术宣传点。如果我们能注意到周围的环境，注意到一切可供我们学校利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农村里，目前也有很丰富的材料可供我们向儿童介绍现代技术之用，并且可

以说明这种技术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利用每一个工厂。

不久前，我曾经去过一个工厂。这个工厂附近就是一所七年制学校。所有的废物、碎铁、金属丝——这一切自然都是学校小型工厂所需要的，以便利用这些废品来说明发动机的全部构造，可是这个工厂对学校并不关心。这个工厂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关心学校：能不能把学校并入工厂的范围，能不能用学校的地方再建一个车间。至于学校的情况如何，学校教学大纲的内容如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大纲，工厂应该怎样帮助学校，——这些，工厂都不关心。

必须使工厂关心学校的事，学校关心工厂的事。现在，很少有哪个工厂去讨论学校的教学大纲，很少有哪个工厂去讨论综合技术教育的大纲编订得是否正确。我们发现各个企业不重视这一点，那些参加生产竞赛并且提高了生产的突击队员，也不重视这一点；我们发现大家对学校的各种问题都不够重视。我们还发现这样的情况：莫斯科一所中学里有一个小型工厂，这个工厂从前是一个手工业式的工厂，现在由于综合技术教育很时新，于是他们就宣布说，这是一个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小型工厂，虽然这个工厂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一个纯粹手工业式的工厂。如果你要问学生们做些什么，他们会说：“我们有两小时实行综合技术教育，而且最妙的是这两小时排在最后，因为这样就可以偷偷溜走，所有能溜走的人都走了”。我问他们，这两小时的学习与其余的学习怎样联系起来。他们对我说，小型工厂里的工作与学习一点联系也没有。如果工人能够参加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那么这种现象当然也就不会发生。学校的教学大纲应该拿到工厂大会上去广泛地讨论；只有在学校把自己的展览品拿到工厂里去，只有去参观那些综合技术教育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很好的示范学校，只有请工人来听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引起他们对学校的关心。

不久前，我在一个工厂做了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工人

们对综合技术教育一点也不懂。那里对教育问题谈得很多，大家都发言，谈得很热烈，于是就引起了兴趣，但是我相信，可能只是几个人对综合技术教育这个问题感兴趣。如果能举办一个展览会，说明如何使教学工作与学习纺织联系起来，表明教学与生产联系的情况，那么大家的兴趣就会大些，同时也就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来。我们要通过关于具体工作的展览来吸引群众参加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

综合技术教育的宣传工作应该安排得生动活泼，现实具体，应该通过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问题，不要抽象地议论，而要讨论一些实际的问题。

这不只是与工厂有关，与集体农庄也有关。现在我想谈谈我党党纲中曾经提到的国民教育委员会的问题。这种委员会就是工人代表的委员会，就是学校附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代表的委员会。这些生产部门应该非常关心大纲，正如一个集体农庄庄员所说的，要“逐字逐句”地研究学校的教学大纲。只有当群众真正关心学校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建成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

……现在，扩大工人综合技术眼界的问题表明，目前关心学校的群众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群众了，他们将关心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资本主义各国进行的经济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建设是有计划的。我国的五年计划在资本主义各国存在的那种竞争者面前有极大的原则性意义。我们现在已经亲眼见到了北美、德国以及其他许多大国的严重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正是生产没有计划而引起的。统一的五年计划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大家都知道，谁也不会认为制定这个五年计划只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事情。我们必须懂得，计划性意味着这一五年计划的制定应使每一经济组织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就在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发现这种计划性已经深入到每个工厂、每台车床去

了，它使工人阶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看到了一个得到响应的工业财务计划。

“得到响应的工业财务计划”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计划性已经从办公室走到每台车床、每个工人那里去了，而随着这种得到响应的工业财务计划的广泛发展，工人对这种计划性的理解也就越深刻。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与下面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必须广泛地使工人了解这种计划性的许多要点。因此，我们也应该使我国的学校工作进行得很有计划，不要到了学校小型工厂之后，随便做点什么，就万事大吉。不能把计划性理解为填写教学表格。问题不在表格，问题在于要让儿童自己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事，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我们希望通过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来安排学生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的安排要使他们能培养学生做事有计划的能力，要使计划性深入学校的各个方面去；这样我们就是用新的方法来培养我国的新一代了。

在周围的生活中，还存留着许多旧的余毒、很多缺乏计划性的陈旧现象。修建一个小型工厂，花了45,000卢布，可是过了一天，一看，工程师又提出一个更好的设计方案，刚刚修好的这个工厂就要拆毁，45,000卢布等于丢到水里去了。这种错误目前还不可能完全避免。

但是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培养能够有计划地进行工作的新一代。这个任务是与我们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有计划性，其前提就是要有一定的眼界，要对生产有一定的理解。

在这方面，生产的计划性具有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全面发展的、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后，城乡之间的矛盾才能消除。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也曾谈到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问题。这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社会分工的基础。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一个由于实行集体化而使城乡之间的这种对立正在消除的时期，我们所见到的完全是一些新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即使是农村也开始以不同的态度来关心技术问题了。现在城乡之间距离的缩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现实，而这种情况是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在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从前工人到农村去是怀着某种宣传目的，那么现在到农村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有25,000人到农村去，他们把自己的生产经验、自己内在的自觉纪律、自己从事集体劳动（这种集体劳动产生于工厂的整个环境）的习惯和无产阶级的修养——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带到农村去了。如果你了解一下刚成立的集体农庄，并且把昨天还是单干户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心理状态和工人的心理状态加以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工人们会说：“真是怪事，机器摆在雪地上，拖拉机放在雪地上，集体农庄庄员们从旁边走过，可是谁也不管这台拖拉机，而把这台拖拉机放到草棚子里去并不是什么难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工人们已经养成了爱护公共财产的习惯。他们懂得，拖拉机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是集体农庄庄员们还没有这种习惯，他们还没有养成爱护公共财产的习惯。我们看到，农民刚刚养成这种为进行集体耕作所必需的习惯，刚刚在按新的方法组织劳动的集体农庄里养成这种生产上的主人翁的态度，养成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者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从这一点看来，派遣25,000人到农村去，对于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现在，农村闭塞的现象已大为改观了，这种情况当然会对而且不能不对我国的学校产生影响。不久前还曾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们城里的学校是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乡下的学校是农业化的学校”。农业化倒是农业化，但是农业化不能以落后的农业为基础。它与综合技术教育化应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党纲中关于统一学校的条文，不仅是指的一般的方向和方针，而且是指必须在城市和乡村都设

立统一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目前城乡之间的距离日益缩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我国正在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许多大城市里，我们即将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新的方法来建设农业，农业将要机械化，此外还说明，交通邮电事业也将要用新的方法把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把现有的一切技术成就都在这方面加以运用。

不久前，我读到前德国教育部长别克尔写的一本德文书，其中谈到文化危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意思。书中实际上谈的不是一般的文化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别克尔很明显地揭露说，邮电方面的技术成就削弱了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影响。别克尔说，从前，农村是很闭塞的，可以在那里进行宗教宣传，人们相信这些话（他对这一点当然说得躲躲闪闪），可是现在人们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大城市的事情，农村再也不闭塞了，农民再也不相信那些话了。从前可以进行个人的宣传鼓动，可是现在如果对个人进行宣传，实际上是对集体进行宣传，而集体又不太接受这种开导，于是别克尔就认为文化危机到了。

工业化给邮电事业展示了崭新的远景。有声电影、收音机——所有这些都是新的技术成果。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把它用于完全相反的目的。我们要利用这些东西在最广大的群众中传播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把技术成果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但是对于学校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电影和收音机。我们仅仅开始把收音机用于函授教学。而所有这些都应该更大规模地利用，这样我们的学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常常在农村里无人过问了。借助收音机和电影，所有的优秀人物和技术上的知名人士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教育服务，为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服务。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还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够。这是目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当列宁一般地谈到工业化问题的时候，他说必须把另一种业务（人们往往不承认它是业务）加以改造，——这就是家务。今年冬天，由于大城市的建设，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注意，因为大城市的机械化要广泛地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设立公共食堂，设立公共洗衣房，把技术运用到各种家务中去。现在，由于需要妇女的劳动力，所以这个问题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诚然，我们也有很多过失。到一个修得很好的食堂里去，看起来富丽堂皇，可是仔细一瞧，简直不像一个食堂，而是畜栏，饮食很随便，东西都白白浪费了。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成绩。

我们应该利用好的建设经验，使我国的城乡家务工作达到同一水平。在农村里，集体农庄运动也为合理地安排日常生活创造了前提。这对我国的学校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前，总是不停地让儿童去打水，儿童得做各种零活，这种零活占去了他很多时间，把他束缚在家庭里而养成了小私有者的心理。现在我们看到，普及义务教育正在进行，同时学校面前也呈现着另外的前景，提供另外一些条件。

现代技术在学校面前为综合技术教育化开辟了道路。我们看到，目前各个工厂正在运用的那种现代技术，我们向西方学来的那种技术，已经具有一定的性质，它使手工业技术成为无用之物。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我国工厂的设备，我们就会发现目前还有很多工作是用手工劳动从事的，为此也就需要多种形式的手工技巧。在很多工厂，还只有一部分生产活动机械化了，但是我国的改造工作正沿着以最新的科技成果来重新装备我国工厂的道路前进。而这种装备上的改变是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机械化可以改变要求工人所具有的修养的性质，首先它可以改变学习时间过长的状况。

马克思早就说过，不要成年累月地学习，要用几个月、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会某种劳动过程。

其次，我们现在还看到，在现代技术中，各个完全不同的部门使用着同一类型的机器。许多乍看起来迥然不同的生产部门，其间往往有很多共同之点。生产的机械化为各种生产的接近打下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过程接近之后，从前存在的那种生产上的独特性就开始消失了。

目前，所谓受过教育的工人当然起着特殊的作用。受过教育的工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劳动素养，具有现代技术劳动的素养。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苏维埃俄国已经创立了一套培养这种受过教育的工人的体系——这就是加斯帖夫同志的体系。

我们发现从农村来工厂里当工人的人，他们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他们不懂得机器，不知道照顾机器，他们没有起码的劳动素养，而这种素养又是从事大生产所必需的。

加斯帖夫的成就在于，他恰恰培养了人们这种素养。但是加斯帖夫也有错误，就是他认为，在我们这个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并且群众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国家里，只掌握这些技巧就行了，停留在这一点上就行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认为这种观点和另一种观点是对立的，即：力图局限于机械地训练，局限于仅仅学得一些技巧，这种作法是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作法——培养全面发展的、能够同时做生产的执行者和生产的主人的工人——对立的。

一个工人，如果被束缚在自己的狭小的专业上，而这种专业可能由于技术的进步在明天就成为无用之物，那么这种工人实际上没有具备任何技能，他对国民经济的改造不能作出任何贡献。所以全国人民（首先是经济工作人员）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除了使广大的群众获得这种起码的生产素养之外，还要使他们具有广泛的综合技术眼界，以及把自己的知识、技巧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加以运用的能力。

新的技术同时也改变了有高度技能的工人的性质。从前，有高度技能的工人都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多年的手艺学习才获得一

定的技能。他往往除了自己的技能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连最简单的计算都不会。拿一个老建筑工人来说，他常常不能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最简单的计算问题，没有起码的、对他说来非常必要的几何知识，可是他学习过很多年的手艺。所以现在需要另一种技能，就是把生产劳动同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能力。

当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建立工厂艺徒学校而斗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一斗争中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培养具有新技能、具有现代技术所需要的新技能的工人而斗争。

如果我们使不熟练的工人具有综合技术眼界，如果我们从技术上对工人加以培养，那么我们就能够使没有技能的工人和有高度技能的工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资产阶级的全部策略在于它控制了一小部分熟练工人。只要我们看看工联的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资产阶级对熟练工人是如何百般殷勤，力图把这些工人培养成资本主义的奴仆。对我国说来，苏维埃国家的劳动人民并不是只有一双手的工人，他们是生产部门的主人，所以我们要大力运用一切技术成果，使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缩小到最低限度，使不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

当然，这样就能使生产得到蓬勃的发展，能使每个人从事根据他的能力和爱好说来最适宜的工作。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设想；这个问题目前是由我国国民经济的改造提出来的，今后这个方针将越来越明显。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人，把所有的人从童年时起就毫无例外地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大家知道，我国从今年起开始实行普及教育。今后普及教育包括的年龄将越来越大，我们将采用这种办法通过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人，使他们变为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劳动者。

考虑到现代技术的特点，每一个经济工作人员都应该竭尽全力去帮助建设我国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绍辛同志^⑤在他的报告中将要提出许多实际的建议，指出应

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使学校加强同工厂的联系，使集体农庄管理处的工作和全体集体农庄庄员跟农村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的工作加强联系。他的报告里将提出许多建议。我不打算再谈这些问题了，因为这样就已经占了不少时间了。

我这篇报告的目的是想着重指出，工人群众、与这些群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工会以及经济工作人员（他们当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的工作是在苏维埃国家进行的，这种改造工作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有这些人都应该直接参加各级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这项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也正在使我国的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加强同生产部门的联系。我们一直在那里进行生产实习。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实际上只是第一步。我们要使整个实习工作安排得卓有成效，使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如果工人、工会和经济工作人员不配合在一起进行工作，以便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实习工作，为培养我国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青年打下广泛的综合技术基础，那么我们就会长时期在这条战线上挣扎，直到我们走上能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到底的道路上为止。

遗憾的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经济工作人员并不太多，而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是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在工人中间，由于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竞赛的巨大工作，他们已经对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发生了兴趣。我认为，在今后的讨论中，应该提出一些更实际的问题来。

闭 幕 词

……在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时，我们可能会产生哪些危险呢？

第一种危险，就是我们往往使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变成非常狭隘地去获得一些技巧，而不是使理论与实践真正地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常常发现倾向于狭隘手工业式的技术。我们常常发现这种情况。

在基斯洛沃德斯克城附近有一所儿童之家，它被称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校内有一间房子上挂着一个牌子：“针织工厂”，厂内有一些这所儿童之家的学生，他们用织针在织袜子，一个老太婆坐在那里告诉大家怎样织袜子。工厂的性质就是如此，没有一点技术的味道，——远古以前是怎样学织袜子的，现在还是用的同样的方法。再拿缝纫工厂来说，没有一台缝纫机。可是所有这些工厂都叫做“综合技术的”工厂，实际上是狭隘的手工业工厂。倾向于手工业——这是很大的危险。

甚至在中部地区，在兹纳明卡某地，有的学校自称是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小型工厂自称为综合技术工厂。首先也得打听一下，劳动教学是怎样与其它课程的教学联系的。这是一块试金石，利用这块试金石可以试验出是综合技术教育还是手工业，甚至还要糟糕些，只不过是胡乱摆弄摆弄工具而已。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明白，我们不只是研究劳动，我们的小型工厂不只是一个学习初步劳动技巧的地方，必须使小型工厂里的活动与生产有一种联系。如果在一个纺织工厂附近有一所七年制学校，而校内又有一个小型工厂的话，那就必须使这个小型工厂与纺织工厂的全部生产活动联系起来。问题不只是为了在纺织工厂设立一个综合技术教育化方面的司令部，而是要使这个小型工厂怎样与生产联系起来。小型工厂怎样订计划？通常，我们的计划总是订得很死板。不管是怎样的工厂——造纸厂、纺织厂，等等，总是要你去学习细木工、旋工、钳工的工作。诚然，每一个生产部门都需要旋工和钳工，但是所有这些活往往与生产劳动没有关系，只是为了练习才干一下，这样儿童就会对这些活感到非常苦恼。可是如果改变一

下做法，让儿童在学校里去做一些虽然很细小，却为企业所需要的工作，那么整个的性质就会改变。这也就是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不是一般地说劳动训练要与教育结合起来，他指的是生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怎样建立小型工厂才能使它与生产有机地联系起来。例如，试验原料和检查成品。在这方面可能有很多工作可以委托学校去做。又如设立小型装配工厂。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向美国学习学习。福特在他的学校小型工厂——他的这种学校小型工厂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设立了装配车间、翻砂车间——凡是能完整地说明机器的概念的东西以及学校小型工厂所做的东西，都不送入地下室藏起来，都不让儿童拿走，而供给工厂应用，在工厂里作价之后，作为工厂的出品。

我们当然不能因袭福特的劳动组织，因为在这种组织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工作，每个学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没有集体的工作。但是生活本身、生产本身促使福特去设立这种小型工厂，其中进行的劳动确实是生产劳动。

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这项任务绝非教育人民委员部单独能够完成的，要想完成这个任务，还得依靠工人的帮助，依靠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帮助。所以当大家责怪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拟出一份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大纲时，我一点也不介意，因为要想坐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一些与生产完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小型工厂的样本，那简直是荒诞的空想。而目前似乎工人已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我想，不久经济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关心这个问题的，而教育人民委员部也应向他们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工会学习，向集体农庄和公社学习，以便学会怎样帮助、真正地帮助拟订出一套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大纲。

我们要了解儿童的力量。我们往往只从热情出发去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不考虑儿童的力量。当我们看到集体农庄的儿

童从八岁开始经常从事非常繁重的工作时，我们还很高兴。在这里，需要《友好儿童》报和许多学校的协助，来弄清楚集体农庄的儿童劳动究竟具有什么性质。我说的是集体农庄，不是公社，因为公社的情况要好些。儿童劳动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对保护儿童劳动的问题重视不够，甚至学校有时竟然这样来安排儿童的劳动，就是让儿童无休止地去看守瓜田——这是一种最枯燥、最没有意思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使人不想劳动，而不能使人养成劳动习惯。

我们往往损伤儿童的力量，让他们做些力不任的工作，我们一点也不考虑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我们常常把用于成人的竞赛方式用到儿童身上，采用与成人完全一样的形式，而不考虑是否有什么别的形式适用于儿童。就拿穷苦人家的儿童来说，他们忙于家务，身体发育很慢。过去，常常看到工人很小(从10岁起)就在工厂做工，他们的身体很弱，智力也差。如果我们强迫我国的儿童在年龄很小时就从事繁重的劳动，要他们无条件地进行劳动竞赛等等，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就不是好的效果，而是坏的效果。在这里，我们要善于对待儿童，要爱惜儿童的力量，照顾到儿童的情况。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谈到了工厂工作的问题。我听说，有人想从五年级起，就是从12岁起，就把儿童送到工厂去劳动。当你提出抗议，把我们的法律规定指给他看时，他就说，并非工作4小时，而可能是在五天一周中工作一次，等等。

我们必须了解儿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参观、在工厂里干少部分工作——这是一回事，而经常从事现代技术所要求的繁重的工作，这又是一回事。如果您把儿童弄到传送带旁边去工作，在这里工作又是一点也不能休息的，那您就损伤了儿童的力量。

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甚至在学前期就放弃了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主张。我们要引起儿童广泛的兴趣，使他们获得技巧，要善于使儿童从年幼时起就获得技巧，并且学会从事集体劳动。

在有关劳动组织的问题中，很大一部分是集体劳动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儿童学会的不是一般的劳动，不是对劳动的爱好，而是集体劳动，有计划的、自觉的劳动。大家都知道，在我们面前还摆着许多重大的任务。我觉得，由目前的整个环境所造成的对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兴趣，说明综合技术教育化似乎已经走上轨道，因此当我们在第二届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上见面时，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来谈谈我们的成绩了。

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问题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弄清楚什么是综合技术教育，综合技术教育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恩格斯曾经在一个地方谈到，“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桎梏”的社会可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地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①

所以，工厂艺徒学校开始时应该研究它所从属的那一企业的生产工作(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要研究“母厂”的生产工作)。

开始时应熟悉企业的情况。要了解企业的目的方针(制造什么)，了解它加工制作的材料(用什么东西制造)，以及产品的制造过程(怎样制造)。

但是熟悉情况并不等于研究。要想研究制造过程，开始时应该把整个过程划分为几个组成部分(车间)，弄清车间制作的顺序，了解各个车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个车间所占的地位。然后必须根据同样的方法来全面地研究每一个车间；把整个生产过程划分为个别的过程，了解其间的顺序，但是在这里还必须研究各个过程的性质(是机械性的或是化学性的过程)。一定要给研究每一过程打下科学基础，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了解这种过程。

这里，重要的是要把各个车间的作用以及各个车间工作的性质加以比较。

其次，研究企业的动力基础也有极其重大的作用。要使学生

了解这一动力基础怎样影响着生产的速度，以及这种速度如何改变着生产本身的性质，这时，由于速度的关系，数量变成了质量。

再其次，必须在研究企业生产的基础上理解个别车间以及整个企业的劳动组织情况。

最后，要确定企业劳动的形式和劳动的性质。

从理论上对该生产部门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本企业的情况以及该生产部门的发展趋势。

对企业的研究应该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到各门课程里去。在物理课上，要特别详细地讲一讲与该企业各种机械过程有关的问题。要特别详细地研究该企业的动力基础。化学课应该科学地说明该生产部门里的各种过程。

数学课要能有助于学生从数学上理解生产的各个过程和劳动组织，提出许多统计数字并把在研究企业的过程中所说明的问题具体化。

绘画课也应与一定的组织联系起来。

工厂艺徒学校的小型工厂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它应该与研究该企业生产情况的研究室保持联系，这里应该有工厂生产过程图表、各车间生产过程图表、个别机器的模型、工厂的生产财务计划，等等。材料应该经常加以补充和研究。这个研究室应该接受全厂的监督，每个工人都要到这里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根据他的口述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的。

其次，应该设置学校小型工厂车间来检查原料和产品质量。这项工作对企业来说是很必要的；它应该具有生产的性质。儿童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工作得到提高。要设立的另一个车间，就是训练车间（要照顾儿童的年龄）。其次是研究机器构造的装配模型车间，还有化学实验车间。最后，在这四个车间的基础上，就是企业里各个车间循序进行的工作。小型工厂里应该设立一个相应的技术参考图书馆。

对本生产单位进行全面的检查，就可以找出检查企业的方法。

除了“母厂”的生产工作以外，还必须同样深入地研究一个跟学校协作的企业的情况。

这个企业的生产应该是另一个类型的。比如说，如果第一个企业是金属加工业，那么第二个企业就应该是具有较多的化学过程的企业(如造纸业)，或者是面包烤制业，等等。要把这两个企业的生产性质加以比较，还要把原料、操作体系、主要的车间加以比较。至于说到以后的生产部门，那么所需要研究的可能只是个别车间的工作或者是不同的动力基础的影响，等等。

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是从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过程和动力基础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特别重要的是研究生产过程的组织和劳动的组织。

附言：美国的职业学校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方法，可以检查出儿童对某些部门的知识掌握和理解的程度。这种方法就是让儿童说出：如果发生了某种情况，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应该广泛采用这种方法，特别是在综合技术教育方面。

这可以使儿童在任何情况下及时作出判断的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

例如，一个小型工厂如果停电了，那么会怎么样？如果在某个车间工作的只有粗工，那么这个车间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发明了某种机器，会有什么结果？等等。这种重要习题中包含的正确课题，可以大大促进儿童思想的发展。

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 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对文化教育 问题所发表的言论

列宁对国民教育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言论，至今还未汇编成册。目前只出版了他的载于全集第一版的有关国民教育的演讲和论文的集子。但是恰巧第一版中所收入的列宁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言论不太多，这些言论见于第二版。再者，出版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文集时也未作注解。然而，列宁的每一篇论文、每一篇演说是他在各该时期所写的论文和所作的演说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要想深刻了解这篇论文和演说，就得把它与一切有关的言论联系起来才行。注解就应该说明这种联系。此外，在列宁论述其它问题的演说和论文里，有很多顺便涉及文化、学校、教育、宣传鼓动等方面问题的言论。这些言论尚无一处把它汇集在一起，也没有和他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联系起来。这一工作应该尽快做好。^①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谈谈列宁全集前三卷的情况^②，这三卷书包括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这一整段工作时期。当时，一切公开的和公开的报刊都在大力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党纲已经订好，党的组织原则已经确定。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在这个时期关于国民教育问题的言论就特别重要。

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专门论述国民教育问题的论文并不

太多。

全集第一卷收入了《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这篇通俗短文^③，这是列宁为通俗报纸《工人事业报》（原拟在一个民意党的印刷所秘密出版）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未能见报，因为列宁和一部分同志在1895年被捕，而1896年夏天，负责印刷该报的秘密印刷所又在拉黑特被查封。《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所谈的是星期日学校的工作问题。1895年末，列宁为《萨马拉新闻》写了一篇文章《中学农庄与感化中学》^④（载该报1895年11月25日第254号，署名：克·士林），这篇文章是对尤沙柯夫所著《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一文（载《俄国财富》五月号）的分析。“中学农庄”只是该文的开头部分；由于作者被捕，续稿未能刊出。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所谈的是星期日学校的活动。列宁对星期日学校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参加我们社会民主小组的有许多女教师，她们在涅瓦河关卡之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有雅库波娃、克尔日扎诺夫斯卡雅、克利波维奇。列宁对我们全部的工作都很了解，他经常听学生谈起学校的情况。我有几个星期日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小组，他们经常跟他谈起学校的情形。列宁很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他知道我们打算通过学校宣传马克思的学说。我们通过学校了解到一些有关工厂里的制度以及工人生活情况的材料。后来这些材料都利用来写传单了。

1897年，列宁根据《中学农庄与感化中学》一文的基本思想写成了一篇独立的文章，即《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评谢·尼·尤沙柯夫著：《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1897年圣彼得堡版，全书序言8页，正文283页，定价1卢布50戈比）^⑤。这篇文章编入《列宁全集》第二卷。

这篇文章跟列宁这一时期的一本极其重要的著作，即秘密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⑥

一书有密切的联系。这本书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拟订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阐明了我们存在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活动的方式，无情地批判了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以及他们企图用微不足道的文化工作来暗中替换革命斗争的做法。

《什么是“人民之友”》共分三编，全系胶印版印刷，在搜查时被拿走了；后来花了很大功夫才在柏林档案中找到第1编和第3编，批评尤沙柯夫的第2编至今尚未找到。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最好的补充，它跟该书有着有机的联系。

除了《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之外，第二卷里没有任何别的有关国民教育的文章。

第三卷里也没有专门论述国民教育的文章，全卷谈的只有一个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⑦

因此，1893年到1900年这个时期，列宁只写了三篇专门论述国民教育问题的文章。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篇是《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谈谈这篇文章。

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这篇文章里，列宁首先谈到了等级学校和阶级学校之间的区别问题。列宁在摘引了尤沙柯夫的一些胡言乱语之后说：“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差别不在于法律上的特权，而在于实际的条件，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是以法律上的平等为前提的。等级和阶级的另一个差别，尤沙柯夫先生似乎也并没有忽视，他说：‘……我们……当时（即农奴制度废除以后）摒弃了……国家生活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同时也摒弃了具有等级限制的等级学校制度。目前资本主义过程的加深，与其说把俄罗斯民族分成了等级，不如说把它分成了经济阶级……’。这里也正确地指出了把欧洲和俄国历史上的等级区别开来的另一个特征，即等级属于农奴社会，阶级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⑧ 列宁在注解中

又说：“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只谈到阶级的时候，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非等级的阶级”。^⑨列宁摘引了尤沙柯夫的一些文句之后说：“所有这些都异常清楚地证明：尽管题目很大，尽管词句漂亮，但是尤沙柯夫先生根本不了解阶级学校的实质是什么。最可敬的民粹主义者先生，这个实质就是：教育的组织和受教育的机会对一切有产者来说都是同样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的实质就在有产者这三个字上面。因此说上面引证的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段话，在考虑到学校的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似乎‘根本谈不上制定一个国立中学的共同形式’，就完全是胡说。恰恰相反：阶级学校如果办得彻底，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残余，它必然要以学校的共同形式为前提。阶级社会的实质（因而也是阶级教育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完全平等，所有的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有产者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等级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属于一定的等级。阶级学校没有等级，只有公民。它对所有的学生只有一个要求：要求他们缴纳学费。阶级学校根本用不着把大纲分成富人的大纲和穷人的大纲两种，因为缴不起学费、教材费和整个学习时期膳宿费的人，阶级学校根本不让他受中等教育。阶级的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因为，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阶级学校对任何有钱读书的人都不加以限制……由于尤沙柯夫先生暴露出来的概念异常混乱，我们认为对他再做下面的补充解释也未必是多余的：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七、八年中的膳宿费要比学费高得多，而能缴纳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⑩

接着列宁写着，尤沙柯夫“不慎重地说”，似乎我们应该立刻就坚决地“抛弃了等级学校”，并且还引用了中学和实科中学等级成份的统计材料。列宁说：“不言而喻，我们决不是想说，阶级学

校代替等级学校的问题，改进阶级学校的问题，对于那些没有享用、也不可能享用中等学校的阶级来说，是无关紧要或无足轻重的问题。相反地，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阶级来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因为等级制度无论在生活中或在学校中对它们的压迫都特别沉重，因为阶级学校代替等级学校不过是俄国全盘欧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①

阶级学校与等级学校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报刊上很少谈到。很少有人了解上面摘引的列宁的言论。可是这些言论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性，因为我国现代的学校在实践中往往走上了等级学校的道路，而这是完全不允许的。由于我国的阶级还未彻底消灭，因此苏维埃学校仍然是并且也应该是阶级的，这一点列宁在1918年8月28日的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已经指出来了。^②全部问题在于学校在哪个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把学校变为反对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写道：“我们的学校是阶级的，但它绝对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列宁于1897年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说：“阶级学校决不以阶级限制为前提。”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884年“劳动解放社”拟订的纲领草案中，就已经包括这样一条，即必须实行“世俗的、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应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和学习用品”。这项“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和学习用品”的要求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添加了“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等字，而“教育”之前也添加了“普通的和职业的”等字。普及义务教育并未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但是已经消除了学校的阶级关门倾向^③。

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我党目前的党纲上，也谈到对17岁以下的全体男女儿童实施免费的和义务的普及教育，同时在引言部分阐述了要求这种普及性的意思：“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该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

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⑭学校在内容和方针上应该具有坚定的阶级性，但是不应有阶级的关门倾向。

尤沙柯夫在拟订农业中学(包括8岁到20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计划时，完全没有打算改变教育的阶级内容。他甚至准备不改变“已经规定的教学计划”，只准备把古代语改为现代语。根据他的计划，少数民族和宗教教徒不能享受全民中等教育的福利。尤沙柯夫为了尊重“欧洲大陆反对”男女“合校制的偏见”^⑮，准备保存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两种中学制度。列宁在指出了这点之后，就详尽地论述了尤沙柯夫的基本思想——计划用学生的劳动给中学作“抵偿”，因为中学同时要从事农业。

列宁说：“这里的确有正确的思想……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伟大的老空想家们(列宁指的是欧文。——克鲁普斯卡雅)提出来的，‘学生们’(马克思的。——克鲁普斯卡雅)也完全赞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从事工业劳动，认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坚决主张这种劳动必须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进行。”^⑯这并不是说，列宁同意任何年龄的儿童都可以在工厂工作。在他于1896年在监狱中所拟订的党纲草案中(第四部分第三条)，曾经写着：“由法律禁止做夜工。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做工。”(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

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这一条修改为：“禁止企业主使用学龄(未满16岁)的童工，少年(16岁—18岁)的工作时间限定为6小时。”^⑰这项条文要求保护16岁以前的儿童不受企业主的剥削，但这并不是一般地禁止儿童的生产劳动。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写着：“禁止使用未满16岁的儿童和少年做

工”，建议“完全解除幼年儿童的工作，并进一步缩短少年的工作日”，^⑩ 仅仅由于战争引起了严重的破坏，才临时允许用14岁到16岁的少年工人，同时工作日还限制为四小时。

指出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在儿童劳动方面我们发现很多过火的地方：让儿童从很小的时候（9岁左右）起就在企业工作。

接着，列宁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学校应该培养全体儿童无一例外地都参加生产劳动。“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我们的‘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应该规定体力劳动的义务是一个共同的原则，但这决不是为所有的人规定的，而只是为穷人规定的。”“因此义务生产劳动在我们的民粹主义者看来就不是人类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是为了付中学学费。就是这样。”^⑪ 列宁详细地分析了尤沙柯夫拟订的全部计划，指出这一计划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农奴制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实验，如此而已。富人进一种学校，穷人进另一种学校；有钱就缴学费，没有钱就做工。列宁曾经把尤沙柯夫的民粹派的乌托邦跟农奴制拥护者谢尔盖·沙拉波夫的实际活动相比较。沙拉波夫曾描写他整个夏季“几乎等于恢复农奴制度，当然，打嘴巴和在马棚里的肉刑除外”^⑫。

列宁同时还谈到，尤沙柯夫在自己的乌托邦中想保留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不仅现时学生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克鲁普斯卡雅）曾经写文章反对这种荒谬的观点，就是老空想家，甚至我们俄国伟大的空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克鲁普斯卡雅）也曾写文章反对这种观点。尤沙柯夫先生连这一点都不了解！”^⑬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非常现实。

《中学农庄和感化中学》一文（编入全集第一卷）简要地分析了

(这是一篇为报纸所写的文章)尤沙柯夫载于《俄国财富》上的这篇文章(以后编入尤沙柯夫的文集)。

在前三卷里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直接跟文化问题有关的思想。这个时期使列宁感兴趣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1.文化的发展受经济的发展的制约性，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2.资产阶级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3.知识分子问题。

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人的世界观。

小农经济把小农培养成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列宁在他所写的《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写于1897年)一文中举出了一些例子，引用了如恩格尔加尔德这种农村知名之主的材料。他说：“恩格尔加尔德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个人主义。他详细地表明了：我们的‘农民在财产问题上是最极端的私有者’(第62页，引自1885年版)，他们忍受不了‘大伙一起工作’，由于狭隘的个人的、利己的动机而仇视这种工作：在大伙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怕多作工’(第206页)。这种害怕多作工的情形，简直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可以说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例如，作者说：住在一个房间里因共同经济和亲戚关系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一些农妇，每个人只擦自己用过饭的那一小块桌面，或者每个人轮流为自己的婴儿挤牛奶(怕别人把牛奶藏起来)，单独给自己的婴儿煮粥(第323页)。恩格尔加尔德是这样详细地说明了这些特点，用这样多的例子证实了这些特点，以致根本不可能说这些事实是偶然发生的”^②。

列宁在《1894—1895年皮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写于1897年)中总结了调查材料，指出了家庭手工业对世界观和文化水平的影响。他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拥有20,000工人的将近9,000个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如此惊人的分散性和原始性：在这些生产者中，公有财产的事例只有几十个，3—5个小业主联合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10个！这种分散性也许成了可悲的、

经济上和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最可靠的保证，如果我们幸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一天天地摧毁着宗法式的手艺及其自给自足的小业主的地方局限性，一天天地破坏着细小的地方市场（它们支持着小生产），而代之以全国的和全世界的市场，迫使不只是什么加夫里亚塔村的生产者，而是全国甚至各国的生产者联合起来，使这种联合超出于只是业主和小业主的范围，向这些联合提出了比更便宜地购买木材和铁或更有利地出卖钉子和大车的问题更为广泛的问题”②。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揭示了小生产者的信仰根源。他指出：“零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麻、纺麻、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各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俗话，即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织厂老板；后者又依赖棉田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每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就不行。‘人人为自己’的俗话显然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没有存在的余地，他既不能作为天空的幻影，也不能作为人间的‘金犊’）。”②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的材料是列宁1896—1897年搜集的）一书中，也有几处说明文化建立在发展的工业的基础上的这一原理的地方。工场手工业（在家庭手工业中）的发展已经把文化水平提到一定的程度：“工业以及与社会其他部分的比较发达的商业交往，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及其文化程度；手工业工场中的工人已经瞧不起种地的农民了。大机器工业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使工业与农业完全分离，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创造了一个与旧式农民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居民阶级，它具有不同于旧式农民的另外的生活制度、另外的家庭关系以及更高的物质需要水平和精神需要水平。在小手工业及市场手工业中，我们始终

看到宗法关系及各种人身依附形式的残余，这些残余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环境下使劳动者的状况极端恶化，侮辱他们并使他们堕落。大机器工业把往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集中在一起，已经绝对不再与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的残余相妥协，并且以真正‘轻蔑的态度对待过去’。这种同陈腐的传统的分裂，是使调整生产及对生产的社会监督成为可能与必要的重要条件之一。”^②

城市的文化水平比农村的文化水平高。工业中心对促进居民的智力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写于1894年）中曾谈到这一点。

“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马克思主义。——克鲁普斯卡雅）指出了大工业资本带来的这一矛盾（城市比农村优越。——克鲁普斯卡雅）的进步方面。‘随着大城市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聚集起来的城市人口日益取得更大的优势，资本主义生产积蓄了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die geschichtliche Bewegungskraft der Gesellschaft）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跃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③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曾经引用弗拉基米尔省波克罗夫县的材料来证明这一事实。“‘木匠业给当地农民生活的整个结构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农民木匠渐渐地同农业生疏了，后来就完全抛开农业’。都市生活在木匠身上打下文化的印记：他们比周围农民要清洁得多，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智力发展程度’都与农民截然不同。”^④

“‘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县份和森林地区。……彼得堡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儿童们

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在科斯特罗与外出零工乡上，‘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找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识字的彼得堡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像在‘文化很低的’乡下那样厉害。”^⑳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更加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丘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甚的各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的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12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对父母如何热爱，对于父母的家庭如何依恋；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稀有的例外……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来。”^㉑

城市的文化水平在提高，农村依然没有文化。

列宁根据1894年至1895年在皮尔姆省进行手工业调查所得的材料指出：“就调查的材料看来，‘与农业的联系’对手工业者识字程度的影响异常显著……不经营农业的居民比经营农业的居民的识字程度高得多，并且在所有各个分类中，无论男女情况都是如此，毫无例外。”^㉒……“我们……可肯定……（1）与农业（指小农经济而言。——克鲁普斯卡雅）的联系保留了最落后的工业形式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3）阻碍了那些需求水平较低和识字程度远远落后于不经营农业者的居民的文化发展。”^㉓

列宁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条件的问题。

西方的消费要大些。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说：“为什么西方的消费较大呢？因为那里的文化高些。可是这种文化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是资本主义技术的发达，不是使人们彼此更加

接触并打破地方的中世纪式孤立性的商品经济和交换的增长，又是什么呢？（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例如法国在大革命前，当半中世纪式的农民尚未完全分裂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它的文化不是并不比我国的文化高吗？如果作者更仔细地考察俄国生活，那他就不能不看出例如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的农民的消费要比纯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消费大得多……‘人民之友’丝毫不注意这类‘小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由于文化或一般生活复杂化的缘故，他们甚至根本不去想想这种文化和这种复杂化的物质基础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②

经济决定文化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文化也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因素。结果辩证地变成了原因。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举例说明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商业资本（在抵押土地下出货货币，以及购买各种生产品等等）与工业资本（在雇用工人下进行商业性农业等等）像两条线一样交合在农民资产阶级手中。这两个资本形式哪一个将牺牲其它一个而发展，这要取决于四周的情况，取决于我国乡村中亚洲习俗的被排除程度与文化的普及程度。”（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③

文化水平也影响着剥削形式。

列宁说：“这样大量的农村小剥削者乃是一种可怕的势力，其所以可怕，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劳动者实行各个击破，牢牢地束缚他们，使他们毫无挣脱的希望；其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剥削在农村的愚昧的情况下（这是由于该体系所具有的低微劳动生产率和缺乏交往的现象而引起的），不仅是对劳动的掠夺，而且是农村中常有的亚洲式的对人格的侮辱。”（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④

社会环境的阶级性质确定着谁去利用“技术改良”。

“不懂得他为之抑制进步方案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的环境，不懂得在农民经济中确已看出的一切‘技术改良’都只不过是改善少

数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的资产阶级进步，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⑤

列宁特别详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农村的影响的问题。“工业从农业中抽走最有力、最强壮、最有知识的工人，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工业国如此，农业国也是如此；不仅西欧如此，美国 and 俄国也是如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文明的城市和野蛮的乡村的矛盾，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⑥

“城市资本主义竭力提供一切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技术，但是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仍旧像从前一样悲惨；城市资本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⑦

列宁也注意到资本主义不好的一面。他在评论1899年出版的考茨基著《土地问题》一书时说：“在现代社会中进步活动只能是减弱资本主义进展对于人民的有害作用，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增强人民进行集体自卫的能力。”^⑧

从列宁在1898年到1900年这段时期对文化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明白了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落后的原因。在经济备遭破坏的时期和恢复时期，还不能为发展文化创造物质的前提，只有改造时期才能创造这种物质前提来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自从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行，我国扫除文盲的工作才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才能够进行普及教育，这绝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使我们明白了必须提高文化水平（为了加速经济建设），加强工业中心对农村的影响；必须提高农村文化，这是资本主义没有做到的，却是苏维埃政权非常关心的。使我们明白了必须把整个文化工作与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尽量广泛地吸引群众来参加文化建设工作。

早在1894年，列宁就非常果敢地谈到了资产阶级文化和小市民文化，“资产阶级的对立者”（工人阶级）和这种文化彻底“分开”，

跟它势不两立。

这种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的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呢？

《人民园地上的新苗》(载于1879年之《祖国纪事》)一文的作者说：“……他们(指俄国资本家。——克鲁普斯卡雅)竭力模仿西欧资产阶级，订购书籍，学习。”列宁反驳作者说：“请看作者自己已不得不承认他刚才虚构出来的幻想是多么虚无缥缈，说我国的‘小市民文化’是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正是它给改革后的俄国带来了文明、‘学识’。”^⑳

列宁指出：“‘文化界’将仍旧兴致勃勃地在吃点和玩纸牌的间隙中谈论小弟弟，并编出一些‘改善’小弟弟生活的人道草案。”^㉑

这是一种什么草案呢？

列宁在论述了民粹派纲领的反动的一面之后说：“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当然也完全承认。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维和行动。”(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㉒

只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指一般民主措施——克鲁普斯卡雅)的提法应该和民粹派先生们的一贯提法有所不同。后者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出发提问题的，照他们说来，似乎这类改革的不能实现，没有什么深刻的、潜藏在生产关系本身中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情感粗暴方面的阻碍，如‘理智的光芒’微弱等等，似乎俄国是一块tabula rasa(净地)，现在只是需要在上面正确地规划正确的道路而已。”^㉓

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

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地、更深入地和进一步地实行这些条款。这些改革在俄国实行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朗。”^③“俄国生活中的社会对立”是什么？这是指的“阶级利益的对立”。上面的引文摘自《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它是为合法刊物写的，因此其中谈到“阶级利益的对立”时用的是暗示的办法。谈到阶级斗争时更得用一种“隐语”了。阶级斗争称为“阶级对抗理论”，工人阶级的要求称为“某些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表达”，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称为“运用”，工人称为“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秘密工作称为“看不见的工作”，拒绝为实现民主要求而斗争并且忽视这种要求称为“线被切断”，社会主义称为“理想”。

不仅沙皇的检查官，就连读者也很难猜出下面这段话的意思：

“如果按照阶级对抗理论提出这些问题〔为此当然需要‘重新观察’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而且只会被它们运用于实践当中（要这样‘运用’，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工作），这些答案就会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小天地’，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④

这段话用普通的话说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问题（为此就需要从这一观点来分析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就必须拟订一个纲领，这个纲领要能表达工人阶级的实际要求，应该组织工人阶级为之进行斗争（当然，为此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种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秘密的工作）。这个纲领不仅应该在知识分子中间讨论，

而且应该成为广大工人群众行动的指南，因为他们受专制制度的痛苦最深，实行社会主义和他们有切身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命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常悲惨）。

我不知道，检查官是否了解了这段写得非常含蓄的话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这段话的精神他们是懂的，刊载这篇署名克·士林文章的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1895年圣彼得堡版）被沙皇检查官焚毁了。

阶级斗争应该赋予整个文化工作以特别的色彩。文化工作不应该蜕化为一种脱离政治的文化工作，列宁曾经谈到这个问题。

列宁说：“‘人民之友’忘记了这种对抗（即阶级利益的对立。——克鲁普斯卡雅），丧失了任何敏感，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圣洁的俄罗斯，十足的资产者也是‘在民主主义掩盖下’隐藏着着的，所以他们（‘人民之友’。——克鲁普斯卡雅）现在是反动的（对无产阶级来说），因为他们抹杀对抗，不谈论斗争，而谈论调和的文化主义的活动。”^④（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

他接着说：“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思想已经腐朽到怎样的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衷主义，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纲领。”^④（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

给群众以知识

必须把知识、科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授予群众。列宁在彼得堡工作的时期，曾和他的整个小组一样，在工人小组中进行过工作。他把小组里一半的学习时间用去和工人谈他们工厂的工作情形和劳动等等情形，另一半时间则用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其他同志大致也是这样工作。我们在星期日夜校工作的小组的组员，如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尽量把初级课程的教学工

作跟向学生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联系起来。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和理论推广到群众中去！”在流放期间，我们小组帮助工人、流放时期的同志学习，和他们一起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等。当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尽力通过通俗小册子和传单来使群众接近理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尽量学习把文章写得浅显使工人易懂。在这段时期，列宁为工人写了许多小册子（如《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新工厂法》^④）。因此对于列宁在1897年8月18日写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的这一地方就很容易理解了：“您和他（指普列汉诺夫——克鲁普斯卡雅）对我的习作（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们写作。”^⑤当时为工人出版通俗书籍、通俗杂志的重要性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曾经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决不是仅仅指这类读者（工人）而言，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对资产阶级科学家方面的公正态度和科学批评不能有多大指望，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这一点作了非常肯定的说明。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大众中间所迅速得到的理解，对我的劳动是最好的奖赏。站在资产阶级观点上观察经济问题的迈耶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道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他说被视为德国人的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索能力（*der grosse theoretische Sinn*），在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间已经完全消失，而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却在复活起来’。”在另一个地方说：“……我们这位作者（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克鲁普斯卡雅）为了根本打破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拼命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字典中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又是科学，又是只值几文钱的小得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显然，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

行争取本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抹杀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着重点是我加的——克鲁普斯卡雅），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一些使俗人都觉得难堪的便宜小册子叙述这个科学，这些人的自信心是多么没有根据呵。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俗人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愿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而自己进行斗争就行了！”^⑧

关于知识分子

特别有意思的是列宁这几年写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现在（1930年12月）我们正在处理“工业党”的案件^⑨，它非常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幕，这些知识分子投靠资产阶级，并且在资产阶级已被剥夺政权十多年的国家里继续为资产阶级服务。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说：“‘知识分子’的成份，也和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的成份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增加的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欲望的‘知识分子’，……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自由派的和激进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进步、科学、真理、人民等等，他们喜欢追忆60年代的情形，说当时没有争执、消沉、灰心和冷淡，大家的心都热衷于民主主义。”^⑩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

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幻想，以为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②

可见，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已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工人阶级（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阶级）的斗争，他才能成为一股力量，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有一次在西伯利亚和列宁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提起涅克拉索夫，谈到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不牢固的小划子系在大船的船尾上”，即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才能成为一股力量。

列宁在他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也谈到无等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当俄国的等级制度在1861年遭到坚决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具有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为实行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是与资产阶级观点不相容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农民中开始了分化的时候，民粹派的知识分子就在自己的言论中反映了小农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把列宁有关的一段话引证在下面。

“如果……一切社会集团所以是现实的力量，只是因为……它们和社会各个阶级一致或是依附于它们，那么很明显，‘无等级知识分子’就不是‘现实的社会力量’。就抽象的理论意义来说，作者当然是对的。他可以说抓住了民粹派的词句。你们说知识分子应该把俄国引上‘另外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了解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你们吹嘘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向来以思想‘纯洁’著称，——其实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始终没有力量。作者的批评只是把民粹派的知识分子万能的荒谬思想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在经济过程中没有力量’的十分正确的思想做个对比。但这样对比是不够的。要判断俄国‘无等级知识分子’是俄国

社会中标志着改革后整个时代(贵族被平民知识分子最后排挤出去的时代)和无疑起了并继续起着一定历史作用的特殊集团,就必须把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纲领同俄国社会现有各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做个对比。……俄国先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等级性’丝毫不能抹去知识分子思想的阶级根源。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主义都是为了无等级性,我国无等级知识分子反对旧贵族制度即等级制度也是为了这个。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过时的等级束缚和其他中世纪制度都是为了全体‘人民’(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当时还不够尖锐),无论在西方或在俄国,资产阶级都是对的,因为它所批评的制度的确束缚了所有的人。一当俄国的等级制度遭到坚决的打击(1861年),‘人民’内部的对抗就立刻暴露出来,无等级知识分子内部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即农民思想家(俄国直接生产者的第一批思想家没有看见而且不可能看见农民内部对立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对抗也随之而暴露出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俄国社会中的社会对立更加充分暴露,迫使人们承认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事实。民粹主义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分开,几乎完全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⑤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写于1897年)中详细地论述了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开明分子，一般‘知识界’，不能不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

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制宗教中间的民主主义分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所有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团结性深刻得多，坚强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政治压迫最厉害地打击到无产阶级身上，而不容对这个阶级作丝毫让步，因为这个阶级既没有接近最高政权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④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将要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其中工人知识分子开始占有很大的地位。列宁在1899年末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中曾谈到这种知识分子。我现在把有关的一段话引证如下：

“正当知识界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断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很坏，在工厂中从事着摧残智力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的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使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⑤

列宁在1899年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还指出了一种知识分子，即农村教师：“其次，也不应该忘记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如军校教师。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人民没有权利和受压迫的情形，所以他们普遍同情社会民主主义（在运动进一步开展的情况下）是毫无疑问的。”^⑥

列宁在1894年到1900年这段时期对“知识分子”所作的评价，

至今还具有现实的意义。现在，由于“工业党”案件的发生，每一个“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和将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哪一个政党联系在一起：同垂死的资产阶级呢还是同工人阶级呢。生活使一切问题都明确起来了。“工业党”案件揭露了投靠大资产阶级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面貌。康德拉基也夫案件揭露了把自己的命运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命运、同富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现在，政府和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干部上，放在使他们获得必要的知识上。这种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跟工人阶级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目前整个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使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如何借助于这些知识把资产阶级的文化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

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①速记

记录汇编前言

综合技术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一国际讨论过综合技术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撰文论述过综合技术教育，我党党纲也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教育人民委员部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这个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外，却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问题——生产者不关心这个问题，工人群众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可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是离不了他们的。忽视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缺少开展综合技术教育的客观前提条件。综合技术教育要有一定的基础，即大工业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综合技术教育只能在大企业附设的学校进行，而不能在农村进行。这里的问题在于全国的态度如何，在于一般的工作方法，在于是否善于利用每一台拖拉机、每一部机器来为综合技术教育化服务。

连年的战祸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大工业的凋蔽，凡此种种，无不使综合技术教育化遭到破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工业的飞速发展目前已为它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无论对综合技术教育化来说，还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大工业的发展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并非唯一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大工业无条件地把教育推上这条道路，但是综合技术教育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不可能把工人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培养成生产的真正主人，而不过是

培养成简单的执行者，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就妨碍了综合技术化的发展；资本主义阉割了综合技术教育的社会主义本质。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使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的内在矛盾之一。

列宁说过，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全部东西^②。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是发展现代大工业的重大因素，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部分即整个国民教育工作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全部条件……

无论从政治的观点看，还是从生产的观点看，召开第一次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都是必要的。这次大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会议大厅容纳不了来自各地的全体代表。会议没有书生气。代表中间，有许多人是先进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代表、经济机构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大家在讨论各种问题时热情高涨，表现了对工作的极大关心。

这次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闭幕已经几个月了。这段时期的情况表明，综合技术教育化已广泛深入到生活之中。企业附设七年制工厂学校^③和国营农场附设青年农民学校^④起了特殊的作用。

目前迫切需要劳动力，加之工人群众社会主义劳动的自觉性大大增强，这就为苏维埃国家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我们将努力以赴，毫不懈怠。

儿童读物是进行社会主义 教育的强大武器

儿童读物是有力的教育武器。童年的种种印象往往特别深刻，令人终生难忘。我们经常谈到环境的影响，社会的影响，谈到必须考虑这些影响，把它引向正轨，同时要清除其中的某些影响。可是我们却很少关心儿童读物。同时，我国儿童读书甚少，其原因不是他们不喜欢读书——孩子们把图书馆的大门都挤坏了，可是儿童读物却有如凤毛麟角。儿童读物少得可怜，白天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而儿童读物的质量更是不堪一提。要知道，儿童读物乃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最强大的武器。同时也不应忘记，这种读物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学习质量。如果我们把那些阅读课外书籍很多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与那些除了教科书别的什么书也不读的学习成绩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文化水平有很大差距。经常阅读课外书籍的孩子能独立学习书本知识，能较好地把握书中的内容，并能从中找到使他们感兴趣的各種问题的答案。年轻一代对图书的需要，并不亚于对学校的需要。

最为重要的是儿童读物的内容。这种内容应该很有意义。现在我们很多书籍内容贫乏空洞。很多儿童作家不善于把新的内容注入儿童读物，因而他们往往阉割了儿童读物的一切内容。

儿童读物应该具有共产主义的内容。这绝不是说，儿童读物

只应该复述党纲和党代会的决议，而是要告诉他们一些有助于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的知识概念和生动形象。许多人对儿童毫无了解，他们认为，如果图书和教材不写成决议那样，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内容了。举例来说，不久前展开了这样一场争论：是否应该向7—8岁的孩子讲授有关剥削的概念？乍看起来，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争论之处。如果不懂得什么叫剥削，那就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那就不懂得为什么工人群众如此仇恨资本家，广大的农民群众如此仇恨地主；也不会懂得为什么苏维埃国家没有富农容身之地。但是……有些共产党员却不去向孩子们讲清剥削的实质，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我们都在搞社会主义了，干吗还去讲什么叫剥削？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事实的确如此。这场争论生动地说明了出版儿童共产主义书籍之困难。

我们要通过儿童读物给年轻一代打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这是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也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任务。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儿童作家在向儿童介绍某些事物和事件时，就必须生动具体、十分连贯，善于用儿童懂得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做出恰当的评价并指出这些事件与周围现实的联系。换句话说，撰写儿童读物也像做其他通俗化工作一样，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上述一切也都适用于描写当代的事件。不要粉饰现实——孩子们非常讨厌弄虚作假，但是要帮助孩子们认清现实，影响现实。共产主义的儿童读物要能鼓舞儿童去进行斗争、从事建设，养成他们相应的志趣，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组织工作。

对那些散布异己思想的儿童读物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是不言而喻的。娃娃们缺乏生活经验，他们对异己思想毫无分辨能力，因为这种思想往往是通过伪装的形式、用动人感情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这绝不是说，凡是非党作家的作品都要扔入火炉、付之一炬。要善于选择，要给许多儿童书籍写前言，并且提供一些补助性的现实材料。

儿童读物不一定是小说。我们特别需要一些务实的儿童书籍。这个问题目前争论很大。我们需要共产主义的儿童百科全书，需要综合技术教育的儿童百科全书，需要儿童农业百科全书、儿童游戏百科全书，等等。

与内容有关的还有插图。插图也应该有意义而不能空空洞洞。插图不应歪曲现实，而要比比较确切的反映现实，丰富现实，要能激起一种十分明确思想和感情。

除了内容问题之外，装帧问题也很重要。儿童读物要写得浅显能使儿童感到易懂，不要用一些遁辞饰语，弄得晦涩难解；不要让一些细节充斥全书，而要突出中心思想。要在运动中、行动中、相互联系中描述一切。如果读物是小说，那么它的情节应使儿童感到亲切有趣，能鼓舞他们，吸引他们。这里必须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经验。同样一件事情，对学龄前儿童的讲法与对小学生、少年儿童的讲法就不一样；对城市儿童是一个讲法，对农村儿童又是另一种讲法。他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各不相同。但是不管对哪一年龄阶段的儿童，读物都不能歪曲现实，讲一些谬误的东西。对于这种书籍说来，艺术性不仅不能减轻坏处，反而要扩大坏处。艺术手法高超的神秘主义读物，要比枯燥无味的同类读物有害十倍。但是，如果方向正确的读物写得很有艺术特色，那它的作用就会提高百倍。阶级敌人经常利用艺术手法以售其奸。我国的儿童作家应该学会写得很有特色，使儿童感到明白易懂。要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儿童是如何领会某些读物的内容的。不要泛泛地讲全体儿童，而是要弄清楚：工人的孩子、中农的孩子、贫农的孩子对同一事物是如何理解的。要用阶级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阅读兴趣。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会怎样为儿童写作了。

要培养儿童作家队伍。要吸引工人、集体农民出身的年轻作家从事儿童读物的创作。要对他们认真加以培养、提拔。

现在需要特别关心儿童读物。去年，国家出版社在儿童读物出版工作方面无疑有了进步。在出版少年业务书籍方面的进步更

为突出。现在已经出版了不少图书，主题重大，浅显易懂，饶有兴味，装帧美观（例如：伊林所著《伟大的计划》^①；奥列格·施瓦尔茨所著《集会》；比斯库诺夫所著《巨人》，等等），但是遗憾的是，同时也出版了不少内容贫乏的次品，其发行量与新型的业务书籍不相上下。小说方面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供农村阅读的小说奇缺。有些读物乍看起来是极为革命的，可是细读之下却发现有很多实难容许的东西。仅举戈留诺夫所著《列宁同志》一书为例。书中描写一个有流氓习气的小伙子梦见了列宁，列宁如何开导他按时上学，并且不要欺侮贫农的孩子。

我们必须加强对儿童图书战线的关心。我国青年的成长不是以日计算，而是以时计算的。青年一代肩负重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就得用必要的知识和必要的信念来武装我们的下一代。要为少年儿童提供我们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图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工作。

论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①

国民经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是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的耕种方法和作物栽培方法去代替落后的、原始的方法。占地广阔并且使用机器耕种的大型农场是非常优越的，所以它能代替个体的小农，正如大型工厂代替手工业式的家庭劳动一样。大型农场、工厂要求对人数众多的集体进行有计划地组织。现代工厂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进行这种组织的明晰图景。整个的生产过程分为许多生产环节(工厂的车间)，每一个环节都根据自己的设备而需要特殊地挑选人才，需要这些人才受过特殊的训练、具有特殊的素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大生产尽量在作坊内进行分工，把每一生产过程分为若干构成要素。为了完成生产过程中的个别部分的工作，已经不需要具有专门的职业素养。把生产过程分为若干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科学。科学的工艺学对各个生产过程都运用科学材料，这就使这些问题得到统一，经常改变其形态。“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②。他接着说：“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

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③接着马克思谈到必须培养“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的人”^④。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如果能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前提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了未来教育，这种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⑥

国民经济的改造，大型农场的建立，都要求重新组织劳动、有计划地进行分工，都需要全面发展的、能适应经常变化的劳动形式的工人。一切与工厂劳动有关的东西亦将日益与农业劳动有关。

改造时期的任务是提高社会生产并且改造现代社会。在改造时期，党、苏维埃政权及其各级组织一定会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指示非常重视新一代的教育工作。

还必须注意，马克思是把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与普及教育的问题以及体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在普及教育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必须实现义务教育，必须同父母和亲属剥削儿童的现象进行斗争，并且要采取许多措施来创造一些现实的条件使义务教育得以实行。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在城市和农村发展七年制学校。

马克思提出要把生产劳动与体操，亦即与体育发展结合起来时，强调指出国家必须关怀新一代的健康。如果不在组织儿童集体伙食方面采取许多措施，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经济破坏和饥馑的年代也影响了新一代。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新一代身体瘦弱的现象。我们对儿童的体育问题研究得很不够，可是体育对于增强新一代的体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培养出身强体壮的一代人，在进行儿童集体劳动的时候，一定要

特别注意根据年龄来决定劳动的份量，要特别照顾体弱的儿童，要注意预防任何使儿童疲劳的现象产生，因为疲劳过度对儿童的健康和学习都会产生有害影响。

在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右倾现象，表现为对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的意义估计不够，表现为对待这一重大问题采取消极的态度；还有一种“左”倾现象，就是由于轻视保护儿童的法律以及没有充分地把儿童劳动与提高学习和健康水平联系在一起，因而使广大群众对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产生了反感。

七年制学校的教学大纲必须根据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情况而作很大的改变。从低年级开始，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就应该在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体操应该成为每天工作的组成部分。当然，少年儿童的体操在性质上应该与一般的体操不同，其中游戏的、定向的、劳动的因素应该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塑造、绘画、制图、模型制造可以巩固形象思维和视觉记忆，它在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它应该在学校里占据完全不同的位置。

要特别注意在各个年级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解组织劳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的改造中，集体劳动的组织问题起着重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苏维埃的劳动学校对这一问题置之不理的话，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这个问题应该与统计、计划、组织劳动的问题非常密切地联系起来。

讲解这个新的领域的知识——组织劳动的问题——应该与安排整个校内和校外作息时间密切地联系起来，并且从根本上重新解决儿童自我管理的问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⑦。在我国学校里，还没有给这种教学工作以适当的位置。我们目前还只是研究科学工艺学的某些要素，因为物理学和化学课程中包括这些

材料。但是，科学的工艺学要求我们研究物理学和化学时，要比我们在一般的物理学课和化学课上更加密切地、有系统地与生产联系起来。我们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马克思还谈到必须讲解农艺学。改造时期的特点是使城乡生产接近起来，这就非常有必要在各个学校(包括工厂艺徒学校^⑧在内)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讲解农艺学。

讲解科学的工艺学和农艺学可以确定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劳动性质。一定要竭尽全力去消除学校小型工厂的那种狭隘训练的手工业性质，把学校小型工厂改造成成为研究材料及其制作方式的劳动实验室。

与此同时，学校小型工厂还应该组织儿童的校内和校外生产劳动。

每个班级的儿童的生产劳动都应该具有各自的一定面貌，要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经验，并要易于统计。

把生产劳动与学习结合起来，把具体的生产劳动与综合技术劳动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只有许多实际任务解决后，这个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

学校应该对它所从属的那一企业进行特别深入的研究。企业方面应该尽力予以协助。但是这种研究在工厂艺徒学校里不应变成职业训练，变成给该企业培养劳动力的手段，而只能作为更深入地研究任何生产部门的出发点。训练因素在职业训练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在综合技术教育中只应起一个辅助作用……

在研究企业工作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其它一些劳动形式，如：工农通讯员工作，教学活动，合作事业，统计工作，等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求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

更重要的是把工业劳动和各种农业劳动(园艺、养鸡、栽种亚麻、播种牧草，等等)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把各种形式的活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

正确地选择职业可以最合理地运用每一个人的力量。因此学校应该协助这件事情，对预先确定选择什么职业进行一些辅导工作……

考虑儿童的能力及其协调的发展情况，从教育上消除个别儿童在兴趣和发展上的单一性，考虑到专业才干并且满足由这种才干而产生的各种要求——这就是苏联少年儿童应用心理学所走的道路。

正确地选择职业会使人对工作非常满意，并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不能再拖延了。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有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必须立即组织经常的训练班，从各种职业的工人中培养一些进行综合技术劳动的指导员。但这只是一部分工作。发动工人参加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成人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化。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虽然它的迫切程度并不次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是需要根据年龄来确定的。整个成人教育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和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应该密切地联系起来，并且应该尽快加以解决。

提高学校工作质量

(在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①)

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为普及教育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学校的数量而斗争，不仅是要让全体儿童都能上学念书，而且还是为了使教育和教学具有一定的质量。对我们说来，为提高学校的质量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学校是社会主义学校，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学校，因此，评价我国学校质量的尺度，应该是看这个学校的方针、全校的教育和教学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所社会主义学校。这种学校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一条战线。列宁说过，不仅要铲除剥削制度的莠草，而且要翻耕土地，使它不能再生长出任何富农、资本家，不能再生长出任何剥削制度来^②。他一向认为，在翻耕土地方面，在按照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生活方面，学校的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读到他在这方面的谈话时，就会发现他所讲的许多话我们一直未能做到。我们现在正处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期，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正迈着巨大的步伐向前进。我们知道，我国在工业化方面，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这块土地上已生长出劳动人民高度的自觉性。新的社会主义学校在全国各地充分发展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种学校的特点是：它具有并且应该具有综合技术教育性质。列宁说过，社会主义需要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即大型现代化工业这样一些前提条件^③。同样，我国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充分发展，也必须具备两个前

提条件：苏维埃政权以及列宁用“电气化”一词表示的现代化大工业。我们发现，这两个前提条件现已具备，因而，目前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基础是劳动。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信奉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我们深知技术的重大意义，深知技术和劳动组织的决定性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劳动当作我国学校全部工作的重点，不过这种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我至今记得，1919年我在喀山与几位教师谈话时，他们对我说：“我们在校内教学生要爱干活。”“爱干活”是一个旧词，我们现在不是教学生要爱干活，我们是教他们以自觉的社会主义态度对待劳动，教他们善于工作，善于在任何条件下工作。由此可见，作为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基础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发展中的当代劳动。我们创办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同时我们把劳动摆在一切中介和各种联系中去认识。一方面，我们把这种劳动与掌握各种自然力、与科学工作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我们把我国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劳动与社会发展、与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我们的整个生活联系起来。这样理解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就不是一种手工劳动，不是学习各种生产，而是与其他一切联系、与其他各种中介摆在一起，这种综合技术教育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存在其自身的矛盾。工业的发展需要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工业所需要的不仅是自觉的执行任务，而且还需要自觉的工作人员，这种工作人员要能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况，而由于科学的进步，现代技术经常出现这种变化。

这就是工业提出的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各国的整个制度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因为工人一旦有了自觉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也就到了。这是使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诸种内在矛盾之一。

我们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学校办成单纯的劳动学校，而要办成社会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列宁在十年前指出，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④。他指出了当时在生产领域、工业领域所业已具备的许多条件，足以使我国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一转眼，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如果我们看一看目前的情况，就会发现，列宁在这方面的指示还远未实现。

教育界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在工业落后的农村和民族地区，是否可以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呢？是否只能在大型的先进工厂才能开办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在落后的地区却做不到这一点呢？

只要看一下我国工业化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个工业化运动不仅涉及某些工厂，而且席卷全国。改造时期的特点在于，手工劳动为机械化劳动即机器劳动所代替，然而这种改造却不只是在在大工厂进行的，它也在最落后的生产部门进行，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在日常生活和家务劳动中进行，这种手工劳动为机器劳动、机械化劳动所取代的情况堪称为改造时期的一大特点。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在穷乡僻壤都随处可见。

现在，农民们对拖拉机特别关心，拖拉机已成了改造广大劳动群众世界观的强大动力，可以充分说明这方面的情况。我国的改造有些什么特点呢？建立了大型的电力基地。列宁曾说，要把每个电站变成一个宣传站，围绕这个宣传站开展大量的工作^⑤。我们现在对电站还未充分加以利用，而我们是能够这样做的，并且将逐年越来越广泛加以利用。那些还未利用电站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内燃机，利用拖拉机，利用汽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告诉儿童许多东西，使他们了解我国现已具备的基本力量。

祖传的耕种方法已成历史陈迹。与几年前相比，科学的组织和科学的生产态度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我国学校也应采取同样的科学态度。我们所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应该具有更大的科学性。我们应教儿童从低年级起就学会观察，做出一定的结论，对所见到的每一种现象采取研究的态度。同志们，这是很有特点的。再就是根据新的原则组织劳动并使劳动集体化。工农检查人民委

员部^⑤已下达命令，要学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组织劳动的教学。这件事是应该做的，而我们却做得很不够或者说根本没有做。小农经济为大农业所取代，其好处可以通过实例来说明，不仅用大城市的例子，而且也用农村的例子。在农村，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农村极其落后，那儿能更清楚地看到拖拉机的作用，看到大生产的优越性。集体化创造了组织劳动的新形式，因而它的意义十分明显。

改造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济的计划性。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使我国儿童了解这种计划性。当我们去了解我国学校的工作质量时，我们要看看它对上述方面研究得怎样，这项工作是否深入，是否安排得当。建立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不能只靠教师。这一点党纲中说得很清楚。党纲指出必须吸引居民，首先是吸引工人群众。党纲根据列宁的提议，增加了必须建立国民教育委员会^⑦的条款。我们有教育委员会^⑧，家长委员会，不过我们还需要建立这样一种委员会，参加者不仅有家长，而且还有工人、集体农民、党员、共青团员、突击队员等先进阶层的人物。

不久前，我们实行把学校附设在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拖站^⑨。这在加强工人、劳动人民与学校的联系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拿莫斯科作例子，情况如何呢？我曾经参加过列宁区的一次代表会议^⑩。同志们纷纷祝贺代表大会的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区各工厂的代表。不是个别的代表，而是一大批代表在热情地讨论如何办好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还要在工人中间，在广大集体农民中间广泛宣传综合技术教育化，让他们明白什么叫综合技术教育化，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还远未弄明白。这种宣传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列宁说过，应该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他说得非常清楚明确：“避免过早地专业化。”^⑪可我们是怎样做的呢？拿列宁格勒来说，从统计材料上看，一些完全是按七年制范围进行学习的儿童，把

他们从六、七年级挑选出来，动员他们到工厂艺徒学校^②学习，也就是说，这就降低了工厂艺徒学校的意义，使儿童不能预先受到综合技术训练，而这种训练是应该先于工厂艺徒学校的。诚然，每个人都在为综合技术教育化而努力，但是应该知道，工厂艺徒学校毕竟是职业学校，那里已有某种程度的专业化。我们应该避免过早地专业化，我们应该把七年制工厂学校^③当作进行一般综合技术训练的基地加以发展。每一个少年工人，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在他确定将来要从事何种专业之前，都应该到七年制工厂学校这种学校学习。只是把七年制工厂学校附设于企业，这还不能保证工作的进行。

人们常常把综合技术教育的概念缩得很小，仅仅归结为劳动教学，而不是在综合技术教育这一概念的各种中介中来理解它。当然，自觉对待劳动的工人突击手、党员工人、团员工人，他们对此事是很关心的，他们深知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意义，但我们学校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广大的劳动群众对综合技术教育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这里还必须指出列宁的一段讲话。他曾强调指出，必须把整个生产宣传，把在成年工人中进行的职业教育工作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联系起来^④。如果我们把成年工人的教学工作与综合技术教育联系起来，那我们就使这项工作具有了这样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在学校建设中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一谈。

乌拉尔一位女工写信给我谈扫盲问题。她在信上说，目前工人们正奋力完成工业财务计划，他们完全投身到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中去了，因此，如果目前的识字教学不与他们当前关心的工作联系起来，那么谁也不会去参加扫盲学习的。必须把扫盲工作与培养自觉的劳动态度，与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联系起来，与完成工业财务计划联系起来。

这位女工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扫盲工作必须面向生产，不仅要面向生产，重要的是要把这项工作与综合技术教

育联系起来。目前很多工厂为新投入生产的工人开设的《生产导论》课，也应该体现综合技术教育的性质；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具备他们所必须的综合技术眼界。我们的整个政治教育工作也必须体现综合技术教育的精神，因为这是当代生产的要求，这是当前改革的要求，而我们在这方面是极其落后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对提高普及教育的质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在工人中进行的综合技术教育宣传，从口头到实际都做了一些，而在集体农民中，这项工作却搞得不大好。我们必须认真开展农村的综合技术教育宣传工作。

列宁讲过，必须动员全体工程师、农艺师、全体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来做关于电力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讲演，以指导综合技术教育工作，指导参观实习工作，从而扩大综合技术眼界^⑥。这番话是十年前说的，然而这项工作我们至今还“无声无息”。当然，列宁格勒的同志在会上也谈到了《劳动旗帜》工厂在综合技术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讲到他们已动员了一部分工程师从事这项工作。我不知道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会讲些什么情况，不知道他们的动员工作做得如何。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疏漏：我国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工业院校、农业院校等）的大纲没有列入“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化”课程，而这门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工程师、农艺师、教师如果不学会在农村工作，不会帮助广大群众具备和扩大综合技术眼界，那他就不是一个苏维埃教师，不是一个苏维埃农艺师，不是一个苏维埃工程师……

每一个苏维埃工程师、农艺师和专家都必须彻底弄明白什么叫综合技术教育，这样我们才不会出现狭隘的手工教育和多种手工教育的偏向，就不会出现屡见不鲜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就不会把综合技术教育化归结为狭隘的技巧教学。所有这些偏向都会得到纠正。但是不仅要在工程师和农艺师中间，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我们都应把综合技术教育的宣传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

我们现在已把学校附属于企业，但各个企业是否都成立了由自愿者组成的支援学校的委员会呢？我们已经有了促进委员会^⑧，但这种委员会主要是由家长组成的，而我们要使在这种委员会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工人。因此，应该在企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设置委员会，让这些委员会深入研究教学大纲，研究学校工作方法，使企业对学校的帮助不限于物质方面。当然，物质帮助是极为重要的，但这种帮助往往是这样进行的：“我不要的都给你”。机器坏了，那就送给学校。生产部门的各种废旧物品一概送往学校。不能这样去帮助学校。对学校的物质帮助应该采取极其认真的态度。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应该懂得这一点。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工人都应透彻了解教学大纲。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诚然，这种情况还不多）：工人和集体农民“逐字逐句”研究教学大纲，然后决定何处应该修改。要让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国的教学大纲符合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要求。

我国学校对自治问题处理得很不好，它是我国学校的一个薄弱环节。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其他各国（法国、英国、德国）的自治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诸国的学校自治都是国家体制的翻版。而民主国家的学校自治有着自己的特点。例如，美国的作法是这样的：那里的自治反映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全部虚假和伪善。我国学校的自治要能反映苏联国家组织的特点。我国各级苏维埃有发言权的是谁呢？劳动人民。我国最近几年的选举都注意到把一些对生产最自觉的突击手推举到各级苏维埃去。所以，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学校组织应该按照苏维埃组织的原则来建立。我国学校的学生都是劳动人民子弟，全体儿童都有权实行自治。自治工作主要的是组织生活和劳动，组织与这种劳动密切联系的学习。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但很不够。我国的学校自治往往有些像沙皇时代一些优秀学校的自治。我国的学校组织往往缺乏一种真正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精神。为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

而斗争，就是为儿童参加生产、参加生产劳动而斗争。我国儿童是欢迎这样做的，只不过需要帮助他们找到必要的形式。

我国目前盛行儿童工作队。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很明确的工作和组织形式，可以让儿童从事生动有趣的工作。这种五至七人组成的工作队要提出工作的目的，并让孩子们加以讨论：我们的工作（生产活动或社会公益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要让孩子们讨论达到这一目的的整套办法：应该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应该在何处学习，学些什么。然后，就是让他们分工，使整个工作的完成成为集体劳动的结果。我们首先要制定工作队工作计划，小组工作计划（小组比较容易开展活动，也易于儿童们组织起来）。每个学生、每个工作队要从事各种类型的工作。决不能（而我们却往往这样做）把一些水平最高的孩子组成一个工作队，将主要的社会工作交给他们，而对其余的孩子则听之任之。我们现在过于沉醉于工作队这种形式，以至常常想用它来取代年级、班级等较大的集体。我们要使学校建立一些较大的集体，让各个工作队都结成一个共同的组织。所以在组织年级和班级时，就要使它成为一个与劳动组织有关的真正的社会组织，要认真考虑到使年级（班级）与工作队的工作联系起来，使工作队的工作限于一定的范围，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班级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要通过工作队的工作教儿童掌握组织的技能，但不要停留在工作队工作上，还要组织劳动，使这种组织工作与整个年级的工作联系起来。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锻炼，需要的是从理论上对全部工作进行说明，需要的是用知识武装儿童。我们要让儿童充满社会主义精神，渴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战士；我们要使学校为集体化、为自觉地对劳动而努力奋争；我们要使学校成为一个战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的战线上自觉地进行斗争。这种任务不能按工作队分配，而要集中到一个较大的团体——年级、班级去完成。可能要把教室划得很小，从令人发闷的教室走向广阔的活动场所，然而，班级作为一个集体却是我们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取消，而只能加强的。要教学生学会比现在更好地组织班级、年级的工作。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班上选出几个领导人物，这几个领导人物管理全班事务，其作法恰如资产阶级学校一样。我们应使班执行委员会能经常受到监督，可以改选，让孩子们学会组织工作，学会监督工作，而不只是宣读工作报告。当然，现在孩子们已开始自觉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懂得应该对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报告，这是可喜的，不过还要更深入一些。组织儿童的问题是一项基本任务，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以及学校工作中其他许多极重要问题的解决，都无不取决于它。

举例来说，各民族儿童的团结问题。有时收到远东地区孩子们的来信，发现他们对别的民族的儿童关心的事情全然无知。例如，俄罗斯族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写道：“我们将要帮助附近比较落后的民族的小朋友。”在他们眼里，别的民族的小朋友都是落后民族的儿童，可是，如果他们看一看，这些“落后”民族的儿童往往比我们的孩子更会工作，那他们就会改变这种看法了。我们的国际主义教育往往与我们学校的整个工作脱节。须知，我们学校的全部工作都应贯穿国际主义精神，而不只是在某些节日才来讲国际主义。莫斯科一家工厂的代表乌兰诺娃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这位乌兰诺娃同志对我说起她开展反对反犹太人运动的斗争情况——她在本厂是一位有影响的工人。她说：“厂里有人反对犹太人，我就这样说：‘你反对犹太人，可你看看犹太人是怎样在机床上干活的，看看谁不大闲逛——是犹太人还是你们，看看并且比比。犹太人从不闲逛，可你们却常闲逛。再看看谁总爱喝酒，然后再说话’。”用其他工人的话说，她的宣传取得了很大成功。当不同民族的孩子站在同一台机床旁，干着同样活，关心着同一件事的时候，这时，结合劳动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要用儿童的本族语进行教学，但这并不是说，儿童应该闭关自守，民族学校应该是封闭式的学校。民族学校应该与说其他语言的孩子所在的学校保持密切联系。综合技

术教育化大大有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劳动旗帜》工厂的同志们说，他们办了两所学校：俄罗斯族学校，鞑靼学校。俄罗斯人与鞑靼人并肩工作。孩子们有着同一目标，他们关心同一件事，而这对国际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再拿另一个问题来说(我们往往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无关痛痒”的)——这就是反宗教教育问题。本来，整个教学都应该贯穿反宗教教育，可是我们往往只是在圣诞节、复活节、斋期才把这个问题列入教学大纲中去。不对，整个教学工作都应该与反宗教宣传有联系。要把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全部工作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所以也要善于把反宗教宣传与学校的综合技术工作联系起来。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儿童从小就看到，他在研究自然力时，也就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他对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实质都有透彻的理解，因此他就能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儿童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学会正确地对待社会现象，懂得某一事物是如何产生的，懂得阶级结构，懂得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时他就会以迥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宗教——他就会明白宗教是什么，明白宗教的阶级实质和根源。反宗教宣传不能脱离整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宣传，因为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不能使国际主义宣传脱离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工人所面临的任务。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说：“她讲得文不对题，她应该讲学校的质量，可她却在讲学校的自治。”同志们，学校的质量也正在于此。如果我们善于吸引儿童，善于做工作，善于吸引居民，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好地学会读和写，学会自学，等等。

巴尔苏柯夫^①同志要讲到中伏尔加达尼洛夫区的一所学校，它如何在比较落后的地区把学校变成了为集体化而斗争的战斗组织，使学校具有了综合技术教育性质的情形。该校的学生既写得漂亮，又读得流畅，还很会利用图书。学校能够吸引儿童，教他

们学会做组织工作——同志们，这是很重要的。我国学校往往脱离生活，因为教师总想自己包办一切。教师不可能只靠自己的双手而不依靠劳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来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今天我收到东西伯利亚一位女教师的来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农民不愿供给学校取暖用材，谁也不关心学校，连区执行委员会也这样。农民不供给学校取暖用材，区执行委员会也不罚他们的款。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上了几天课，后来学校就无法取暖了。”^⑩要是这位女教师开始时能建立起一支积极分子队伍，善于发动这些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又会吸引农民，那她就不必奔走于区执行委员会了。

列宁说过，要动员全体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帮助进行综合技术教育*。但是，不仅应该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在列宁区召开的代表会议^⑪上，我收到一个条子：“我们老工人为什么不能帮助学校？本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讲到老工人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发动老工人参加学校的工作，没有让他们有机会学会认真地帮助学校。”这张条子写得好极了，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工作：不光是教师教，而是要让一大批工人学会工作，学会要怎样更好地工作。

当然，现在教师们应该重新学习。我们大家都在重新学习，因为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学习。任何一个想真正搞好工作的人，都不会认为他对所从事的工作十分精通，——他必须坚持不断地学习。我们大家都经常在学习。学习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在，教师面临着一项任务：学习生产，学习比以前更好地了解工人的环境，寻求与工人、与集体农民的共同语言。今年春天，在扎莫斯克沃烈茨区（该区纺织女工很多）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教师们发言时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工人们说，最主要的是，教师们与他们更亲近了，对工厂更关心了。我国工厂经常

* 参阅列宁对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提纲的评注——作者注。见《列宁论国民教育》，第4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搞生产宣传，到处都在召开生产会议，应该让教师参加生产会议，这样，就会把教师看作我们集体的一部分了，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我认为，教师也应通过自己的工作让工人阶级把教师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作与他们从事一种共同事业的人。

很多问题取决于教师本人。只要教师做到让工人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他们，那就会摆脱目前这种状况。工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工作能力，取决于教师对来校工作的文化战士的领导水平，——在这方面需要进行同志式的互助。

如何检查学校的工作呢？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要表述得简练明确，便于检查。我们在组织方面制定了许多检查办法，例如拟订了质量指标。不过，不一定匆匆忙忙地拟订质量指标，但要便于检查：学校是否已附设于工厂；工厂的文化工作搞得如何；这项工作是否与综合技术教育有联系；在扩大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眼界方面做了什么工作；是否有积极分子；学校附设于工厂是否只是一种形式，或者这种做法确能给学校帮助；是否由工人组成了支援学校委员会，它与教师的联系是否密切；与该委会的联系是否密切；教师是否坚持提高，怎样提高；在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中是如何帮助教师的；是否动员了工程师、农艺师，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动员工作是否广泛；学校的劳动采取什么形式，是否过早地专业化了；劳动是否广泛开展起来了，与教学的联系是否密切，教学工作是否安排得当；是否达到相当的高度。要事先预计到许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难提出，而且也应该提出。社会各界都应过问这项工作，为提高质量而斗争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正如为搞好质量指标一样。要把这种质量指标确定下来，要在整条战线开展斗争。苏维埃这一我国的基本组织应该最积极地、直接地参加这一工作，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学校综合技术教育的这些并非直接的问题。当然，苏维埃就得为此做很多工作，尤其是现在的苏维埃，因为工人和集体农民中的一些突击手选到里面去了。

同志们，在结束我关于学校工作质量的讲话时，让我预祝我们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展广泛的社会斗争以提高学校工作的质量。

论儿童的学前教育

（在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①）

同志们，您们大家也许都读过了今天报上刊载的斯大林同志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讲到，工人们英勇顽强地劳动，积极参加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他们也还有某些别的要求，即文化方面的要求。

同志们，其中的一种要求就是大规模开展学前教育。

我曾经到过奥列霍沃祖耶沃。我到那儿本来是去解决图书馆工作问题的，可是在各种会议上，大家却不谈图书馆工作，而谈学前工作。女工们纷纷发言，强烈要求学前机关多收儿童。他们那儿有几所学前机关办得极好。

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设在俱乐部里。我推开门一看：一些孩子站在那儿，站成一排，严肃认真，正准备洗手。这时一个小女孩瞧着我说：“婶婶，你不守规矩，怎样能穿着大衣进屋呢？”学前教育，这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正按最新的办法教育儿童。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机构为数太少，简直是在捉弄人。虽然这几年学前机构有所增加，但是与目前的要求比较起来，规模当然还是很小的。我们要使娃娃们百分之百地到学前教育机构学习，当然，首先是接纳女工的孩子。现在，妇女都参加了生产，没有人照管孩子。而我们有什么设施呢？当然，我们在报纸上都看到了，新建筑群的设施齐全。乍看起来，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我们知道，在新建筑群工作的都是单身

汉，成了家的人要到后来才搬进去，那儿的孩子为数很少，他们的问题好解决。举例说吧。我收到由谢里马什斯特洛依寄来的一封信。那里的情况如何？信内只谈到托儿所，而没有谈到幼儿园。谢里马什斯特洛依有一万五千工人，入托儿所的孩子共192人。至于托儿所的工作情况如何，信中没有谈到，但是谈了一些别的情况，这些情况说明那儿的学前教育工作也不怎么样。信里说，工人有食堂，工人家属却没有食堂。孩子们则任何食堂也没有，因此很多工人都想把自己的饭菜带回家去喂孩子。于是一个民兵就站在食堂门口，不准工人把饭菜带回去。这样一来，由于父母都很忙，孩子们只得吃饼干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人照看他们。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学前工作的范围应该大大扩充。我认为，这里的关键不在经费，虽然我深知学前工作的经费多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这话的意思当然不能这样解释：既然关键不在经费，那好，不要钱也行。这样理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途径和条件来开展这项工作，而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又会找到开展这项工作的经费来源。扫盲工作刚开始时，我们都在说：从哪儿弄钱搞这项工作？可是，当工人们认真抓起这项工作，把基层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当这项工作有了很大规模，如像在中央黑土地带省^②那样，在过去文盲充斥的国度，全体农民人人参加了学习，这时，经费问题已不在话下了。问题已不在经费了，而摆在首位的是任教的人员了。

当然，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学前机构要采用三班制。就连一般学校也不行。到第三班时，低年级已不能上课了，更不用说学龄前儿童了。这样做就成了：孩子们白天在街上东游西逛，然后再到学前机构呆几个钟头。本来，学前机构的目的是，就是要照看那些眼下无人照看的孩子。

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位美国人。她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妈妈们怎么会同意成天把孩子放到一个什么地方的幼儿园里呢？我回

答说：“因为当妈妈在企业或其他工作单位的确很忙。”她说：“不管怎么说，凡是能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妈妈，大概都不会愿意把孩子交出去的。”我只得向她解释，我国的社会工作很发达，要是一位妈妈不在工厂干活，她也会去从事社会工作的。但她对此似乎毫不理解。她具有的是资产阶级心理，与我国女工的心理完全不同。

我曾经同一位女工谈过学前工作。她说：“我为什么愿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呢？当然，我也可以雇一个保姆在家里，不过我希望我的孩子受到新式教育。”所以我就尽量向来访的这位美国女士解释，我国女工之所以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不仅是因为家里无人照看，而且还由于她希望孩子受到新式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们主张三班制，如果我们只关心多收些孩子，而质量却不断下降，这当然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我们要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儿童有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一整天）呆在学前机构里。所以，首要的是规模，要让百分之百的儿童能上学前机构；其次，学前教育应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项任务。

列宁谈到扫盲工作时曾说，如果工人们自己把这件事承担下来，那就会有很快的进展。学前工作也是如此。如果群众自己把这项工作抓起来，那这项工作就能进行下去。你们大概都听说过和读过萨拉托夫市的经验，都了解他们如何实行分别对待的计划，如何尽力让每个孩子都上幼儿园，如何与家长们讨论谁能给他的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什么帮助。据说，目前萨拉托夫市已有62%的儿童上了学前机构。这不仅对工人的孩子，而且是对全体儿童。萨拉托夫已有62%的学龄前儿童上了幼儿园。当然，这个较大的数量只是与别的城市比较而言的，该市的经验却可能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不过我相信，生活中还可以找到更多途径来广泛地开展这项工作。

我要说，我国的教育刊物对这项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我有一份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杂志《共产主义教育》^③，今年我一直在看这份杂志。上面没有发一篇学前教育的文章。我担心《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④也是一篇也没有。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发现这份杂志果然没有发这方面的文章时，我真是大吃一惊。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们要更加关心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普及教育那样的办法。

你们知道过去普及教育是怎么搞的吗？事先规定一定的指标：设置多少学校，招收多少学生，缺少多少教员，缺少多少校舍。然后抽查三四个指标，就可以看出这项工作的进展。刚开始时，大家想尽量把检查的范围搞得广泛一些，但是后来却只搞了几项指标。同时向各省和地区发简报，报导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我认为现在也应采取这种方针和检查办法，这样就会大大推动工作。人人都能注意到工作的进展。要不断采取措施来扩大这项工作的规模，而报刊在这方面应该做很多事情。我们有了文化进军^⑤的经验；我们要把学前教育方面已经开展起来的工作进行到底。

在开展学前教育进军的同时，还必须组织卫生进军。卫生部或医卫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像教育工会中央^⑥那样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并且也要坚持开展这一运动。要让医生、医士和全体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参加并帮助学前教育工作人员和从事这项工作的文化大军，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儿童卫生保健知识。

我们要努力造就身体健康的一代，要让下一代从小健康强壮。这是自不待言的，因为我国学前教育工作人员很注意儿童的生活条件，让每个儿童有一张小床，让他们经常洗手，保持清洁，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不要估计低了。我总是说学校工作人员应向学前工作人员学习。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很重视儿童的健康，而学校在这方面则差得多。我认为这件事不容忽视，不能削弱，恰恰相反，要加强，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学前工作人员都是一些热心肠的人。现在他们很多人员主

张让儿童参加完成工业财务计划的斗争，要他们参加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等等。这都是些好主意，我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否因为这样就可以削弱、忽略保护儿童健康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呢？我认为一点也不能，这项任务过去和现在都很重要。在个人健康上，童年的早期对一个人以后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努力保护儿童健康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为此，要建立各种儿童活动场所，采取各种措施使儿童夏天能有很多时间在露天度过，冬天也能呼吸新鲜空气。所有这些都极其重要。儿童的饮食问题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人。要知道，工厂和集体农庄的新技术劳动，这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一种集体劳动。正是这种集体劳动可以养成工人阶级的心理，可以培养具有集体农民的意识。关键是这种集体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体劳动将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要把儿童从小培养成集体主义者，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培养成善于从事集体工作、适应集体生活的人。应该说，我们学前教育处在这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如果把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与资产阶级的学前教育加以比较，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学前教育工作采取的是培养集体主义者的方针，我们培养儿童能友好相处，会干活，能互助。要使他们养成一定的熟巧，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集体工作应该如何安排。我想说，在学前工作方面，尤其是在学校工作方面，开始时往往把集体理解为无人负责。这件事由集体做，那件事由小组做，还有一件事由班级做，但是，班级里由谁去做，到底要做什么，往往不清楚。常常有这样的事：从事活动的只有两三名儿童，而其他的人则不知干什么。低年级的儿童往往也是如此。有时展出一些图画，虽然不怎么好，却还是孩子们大家各自动手画的。可是有时展出的却只是一些画得最好的图画。三个孩子画的，你一看却大

为惊叹：啊！咱们的孩子们画得多好啊！但这是全班画的吗？不是，只不过几个人。其他孩子的画根本未展出。我们今后应特别注意让全体儿童人人都参加活动，参加劳动，参加儿童生活的建设，从而使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学会集体工作，让每个孩子都能量力完成哪怕一小部分工作，让他们参加共同的活动，根除学前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甚至在大学生中更为明显的）现象。现在，生活使我们认识到，集体不应理解为无人负责。恰恰相反，生活要求每个人善于与别人共事，善于与别人一起安排生活。

我们经常谈到国际主义教育，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向儿童讲述某些原理，那就得不到应有的效果。我不妨向您们讲一个例子，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学龄儿童的例子。

我收到了一封信，好像是乌兹别克斯坦一所儿童之家的俄罗斯孩子写来的。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懂得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意义。我们附近住着一些野蛮的乌兹别克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我后来给他们的老师写信说，要向孩子们讲讲乌兹别克人生活的一些情况，说明乌兹别克的儿童在某些方面比俄罗斯儿童强。显然，乌兹别克儿童的游戏就非常有趣。凡是儿童的生活接近自然的，他们的游戏就非常有趣，他们明显地比俄罗斯儿童跑得快。不要讲乌兹别克儿童落后的一面，要讲他们比俄罗斯儿童强的一面。

总之，在民族问题方面，我希望找出一些正面的东西告诉孩子们，否则他们嘴上说得头头是道，行动上却表明他们一窍不通。比如说，如果集体活动安排得很妥贴，如果儿童养成了在集体中友好生活的习惯，那么在此基础上就比较容易向他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在反宗教宣传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往往把反宗教宣传理解得非常简单：只是告诉孩子们没有上帝这回事就得了。不久前我碰到两个小女孩子，只有六、七岁光景，都是领导干部的孩子。她们一边跳着一边拍手，两眼望着天空说：“没有上帝没有天，没有天使和神仙！”可是后来一个女孩却说：“你知

不知道：一个男孩对我说，树影是活的，树木也是活的，什么都是活的，一切都是活的。你以为树木什么都不懂吗？它们什么都懂。”这是典型的万物有灵论，典型的神秘主义。一方面认为没有上帝，而另一方面孩子们却在信奉一种原始的独特宗教。重要的是根除宗教。在这方面，养成友好地集体地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使孩子们不是把“我”放在首位，而是把“我们”放在首位，这样就有助于消除任何宗教情绪。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例子可以用来对学龄前儿童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奥尔洛娃同志^⑦对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几个孩子给菜地浇水、施肥，其中有一个孩子说：“浇不浇都一样，就看上帝怎么样：上帝高兴，地里就能长东西；上帝不高兴，地里就不长东西。”这时另一个男孩就建议说：“那就把这块地浇上水，算我们的；那块地不浇水，算上帝的，怎么样？”于是他们就在自己那块地上浇水、施肥，结果地里生长的蔬菜非常好，而上帝那块地里什么都没长，全干死了。后来他们把自己的父母领来看：上帝地里什么也没长，全是一片荒草，而要想地里东西长得好，就得浇水和施肥。

这种反宗教宣传自然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既然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那我们就要把他们培养成智力发达的人。我认为，我们学前处的工作路子是对头的。每当我读到这样的材料，说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张罗着带孩子们外出参观游览、庆祝节日活动等等时，我总是非常高兴的。这种做法可以大大开扩儿童的视野。

去年冬天我在列宁格勒。十月革命前，我曾在那里的一所星期日夜校工作过。这所学校在涅瓦关卡外，现在这地方叫沃洛达尔区。那里当时有许多纺织工厂。涅瓦河对岸还有一家制呢厂，这家制呢厂的厂主叫托仑顿，他总是从斯摩棱斯克省的几个村招募工人。他让他们过本教堂的节日，挖空心思不让他的工人到涅

瓦河对岸去，因为施里谢尔堡驿道的工人们都很革命。这已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了。这次我到沃洛达尔区去时，看了我过去工作过的一些地方。我看到了隔岸远处的这家工厂。随行的一个同志对我说：“您知道吗，托仑顿工厂至今还有一些工人从没到这边来过。”

岁月流逝，发生了1905年的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也已13年多了，而这些工人现在的生活还一如过去，与世隔绝，像受了催眠术一样。

我以前在农村住过一段时期。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往往从未到过邻村，她的思想甚至未曾逾越过本村的范围。

因此，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扩大儿童的视野，尽量让农村的儿童了解城市的生活，参观企业，让他们看看拖拉机和轮船是什么样。要从童年起就扩大儿童的视野，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闭塞。尤其是妇女，她们的闭塞简直令人惊讶。现在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忘记了。

要推广儿童的经验。我曾经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用木铲去敲打石头台阶，于是保姆就说：“瞧，铲子会把台阶弄坏的”，可这个小孩（他上过幼儿园）一本正经地瞧着她说：“你怎么这样说呢，难道木头还能打坏石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认识物质，熟悉物质——这非常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幼儿园要让儿童多获得一些生活经验，让他们了解动植物的生长情况。哪怕让他们多少了解一些，那他们也会变得比以前的儿童聪明一些。

我们的儿童常说：我们是活泼的儿童。这是对我们学前机关最大的称赞。我曾经参观过瑞士和法国的幼儿园，看到它们努力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听话的人。有一次我问一位主妇：在所谓母性学校里究竟教孩子们学些什么？她回答说，教他们学习模仿：教师举起一只手，那么他们就得举手。资产阶级的学前机关绝不唤起儿童的思想和儿童的独立自主精神。它们只会千方百计

摧残儿童。而我们却要大力发扬儿童的独立自主精神，让他们更多地具备这种精神，善于观察周围的生活，更加成熟地对待生活。

现在，我们都在努力掌握技术。我国学校长期未能成为真正的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但是近几年来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儿童更加接近工厂企业了，他们经常到厂里去，而全体工人也发现孩子们在努力掌握技术。

我不打算详细谈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这种趋势已把我国学校引上了完全不同的轨道。在我国学校面前展现了条条新的道路。我国正在为掌握技术而斗争。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在考虑应该帮助学前儿童掌握技术。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必须考虑年龄特点。不过，不管儿童年龄多小，都必须唤起他们对技术的兴趣。天上的飞机，身边驶过的汽车、拖拉机，日常用的缝纫机，所有这些都能引起儿童的注意。他们对这一切都怀有天生的兴趣。应该大力培养这种兴趣。我们要出版一些有关的儿童读物，生产一些有关的玩具，开展一些有关的游戏，等等。

我们的儿童游戏往往毫无特点。例如，四岁的儿童总是玩红军打白匪。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得红军和白匪到底是什么，只是做游戏玩玩。于是他们彼此就厮打不休：一部分人当白匪，另一部分人当红军。他们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狠狠地打。这种游戏只能起反作用。

有许多游戏可以锻炼身体，发展劳动技巧，提高视觉的精确程度，使人机智灵巧。我国学前机关应该大力开展那种可以培养人的机智灵巧、加强人的体力、培养达到目的的毅力的游戏，以及各种在劳动中具有极重大意义的游戏，这一点特别重要。

对掌握技术来说，最重要的是掌握绘画、建造的技能。这种性质的游戏也极其重要。不过，我们往往是这样想的：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不去参加全国都参加的建设工作呢，当然要吸引他们去参加这项工作啊！这是对的。是应当吸引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自己也想这样做。我们知道，儿童是善于模仿的。他们看到少

先队员为集体农庄运动、为工厂做了什么工作，这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就要学着去做。但这往往使我们心里盘算：儿童的劳动能为生产做些什么呢？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如果学前儿童能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比如撕麻屑等等），这从赚钱的角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强迫他们去干这件事，让他们去干一些对他们的成长无好处，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疲乏、厌倦的活儿，那就会影响他们的发展。我们要记着，当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一亿分之一，两年之后，他们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五年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十万分之一了。儿童年龄越大，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我们要特别重视儿童的发展。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记不起是谁了，大概是一个“只顾现得利”的人说的），孩子们喜欢做各种甜点心。很可能就有人让他们去干浇铸模型的活儿。我觉得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我们首先要关心的是爱护儿童微弱的力气。教儿童学会劳动是对的，但这种劳动应该是儿童感兴趣的，有助于他们的成长，而不能只从对生产直接有利这种眼光短浅的观点出发。

我们当然要着眼于生产，我们当然要为生产培养顶用的工人，但如果我们采取目光短浅的态度，希望儿童们眼前马上就为生产作出贡献，那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往往批评儿童，你为什么不做这、不做那，我们往往采取一些对成人有效而对儿童不适合的方法。例如，我十分担心在儿童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这种方法。而我们往往盲目地搬用成人中的那一套。成人已经能自觉对待劳动了。对成人说来，社会主义竞赛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可是孩子们为了争得一个甜点心而展开竞赛，那就与法国学校一样了。那儿的五岁幼儿非常喜欢搞竞赛游戏，看谁是品德最优秀的孩子。凡是品德最优秀的孩子，就给以奖励，授予奖章，上面写着：品学兼优。他们经常在儿童中开展这种个人竞赛，使儿童的神经系统大受摧残。他们破坏了儿童之间的友好团结，损害了儿

童从事集体活动的能力。如果我们在成人中，即在幼儿园工作的教养员中开展竞赛，这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明白这件事的意义，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在幼儿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那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那就会使他们自高自大，认为自己什么都行；他们就会不去学习，而只会夸夸其谈。这种风气很不好，必须与之斗争。

我们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校里既有领导干部的孩子，又有工人的孩子。领导干部的孩子回家之后，他们的妈妈与他们一起谈话，做功课，他们念书就念得好些。可是工人的孩子回家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什么可读的，也没有人带他们学习。然后，学校里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那么结果又是如何呢？领导干部的孩子读得很流畅，可是工人的孩子却落在后面。得奖的当然是领导干部的孩子，而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与工人的孩子却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从事儿童工作的教养员会敏锐地感到，这种社会主义竞赛对儿童说来是不妥当的。可是我们往往把那些在成人中间行之有效的方法搬到孩子身上，这是不行的。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因此这种做法是不行的。

我还想谈的是，综合技术教育这个概念不仅包括劳动技巧，不仅包括有助于形成这种劳动熟巧的知识，而且还包括组织熟巧。工厂、企业以及任何从事集体劳动的地方，工作本身都要求较高的组织性。您只要看一看工人，就会发现工人的组织天才处处都在显露。工人往往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如果拿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工人作比较，那么工人多半是优秀的组织者。其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企业的全部劳动组织工作有助于培养这种组织能力。我国当前的集体农庄已进入到组织劳动的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看到正在地里干活的拖拉机时，看到某些集体农庄的生活如何美好时，于是就大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至少在有些地区是如

此。可是到了集体农庄之后，却不知道下一步将该怎么办，工作从哪里着手。他们等待着别人来给他们安排工作，自己却不会把工作开展起来。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初期的情况。可是现在我们都已看到，男女集体农民如何在生产会议上讨论各种组织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些问题得到了提高。

克拉夫琴柯同志^⑥任职于《农民报》，她不久前到过米列罗夫区。她带回一份速记稿。她在那儿住了两周，与许多男女集体农民谈过话，并且出了一些题目让他们做。但他们口头上讲得很好，可是提起笔来却不大会写，所以她就这样来进行这项工作。

举例说，一个女庄员讲了她们办托儿所的情况，但语焉不详。克拉夫琴柯向她提了许多问题，这个女工回答得很好，速记稿把她讲的内容全记了下来。结果写成了一篇很生动的通讯，语言很生动。这篇通讯反映出：一位女庄员能把她的全部感受表达出来。因此，这本小册子写得趣味盎然，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从旁代笔的，而是男女集体农民们自己亲口讲述的。这些文章生动地反映出在生产会议上他们讨论除草工作和劳动报酬等等的情况。而通过讨论这些组织问题，可以看出集体农民觉悟提高的情况。

其他到集体农庄去过的人也讲到了这样的情况。

由此可见，集体农庄现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即集体农庄的工作也可以培养组织熟巧。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想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未来有用的人，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从小就养成组织熟巧，让他们养成守秩序的习惯（按一定的方式把玩具或工具摆好），能够准确地交待受托之事，能两三人一起完成某项工作。我们要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要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这种教育。如果幼儿园能授予这种技能，那么，以后孩子们进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之后就会进步得更快。

下面我还想谈谈计划性问题。要教孩子们做事要有计划，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不下去。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计划应该简单明了。学前教育工作者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应该计划儿童的工

作。他们要考虑应该授予儿童一些什么知识才能使孩子们受到教育，得到提高，增强体质，掌握劳动技巧和组织技巧，等等。学前教育工作者要有这种考虑，但如果对儿童提出这种要求，要他们订一个长远的规划，那纯粹是乌托邦。在这里，重要的是让学前教育工作者制订工作计划，使她知道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来安排某项工作，而儿童只要了解一下就行了。不过制订计划时要考虑儿童的兴趣，因此计划要有灵活性，不要把计划变成官僚主义的计划，而是很有活力的计划。这就要注意儿童兴趣之所在，他们对周围生活的了解——他们对这些都会进行模仿；而这一切也会使他们深感兴趣。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组织儿童的兴趣，把它引上一定的轨道，并且授予他们这样一些知识，使他们不断提高，成为自觉的人。在这里，要少说一些空话，多干一些实事。这当然不是说不能对孩子们讲任何重大的事情。有些成人往往认为儿童什么也不懂，实际上，五、六岁的孩子就已经明白一些大事了。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培养学前教育干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认真地做一些工作来大量培养干部，用两三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时间讲授一些有关学前教育工作的初步知识。但是，由于孩子们经常提出各种问题，所以学前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要成为一个对周围形势有所了解和分析的人。同时，他们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医药卫生知识。所以在学习期间需要安排辅导课，经常举行讲座，交流介绍学前工作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其次，全体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是一定集体之内的干部，他还应该对自己这一重大的工作有一定的认识。

同志们，请允许我祝贺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这次代表会议，希望您们在学前教育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取得完满的成就，培养出一支学前教育工作者和文化战士的干部队伍，使我国的青年一代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基础，能够从小就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关于中小学的决议》

(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①与莫斯科
教育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

我的报告不想讲得很长。我希望地方来的同志们能普遍谈谈对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的认识,并且谈谈怎样贯彻这一决议^②。

同志们,您们都知道,最近一年我们在国民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首先是指我们实行了四年制普及教育。这当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学校业已成为教育青年一代的巨大因素。学校招收了八岁到十二岁的全体儿童以及各个阶层的居民,并且真正成了教育青年一代的强大武器。

最近一年的另一特点,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提出的把我们苏维埃学校变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这一口号,现在已经付诸实现了。我们看到,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在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综合技术教育化已成了一项普遍活动,不仅是个别学校在搞综合技术教育化,而且所有的群众学校都在搞综合技术教育化——到处都在搞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现在已经有了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基础。

这一进步是很大的,但是文化战线的形势至今还不够稳定。一部分教师发起的活动和他们的好的倡议,其他的教师往往都不知道,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常常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把学校看作无关紧要的部门。我曾经听到一个录取到中师^③的小伙子说:“您知道,我想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我不想去中等

师范学校。”我认为青年中这种情绪很普遍。甚至工人来信中也有持这种观点的。我曾收到一个工人的来信，他说：“我女儿想去中等工业学校，她想当工程师，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可是您却让她去中等师范学校。”

我认为，中央的这一决定将会使这种言论销声匿迹。这一决定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它使全党的注意力转向了学校问题，转向了教育问题。这一决定的整个精神和它的全部内容都说明，学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门之一。当然，至今为止，凡是粗知马克思主义的人，凡是读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人，都会知道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互相关系。但是，由于过去把全部注意力长时间都集中在政治斗争上，集中在持续至今的阶级斗争上；由于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战线上，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关系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放在次要位置上了。中央的这一决定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它把全党的注意力引向了学校。过去常常有这样的事，就是经济工作人员把学校看作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只要稍有一点借口，就争着去占领校舍。学校嘛，可以搬到郊区去。当然，最近一年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让学校搬家已非易事，让学校搬到坏房子里去也非易事。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对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有过帮助，使学校的工作趋于稳定，但还是认为学校工作不足挂齿，对学校依然不够重视。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把教学与儿童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要服从（完全服从）于教学和教育的目的。这是中央决定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人员在广泛开展的综合技术教育化的运动中，往往把学校看作提供劳动力的场所。我曾经与一位在制糖工业工作的同志谈过话。他说：“我们今年的情况将不错。孩子们为我们耕种了多少公顷甜菜。”我说：“您说的是多大的孩子——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他说：“就是一般的学生。”我说，小学生不能干这种活儿，他们要学习，力气又小，他们怎么能耕种几公顷的甜菜。

当你谈到儿童的劳动，指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服从教学目的，它应使儿童养成对劳动的自觉态度，给他们以广阔的综合技术教育视野，不能让儿童长时间干机械的活儿(因为他们只是刚开始干时才有兴趣)，这时教师可能会说：“你要知道，咱们是经济第一呀！”对此，我们就得说：“这是当然的，不过，不仅今天的经济取决于对青年一代的教育，而且明天的经济也取决于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我们应该看到未来，并且还要想到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人，要把他们真正培养成什么样的工作人员，而不要只看到眼前，算计他们一天能挣几文钱。”

同志们，我们当然不能狭隘地理解“培养干部”的涵义。我们要培养我国青年一代，能够按崭新的方式管理经济，能用社会主义的态度安排全部工作。为此，我们必须按新的方式来教育青年一代。

决定中已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教育青年一代的途径。这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承认了学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还有一点，就是决定十分重视教师，要求给教师以教学法上的帮助。决定发布至今已一周了。我们知道，一周来，就莫斯科的情况而言(我想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各校都召开了群众大会来讨论这一决定。我昨天就在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区参加了一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种会议(这是一次大会，出席者近九百人)的是一些普通教师。通常参加会议的都是一些巡视员，各种文教官员等等。但是出席昨天会议的却是一些群众教师，他们的年龄都很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满怀着苏维埃的情感。有一位年轻女教师的发言特别有意思。她不久前毕业于七年制中学，然后上了四个月短训班。她说：“我们时刻准备执行我们党的指示。我们决心贯彻中央的这一决定。”青年的这种情感极为强烈，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担心。只要一读决定，就会看到对学校、对教师的关心。这使教师们产生了一种愿望，就是想了解这一决定实际

会怎样执行。他们之所以一字一句都用心去听，是因为决定中明确地谈到了学校的意义，谈到了从教学法上、物质上以及其他方面对教师进行帮助。而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教师，又很想知道根据党的决定他们应如何工作。

同志们，一般教师都在探求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们懂得学校目前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还感到，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关注我们苏维埃国家。我们的每一错误都会使那些正与旧世界进行斗争的人们感到不安，而我们的每一成就都将鼓舞他们的斗争。您们都知道许多国家目前的局势多么紧张，您们也都了解目前的国际形势。我今年曾有多次机会与国外来访者进行交谈。每当与他们谈话时，都使你感到他们是在密切注视着我国的一切。我国学校引起了普遍注意。德国、瑞士等地纷纷来信索取各种资料，因为他们现在迫切需要了解我国学校情况，了解文化战线情况，得到这方面的资料。我国的普通教师当然也感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读报就能了解国外的情况，并且知道应该怎样工作，知道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至于说到应该怎样工作，这个问题在中央的决定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中央决定中谈到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将会对教师有切实的帮助。

我随后还要详细谈到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等问题。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决定中谈到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潜心研究教学法。决定中的这一要求表明，党认为教学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想重复说一句，党目前认为教学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党十分重视对待儿童的方法、教育儿童的方法以及把教学安排得最合理的办法。决定不只是提到了共产党员，而且指出，校长要对学校工作负责，而要想负责就得懂得业务。因此，校长也应该掌握教学法。

决定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视导员的问题。视导员是教师的助手。他不能只是泛泛地议论，而要实际做出示范。

大约两年前，我曾经同一位十分著名的视导员谈过话。我很

关心这样的问题，就是视导员能否看出教学法方面的问题，能否帮助教师改正教学法方面的错误。我就这个问题向一位优秀的视导员作了了解。这位视导员热心并忠诚于国民教育事业，他采取的一般方针是对的。我问他：“您到学校去发现教师教学不合要求，您能否代他上课，让他看看应该怎样讲法吗？”可他说：“不，我不干这种事。”当然，作为一个视导员，他能够及时发现组织工作中的缺点，但他既然是一个视导员，他就应该从教学法上对教师进行帮助。所以，中央强调指出组织这种教学示范是极为重要的。

通过示范对教师进行帮助是极其重要的。视导员要做示范，但一个区只有两个视导员是不够的。要大力进行教学法方面的帮助，而且要经常进行帮助，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基础学校^④的巨大重要性。我国过去建立过实验示范学校^⑤。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应该按新的原则建设学校，不能再按旧章法办事，至于怎样建设学校，则有不同想法，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不知道怎样去做。我国的实验示范学校为新思想开辟了道路。当时设立这种学校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我们取得的经验是不同的。有些实验学校办得很好，它们的确做了大量工作。而有些实验学校却完全是老式的，它们规定了要教学生一些特别的知识。我记得，乌拉尔有一所拉脱维亚学校，它在1919年想给学生讲解为什么有人眼珠是蓝色的，有人则是棕色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讲的；那里的孩子们成天劳动，理论学习则放任自流。有的实验很有意思，但有的实验却毫无价值，毫无用处。不过从总体上看，实验学校在当时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我们需要的是普通学校，但是这种学校的教员要有水平、有经验；这种学校要具有全面开展工作的条件。我们要认真考虑如何建设我国的基础学校。中央的决定中谈到了这种学校，并且指出基础学校应起示范作用。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在何处建设这种基础学校：要在可以观察到这一工作进行情况的地方开设这种学校；要发动周围的群众帮助这

种学校，使学校或者与一些经营管理完善的企业、机拖站^①保持密切的联系，或者与一些办得较好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得到这些单位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帮助；要使学校能成为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地方。

我们知道，我国已经自发地出现了这样一些单位，那里的教学思想是通过示范来实现的。我们不妨拿乌拉尔的克拉斯诺波良斯克区的经验作例子。这个区包括三十多个居民点，全都实行了集体化。这个地方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开展了集体化运动，所以这里有一些集体农庄已成立十年之久。当地居民中有很多游击队员，但居民的文化水平却很低。教育人民委员部派到那儿去的工作队，收集了有关该区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材料。例如，工作队说，一位年老的女游击队员讲：国内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刚刚建立，她曾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的农庄能够巩固下去。可是现在这位女集体农民却说，她早已不相信任何上帝了；生活教育了她，使她懂得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结果，克拉斯诺波良斯克区的大村子都建立了文化宫，这种文化宫已成了全体居民经常性的示范学校。我们以这个文化宫为基地开展了各种教育活动。那里来的一位农艺师说，农村里实现集体养鸡，可是鸡却不断死去。养鸡离不了沙子，但他们只是把鸡群赶到一间屋子里，撒上一些饲料，却不在地上垫一层沙子。于是农艺师们就为全村居民开办了短训班。每个居民点推选一个农民(男女均可)来学习这项业务。在文化宫里，农艺师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搞集体养鸡，怎样才能使鸡长得壮实而不死亡；应该怎样做，才能把一切都搞得很好。他们还搭了一个鸡棚，具体进行示范。集体农民们都很满意，因为他们以前不会干的，现在都会干了。

他们对学前工作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们在文化宫开办了学前工作短训班，也是每个居民点派一二人来参加。他们先在短训班学习一个月，然后再实际观察如何照料孩子，懂得为什么要给孩子洗手，为什么不能把没有洗干净的水果给孩子们吃，等等。

凡是教养员需要知道的东西，都在实际工作中做给他们看。后来，各边远居民点凡设有学校的，都派教师来，与这些教师一起开会，组织他们参观当地的学校，同时向他们具体介绍工作经验。这样一来，这座文化宫本身就成了一个基本的示范点。据我们所知，目前这种示范点已设立了很多，这种示范点可以告诉人们某项工作应该怎样做。有些集体农庄也是采取这种办法。有一个成立很早的公社抱怨说，边远地方经常有些农民到他们那儿去，但是吃住无法解决。于是这个公社要求在他们那儿建立一个中心文化宫：农民来了之后，可以参观公社的工作，收集资料，看看某项工作应该怎样搞，并且能有一个地方住宿，等等。应该说，这种想参观、学习如何搞好工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因此，基础学校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对这个问题当然应持慎重态度。我们知道，中央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能对普通教师进行一些切实有效的帮助^⑦。

同志们，当然啰，在我们日益广泛深入地开展的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存在各种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有时表现在理论上，有时则是由于缺少熟悉业务的人，由于水平太低，或者由于旧时的影响。而这种情况又在实际工作中助长了对教育工作的错误态度。现在既然十分重视学校，我们就必须采取统一的正确路线，避免对正确路线的各种歪曲。

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两种偏向。一种偏向的表现就是，认为一切做法都应该与以前一样，而未充分认识到：我们目前的教学有了根本的变化，它的精神与从前的有本质的不同；教学大纲应该充分体现马列主义精神。有的人不喜欢这样。这就产生了右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不了解生活，不了解具体条件以及错误的“左”的理论，又造成了另一种偏差，使人们认为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在制定庞大的计划时，乍看起来一切都很革命，可是深入一了解，这种计划不是有助于、而是有碍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左”的倾向是对右的倾向的最好帮

助。一直往左走，到头来就会走向右边，于是就形成了“左”右同盟^⑧。

现在，我想就此谈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学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国的某些教育学书籍表述了（而在生活中也实际表现出）这种思想：学校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认为，瞬息万变的生活和革命化的环境不会对学校发生根本影响。他们看不到学校和生活之间应该存在并且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有机联系，想使学校闭关自守、保持原样。这种情况至今屡见不鲜。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言论，说什么学校不应“受干扰”。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截然不同的言论，即一些“左”得很的人在说：“你们看，我们的生活瞬息万变，生活使人得到改造。”生活当然使人得到改造，这话并不错。但是，“左”倾分子却由此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他们说：“学校不起作用，学校必将消亡^⑨，因此，一般说来，重要的是让儿童了解周围的生活，至于学校，则是无足轻重的。”这种“左”倾理论当然会对未来作出错误的估计，在生活中就会忽视学校，这个问题是必须引起重视的。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提出如何安排和组织学校工作，如何真正按新的方式搞好学校工作的办法。但他们却不提出这种办法，而是回避目前的困难，不去寻求新的途径，说什么：“生活会产生影响，而学校……学校对我们说来却无关紧要。”

党对学校是怎样看的呢？我们首先引用一下列宁同志对学校的论述。1918年8月，他在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上说：“必须竭尽全力和运用一切知识来尽快地建立我们未来的劳动学校，因为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将来能避免目前这种已持续了四年多的一切世界冲突和战争。”^⑩目前正在争论不休地讨论学校是否将要消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列宁关于学校具有重大作用，要我们十分重视学校的指示。列宁说，我们必须把全部力量、精力和全部知识用于建立我国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此外，如果我们看一看我党的党纲，那么大家都知道，党纲上谈到了学校，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①

您们看，党纲第十二节十分重视学校。学校应该按新的方式培养全体儿童，我们苏维埃学校的利刃应该把各个阶级的最后一点残余的杂草铲除干净，应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能够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的人。如果从列宁的上述言论出发，从党纲第十二节出发来看待9月5日发布的中央决定，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决定是符合上述路线的，因为决定指出要重视学校——学校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部分。要千方百计办好学校，为提高学校质量而努力。

另一个问题，就是教学大纲问题。在这方面，也存在“左”、右两种倾向。我们知道，有一部分人这样主张：“不要经常修改大纲，最好让大纲稳定下来。旧的课程一定要保留。一般说来，这里没什么可以自作聪明”；至于生活的不同要求，科学不断前进，因而要选用新的事例，采用新的分类法，对于这些，右倾分子中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也绝口不提教学大纲应该充满马列主义精神，这是右倾。

但也有另外的论调，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开始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化、开始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之后。由于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确非易事，毫无经验可循，于是这些人就说，没有必要搞新的教学大纲，应该向沸腾的生活学习。与其说是教学大纲重要，毋宁说是“号召”重要，口号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学校教学的核心（奠定世界观基础）就不复存在了。我们不是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而是把教学大纲丢在一边。不用教学大纲，而采用各

种“草案”。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些“草案”，把1，2，3，4年级贯通起来，完全谈不上教学大纲知识的衔接性和系统性。于是就提出了各种口号：“大家都来完成工业财务计划！”，“人人都要参加文化革命！”这些口号都是一级学校的工作要求，全体都要照此行事。当我们指出：这样下去，孩子们就无法学习，就不能逐渐地积累知识，孩子们就不会感到自己有所提高。这时，他们就会回答我们，说：“您这是什么话？生活要求这样做！”这当然是“左”倾。^⑤

党是怎样说的呢？我还是想从列宁同志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谈起。您们都知道，他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过，“只有把教育组织和训练青年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使这一代青年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⑥列宁说，必须依靠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实基础。他反对资产阶级学校，反对资产阶级学校的教学大纲。他在1918年全俄教育工作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资产阶级学校使青年人满脑子都被一些最粗野的偏见所填塞。^⑦资产阶级学校的教学大纲充斥了谎言和诬蔑以取悦于资产阶级。中央的决定是怎样讲这个问题的呢？决定指出，儿童应该掌握知识，掌握全部科学成就。不是掌握片断的知识，而是需要掌握系统的知识。每个成年工人之所以特别赞成这一点，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工人还是儿童，似乎都是“通过空气”来获得知识：读报纸，听报告，听收音机。获得的知识不少，但缺少什么呢？缺乏系统性。他们有知识，但这些知识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怎样把这些知识统一到一定的体系里去，却不甚了了。现在上学的工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些零碎的知识纳入一定的体系，他们要奠定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他们要使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成为亲切易懂的。系统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整个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对系统性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现象，是极其有害的。所以党特别强调不要讲授片断的知识，而要讲授系统的、科学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掌握技术，不掌

握科学，我们就不能按照要求进行建设工作。

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斯大林指出，要掌握技术和科学。他把全国人民所感受到的东西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必须掌握科学和知识。

您只要看一看广大工人、集体农民目前对待知识的态度，您就会懂得：忽视教学大纲是不行的，对掌握系统化的知识，对掌握极其科学并经过检验的知识一事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资产阶级学校力图通过教学大纲向儿童灌输各种谎言和诬蔑，力图煽起沙文主义，力图把儿童培养成奴才，他们对历史事实大肆歪曲，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就应该授予儿童经过严格检验的、科学的知识，我们就应该极其认真地对待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反复从科学的观点对教学大纲进行检查。我举一个例子：不久前，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的同志说，我国植物学教科书至今还是采用的林奈^④的体系，这是一个受到科学批判的旧体系。我们不能把这种东西列入教学大纲，不应采用在科学上早已陈旧了的体系。所以，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教学大纲必须从这个角度好好加以检查。

我们都看到，党的决定目前非常重视教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加以考虑。

下面再谈谈怎样教。怎样教的问题牵涉到对儿童的了解以及对教学法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怎样向孩子传授知识，怎样对待孩子，怎样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有右的偏差，也有“左”的偏差。这些偏差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右倾的特点是什么呢？右倾观点认为：儿童是一个幼小无知的生物，他的使命就是多多听取父母和老师的教诲。我们之所以应该教育儿童，引导他们，一举一动都要督促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幼小无知。这是一种右的偏向，对儿童估计不足，不相信儿童。这种偏向极其有害，至今仍有表现。我有一次曾经与一位老教师谈话。他对我说：“怎么能跟孩子谈政治，孩子们懂什么政治？”然

而事实上孩子们自己现在常常在谈论政治。您不妨试试，现在不跟他们谈政治行不行。列·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当农村要重新分配土地时，学校里简直不可能上课：任何一个最优秀的教师都不能上课，因为全体儿童都想着农村正进行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事。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竞赛。如果有的孩子住在工厂附近而对社会主义竞赛毫不关心，那您会怎么想呢？我记得，过去开展罢工斗争时，我正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⑤工作，有人对我说，一个学生到学校来对老师讲：“咱们罢工了，我跑在最前面，狠狠用泥团揍了厂主一下！”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和全体工人都反对黑帮分子厂主，用罢工来反对这个厂主。他们也反对厂主，也想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参加这一斗争的方式是朝厂主扔泥团。孩子们想参加周围的生活，教师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与他们谈到政治，他们自己也要谈到政治。我记得我们流放时^⑥，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常常来玩，有一次我发现他站在那儿，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谁在说谎，是乡主席说谎，还是政府说谎。”当然，他是机械地重复他听来的话。他常常跟他父亲到乡里去，听到乡里的农民在说“不知道谁在说谎，是乡主席说谎，还是政府说谎”，于是他就重复，这么反复讲十来次，他就记住了，等到将来，他就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不跟儿童谈政治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却有人说：“没有什么年龄特征，儿童什么都知道，他们什么都懂，不怕负担过重。”我国的儿童了解并懂得很多东西，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我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两岁的孩子与六岁的孩子也会有区别；而六岁的孩子与十四岁的孩子也有区别。所以不能置年龄特点于不顾。那种认为可以不考虑年龄特点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什么儿童一切都会，说什么没有年龄特点，这些论调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要认真研究年龄特点，我们要了解这种年龄特点，并且要知道应该怎样根据年龄特点使儿童全面发展。我们要学会全面培养儿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善于对待儿童。当然，研究儿童并不是制定各种研究模式等等，而是

要掌握现有的科学成就，因为这种成就能向我们指明研究儿童的途径。所有这些都应在观察儿童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必须承认年龄特点。认为儿童什么都能干，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划上等号，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现在谈谈教学和教育方法问题。右倾分子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什么呢？右倾分子会说：要知道，方法是世代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上别自作聪明。要知道，过去教育出来的孩子要比现在好，纪律也比现在强。昨天，列宁格勒区开大会时，有人递了一张条子：“您的方法行不通，学校里秩序太乱。”落款是“一个过路人”。不过我知道他来自何方。这里的问题在于：对待儿童，对待学习，采用的是世代的老办法，人们害怕这种老办法遭到破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左”的偏向。我们的新方法源于西欧、美国，我们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没有对它加以检验，没有认真加以研究，把各种方法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认为“设计教学法^①”是唯一的、万灵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并未受过检验。是否应该向西方和美国学习方法呢？当然应该。举例说，我就记得列宁曾让我办过这么一件事。杜拉柯夫教授^②去过美国，列宁对我说：“你问问他，美国人用的什么方法。”后来，一位老党员的妻子来了，她在美国住了二十年，回国后参观我们的农村时，她说：“您们农村能做的事太少。在美国，那里的居民会做很多事。”列宁对我说：“详细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培养各种能力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全部经验，看看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和用什么态度对待成人和儿童。当然，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为依据。如果我们只是盲目照搬德国的方法、美国的方法，那就一点好处也没有。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教的是谎言和诬蔑，那是用的一种方法，而如果教的是真正的科学，如果教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就要用另一种方法。我们只能采用那种对我们适用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方法。我们应该对这一切进行深入的改造，以便真正能形成一种我们需

要的方法。

就拿设计教学法来说吧。在与杜拉柯夫谈话之后，受他的影响，我开始看了一些美国书籍。书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提到要把设计教学法用于农业。某校的学生要搞一项设计，比如说，要设计一个鸡笼，因为他打算养鸡。他设计怎样搞这个鸡笼，从何地能弄到有关品种的鸡，并且拟定一个完整的经营计划。这一计划送交学校讨论，由教师提出意见。教师 and 全班同学一起到提出这个计划的学生的经营地方去，与家长们一起讨论这个计划，然后签订合同。这里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这种值得借鉴之处在1923年给人什么启迪？首先，学生学会了计划，学会权衡各种手段和条件。我们俄国人要认真学会做计划；不仅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做计划，而且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都要做计划。否则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某个工厂刚修建一个新车间，过了一年却把这个车间拆了另建一个。一栋房子，今天维修，明天弄坏。由于我们俄国人不会做计划，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没有计划，不善于考虑各种条件，不会做计划，这是一大缺点。我们要学会做计划，列宁说过，我们应该学会工作：“我们俄国人要学会工作。”他晚年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他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学会工作^⑨。我们要掌握工作的技能。这种技能我们还未彻底掌握。而由于设计教学法可以使我们学会一定程度的制订计划、权衡条件（在许多细节方面让我们学会），可以使我们学会工作，所以这种方法还是很可贵的。美国的设计教学法中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它体现了务实观点，目的方针明确，注重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一个学生养鸡，然后按一定价格出售，这个学生拍拍口袋，表明他赚了多多少少钱。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像一根红线贯穿在美国的各种设计之中。因此，我们从这种设计教学法中所能学到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设计的能力，计划工作的能力，而个人主义则是我们不能吸取的。

1923年讨论这种方法时，主要是从政治教育工作的观点出发

来讨论的。我们主张在俱乐部工作和教学工作中采用设计教学法，目的在于多关心俱乐部的成员，多考虑他们的兴趣所在。这种设计教学法在政治教育工作中未能推广，它更多地是用于农业小组中。青年农民学校根据我们的精神把这种设计法加以改造后，也开始采用了。城市学校几乎没有采用。最近一段时期，大家认识到：学校应与生活保持更紧密的联系，理论应与实际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而设计教学法却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加之生活本身也有此要求，所以设计教学法在我国采用得就很广泛了，而采用得最广泛的是一级学校。不过对它的采用很有特色，什么东西都随心所欲地叫作设计法，例如把各种宣传工作也叫作设计法。当“帮助我国工厂完成工业财务计划”这一口号提出后，也把这叫作“设计法”。为什么？这里哪有什么计划，哪有劳动力配置，哪有克服困难之处，哪有公益效果？这些都没有。结果，我们往往把一些与设计法相距甚远的东西叫作设计法，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名副其实的设计非常之少。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我收到孩子们一封来信，孩子们在信中说，他们决定按设计法进行工作；他们在信中非常具体地、用孩子的口气讲到他们怎样制定这种设计，其中谈到扫盲工作等等。信的详细内容我记不住了，这封信不在手边。这当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设计。

如果认为其他一切方法都要淘汰，什么研究法、劳动法、直观法都要淘汰；认为有了设计法，其他方法都可弃置不用，这种态度当然是错误的，不值一提的^②。我们在培养实际的计划能力时，很需要设计教学法。当我们谈到五年计划，谈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时，全体教师都认识到，我们应该教儿童学会有计划地工作。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却不知道，于是就把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作的尝试，统统称之为设计法。这样一来，设计法就成了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有人就主张不要搞教学大纲了，只要提出一些设计就行了，等等。这样做行吗？这当然是对设计法这一概念本身的歪曲，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所以中

央指出必须寻求新的途径。中央的决定要求建立一个研究所，派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优秀而又坚强的干部到那里去，让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出一些新方法，能真正找出一些如何合理地、正确地安排教学工作的新途径。但是中央提出对新方法要慎重，新措施要通过试验来检验，要对我国学校目前进行的工作加以认真的研究。可是您们都知道，我们非常不善于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宣传。有时个别学校采取的办法和新的方法很好，而对此却沉默不语，认为“既然学校一切都好，那就行了。难道有必要登在报上？报道一下也好，但是没有时间写。”恰恰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忽略了普通教师所进行的巨大的创造性工作，而他们是在教育儿童，是在考虑如何更好地把知识传授给儿童以及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合理地组织学校生活的。中央还提出，我们研究所要特别重视对经验的检验，要推广经验，使个别的创举成为集体的财富，使这项工作是一项能经受检验的工作，使整个这项工作贯穿一种精神，即辩证唯物主义精神。要三思而后行。对我们的教学法也应如此。我们迫切需要新方法，因为我们首先要合理地安排教学工作。教学工作的安排要能做到合理分配儿童的时间。

我国的一批青年教师，毕业于七年制中学之后，上了四个月的短训班。我们对他们应予关心。这些教师在学校的工作如何呢？他们对孩子很好，他们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使学校井然有序。同志们都知道，我国现在的七年制学校能使儿童获得一定的组织熟巧。的确，只要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学生，看一看我国的少先队员，并且把他们与旧学校的学生加以比较，那么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学生与过去完全不同。旧学校的学生什么也不会干，而现在的孩子就组织方面而言，都是一些心灵手巧的人。诚然，他们难免有错别字，把“彼得罗夫”写成“皮得罗夫”，但是，我要再说一遍，就组织方面而言，他们都是一些心灵手巧的人。不过从总的方面看来，青年教师教学经验往往不足，他们不懂教学法。举例说，

他们往往一连两小时教数学。而我们的教学法跑到哪儿去了呢？教学法，你在何处呢？研究儿童，又表现在何处呢？因此，应该让我们的青年教师知道怎样安排儿童的时间，怎样把教学大纲的时间安排得很经济，以免用一刻钟的时间去倒墨水或找书，或者瞎忙一阵，而这种情况在学校里是屡见不鲜的。学校里的整个制度要非常合理，而这取决于很多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纪律问题的难度。我已讲过，目前中央特别重视教学法，中央号召学习教学法，因此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工作，既要制订新的一般教学法，又要制订个别学科的教学法，即分科教学法。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从科学的观点加以考虑，因为每门知识都有自己的结构，必须使教学法与内容联系起来并且符合我们总的方针。

同志们，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教师问题上也存在着种种偏向。右倾分子说：“教师乃一校之主”，而不说明是什么样的教师。“左”倾分子则说：“教师对学校的工作干预得越少越好。他要撒手不管也非坏事；学校将会更快成为儿童组织。”

中央的决定十分关怀教师。只要我们翻阅一下决定，我们就会发现，决定中谈到了物质待遇，谈到要从教师中提拔一些最有才能、最有牺牲精神的教师；决定还反对把教师当作某种无足轻重的人。中央指出必须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提拔最有才能、最有牺牲精神的教师。中央指出要从教学法上帮助教师，中央特别强调教师的质量。

末了，我要讲讲儿童组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右的偏差，又有“左”的偏差。有些教师往往认为：儿童组织、学校组织都只不过是教师的助手；学生委员会只应该召集家长开会。教师自己出面召集家长开会目前有所不便，而如果由学校组织来召集，则情况又当别论。右倾分子就是这样看待学校组织的，他们把学校组织的巨大教育作用忘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则是“左”的偏差。“左”倾分子说，成人对学校的干涉越少越好。中央是怎样讲的呢？中央承认学校组织的重要性，但是学校组织应该关心学习质量的

提高，激发儿童以自觉的态度对待事业，养成自觉的纪律。我们知道，有许多途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学校的儿童组织如何提高学习质量？右倾分子认为，学生委员会应召集家长开会，一般说来它应极其严肃。但我们知道还有别的途径。我们知道，即使在旧学校里，成绩好的学生还经常帮助学习比较差的。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让我们的学校组织、儿童组织尽力把这种互助搞得更好，并且形成一种儿童舆论。您们都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儿童对同学的意见比对教师或家长的意见更容易接受。所以，在儿童组织中形成这种舆论，让孩子们反对不守纪律、不讲秩序的表现，让他们经常帮助比较差的同学，所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巩固纪律的共同工作和这种互助，对学校说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要让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认真讨论这一问题。

同志们，您们都已看到，中央的整个决定是对我们全部工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指示。决定中还有对马克思主义教师的指示，决定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应该研究一下如何在教师的日常工作中对教师进行教学法帮助的各种基本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的工作，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综合技术教育部的工作搞得最有意思。该部制定了文化计划。但是现在考虑到中央的决定，我认为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就是我们应搞好研究儿童和儿童集体的工作，深入研究如何组织学校工作、安排全校生活的问题。要特别重视对各种方法的讨论、制定，重视教学大纲和大纲内容的讨论。在这方面，对我们说来重要的是尽可能密切地与普通教师加强联系，帮助他们搞好教学工作。我们应该这样来帮助教师，使他们的每种主张、倡议和新的创举都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而做到人人皆知。恳请大家鼎力帮助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

为建立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 学校而奋斗

共青团应该特别认真地对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①。我国青年渴望掌握知识和技术，但是往往认为小学的问题是部里的问题。然而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常常是密切相关的。学校应该为掌握技术、掌握科学成就开辟道路，它应该教学生学会按共产主义态度学习和工作。我们常常谈到文化革命。但是我们往往只是把文化革命的概念与司令部、文化总动员、突击任务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文化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它的实质在于群众要掌握技术，掌握科学成就，学会把这种科技成就运用于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生活。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仅仅跨出了第一步。群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掌握技术和科学成就，而需要进行顽强的、经常的工作。

要掌握技术、掌握科学，首先就得具备丰富的普通教育知识，否则是不行的，它只能是镜花水月，只能是美好的愿望。正因为如此，中央委员会在决定中强调指出，重要的是使学校能授予学生一些基础知识。学校不仅要使学生在知识水平上有提高，而且还要使他们获得实际熟巧，让他们学会独立学习；养成读严肃的书籍的习惯，会使用参考书，能将耳闻目睹的事记录下来，会统计、计算，懂得最重要的科学的原理，否则就很难了解周围的生活，更不用说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生活了。

我们已经开始创办综合技术教育学校，高年级学生开始进工

厂了，不过他们的劳动往往与学习、与理论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系。中央委员会已指出这是不能允许的。

中央委员会在决定中指出关于“学校消亡”的种种论调^②的危害性。

从前有一段时间，一所群众学校也没有，群众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工厂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是与使用集体的劳动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集体工作要求一定的劳动组织，要求起码的文化熟巧。资本主义开办了群众学校，这种学校能授予学生一定的知识。但是，资产阶级在授予这些知识时，总是力图通过学校来模糊青年一代的意识。在苏维埃国家里，学校的宗旨完全不同：学校授予知识，同时培养共产主义者，它竭力把青年培养成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人。

学校在将来也不会消亡，因为学生的年龄特点将一直存在下去。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三岁的小孩，七岁的小孩和十二岁的小孩。他们的教育和教学在未来也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系统的社会教育以及成人对儿童集体的教育。学校还将存在，不过形式将有改变。孩子们将更有水平，更为友好，更有组织性。教师将不同于现在。他们除了教学活动之外，可能还有别的工作：有人在机床上干活，有人当飞行员等等，但是，学校和教育过程依然存在。

说什么学校将要消亡，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越快越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现在的学校乃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全体儿童的工具。我们正在实行义务教育。实行义务教育的还有别的一些国家，但是教学生学习共产主义的义务学校，在别国却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关心我国学校的建设，提高学校的质量。

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大家都来关心学校，关心教师，帮助教师。

普及教育需要大批新的教师，成千上万没有经验的青年涌进

了教师的队伍。他们特别需要教学法上的帮助。所以中央委员会号召共产党员认真研究教学法问题，要培养一批能干的教学法专家，要建立模范学校，通过示范来帮助青年教师。共青团应通过少先队组织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告诉学生，并对他们提出简单明了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自觉地对待这项工作，组织互助。

旧时学校的优秀学生，学得比较好的学生，也常常帮助学得差的学生。他们到校早些，给学得差的同学讲解功课。要使班上的每个小组都关心全组学习质量的提高。要在儿童中形成一定的舆论，使上课迟到、在班上淘气、学习马虎的人感到难为情。要互相帮助。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上课迟到了，同学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原因。也许是他妈妈让他干的家务事太多，那就要找他妈妈谈谈，让她别这样。再比如，有的孩子没有意志力，他虽然按时离家，却未及时到校——一路上东张西望，打架斗殴，那就要找一个自制力较强的同学跟他一起上学。谁算术学得好，就去帮助那个学得差的。有的人喜欢地理，就让他去培养别人对这门课的兴趣。

学校要成为一个友好的集体，能集体开展工作。少先队要用这种精神教育儿童。

知识就是力量。学校也应该用这种力量来武装儿童，共青团应该在这项工作中帮助学校。

在建设我国苏维埃学校方面，还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教学工作要经过科学的考虑，把一些无用的知识从教学大纲中删除，而讲授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教学法要有助于知识的掌握，使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而又能为儿童所理解。

学校也是一条斗争战线。旧意识还很顽强。很多人主张：新事物越少越好。他们想把学校拖向后退。对这种右倾思想必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向后倒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有的人不去克服困难，而是绕着困难走；有的人不知道学会认真负责地工作多么重要；有的人制订各种新方案，面铺得很宽，而不知道自己

远远脱离了生活；对于上述种种现象，都要进行斗争。

我们要全力以赴，创办我国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为此，人人都要勤奋工作，共青团更应走在前头。

教师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 苏维埃教育家

教师要提高教学质量，就要掌握教学的艺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个问题正是国家学术委员会学校部所研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它已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表述这些结论。

教师首先应该了解自己所教的这门课程，了解他所讲授的科学及其原理。他应该明白这门科学的精神实质，它的现状如何，它经历了哪些主要发展阶段，它与别的科学和社会现象有何联系；他要知道这门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它与生活和实际的联系。总而言之，他应该掌握辩证法的科学原理，因为只有掌握了辩证法，才能彻底揭示这门科学的特性和特点。科学原理可能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烦琐地来理解，但苏维埃教师却应该辩证地来理解。

教师对所授科学辩证原理的知识是必要的，但远非唯一的。另一个条件就是要掌握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的技能，善于介绍事物、现象，不是泛泛而论，而要利用现代技术的一切手段揭示其中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教师要善于解释现象，同时懂得运用具体性的作用，能从具体到一般，掌握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他要能向学生证明自己论断的正确性，帮助学生掌握、记住所讲授的材料，学会把所得到的知识运用于实际，把知识变为前进的动力。有些教师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多半带有纯经验的性质。

只有最新的科学成就，如神经心理学，才能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论证知识的传授方法。

最后，第三点，教师还应掌握儿童学，也就是说，要了解儿童在感知和思维上的年龄特点，儿童在每一年龄阶段的发展条件，当代儿童生活经验的容量，这种经验的性质和深度。要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向儿童传授知识的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员都应掌握他所讲授的这门科学的辩证原理知识，掌握讲授知识的一般方法，了解儿童思维的年龄特点，了解他的生活经验的容量和性质。

但是，每一门课程，每一门知识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难点（这些特点和难点在该门知识的发展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自己特有的认识方法（例如，在自然科学中起特殊作用的是观察和实验，在数学中则是形式逻辑，等等），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的性质（数学是一种性质，文学是一种性质，自然学科又是另一种性质，等等）。由于有着这些特点，每门学科都要考虑到向不同年龄的儿童讲授时的不同方法，要考虑怎样衔接，怎样讲授。这就是每门学科教学法的实质所在。

我们应该研究前人在教学方面所积累的全部经验——长期以来在文化发展上处于先进地位的各国的经验，要根据我们的观点、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对这种经验加以分析、改造。我们有着西方、美国的丰富经验，有着革命前俄国的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和改造这种经验。我们还应该对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教师们们在各门知识领域所进行的巨大的创造性工作进行研究和分析。

向青年教师传授教学技术也有其特点。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讲述要通俗、具体，通过实例来说明，要正确地安排实习。

研究讲授过程的理论基础，观察这一过程的进行情况，分析观察的结果，对每门学科的教学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这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全体苏维埃教师必须群策群力，完成这一任务。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①和学前 教育的任务

(1932年5月7日报告摘要)

怎样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学龄前儿童？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危险，就是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把共产主义教育理解为让儿童背诵一定的共产主义词句。有人认为，只要我们张贴一张标语，然后告诉儿童要拥护共产党，那我们就尽到了责任。我们教儿童一些大道理，但往往没有考虑到儿童并不懂得而且也不可能懂得这些大道理。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学龄前儿童。比如说，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跑来说：“妈妈，伊凡诺夫一家不都是共产党员吗？可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列宁是红色的呀！”妈妈回答说：“是的，是红色的。”“可是伊凡诺夫一家却把列宁弄成白色的。”原来，这个小女孩看到用石膏做的列宁塑像。还有这样的谈话：有的家庭人口很多，父亲，兄弟全住在一起，后来纷纷迁居到别的城市，家里只剩下妈妈与小儿子。小儿子就问：“妈妈，我们从前是富农吗？”妈妈说：“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因为我们以前人口很多，现在我们是贫农了；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了。从前人口多，现在人口少。”您瞧，他们的小脑袋想些什么，一切都是按自己的理解。他们的视野和生活经验的范围都很狭窄。成人往往不能站在儿童的观点上来看问题。比如，孩子就很喜欢破冰船是“红色的”等等。母亲

对他讲，有几个飞行员降落到沙漠地里了，饥寒交加。这时他就会说：“这是奇怪的事，说明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制度。”你要问他为什么，他会说：“他们怎么不知道，各地都有合作社呀！”他根本不明白，沙漠上是没有合作社的。凡是与学龄前儿童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些字眼，成人已有一定的意义，他们却给它一些完全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儿童还喜欢模仿。他们能背诵一些词句。有时一个男孩或女孩突然讲出一番话，使人觉得他们俨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家长们很高兴：这孩子什么都明白。可仔细一了解，原来不过是这孩子重复讲述一些偶然听来的话语，他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我们要注意，可别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只会讲大道理的人。儿童对周围生活中一些往往很简单的事物和现象都缺乏起码的知识。无论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还是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都需要经常扩大儿童的知识范围。这并不是说只应当向儿童讲一些他们明显地懂得的东西，降低到他们能理解的水平上。例如，既然儿童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应该当他们面使用这个词。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因为成人说的某一句话，往往使儿童终生难忘，当他们长大一些之后，他就会想起这句话而可能影响到他的整个发展。我记得童年时有这么一件事：我六岁时，有一次跟父母一起坐着一辆地主家的马车（当时还没有修铁路，出门是坐马车）。我们经过一座村子时，迎面来了一辆农民的雪橇，拖着一具空棺材。我们坐的是三套马的车，转弯不及，马车夫把棺材撞翻了。我记得，那个农民把我们的车夫打得鲜血直流，一边说着：“你是地主的狗腿子。要把你和你拉的地主塞进冰窟窿才解恨。”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父亲说的一句话我却记住了：“这就是农民对地主的血海深仇。”这句话以及车夫挨打的情景却使我终生难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以后的发展。我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农民如此仇恨地主。我特别注意去了解地主怎样剥削农民，榨取他们的血汗。

因此，教养员有时对孩子们讲一点他们当时还不懂的话，这

还是很重要的。我这绝不是说，我们要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孩子们能背上一句口号或一首短诗，就是受到了共产主义教育。这还不能算作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应该用知识武装儿童，让他们掌握一些研究周围情况的方法，同时我们还要观察儿童，观察他们本人如何研究周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就不大重视模仿的作用。要知道，儿童不是瞎模仿的。儿童在模仿时，他是机械地重复别人的动作，这样他就能更好地理解别人在做什么。

要观察儿童如何掌握周围的情况，观察时要特别留心。去年我碰到过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六岁的女孩望着天空，边跳边说：“没有上帝，没有神仙，这些鬼话，都是神甫在瞎编。”另一个孩子也同时随声附合地重复着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觉得这两个孩子是彻底地反宗教的。可是后来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孩子在上学时却说：“你知道吗，一个我认识的小男孩对我说，所有的树都是活的东西。”另一个女孩也说：“是的，是的，我也发现了：树与树还说悄悄话呢！”这是地道的神秘论。您怎样让孩子们不受这种神秘论的影响呢？他们知道既无上帝，也无神仙，可是依然相信那些胡说。深入观察、仔细了解、认真研究儿童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儿童的绘画很有益处。低年级的男女学前儿童往往不是画的个别物体，而是一整张图画。根据这种图画，我们可以对儿童观念进行判断，判断哪些东西是他们懂了的，哪些是没有明白的。我曾经看到预备班的一个小孩子画的一幅图画。他起初画的人，双手都是固定的，不能动的。他不懂得双手是可以活动的。

我常常看孩子们的图画，发现他们画的双手不是高高伸开，就是下垂在胸前。后来，等这个孩子进了幼儿园，开始用双手干活的时候，他的画法就改变了：他对双手的画法是不同的。他开始注意双手在干什么，于是每只手的画法就有所不同：一只手提着水桶，另一只手拿着笤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一本练习本上，就可以看到儿童对人的概念的发展过程。刚开始，所画的人不过是一个不能活动的物体，后来却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一个

人站在拖拉机旁，一只手掌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把斧子。他开始关心斧头这种劳动工具了，开始关心机器来了，他对人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如果我们偶而看看儿童的图画，我们就能根据这些图画发现儿童是怎样理解各种事物的。

要全面地研究儿童，以便学会正确地对待他们。要知道，往往一种很普通的尖叫声或者一种威胁，都会使他终生变得胆怯害怕。例如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我九十年代住在列宁格勒时，常坐铁轨马车到沃洛达尔区去。那里有一座圣母像，一些腿瘸眼瞎的人都到那里去。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妇女领着一个四岁左右的男孩。每当有人与这个男孩谈话时，他就十分害怕，两眼泪水汪汪。他的奶奶说，这孩子的父亲是个酒鬼，有一次打了这孩子一顿，从此以后，这孩子见人就害怕。老奶奶希望圣母能治好他的病。

不久前，我见到一个小女孩。她是上了幼儿园的，也很怕见人。谁要一走进来，她就喊道：“不要，不要。”见到一个新鲜东西，她就眼泪汪汪地喊道：“不要，不要。”显然，她是害怕什么东西。去年她上过托儿所，这一现象出现在上托儿所之后。这个女孩三岁多一点。看来她有过这样的经历，即被什么人用什么东西吓坏了。对成人说来，那也许并不可怕，而对孩子说来却很可怕。而现在却要费很大力气来消除使她变得如此胆小害怕的印象。还有一个小男孩，有一次走过一幢正在修建中的房子，随手拿了一块木板。一个工人开玩笑地说：“你偷木板，我这就把你抓起来。”这可把这个小男孩吓坏了。这一年，凡是见到这个小男孩的人，都发现他变得非常胆怯了。对孩子的态度要特别谨慎，尤其是对学龄前儿童。总的说来，在学前工作中，我们对孩子的态度还是很好的。应该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学前工作是新开展起来的，它没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那些坏习气。

我们之所以必须全面研究儿童，因为他们是我们要进行加工的原材料，如果我们对之不了解，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对待我们

的工作。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要重视年龄特点。我们发现儿童特别要求具体性——他们对一切东西都要摸一摸，从不同方面看一看，有时甚至想用舌头舔一舔。列宁的姐姐说，列宁小的时候，有一次有人送给他一个三套马车的玩具。他带着这个玩具不知到什么地方玩去了。大人们找呀找，等了很久，后来才发现他坐在门后，把三条马的腿全扯了下来，放在旁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想数一数马有几条腿，于是就把马腿全扯了下来放在旁边。

如果您去观察儿童，您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喜欢具体化：要尝试一下，仔细看看，动手摸摸。儿童的这种要求特别强烈。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是不了解儿童。其次就是儿童的模仿力，这种模仿力连幼小的动物也是有的。这是掌握知识的一种方法——儿童什么都想自己动手做。比如说，如果大人朝前跑，那么小孩一定跟在他身后跑。

我们不能压抑儿童的积极性。模仿就是一种积极性。游戏就是通过亲身的实验进行的一种检验。我们往往对游戏的作用估计不足，没有考虑到儿童在游戏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学龄前儿童所做的一切还不能称作劳动，因为劳动是有明确目的的，而儿童的情况却是：开始想用粘土捏一个有用的东西，可是在捏制的过程中却想改做别的。于是他就要捏一个炉子，一边捏一边又在想：也许最好捏一个泥人。于是他又开始捏泥人。这就是儿童年龄的特点。儿童这种事先未能想到的创造性念头，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在教儿童从事劳动时，我们应该影响儿童，不过我们不要伤害了儿童的主动性。我们要做到：在影响儿童时，要尽量别挫伤儿童的首创精神；恰恰相反，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发扬这种首创精神，并且要巩固儿童自发地掌握的学习方法。还有一种情况，也反映了儿童的一种年龄特点：孩子们有时能耐心地把一首诗听十四、五遍。他早已会背这首诗了，但还是一再重念。显然，他是想掌握某些单词，掌握某些词组。如果有人问，我们去研究儿童以及儿童掌握知识的方法就是背离我们的原则，就是回到经验

主义，那么，这种说法就是完全错误的。医生如果不了解病情，又怎么能治好病？如果我们不了解年龄特点以及儿童生长环境的特点，难道就能把儿童培养好吗？

我还想谈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教育问题。我们谈到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时，往往说的是国际主义教育和反宗教教育，然而共产主义教育却不止于这两方面。必须特别重视同情谊，善于集体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对儿童的游戏加以重视。游戏可以教儿童学会集体行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在某些时刻能使自己的工作和行动与别人的工作和行动协调一致。就这一点而言，游戏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我们有时却对游戏的这种意义估计不足。我们往往挑选了一些不应该让儿童参与的游戏。例如，我们有时进行“白匪与红军打仗”的游戏。孩子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白匪，什么叫红军。我上面已举了一个例子，说是一个小女孩讲的，列宁不是白色的，而是红色的。他们的理解过于简单。成人赋予白与红这两个词的社会含义，儿童们还不具备。

因此，白匪与红军的游戏就完全成了一场混战：看谁把谁打败。这种游戏就达不到教育者提出的目的。有许多游戏是早已形成的，只要换个名称，想出个别的叫法就行。过去有这样一种游戏：“国王，您好！”“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好！你们到哪儿去了？”“到森林去了！”“在那儿干什么呀？”于是所有的小朋友就表演他们刚才做了什么。现在只需要把这种游戏改换一下词句就行。把国王换成集体农庄主席，把国王的孩子换成集体农庄庄员。这些庄员讲一讲他们干了什么。这种游戏很能吸引儿童，同时也可使他们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应该在研究周围生活的同时，寻求在生活和游戏之间架设桥梁的形式。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例如，我们对玩具就很少研究。现在莫斯科正举办玩具展览会。您们大多数人可能参观了 this 展览会，不过我不了解您们的评价如何。我担心这次玩具展览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教育的目的。例如，常常

给孩子们一些工厂制造的玩具。学龄前儿童对此全然不感兴趣。某一个小女孩用纸做的公鸡往往比工厂制造的小鸟更珍贵。评价一个玩具的价值，应该看这个玩具是否有助于研究周围的生活，是否有助于发扬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玩具对研究周围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游戏就在组织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特别重视儿童的游戏，因为这是培养儿童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自制力的途径。

使儿童具有集体的体验也是特别重要的。讲得娓娓动听的儿童故事，在班级展出一幅图画，或者在音乐声中散步游玩，凡此种都能起到一定的组织作用，并使儿童学会集体地生活、集体地工作和集体地感受。这样一来，儿童就在不知不觉中紧靠集体，不与集体对立，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集体中真正的一员。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这种集体感受的能力、集体行动的能力和集体工作的能力。当然，儿童的工作不同于成人的工作。所以，儿童的游戏与工作之间的差别要比成人的大。要使劳动有组织，尤为重要的，是要使儿童对劳动的目的感到亲切易懂。我国有些教师往往认为，他们向儿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这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从集体主义的观点看，最有组织作用的目的通常都是为儿童本人感到亲切易懂的目的。而教师向儿童提出的目的往往不能把儿童组织起来，于是教师大为惊奇：这个目的很好，可是孩子们不感兴趣。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一目的让儿童感到亲切易懂，这样就有助于把集体劳动组织起来。可以向儿童介绍许多方法，让他们学会集体地行动。要具体告诉儿童，两个人在一起工作时，怎样才能避免一人干、一人看的现象产生；告诉他们小组应如何开展工作。然后，特别重要的是要把儿童培养成自觉的集体主义者，从儿童的观点出发来讨论游戏和劳动问题。每年每个班的孩子都要订一个很简单的规划，这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规划非得刻板地执行不可，而要因班而异。农村班就完全不同于城市班。手工业者的孩子所在的班就不同于

工厂工人的孩子所在的班。要考虑环境，考虑环境的差异，而学龄前儿童的环境差异是很大的。有时出现这样一种偏向：对全体孩子用同一尺度来衡量，这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我国工人的孩子看起来比较笨，知识少。教师中一部分思想反动的人正是这样叫嚷的：瞧，知识分子的孩子要聪明得多。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不善于对待，不善于发现不同居民的孩子所在班的儿童特点和优点。有些教师往往不会采取一种有助于这些儿童显现自己才能的办法。如果办法得当，就会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很聪明的。不要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孩子。我们对游戏的形式，对儿童劳动的形式都要认真加以研究才好。

要使劳动日常生活化。旧时的家庭都能培养某些劳动熟巧。现在，从前的家庭劳动转向了工厂、食堂等地之后，儿童学到的劳动熟巧就比过去要少，因此，儿童之家、幼儿园应该创造一种环境，使孩子们能获得各种劳动熟巧。

同志们，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我还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工作。

各民族省和民族共和国建立的一座座工厂，以及农业的集体化，凡此种种，都使旧的生活习俗从根本上得以消除。但是还需要对居民进行大量工作，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旧的残余。这要更困难一些。在这方面，学前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学校是男女儿童同校，然而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旧的偏见，由于性别上的偏见，却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地方的家长对男女儿童同在一个学前机关是看不惯的。在这些地方，重要的是从学龄前教育开始就采取男女合校的办法。少数民族在我国旧政权下备受欺压凌辱，我们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旧的残余和宗教迷信以及半奴隶制观点的残余。当然，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但是，要想根除日常生活中旧的残余，就需要特别重视学前教育。

如果我们从幼儿园、即从儿童机构的观点来看待第十七次代

表会议的决议，那我们就会发现，幼儿园这类学前机构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家长们的自觉参加这一工作，他们对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认识，都将有助于大大推动这项工作向前发展。

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决定

我国学校现在已经拥有大量学生，学校的比重增加了，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党纲对学校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提出的任务，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党中央最近如此重视学校。“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①

学校应以知识武装青年一代的每一个人。知识就是力量。以前，知识一直是少数上层人物的财富，它是统治阶级手中进行奴役的强大武器；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法堵塞群众取得知识的道路。它们授予群众的知识却是虚假的，被歪曲了的，数量既少，也不成体系。

1918年1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剥削手段。这些我们都知道，为了实现这一最伟大的历史任务，难道还不值得努力工作，还不值得献出全部力量吗？劳动人民一定要完成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②

使知识成为全民的财富，这就是我国学校面临的任务。这项

任务是艰巨的，光靠学校是无法完成的，因为不仅要在孩子中间开展工作，而且也要在成人中间开展工作。但是学校在这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本文中不想涉及这些原因），我国学校在用知识武装学生方面，工作做得很差。学校未能贯彻它应该贯彻的方针，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在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这一缺点更是不能允许的。中央委员会在1931年9月5日的决定^③中指出了学校这一带根本性的缺点。这一缺点现在已有很大改正，但远远不够彻底，所以中央在1932年8月25日又作出了新的决定。教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教什么——这取决于教学大纲。中央指出教学大纲份量过重。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缺点。重要的是，不要把每一方面的知识都尽量地纳入教学大纲，而要把最本质、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选进去。有的教学大纲可能内容广泛，但同时也很有可能没有把科学基础知识包括在内。要从这个角度对所制订的教学大纲作仔细的检查。在制订教学大纲时，充分估计到学生现有的知识量并以此为根据制订每年的教学大纲，这是特别重要的。不能过高地估计学生的力量，要十分了解他们的水平。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来纠正“孩子们什么都能干”的错误观点。因此，我们不能忘记：学生不可能对任何教学大纲都掌握。

中央也指出了各门教学大纲之间联系不够。教学大纲所授予的知识，要能为唯物主义世界观打下牢固的基础，因此各门教学大纲应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如果缺乏联系，就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重复，而主要的是学生应掌握的各门知识之间的实际联系就会化为乌有。不要使各门课程彼此隔离，而要体现出其间的联系。

中央还指出必须使各门课程的教学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实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使教学有了活力，可使教学更接近生活。

中央指出了许多教学大纲存在的种种原则性错误，以及某些制订大纲的人对自己的工作采取的简单庸俗的态度。中央还指出，所讲授的材料应该是经过科学上认真审定过的，教学大纲应考虑到年龄特点，但不能讲一些虚假的知识，用这些知识去“适应”儿

童的需要。教学中应该努力消除不科学的这个重大缺点。

我们应该在发展中来讲授各种现象，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使青年一代学会辩证地思考，学会朝前看，预见事件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央坚持必须以历史的态度来研究社会现象，要求“加强社会学科、语言和文学、地理教学大纲中的历史主义因素，在讲授这些学科的基本部分和专题时，必须采用历史材料，进行历史参观和比较。”

中央指出教学大纲必须包括有关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化、文学、艺术、历史发展的知识，这是很重要的。中央的这一指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至今还未彻底纠正对苏联领土上各民族的特点采取旧的、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国主义的轻视态度，以及对各民族的发展估计不足的种种偏向。

党纲指出，我国学校应是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应把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中央1932年8月25日的决定强调指出了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正确安排劳动教育的意义。从苏维埃学校建立之初开始，就在学校实行了劳动教育，我们已经有了十五年经验，我们已经可以据此找到这项工作的正确路线。最初几年，人们往往把劳动教育归结为自我服务（擦地板，挑水，烧饭等等）。这是由于严重的经济凋蔽引起的。

这样安排学校的劳动是不正确的。但是，劳动教育应该包含自我服务的因素，因为我们想改善一般的生活方式，使它更加合理。在安排劳动教育时，有的学校往往步入了手工艺匠的道路，完全无视我国在工业化、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们只是授予学生一些狭隘的手工熟巧，而这种熟巧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计划经济却毫无联系。既然已经看到这种做法的错误，那就应该使学生掌握使用基本工具的技能，同时应该明确规定至少应掌握哪些熟巧。否则，不管你是开机器或拖拉机，是装配机器还是制作模型，都是不行的。

不仅于此，还要授予学生工艺学、动力学、机械学方面的知

识，把这种知识与开机器、驾驶汽车的技能联系起来，与合理地安排工作的技能联系起来，计划自己的工作，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检查，等等。

学生在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工厂与成年工人一起干活，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种活动是企业有计划的总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不能简单地把孩子们当“劳动力”，他们的活动应从属于教养和教育的目的。在实际工作中，日常生活的劳动往往失去了综合技术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学校和教师都应更加关心如何把学生在工厂的劳动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把生产劳动与普通教育知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应从教育学上加以认真考虑。与此同时，必须在学生中广泛地开展校外技术宣传。

中央关于修订教学大纲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教什么的问题。

不过中央也讲到，问题不止于教什么，还有怎么教的问题；不只是教学大纲的问题，还有教学法的问题。

在教学法问题上，我们也应纠正放任自流的现象，不要老是摇摆不定，时而完全倾向旧的方法，时而倒脏水时又连孩子一起泼了出去，把旧的东西全盘否定，不善于存其精华，并且把这种好的东西与新事物联系起来，使它成为新事物的基础。不要再去追求什么最新的、“包罗万象”的方法。各种进步的教育学书籍早已指出，教师应把他所负责的班级和整个教学集体的工作搞好，同时他应该了解每一个学生，领导他们的活动，不要把自己的部分职责转嫁给组长这样一些成绩最优秀的学生^④。书中还指出，教师讲课要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引起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善于生动具体、简单明了地向孩子们讲述许多问题，利用标语、实验和参观增长学生的知识。

书中谈到，教师应善于安排儿童的学习和劳动，教他们学会独立学习，并且应经常帮助他们。

每一位优秀的教师都应做到这一点。

不过他同时还应该教孩子们学会在小组、小队集体里，有计

划地进行工作，要在教学和劳动的过程中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公民，成为社会活动家，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来按照新的方式，即社会主义方式安排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工作。

中央要求对各种苏维埃工作的执行情况和完成结果进行检查总结。对于教育工作，中央也要求进行切实的总结。如果一个教师不能准确地了解学生的知识情况，他就不能讲好自己的课程。所以中央要求教师注意学生的成绩，每个学季结束时对学生成绩作出鉴定，指出他掌握了的知识是什么，未掌握的知识是什么，应该从哪方面进行帮助。学年结束时要进行考试。评定学生的成绩不是教师本人，而是由某一集体来负责。这种检查已不只是对学生成绩的检查，而且也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检查。

要想培养苏维埃国家的自觉公民，培养能把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代人，那就要使每个学生养成自觉的纪律，他们能够使自己的意志服从集体的意志，能够把握自己，成为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的战士。教育工作越是进行得好，每个学生就越容易做到这一点。然而学校迄今为止并非一向都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学校的影响往往很薄弱，家庭和街道的影响却更大。我们对工厂的财产、集体农庄的财产都很爱护，难道我们能不爱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未来吗？

常常有这样的事：有的少年儿童在生活中遭到挫折，受到街道和离散的家庭的影响，他们上学之后，开始把别的孩子带坏，讲下流话，耍流氓，领着别的孩子去偷东西、干坏事。这时，学校为了使别的孩子不受影响，就把这个学生开除一至三年。

这种开除的做法说明教师软弱无能，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顽皮捣蛋的学生，他在学生心目中威信不高，全校的教育工作很薄弱。但是，我们不能想入非非，而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有时不得不采取开除学生的办法，这是对学生实行社会保护的一种措施。

有一部分教师（我们认为，为数很少）受旧传统的影响很深，

工作上虽能勉强应付，但他们不明白当代的苏维埃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学校，想把中央的决定看作可以在学校实行一系列惩罚的依据，希望走回头路，又去求助于旧的奴隶式的而非自觉的纪律。这是对中央决定的曲解。

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对学校的要求已不同了，学校要把学生培养成不同于过去的人。

当然，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要知道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重要的是谁去教。所以，中央强调指出必须系统地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中央还讲到要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更加关心他们的疾苦，减轻他们一些不必要的负担，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一心一意投入学校工作，把学校工作提到必要水平上。中央认为，教师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工作，因此教师在子女、供应和权利问题上享有同工人同等的待遇。

我们知道，中央的决定涉及到学校一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这个决定将有助我们掌握必要的知识，迅速地建设我国青年一代真正的列宁主义综合技术学校。

评价教师的标准

1. 教师应是社会活动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2. 教师应熟悉本门学科及其教育特点，以及由这门学科的实质而产生的特殊的任务和方式。
3. 教师应能把教学工作与教育工作结合起来。
4. 教师应了解本班情况，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全班面貌，班级的优点和缺点，班级的情绪及其产生原因；教师应了解每个学生及其生活条件，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应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分别对待的态度。
5. 教师在学生中间应有威信，受到尊敬。
6. 教师应懂得科学组织劳动的原理，善于组织儿童的集体工作，避免无人负责现象，能把竞赛提到社会主义竞赛的水平以利于集体的巩固。
7. 教师应能懂得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并善于将其付诸实践，善于影响少先队辅导员并使少先队组织成为优秀学生真正先进的队伍。
8. 教师应掌握教学法，善于简单明了、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讲述某种事实或事件，善于用鲜明的事例、图片或通过参观及劳动的方法讲述短文，从而使课程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要善于提出问题以弄清学生理解的程度和掌握的深度；善于发现学生不明白的地方，然后详细地加以讲解；善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布置一些能启迪这种主动性的作业；善于妥当地在学生之间分配

任务，使每个学生随时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进步和提高；善于通过辅导答疑和系统的检查来教学生学会独立工作。

9. 教师备课时应突出重点，次要的只需略加说明；备课应从教学法上认真考虑；要善于发动全班预习功课，其办法是事先布置学生阅读一定的材料，观察某些现象，以激发他们对该问题的兴趣。

10. 教师应善于检查学生对所讲授材料的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检查对材料的牢记程度，了解学生是否能把所掌握的材料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11. 教师应善于组织学生从事该门学科的校外工作——成立固定的和临时的小组；组织学生开展旨在实际运用所学知识的活动。

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

每一门学科——数学、生物、历史等等——都要研究一系列多少有些相同的现象。

上列的每一门课程里，都有大量的事实以及从各种不同观点（有唯心主义的，也有唯物主义的）来讨论这些事实的许多著作。问题在于怎样从所有这些材料中选出最必要最本质的东西；怎样把材料系统化；怎样把材料安排得使学习它的人能异常清楚而确切地了解某类现象的本质。换句话说，能使他了解这门科学的原理。科学原理的知识能使学生通晓某类现象，通晓他们在今后将会遇到的各种新的事实。列宁在谈到必须掌握科学原理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必须了解每一知识领域里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①。

要想妥善解决正确选择和安排材料的问题，就必须以辩证法为指南。

1920年末到1921年初，共产党内对工会问题展开了争论，当时列宁曾给辩证法下了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他说：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②

列宁本人在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时就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辩证法。

举例来说。列宁是怎样研究资本主义这种现象的呢？当民粹派分子扬言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时候，列宁撰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重要科学著作作为回答^③。列宁力图在这本著作里把握和研究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尤其是他在研究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情况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他在各个部分都指出了从旧的、前资本主义形式怎样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他研究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而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即俄国改革时期以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他既揭示了资本主义落后的一面，也指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分析了扩大落后的黑暗面和扩大进步面的政治条件。列宁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工农生活的影响。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时候，不是单独地考察俄国的资本主义，而是联系了其他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来研究，他也考察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他研究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想寻求这样一种道路，即怎样加强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组织性，指出消灭资本主义并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它的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前进的原动力。这是人类所需要的。

我们可以从列宁的著作里找到许多材料，这些材料能告诉我们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各种社会现象。

我们在编制中小学教学大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教材并且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教材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辩证法为指南。

我们在学习例如数学的时候，应该研究数学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还要使儿童明白几何、算术和代数之间的联系。

要使儿童明白数学对于研究技术和把技术提到最高水平所起的作用,明白学习数学对研究自然力(例如天文学)所起的作用,明白数学对组织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统计、计算、计划的作用)。其实,最好能出版一套通俗又浅显的书,来说明怎样依靠数学越来越深入地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怎样依靠数学去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生活。

数学教学本身应该进行得使儿童能够清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应该把学生自己编应用题的工作提到最高的程度。要使儿童在编应用题(取材于周围的生活)、比较和概括应用题的过程中,能够明白数学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各种现象的规律。学校必须培养儿童通过“数学眼镜”来观察各种现象的能力。

举另一课程——历史——作例子来说明。

必须全面地研究过去的情况。必须研究生活的一切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应该指出生活的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否则就不能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应该研究过去的全部情况。应该指出各国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性。要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背景来研究每个国家。

应该指出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人类的发展中来研究人类。必须提供一些生动、具体而又典型的事实,而不只是提供一些定义,要指出学习历史的目的,指出历史对现实的影响。

当我们研究现实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研究现实的若干主要方面,而要研究整个现实——包括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现实的研究应该非常具体。应该以国际现实为背景来进行研究,应该把对现实的研究跟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的组织紧密地联系起来。

对每一门课程所抱的态度都应该像列宁所一再指出的那样。否则,我们的教学就不会使学生形成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会使他们具备理解周围生活的能力,不能教会他们进行合乎逻辑的思

考，不能教会他们把所学的知识用去改变和改善生活。

或许有人会说：“您又想走单元教学的老路。”单元教学与单元教学各有不同。有一种“单元教学”，它模糊了实际的联系和中介，把许多相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我们学校的实际工作中几乎随时都可以看到；还有另一种“单元教学”，它有助于理解各种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实际联系，从而有助于形成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我们采用了分科教学制度，这种制度容易使学生系统地研究各种现象，但这是不是说我们想在各门课程之间筑上一道高墙呢？我国学校所抱的宗旨，就是授予学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知识。

各门学科都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传授各门学科的教员都应该用这种观点来对待教学工作。他应该给儿童指出理论与实际运用这些理论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这种态度可以把各门学科用一个共同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是必须建立的。

谈到必须以辩证法为指导来编写我国的教学大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谈谈系统问题。设计教学法取消了一切系统，不过旧时学校习用已久的旧系统对我们也不太适用。所谓系统也各有不同。以自然科为例。林奈在世时是采用的林奈系统^④，后来这种系统被进化论的系统所代替。通常，教学上的系统和科学上的系统是完全脱节的。这种现象必须根除。在这方面，我国各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我还想着重指出必须在对象的发展和“自己运动”中来研究对象。“自己运动”——这是由简单向复杂、由局部向一般、由具体向抽象(可以具体说明)的发展。这是每一个教学法专家所早已知道的。

系统性的原理应该从该门科学的发展史中去寻找。

每门科学的发展史说明了这门科学在“自己运动”的一定阶段

内的发展上的困难。教学法专家应当了解困难之所在，以及怎样克服这一困难，了解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又是怎样克服这一困难的。这一问题目前还研究得不够，需要进行巨大的科学研究工作。

教学法是与所教课程的实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教数学采用的是一种方法，因为在这门课程里，逻辑思维居于首要的位置；教自然科所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因为在这类课程里，重要的是跟周围环境中众所周知的各种现象的特殊联系，在这里，感情因素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

教学法也是与学校的宗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学校的宗旨是给资本家培养顺从的奴仆，那就会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而且科学也就会用来培养一些尽可能不会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顺从的执行者；如果学校的宗旨是培养社会主义自觉的建设者，那么教学法也就迥然不同，全部科学成果也就会用来培养这样一些人材：他们会独立思考，能够集体地、有组织地行动，明白自己行动的结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和主动性。

长期以来，对儿童进行感化、影响的方法，一方面是以个人经验为根据；另一方面也是以唯心主义的心理学为基础。旧的教学法谈不上任何科学性，即便有，也是虚假的东西。现在，以现代神经学的成果为基础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给我们提供了最稳固可靠的科学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就可以建立科学的教学法。最后，教学法还与感化的对象（也就是对之实施该教学法的那一正在成长发育的人）所具有的知识有机地联系着。工具的特性是由它要使之改变形态的那一物质的特点所决定的：缝麻布要用针，缝皮子要用锥子，打石头要用铁锤，等等。因此教学和教育的方法也要随时改变，应该根据学生的体力、生活经验、技能和知识水平以及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等等而有所改变。儿童学^⑥在此应提供确切的指导。它应对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环境的儿童进行研究。

所以，在选择和组织教材时就要运用辩证法。

辩证法也决定着教材系统性的性质。

教学法要想安排得很正确，就应该从该门课程的实质出发，以研究这方面的知识的发展史为基础，以学校的宗旨为转移，以科学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成果和对儿童及其年龄特征的全面理解为基础，并且还以这些特征在适应该时代的环境中所表现的情况为基础。

中央委员会1931年9月5日的决议^⑥极其尖锐地提出了教学质量和系统性的问题。教育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一决议出版了教学大纲和教学法指导书，——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要拟订充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就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把这些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所要求达到的高度来加以解决。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些受过实践检验的、用于对成人进行宣传鼓动的方法里，我们应该吸取哪些东西用到我国中小学的教学法中来。

只要我们看看我们党成立以来是怎样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我们就会发现，党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由这一总的目标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情况下所提出来的一切个别目的都从属于它。组织罢工运动和武装起义，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宣传反对战争，组织群众讨论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等等——这一切都从属于一个总的目标，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整个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以对群众的深刻了解，对群众的切身利益以及当时他们最为关心的东西的深刻了解为基础的。这种对群众的了解就使党能够感到在各个时期群众最为关心的东西是什么，使党能找到应该抓住的环节。眼前利益可以作为出发点，它是一个组织因素，可以围绕着它来展开全部工作。最初从沙俄时代工厂经理不给工人开水喝、工人常常被罚款、工作日太长这些方面开始，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工人懂得社会主义。应该从简单的、具体的、近处的东西引到复杂的、抽象的、远处的东西，但是这种抽象的远处的东西必须是随时都可以用具体事实来说明的，是随时可以从当前的需

要出发和为了达到既定目的而加以阐释的。其次，不要为了宣传而宣传，也不要为了鼓动而鼓动，而是为了通过一定的方式动员人们的意志，为了发挥人民的独立精神，使人们准备去行动才进行宣传鼓动。

实际生活已经证明这种宣传鼓动方式是适宜的。

读者也许会问：“可是这些东西与学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每门课程的教员一分钟也不应忘记教育的目的，即培养没有阶级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而又积极的建设者。教材的组织也好，系统性和工作方法也好，都应从属于这一目的。我国学校的任何一门课程都不可能“客观地”开设，不可能不问政治。当然，这并不是说教师就要让各种事实去适合一定的结论。但是，列宁早在他革命活动的初期就曾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和《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两文中阐明了这一问题，即真正的客观性及其与阶级斗争的密切联系，以及阶级斗争的敌人（即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隐匿其后的、加引号的客观性的问题。^⑦

目的可以使各门课程、各种方法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

另一个结论，就是必须对儿童、儿童的年龄特点及其生活环境进行深刻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研究，必须对儿童集体和儿童的兴趣进行研究。不要轻视儿童，把他们看作什么下等动物，要好好地对待他们，善于照顾他们目前的利益和发展的利益，而不要忽视他们的利益。

末了，最后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学习安排得使它成为行动的指南。理论和实践联系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我们反对在设计教学法中所看到的那种联系，因为学习、理论在那里已被化为乌有。但是也绝不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我们应该把儿童关在校内，使学习和生活脱离。列宁在《远方来信》、《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直接指示我们，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儿童的学习与社会

工作联系起来。通过学习，应当使儿童获得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一点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

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

1920年12月末和1921年1月展开了关于工会的争论，讨论了工会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作用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列宁很扼要地说明了应该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某种事物、现象、问题，应该怎样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这些事物、现象、问题。下面就是列宁所说的话：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的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①

这寥寥数语是列宁多年来研究哲学问题的成果。列宁学习哲学并不是由于哲学是一门“饶有兴趣的学科”，而是为了从中寻求行动的指南。他的确也在辩证唯物主义当中找到了这一指南。辩证唯物主义使他能够异常深刻地研究各种现象，找出对这些现象产生有组织的影响的方法；辩证法使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坚定的见解，使他具有如平日所说的那种“击中要害”的本领和阐明每个问题中最本质、最重要之点的本领。

凡是想彻底了解列宁主义的人，都应该了解上面所引用的列宁所说的那段话，分析列宁的许多著作，注意列宁是怎样阐述每个问题的。举例来说吧。19世纪90年代曾经争论过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在俄国有发展。这是当时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应该进行的革命活动的整个性质。于是列宁就着手来写一本长篇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②。他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必须进行组织工作去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

列宁所选择的问题总是非常现实的；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都对“做什么”这一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他的每一本著作，每一篇论文都是行动的指南。

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得到了非常具体的阐述。列宁所谈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问题，而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在那时还很落后的我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具体地提出一切问题是列宁全部著作的特点。列宁不是片面地而是全面地谈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他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一切形态和表现。

广泛地提出一切问题——这也是列宁对待各种问题的特点。列宁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探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问题。在沙皇检查机关横行霸道的时候，要想使所写的东西能够合法存在，就不能把问题谈得太明显，虽然如此，列宁还是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与刚刚崩溃的农奴制度之间的联系，把俄国的资本主义与整个社会制度、居民文化水平等等联系在一起作了一个剖视。列宁总是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探讨各种问题。正因为如此，只要我们比较一下他怎样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考察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他从哪些新的联系中来探讨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他每次怎样用新的方法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列宁在描述十九世纪末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景时，列举了大量实际材料，研究了当时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各种发展形式的

全部经验，挑选出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列宁极其细心地研究了实际材料和当时所掌握的全部经验。他研究了那些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快得多的国家的经验，然后根据这点来确定哪些东西是特别需要阐明的，——他研究了人类在这一领域中的全部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研究了我国的经验，最后才从这一问题的发展上来探讨整个问题。这一切都使他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得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

每门学科的教员都应该了解，要成为讲授这门学科的优秀教师，首先就应该深刻地掌握这门学科的知识。在研究每门学科——文学、社会科学概论、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学等等——的时候，必须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辩证地对待这些学科的研究。列宁的指示在这里也特别重要。

1933年将召开规模很大的科任教师代表会议^⑤，我们应在会议召开之前对这一问题认真加以研究。让那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科任教员”尽快在小组对它进行研究将是很适宜的。我觉得，这也可以使“科任教员”本人受益不浅。

以数学为例。“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这是对辩证地研究对象的第一个要求。数学家应该知道数学的几个主要部分，知道这几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一个部分怎样补充另一个部分。但是这还不够。必须知道这一部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用这种态度来研究数学，那么就应当明白数学在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上起着什么作用，数学在技术等等的发展上起着什么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知道数学科学的发展怎样推动了技术、工业、计划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数学和天文学、自然地理、物理、化学、社会科学概论之间建立起巩固的桥梁。如果不了解数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就不会了解，比如说，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费那么多心血去研究数学。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为什么呢？

是由于他们的怪癖奇好，还是由于他们深刻理解了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呢？

考察一下数学是怎样并且在什么东西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指出数学发展的要点，在数学的“自己运动”、在数学的发展上来探讨数学，这是极其重要的。这恰好有助于教师理解在教学时要特别详尽地讲解的那些要素，能比较明显地揭露出在讲授该部分时需要克服的种种困难。

其次，在考虑数学这门课程的时候，必须明白应该怎样在每一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搭上一座桥，明白数学对解决许多迫切问题中有何重要性以及为什么重要。为了使人们能体验到数学的那种迷人的、独特的诗意，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是特别重要的，是特别可以唤起人的首创精神和思想的。数学教师应该特别注意跟学生一起做那些具有实际意义的习题，注意在这方面鼓励学生。真理应该是具体的。应该学会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最抽象的数学概念。

喜欢奇谈怪论的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不会把高等数学原理讲得使每个人都明白的数学教授，到哪里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见解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理。数学教员如果能开始考虑辩证地对待数学这一问题，那么他就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得很全面、很深入。

以另一门学科——经济地理为例。这里既要加以全面地研究，也要注意这门学科的发展。应该根据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来研究这门科学，因为这些自然科学能揭露每个边区、地区的资源、生产条件和远景，揭露这门科学跟地质勘查、生物学成就的联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应该根据技术和社会主义的经营形式的发展情况来研究。要揭示经济地理过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怎样的，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又是怎样的。要阐明这门科学的发展前景。

应该把经济地理的研究跟计划经济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通过许多例子来说明经济地理怎样有助于经济的合理化。最后，应

该编订在一个具体地区进行自然和经济情况调查的具体计划，并且一定要根据调查得出结论。

经济地理是这样一种科学，对这种科学进行研究而采用辩证的态度完全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要求。我不知道《卡拉——博加兹海峡》*这本极有兴趣的书的作者巴乌斯托夫斯基同志是否考虑到辩证地描写里海的这个海峡，但毫无疑问，从这本书里是可以学到这种辩证的态度^④。

我不打算再谈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这些学科的情况了，因为这方面问题很明确。我想以另一类型的学科——文学——作例子来谈谈。大家都知道，文学和社会生活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沙皇时代，文学是这样一种学科，通过它，政治暗中闯入人们的思想领域，它教导人们仔细地观察生活并且自觉地、批判地看待周围的社会制度。在社会制度的研究和文学之间如果没有一座巩固的桥梁，那么对社会制度的研究也就会毫无生气，文学里也会失去生动的人物形象。难怪普列汉诺夫说：研究乌斯宾斯基的著作和当时由农奴制进入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对于理解该时期来说，其重要性并不次于对许多科学研究著作的研究^⑤。文学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因此研究文学就不可能不过问政治。文学跟语言科学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如果认为语言科学只不过是各种定义和拼写法规则的堆砌，那么这种“语言学”就会跟文学隔上一道铜墙铁壁，但如果了解语言跟人们的直接感受，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思想工作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使文学的研究脱离语言的研究的一切言论都是毫无价值的了。80年代反动时期的个人主义者——诗人拉德松^⑥曾说：“我们贫乏的语言平淡而且可怜。”然而，在千百万双手建设着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国家里，其语言必将变得日益热情、有力、丰富、国际化。随着普及教育的发展日益广泛深入，随着知识的深入群众以及科学

* 苏联地名，在北纬40°—50°之间，东经50°—60°之间。——译者

和劳动的结合，随着城市和乡村在文化上的距离的消除，随着农村集体化的发展和巩固，——词汇和概念也会不断发展，语言结构就会更加简化，语言也会更加明白易晓，更加具有表现力。难道文学能够脱离历史吗？文学史必然要反映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可以用鲜明的线条刻划时代的特点。文学跟艺术、音乐、造型艺术是有联系的。这一点大家都了解。文学跟劳动的联系日益巩固。过去，文学跟各种精确科学是脱节的，跟改造地球的外壳是脱节的，跟掌握地球力的斗争是脱节的。但是随着群众对这些科学理想的实现，文学的内容也有了变化，文学所描写的主题范围也扩大了，文学开始为各种精确科学服务，开始帮助群众更好地、更深刻地理解各种精确科学的成果，理解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在一切联系和中介中，在文学的发展中来研究文学。但同时文学应该跟目前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文学面临着许多重大的任务，这些任务我在上面已经部分地涉及了。文学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要素。我不打算再谈别的学科了。

如果各门学科的教师不故步自封，那么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就会使他们受益不浅。如果教师能够对学科进行热心的研究，那么他们也就会使自己的学生对这门学科发生兴趣。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①

(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同志们，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长期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他1904年来到日内瓦，当时形势已经明显：与孟什维克彻底分道扬镳的时刻到了；必须进行斗争；孟什维克不可能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时真可谓困难重重，艰苦异常。国外支持列宁的人寥寥无几；孟什维克在我国侨民中颇占优势。这时，布尔什维克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前进报》^②。这就需要挑选一些能在工人运动出现新高涨时进行斗争的同志到那儿去工作。

恰好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于此时抵达日内瓦。我至今依然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一见到他，就紧紧拉着他的手不放；他们两人滔滔不绝地谈到工人运动的前途，谈到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谈到如何在党内开展工作，以便立即把整个工人运动提到应有的高度。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留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战士的印象。刚刚来到日内瓦的这位同志，他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及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携手并肩，共同战斗，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为了贯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反对孟什维克而进行的斗争中。

那一时期，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为《前进报》撰写了不少文章。当时为《前进报》撰文，不仅是写几篇文章的一般举动，因

为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篇政治上的檄文，都是投向孟什维克的一把匕首。当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用的笔名“沃依诺夫”（意为“战斗者”——译注），也不是一个信手拈来的笔名，这个笔名充分体现了他当时活动的全部性质。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们侨居在国外的同志得知一月九日消息的情景。我记得，当时我与列宁正到图书馆去，对于报告一月九日事件这一消息的电报毫无所知，我们边走边谈，谈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正在这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快步流星地迎面向我们走来。他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枪击工人事件的人。我们不仅无比愤激，而且还意识到：一月九日事件对整个工人运动将是一股极大的推动力，党的肩上将要承受巨大的重任。我们就是这样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一起度过一月九日事件的。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正潜心研究其他各国革命运动中的诸种问题。他在《前进报》上以《西方革命运动概论》为题发表了许多文章^③来探讨这一问题。由于吸取了西方革命运动的经验，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党应该走的斗争道路。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最后几期的《前进报》上撰写的许多篇文章是论述群众罢工的。我们都知道在1905年革命中群众罢工所起的作用。所以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就著文指出了群众罢工的革命意义。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招致了孟什维克的无比仇视。在孟什维克眼里，沃依诺夫这个名字乃是一个望而生畏的名字。在1905年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我们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已极为尖锐，以致他们拒绝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共同的党代表大会，而准备另行召开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在这一革命迅猛发展时期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④，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做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他的这一报告曾在事先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共同讨论过并得到了列宁的同意。凡是现在重新读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所做的这个报告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报告的中心

思想和主要意思在于指出必须发动革命，这也正是我们与孟什维克的争论所在。他们把革命视为一种自发力量，全然不了解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了组织革命的必要性，讲到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当时的演说都没有速记记录，而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篇演说由一位记笔记的人转述的，因此要比原稿逊色得多。记得准确无误是一回事，用别人的话转述演讲人的话则是另一回事。这篇演说的内容极有战斗性，这种演说正是当时所需要的演说。

后来，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的统一党代会^⑤上，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又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那次会议上的几次发言都作了速记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演说极富机智。在这次会议上，孟什维克疯狂地攻击列宁，而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又是多么机智地捍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啊！当我们现在重新读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些演说时，我们就不难理解孟什维克何以要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我不想谈第二次侨居国外的情况了——我们第二次侨居国外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工作地点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身边的同志很远。这段时期，他在哲学思想上犯了一些错误^⑥。这些错误是大家都熟知的。我现在想谈谈我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接触最多的工作，即他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彼得格勒各区杜马都在进行国民教育工作。当时，即1917年，这项工作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与工人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与政治工作交织在一起。那时在各区从事这项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到杜马开会时，都是由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主持会议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国民教育方面的起步草创工作就是这样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领导下进行的。

十月革命后，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每当我们与现代的青

年谈话时，往往就会发现他们对过去教育战线进行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那个时代是与目前迥然不同的。

我不禁回忆起当初我们一行数人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率领下进驻旧国民教育部(后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情景。当时，旧国民教育部的一些怠工者处心积虑，阻挠我们，甚至威胁我们不得接近教育部，而布尔什维克很想掌握教育部。

当我们来到旧国民教育部大楼时，那里除了几个勤杂工、清扫工和看门人之外，全楼空无一人。我们几个人在一间办公室商议对策。我记得，我们把全部的职员找来开了个大会。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他们讲了国民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些多年来供职于国民教育部的人，第一次见到人民委员(相当于旧时部长的人)，待人平等，毫无架子，听他郑重地向他们讲到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次讲话极为成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就是一步一步地占领各个阵地。拿教师界来说，当时小学教师深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对布尔什维克采取敌视态度。二级学校除个别人之外，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更为敌视。因此，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不得不逐步争取教师界。这是一项平凡而又重大的工作，虽不惹人注目，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还要争取青年，因为当时的中学青年几乎都心怀敌意。我记得，在七月事件的日子里以及午后(下午三点钟放学之后)，克谢辛斯卡雅宫^①附近经常聚集着一群不满布尔什维克的古典中学学生，阿列克辛斯基之流^②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煽动起来反对列宁。当时必须在青年学生中注入一批新鲜血液。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有一些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学生来访，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总是与他们交谈。

我还没有谈到群众工作。这是一项基本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必须打破旧的官僚机构，建立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的新机构^⑨。在国民教育方面，由于以前在各区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工作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当时经常到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来的还有许多男女工人，他们很快发现，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他们自己感到亲切的机关。当时我们与前线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与群众建立了这种亲密的联系，使我们后来得以扭转教师界的情绪，得以争取大批青年干部。在这方面，工农速成中学起了特殊的作用^⑩。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是充满战斗气息的宣传，他这位战斗者提出了许多原则性问题，他善于用自己的热情去唤起群众，向他们指明前景。十月革命像一个探照灯，照亮了各方面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教育的道路。

在这方面，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年代，在为建立苏维埃制度而斗争的年代，为国民教育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比美。他善于对待群众。当时正值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全国都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做的工作，所发表的演说，都使人受到很大的鼓舞。

当然他也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受到鼓舞，因为置身在当时那种战斗环境中从事工作，只有亲身感受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有这么一位使人深受鼓舞、明确前进方向、善于进行领导的人，才可能把工作做好。我还记得我们召开部务会议时的情景。这种会议不仅是讨论日常工作。每次会议往往都要提出一些方针，指出发展远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每次部务会议都很关心，这种会议也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每位工作人员得益不浅。

当时我们要在各种各样的居民阶层中开展工作，不仅要在工人和教师中开展工作，而且还要与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打交道。在这方面，依然需要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才干，需要他的广阔视野，需要他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态度的本领。当时，凡是对国民教育工作感兴趣的人，不论是工人、士兵还是农民，都

经常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我记得有一位农民，我们戏称他为“非直观家伙”，因为他曾经把直观教具叫作“非直观家伙”。这位“非直观家伙”讲起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与他这个来自卡鲁什省的庄稼人谈话的情景。他说：“卢那察尔斯基让我坐到沙发上，他自己却边走边谈，边走边谈。他谈到了学校。我听了他的谈话后，就去给我们那儿的一位女教师买了一双鞋。”显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讲话使他认识到应该关心教师。这位农民还谈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送了一些书和“珍贵的礼品”给学校。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讲起学校工作时言简意赅，热情洋溢，他和农民谈起话来兴致勃勃。

应该承认，当时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是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的。工农速成中学开办后，工农青年看到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领了一位刚从农村到莫斯科学习的青年小伙子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他不懂得入学手续，只是听说贫农子弟现在可以上学了。他到了莫斯科之后，找到罗蒙诺索夫纪念像，坐到那儿等人带他去上学。什么教育人民委员部，什么工农速成中学——他一无所知，闻所未闻。凑巧一个过路的人与他交谈起来，弄清了原因，就带他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了。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后，大家就领他去见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于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与他作了长谈。我记得，几天之后这个小伙子来讲了他的打算和做法，并且回忆了他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那次谈话。

类似这样细微末节、默默无闻的工作，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从未推辞过。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农民都感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谈的事情他们都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有意义。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这种诚挚待人的作风，他对群众教育工作的关心，是每一个工人（甚至觉悟不高的工人），每一个外地来的贫农、中农（甚至觉悟不高的人）都有深切体会的。

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当然是相当

大量的。群众逐渐被争取过来了。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酷爱艺术，但他希望艺术成为群众的财富。这表现了他对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艺术方面的全部演说一般不是谈的枝节问题，而是讲的如何使艺术成为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如何通过艺术点燃群众对政治的热情。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正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身上最可贵之处。他不谈艺术领域中各种局部的问题，而是讲远景，讲艺术的组织作用，讲激励群众感情的重要性。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这个方面有很多传闻轶事。当我们现在来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途程时，凡此种种无不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您不能不感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国民教育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随后，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年代。这段时期困难重重，各种琐事都要过问。例如，居民开办的学校遭到了破坏，于是就把学校租赁出去，说什么：“我们实行的是经济核算制。”当时对经济核算制的理解十分肤浅。所以，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的是，要给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和他的副手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①配备一个得力的助手去处理这些琐事，好让他们两人摆脱一些琐事，不要过问何处应修什么校舍，何处应防止学校关闭。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紧迫的不是处理这些琐事，重要的是不要降低整个工作的共产主义思想水平，要使共产主义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其中。这方面的工作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做了相当多。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对他都深怀敬意，把他看作用知识武装群众的、用一切艺术成就武装群众的积极斗士。

自 学 须 知

1. 为使自学工作进行顺利，必须具备如下熟巧：中速默读的习惯，使用报纸、参考书和图书目录的能力，做读书笔记和读书摘要的能力。换句话说，为使自学顺利进行，必须掌握起码的自学技术。

2. 为使学习得以最顺利地进行，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最好在不要太疲乏的时候学习，即俗话说的“头脑清醒”的时候学习。所以，最好在早晨或休息后学习。

不要在学习时弄得很快就疲乏了，不能在光线昏暗、空气污浊、闷热不堪的房间里学习；周围喧闹嘈杂、干扰甚多的情况下是很难学习的。

手边有必要的参考书和详解辞典等等，学习时就感到很方便。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阅览室、在图书馆阅览室学习最为方便。

3. 要认真考虑想学什么。常常有这样的事：有人只是一般地想学习，至于具体地想学什么东西，却不甚了了。集体农庄、工厂的工作搞得比较好是因为工作是按计划进行的，同样，自学的人要想搞好自学也得有计划，而不能东翻翻，西看看：一会儿学历史，一会儿学文学，一会儿又学物理。这样学习是不行的。有人想了解党史，有人想了解集体农庄，有人想学习技术，还有人想教育孩子，等等。有的人想上七年制学校，有的人想上十年

制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

4. 但是，光是知道学什么还不够，还要制定一个周密的学习计划。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初学者往往不了解他想掌握的那门知识的范围，也不了解这门知识的体系，即他要掌握的这门知识的系统：学完了这之后再学什么。

在这方面，各种自学辅导材料、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会有很大帮助。但是，最好在学习开始时向专家请教，听取他的意见，或者如通常说的，向他提出咨询。能够担任这项工作的有教师、图书馆管理员和辅导人员，他们现在经常被邀请到图书馆协助开展自学工作。也可以邀请农艺师、工程师和医生等等担任这项工作。

学习开始时的辅导特别重要，它往往决定今后学习的成败。

5. 应该怎样学习？

1) 不要着急，或者如以前老话说的，要“慢慢地着急”。急于求成对自学特别有害。

2) 要注意别留下疑难不懂之处，要查详解辞典(百科全书)，要向内行请教，找辅导人员答疑。

3) 要把学过的材料经常复习一下，一定要复习前一次学过的东西。

4) 学习不能中断，特别是学习刚开始，所学的东西还没有记牢的时候，学习要持之以恒。

5) 记笔记对记忆很有好处。要把学习材料中最重要的地方记入笔记本，要把自己不懂的成语和单词的释义记下来，还要把城市的名字、人的姓名和有关数字记下来。要经常复习一下自己笔记的东西。笔记要记得明白无误，干干净净，免得日后费时间去辨识所记的东西。

6. 如有可能，最好采用函授教科书，因为这种教科书实际上是一种函授辅导材料，对掌握所学的课程很有好处。

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沙茨基^①

今天，莫斯科音乐学院将要安葬该院院长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沙茨基。但是参加葬礼的不仅有音乐界，还有进步的教师界。熟知沙茨基这位教育家的名字的也不限于苏联。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今年刚满56岁，在莫斯科，他为流浪儿童设立儿童俱乐部，开办儿童工学团，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教育活动。

他很重视儿童自治和儿童劳动问题。他认真地研究了西方和美国先进学校的全部成就，多次出国考察当地的教育工作经验。1907年末，沙茨基由于“企图在幼年儿童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而被捕。与沙茨基共事的几位进步教育家（兹艾连柯，斯列格尔，福尔通拉托娃^②等），研究了工人和城市贫民子弟的生活条件，研究了儿童的情况以及儿童工作方法，为青年教师举办了各种短训班。

1919年，在沙茨基主持下，在克鲁什省一个农村创办了儿童工学团。这个工学团从事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只有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沙茨基多年热情向往的工作才得以广泛开展。

1919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建立“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该站的农村分校遍及三十五个村镇。该站的工作很有意义。成千上万的教师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国外的教育家也纷纷到此访问。他们对这里儿童的组织性和所取得的成绩深为惊服。

该站不仅对儿童进行工作，而且也对成年居民进行工作。通

过这种教育活动，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逐步靠近了党。1925年，他成了预备党员，1927年转为正式党员。他的夫人瓦莲基娜·尼古拉耶芙娜^③是一位满怀热忱的教育家，也参加了党。他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共同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有一次，他们的住宅被富农焚毁，但他们继续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尽可能把学校工作搞得更好。

他的音乐教学搞得生动活泼，还演出戏剧，组织合唱队。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毕业于当时的音乐学院，他热爱音乐。

国家学术委员会^④成立后，他是最积极的成员之一。他把自己丰富的教育经验用来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与他一起热烈地讨论如何大力提高教学质量，使苏维埃学校无论在教育方面还是在教学方面都能成为楷模。

我想举几个事例来说明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的为人。他农村住宅的大门从来是不关的，有时清早四点钟左右邻村某一个农民会突然走近他的卧室找他去开会。他的住宅被焚毁的那天晚上，他预定要给教师讲课的。火刚一扑灭，他就按预定计划开始讲课了。

近年来，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这位受过广泛音乐教育的人，虽然被任命为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但他并未放弃亲身参加教育活动。教育人民委员部委托他领导实验学校。就在几天前，我还与他约好见面谈谈一些迫切的教育学问题。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是一位有创见的教育学家，他培养出了一代青年教师。这一代青年教师面临的严重任务是：大力提高苏维埃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质量。他所做的工作定会结出丰硕成果。

列宁论儿童和培养青年 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

在纪念列宁的日子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列宁对儿童的关怀，回忆起他对培养、教育儿童问题的历次谈话。

选举苏维埃的情况说明：在我们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工作和改造日常生活的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各级苏维埃对这项工作不能袖手旁观。苏维埃的文化部应大力抓好这项工作。在苏维埃政权下，社会普遍关心儿童，为千百万儿童开设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儿童游戏场，实行了普及教育。不过，这方面还要不断提高工作质量，要让每个儿童都受到社会的关怀，使儿童的生活越来越欢乐幸福，越来越有组织性。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列宁如何关心儿童的物质待遇。

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是列宁费了很大精力制订的。党纲指出：要“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文具”^①。当国内战争方酣，形势非常艰险：经济凋蔽，工厂停产，民不聊生。然而，1919年5月17日，列宁发布了免费供应儿童膳食的命令^②。命令指出，必须对全体未满14岁的儿童免费供应膳食而不问其父母的口粮定额多少。这个命令是对16个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大工厂中心发布的。不久，国内战争趋于激烈。6月12日，列宁又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扩大5月17日命令有效范围的决议——增加了免费供应膳食的地区，享受免费供应膳食的儿童年龄，延长到16岁以下^③。

1919年6月，列宁写下了《伟大的创举》这篇著名的文章。他在文中大力赞扬了一种首创精神，即工人在开展社会工作以改造日常生活方面所开展的“创举”。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曾强调必须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他说：“我们在实践中对所有的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不反对的这个问题注意得很够吗？当然不够。我们对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关心得很够吗？再说一遍，非常不够。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毫不华丽、毫不夸张、毫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④

1919年9月24日，列宁签署了关于扩大儿童食堂和其他儿童饮食网点的命令，作为对儿童膳食命令的一个补充。

当然，国家对儿童的关怀丝毫也不能取代父母对儿童的关怀，这一点在法律中已有明文规定：父母离婚时，必须支付儿童的抚养费，关心儿童。

经常有人曲解国家对儿童的关怀。国家并不是不让父母关怀儿童，它只是规范这种关怀，把这种关怀引向一定的轨道并千方百计帮助父母实现这种关怀。父母一定要关心儿童的健康，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一定要让孩子们都去上学，等等。

国家应关心全体儿童。这一点在儿童膳食法令中已有明显表现，在党纲第12节中已有记载；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早在1897年所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就强调指出，必须教全体儿童学会劳动⑤。

19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时，列宁曾说：“在婚姻家庭法上的特别下流、可耻、卑鄙的不平等，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已经被苏维埃政权消灭干净了。”⑥

列宁要求对儿童平等，这绝不是主张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他要求特别关心过去备受沙皇政府压迫的那些民族的儿童，要求特别关心贫苦儿童和流浪儿童。

1917年9月，伟大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写道：要使一个最普通的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妇，随便那一个破产农民都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但向财富卑躬屈节，反而帮助贫民，“……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⑦

学校是对整个青年一代进行教育的国家机关。党纲载明，无产阶级国家应把学校“……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变为把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工具。”^⑧列宁早在1913年就曾写道：“我们已经为新的大厦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子女将要把它建成。”^⑨苏维埃学校要把全体儿童培养成无阶级社会的自觉建设者，培养成社会主义的自觉建设者。

要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教他们学会分析各种最重要的问题，能够自觉地对待周围的生活，懂得怎样通过集体的努力来改善这种生活。要让他们学会把已掌握的知识用于生活，能按照共同的计划有组织地、集体地开展工作。有组织的、集体的公益劳动最能培养自觉纪律。所有这些观点，1920年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都已谈到了。这篇演说应该成为我国青年一代教育工作的指南。

列宁在这篇演说中讲到要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⑩接着，他解释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这就是使自己个人的利益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列宁说：“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⑪

近来，全国都为基洛夫同志的被刺^⑫而深感悲痛，同时非常震惊的是：在共产党队伍里发现了许多反革命组织，他们把共产主义道德抛到了九霄云外，把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的伟大目标忘得一干二净，把自己夺权的野心置于社会主义胜利的利益之上，完

全置广大群众于不顾。

苏维埃政权立即采取了一切措施来把这些杂草连根除掉，但我们一时一刻也未忘却我们肩负的教育整个青年一代的任务，因为他们是要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的人。我们要像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所教导的那样，使青年一代从小就养成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每一个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应学习这篇演说，并大力贯彻执行列宁的方针。

谈自觉纪律

(给少年先锋队员和学生们的一封信)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少年先锋队员工作部建议少年先锋队各级组织的负责同志、中队辅导员和中队委员会主席，将克鲁普斯卡雅同志此信在少年先锋队集会和全校学生、儿童之家全体儿童大会上宣读并讨论。)

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儿童在校外时间里的所作所为。有些小朋友的表现很坏，他们扒车，打架斗殴，出口骂人，总之，胡闹已极。老师们为此深感不安，家长们也很担心。为这些事情召开了多次家长会议。教师们和共青团员也纷纷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上面所谈到的现象在大城市尤为普遍。有些从农村进城来参观的小朋友们很惊奇地说：“你们莫斯科的小朋友怎么这样不守纪律，我们走我们的路，他们却扔石头打我们……”

有一次，几个民警对我说，好多小朋友因为扒电车或者汽车而成了残废，甚至于送了命(其中男孩子特别多)。听了他们这番话之后，我想起了1918年的时候，曾经见过这样一个“扒车的”小孩(大约只有10岁到12岁)被电车压倒的情形。他的双脚都压断了，躺在电车下边，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但是妈妈并不在旁边，而且这时妈妈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事情现在还不时发生，因此妈妈们都为自己爱去“扒车的”孩子担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在少年先锋队大会上，儿童们总说再也不扒车、不打架了，以后一定规规矩矩，不再胡闹；但是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

小朋友们，你们自己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以后别再发生这种事情，否则给别人看着是很丢脸的事。为什么说丢脸呢？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般说来都是好的。你们不妨听听我讲一讲有些小女孩或小男孩的情况，看看他们是如何认真地理解生活的。我记得不久前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你们，告诉你们要照顾弟弟妹妹。后来我收到了几百封回信，其中很多信写得非常好。

我最喜欢的一封信，是基洛夫城的一个小朋友寄来的，他是四年级的学生^①。他在信里说，他经常在想，怎样能使全体小朋友都能成为坚定不移、受过锻炼的革命战士的接班人。他也谈到他自己，说他的生活很困难。他写道：“我有时产生了一种不好的念头，想去偷别人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要是偷了东西，全苏联都会因此蒙受耻辱。”*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意志坚定，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大家，他爱惜苏联的荣誉。跟这样的小朋友比较起来，就可看出打架斗殴和“扒车”的小朋友是多么丢脸。那些喜欢打架斗殴、经常“扒车”的小朋友不会控制自己，他们总想表现自己的勇气。但这算什么勇气？这不过是胡闹。过去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常常为非作歹、无理取闹。可是为非作歹、无理取闹是一回事，而勇敢无畏、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必要时甚至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劳动人民的事业，这是另一回事。要勇敢，就要有意志力，要有自制力，要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而要开个什么玩笑，这是不需要太多智慧的。应当嘲笑那些爱打架斗殴和“扒车”的孩子，不能放纵他们，更不能学他们的样。

*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第703—705页，第43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译者

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性格，锻炼自己的意志。要善于克服恐惧感和不果敢、不振作、急躁等缺点。为什么？原因是很明显的。一个没有意志的人只不过是任何一个骗子手中的玩具而已。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呢？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话很对。必须共同行动。男女工人对此理解得最深。过去，他们曾经共同反对过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们又在共同改造旧生活，并把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但什么是共同斗争呢？所谓共同斗争，是指每个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而要按照大家考虑和大家决定的去做。为了进行共同的斗争，为了进行共同的工作，就需要高度的组织性，需要自觉的纪律。这种组织性要从小养成。不仅是校内需要组织性，而且课余时间也要有组织地度过。这样就会过得更快乐，更有意义。

课余时间并不是让你睡大觉，什么事也不做（如果觉得无聊，当然可以这样）。课余时间也不是让你完全用在娱乐上，跑去看电影或者看戏，这样你很快就会感到厌烦的。要学会从事广泛而又有趣的社会工作。这种社会工作很多，比如：绿化街道，改进各种设备，进行少年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还可以做一些义务工作，送书工作，等等。但不要把社会工作变成只是开会，不要使社会工作成为“负担”，而要使它成为共同的、集体的工作，这种工作既引人入胜，又能把大家组织起来。

小朋友们，把少年先锋队组织和儿童自愿团体巩固起来，把所有的儿童都组织起来，吸引他们参加到儿童组织里来，这是消灭纪律松弛、行为放荡、举止粗野等现象的一种方法。

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

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应该指出，童年时代的印象对一个人以后的成长和以后的品行往往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认为国际主义教育只不过是让儿童记住一些一般的口号和原理，那就大错特错了。

苏维埃政权对苏联各民族的政策就是培养国际主义的情感；我国目前的形势最适宜于发展国际主义，但是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了我国过去的情况。常言道：“积重难返”。沙皇政府的全部政策，一方面是在俄国各民族中培养最放肆的大国沙文主义，另一方面是培养暴虐的民族主义，造成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民族隔阂(过去，在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压迫之下，这些被压迫民族一度团结在一起)。如果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和广大群众的思想里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已经消除殆尽，认为对俄罗斯族的疑虑业已烟消云散，民族主义情绪现已不复存在，认为阶级敌人不会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这种情绪，这种想法就过于天真幼稚了。

对这种情况不能听之任之。学校不仅应该进行教学工作，它还应该成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心。而国际主义教育乃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应该成为经常的工作，而不只是局限于国际主义性质的集会和活动。国际主义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工作之中。

我国小学的教学工作是用各民族的本族语进行的，同时着眼点不在于儿童的出身籍贯，而是他所说的语言。这种做法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儿童对所讲的东西就会一点也听不懂，少数民族的儿童在发展上就会落后于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儿童，因为教学所用的语言是人口占多数的民族的语言。

但是，如果在不同的学校对不同民族的儿童进行教学，这往往又会使各民族儿童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谨慎。要使只有一个民族的儿童就读的学校里的学生尽量多了解一些有关其他民族的生活情形。教师不仅要告诉学生这个民族在沙皇时代备受压迫的情况(这当然是必然的)，而且还要指出这个民族性格上的优点，生动地讲述足以显示该民族可贵之处的历史事迹。有一次，中亚细亚(可惜我把这个共和国的名称忘掉了，因为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一所儿童之家的几个俄罗斯族的小朋友写信给我说，他们的教师告诉他们，当地居民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这个民族在沙皇时代很受压迫。于是这些小朋友就说，等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一定要帮助这个民族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骤然看来，这种愿望似乎无可厚非，但是让孩子们瞧不起文化落后的民族是不好的。所以我在回信中就跟这些小朋友说，我们俄罗斯族不文明的表现还很多，接着就给他们举出一些俄罗斯族人不文明的表现作例子。然后我又问他们是否常跟周围民族的小朋友一起玩，问他们是否知道这些小朋友是些多么勇敢机智的小朋友，接着我又讲了几个例子给他们听。

要让儿童注意各个民族的优点，指出这些民族在革命斗争中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等等。要知道，随时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些不良的事情，例如反犹太人运动。在人民的思想残余里常常可以碰到这种东西。有时小孩子也说：“犹太人是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要特别警惕。为了改变孩子们对犹太人的这种恶劣态度，要跟儿童讲讲那些犹太战士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时表现出的英雄气概，跟他们讲讲犹太工人在劳动

中表现出的顽强精神，等等。

为了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文艺作品（既包括俄罗斯文艺作品，也包括各民族的文艺作品）。但是在选择文艺作品时要特别小心。我们在这方面往往有些粗枝大叶的作风。举例来说吧。列·托尔斯泰写的《高加索的俘虏》这篇故事，我们常常念给孩子们听。这篇作品的艺术性确实很高，但是如果不加任何说明就念给孩子们听，就可能引起他们对鞑靼人的仇恨，因为故事里讲到鞑靼人把俘虏当成商品买卖。可以在讲这篇故事之前把鞑靼的富豪对俄罗斯人的态度与鞑靼女孩的态度对照一下。同时还应发给孩子们另一篇故事，其中讲的是俄罗斯厂主或富农对少数民族进行剥削的情况。

利用民族的文艺作品，让各民族的儿童都去阅读这种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仅要从理论上使儿童知道邻近的其他民族的生活情况，重要的是要使包含不同民族儿童的各校之间的学生彼此实际接近起来。在这方面，少先队组织和苏联社会各界应该帮助教师和学校。

要经常组织有不同民族儿童的各个学校的孩子见面。在这里，文艺活动能起特别重大的作用。要广泛地组织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参加苏维埃的各种庆祝活动，一起去参观游览。挑选各民族的一些优秀歌曲（其内容要能为孩子们理解），翻译过来，说明歌词的涵义，组织他们一起来唱；这也非常重要。这种活动可以使各民族的儿童变得非常亲近起来。

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研究各族儿童的游戏，对这些游戏加以分析，从中挑选一些最有趣的形式，赋予它以现代的内容，将其中原有的意图加以改变，这是极其重要的。在这方面可以找到很有趣的材料。小学对游戏应比现在更重视一些才对。要记住，游戏往往是儿童最实际的学习。

共同的劳动也可使儿童亲近起来。儿童技术站有着极其重大的教育意义，因为不同民族的孩子要在那里共同活动。当孩子们一起制作一个什么模型或者必需品时，这也可以使他们亲近起来。

在高级应该开始组织一定的社会工作。比如，组织孩子们一起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托儿所、露天幼儿园做些工作，帮助装饰俱乐部，帮助图书馆借还书，等等。要用特殊的方法组织儿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安排这种劳动，要使儿童不感到疲倦，要使他们所干的活儿很有兴味，不觉得厌烦。重要的在于确定目的。可以组织校际间互相服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比如说，俄罗斯族儿童所在的学校给鞑靼族儿童所在的学校制作某种东西，反之亦然。

共同游戏、一起游览以及集体活动，还可以使孩子们产生学习他们所接触的那一民族的语言的愿望。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俄罗斯人不愿意学习被压迫民族的语言，认为这样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现在，压迫现象已经消灭了，但人们对学习解放了的民族的语言这件事，往往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小学三四年级就应当成立一些小组，来学习孩子们经常接触的那一民族的语言。这种小组可以广泛发展，因为它在促进各族儿童的友谊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种小组的学习应按所谓的发音法来进行，即以每种语言的发音特点为基础。一般说来，这是学习外语的一种最恰当的方法。而在这里，还有另一种意义，即这种小组的目的在于学会经常接触的那些同学所使用的语言。这种小组对于培养对该语言的兴趣很有好处。在高级学习这种语言时，应该更加深入一步。

此外，在地理课上指出哪一民族分布在哪里也是很重要的；在历史课和社会科学概论课上，应当讲讲沙皇专制制度的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讲讲列宁和斯大林在执行各民族平等这一政策中的作用。在各民族州和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应该超过一般教学大纲的规定。当然，在给儿童讲历史的时候应该避

免各种复杂的定义和空洞的口号。讲解要具体，要使儿童觉得特别好懂，特别生动。

应该告诉学生，沙皇政府的政策怎样使得各民族的生活贫困已极；这种政策导致了对宗教的狂热，使少数民族陷于愚昧无知的境地，强化了阶级分化和各民族内部的压迫，使妇女备受奴役。

国际主义教育应从有关苏联国内各民族的问题谈起，因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们对全部问题感到更现实，更亲近。但是，当然也不能停留在这些问题上。应该从这些问题过渡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主义教育。

要告诉学生，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掠夺弱小国家的。例如，可以向学生讲讲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情况。在讲述殖民政策的基础上，应该讲讲帝国主义战争，讲讲帝国主义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其次，还要讲讲布尔什维克如何顽强地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者妄图发动的新的掠夺战争。要告诉学生，全世界的工人应该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制止战争。要向学生讲解五一劳动节的意义，而且不只是讲讲，还要在校内特别热烈地来庆祝这一节日。

各校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可以而且必须选购一些有关的文艺作品。

应该利用外宾每一次到苏联来的机会，邀请外国工人到我们学校、少先队俱乐部等地方去参观。

少年先锋队的报纸要多登一些国外情况，使儿童养成拿着地图读报的习惯，让他们做读报笔记，绘制简略地图，多读一些国外消息。当然，儿童们进中学后会得到关于国外的比较主要的知识，但是在小学里他们就应该受到一定的锻炼——使他们在小学时就对各种国际问题发生兴趣。

应该竭尽全力使孩子们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感到非常亲切！

共青团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部分

共青团面临着种种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共产党坚决奉行的解放妇女的事业进行到底。

我们在解放妇女、提高妇女觉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已是勿须赘述的事了，因为过去已对此写了很多文章，发表了很多谈话。

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讲讲现在摆在共青团面前，特别是摆在女共青团员积极分子面前的几项这方面的具体任务。

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忘记，共青团积极分子应该带领城乡广大青年妇女前进。我们有一支很好的女共青团员积极分子队伍，但如果从总体上来看广大的青年妇女，那我们就会发现，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着许多旧的残余。因此，需要开展大量的、经常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这项工作往往并不引人注目，却是必不可少的，它需要有耐心和恒心。共青团应该经常不断地做下去。

旧的残余之一就是妇女在文化发展上的落后。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对妇女和女青年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妨碍极大。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及照顾孩子，都要影响她们的学习。从前都不让女孩子上学，因为她在家里要帮助料理家务，就像保姆一样。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在我国起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父母必须把自己所有的孩子都送去学习。不过，即使是目前，我们也还应注意这一法令贯彻执行的情况，不允许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女孩子留在家里不让上学；要注意不让女孩子负担过重的家务而妨碍她们的学习，

等等。与此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对女孩子说来，重要的不仅是在学校里的学习，让她们参加校外工作和社会活动，也是同样重要的。

不过，问题不仅对女孩子，她们现在的处境比她们姐姐过去的处境要强得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保卫她们的学习权利，真正做到让她们（特别是某些民族省和共和国的女孩子）能参加学习。在这方面需要开展经常的社会监督。

对全体女青年（特别是农村女青年）说来，掌握知识的问题日益尖锐。共青团和全体青年对此必须加以注意。文化落后就会影响对女孩子的提拔。首先应扫除女孩子中的文盲。但是，只识字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根据我们苏维埃国家所处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水平，劳动人民必须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它能使之用崭新的知识去武装自己，能为其开辟独立工作的道路；它是从事生产劳动、社会公益工作以及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全部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建设各部门的现代科技发展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和相当高的知识水平。科学技术越发展，与之相应的劳动技巧水平越高，那么就越需要较高的普通教育知识水平。

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千百万劳动人民参与其事，要求他们进行集体的社会工作。要使这项工作得以正确开展并纳入必要的轨道，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

我国的女青年都熟知列宁的这句话：“每个厨娘都应学会管理国家。”要学会管理这件事，就得有丰富的知识。

就拿苏维埃工作做例子来说吧。一般说来，青年人（男女都在内）还很少参加这项工作，不大关心苏维埃各部的工作，青年积极分子不大接近苏维埃代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局面。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各部的工作，他坚决主张青年人应千方百计协助这项工作，认为它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还需要十分关心通过苏维埃各部的工作，对女青年身上所特别严重地反映出来的日常生活中不文明的表现进行斗争。但是，消灭日常生活中不文明的表现也需要知识，需要了解这方面面临

的任务是什么。否则，与不文明的表现进行斗争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市侩习气，会滑向模仿旧时老爷商贾的文化。

目前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把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但是，青年一代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也遇到了文化问题、家长普通教育知识问题方面的困难。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到处都是一样：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全体劳动群众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现在，半文盲的概念扩大了。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地理，不了解人类发展的基本阶段，不理解各种自然现象，不善于分析周围的情况，不明白如何使科学为改造劳动和日常生活服务，不知道怎么样和从何处汲取他所需要的知识，——这个人就是一个半文盲。

共青团应千方百计为广泛发展青年和成人学校而努力奋斗，要使全体青年都能进入这些学校。要特别关心那些至今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青年。全体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和集体农庄青年应掌握七年制学校的全部知识。这是一件大事，一件严肃的事。在为扩大这种学校的网点而进行的斗争中，青年人应该站在最前列。要特别关心那些未能适时入学的少年，即所谓超龄生的学习。这种人在女孩子中为数甚多。对他们进行工作特别重要，但是这项工作还没有广泛开展起来，因此还有许多少年未能入学。

目前，自学具有特别的意义。要进行自学就得有图书馆，而图书馆却寥寥无几。图书馆是应该为每一个居民服务的。现在正在开展优秀农村图书馆竞赛以及图书馆管理员为全体居民优质服务的地区竞赛。在举办这种竞赛时，要让全体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特别是女积极分子）参加。

在努力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发展城乡青年和成人学校体系，巩固和发展图书馆网点，组织自学辅导等等）的同时，必须按工会系统保证妇女和女青年的学习权利。拿保姆工会作例子来说吧，为了保证保姆有一定的学习时间，要与雇主达成协议，工会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对这件工作是否有检查和监督？是否对那

些不让保姆学习的雇主课以罚金？如何保证那些参加小工业生产的女孩子的学习权利？等等。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发展的现阶段，工会工作的重心应转移到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努力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条件，努力根据新的原则改造日常生活上来。女青年对这件工作特别关心，她们应该更热心于这件工作，尽可能广泛地参加工会工作。

正在进行改造的生活，向我们直接提出了深入开展文化革命的问题。生活还向我们全面提出了家庭问题、男女互助和父母与子女互助的问题；提出了培养青年一代的问题。青年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心。只有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基础，以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为依据，才能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许多问题完全是按新方式提出的，而以前是不可能这样提出的，这是因为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需要另辟蹊径。这里遇到了一些重大的困难，而主要的困难就是一些陈旧的观点往往披上了时髦的外衣，我们必须备加小心，要提防小私有者道德，提防小私有者的家庭观点、教育观点。

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往事。七十五年前，农奴制在我国还占着统治地位。地主主宰着农奴的命运，出卖农奴，霸占女奴，根据“主人的喜好”把女奴许配给人。家庭生活完全是奴隶关系：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互相体贴、慈祥恩爱。当时的农民家庭生活在高尔基写的一部小说中已有生动描述。他写了七十五年前赫尔松省孔德村的一个丈夫如何残酷地折磨妻子，而周围的农民又是如何熟视无睹^①。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之事。

60年代推翻了农奴制，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但农奴制时期看待妇女的观点却在日常生活中延续了多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制婚姻虽有削弱，但婚姻依然具有买卖性质，依然盛行从财产多寡出发来考虑婚姻。嫁富娶贵是有利可图的，嫁给有地位的名流权贵或者迎娶达官显要之女为妻也是

有利可图的。有时起作用的不完全是金钱方面的，但依然有所盘算：娶妻可以为佣，嫁夫得以为生，等等。

不言而喻，买卖婚姻、金钱婚姻不可能不给人的关系带来虚假伪善。而虚假伪善极易变为欺骗。往往从金钱出发订婚的过程就是制造假象、亵渎爱情的过程。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家庭生活很难给人带来欢乐。有时，一些所谓“有家有室”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外遇，最常见的是宿娼嫖妓，玩弄那些迫于生活而出卖肉体的人。金钱婚姻的必然后果就是欺骗、虚伪、腐朽的家庭生活方式，放荡淫佚的情欲。当然，这种婚姻的主要灾难是落在妇女头上。

在小资产阶级环境中，“实用”婚姻的一切毛病暴露无遗。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撰文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内部才能产生新式的婚姻，这种婚姻不以金钱为转移，而以互敬、互爱、互相信任和观点一致为基础。

苏维埃法律已经创造了一切条件把妇女从旧时沉重的婚姻关系中解放出来。

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旧的残余。小私有心理流毒甚广，乔装打扮，利用新的环境以售其奸。

把妇女当作玩物的观点还很普遍。追逐妇女，放纵情欲，玩弄妇女——难道共青团员中没有这种现象吗？“逢场作戏，寻欢作乐，至于结婚，以后再说。”姑娘怀了孕——“真是惹麻烦，不过，可以去打胎。”这是旧时的观点：不管妇女死与活，只把她看作小玩物。

小资产阶级的庸俗习气往往也在工人环境中出现。人们渴望尽快摆脱旧时的贫困、粗野以及还带有农奴制印迹的旧的家庭关系，可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警惕性，不能察觉那种必须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小私有者的腐朽表现。

小私有者个体经济是封闭的，也是脱离农村社会生活的，只要这种经济占统治地位，那么旧的残余就会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保

留下去，消失得非常缓慢。农业的集体化，整个劳动组织的改变，使妇女得以解放。集体农庄的妇女成了一股力量，这就使男女的权利和关系发生了变化，家庭关系也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蓬勃开展，劳动人民的觉悟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党、共青团、工会和苏维埃的注意力集中于提高全体居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创造了许多物质条件来改造整个生活方式（新的居住条件的创立，公共食堂的发展，托儿所、幼儿园、俱乐部、文化与休息公园等等数量的增加）；如人们所说的，正在为新生活缝制新装——在上述这样的形势下，新的家庭将日益巩固，因为这种家庭是建立在深厚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思想接近、观点一致、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的，它使人感到爱情的欢乐是无涯无际的。

最后谈一谈教育问题。

妇女乃是目前或未来的母亲。她有强烈的母性本能。这种母性的本能乃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它能带给母亲无比的欢乐。

我们对母亲们深怀敬意。母亲是天然的教师。母亲对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幼儿的影响尤其大，我们都知道，孩提时代的生活对一个人的整个性格、对一个人的整个发展会打下多深的烙印。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进行的是什么教育。

一个女孩子可能培养成奴婢，可能培养成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不关心周围蓬勃发展的生活，远离这种生活，孤芳独赏，自怨自艾；也可能培养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她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友好的劳动和为伟大的目标而斗争当作快乐的源泉，也就是说，培养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一切都取决于母亲本人，取决于她的观点。

现在，只要看一看我国的女工，看一看我国的集体农妇，看一看她们如何热衷于实现社会主义，如何努力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你就会感到，这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该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十分重视教育问题。我国的学前机关、苏维埃学校都应成为把儿童培养成新人即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楷模。我国学前机关和我国学校进行着社会教育，而在家庭里，母亲们又都是些热衷于社会主义的人。如果我们把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培养出杰出的一代人。女共青团员和整个共青团应在这方面开展广泛的工作。

谈学校图书馆

最近一年来，学校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教师的工资也大为提高，全体居民对学校工作也普遍重视起来了。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来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使每个公民享有教育权。普及义务教育已经实行，接踵而至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怎样提高教学质量。不久前闭幕的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上，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肃清儿童学^①的错误影响。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不良影响的决议，不仅对儿童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极尖锐的批评，而且也促使教育战线上的领导部门痛切地感到自己对青年一代教育工作所负的政治责任，认识到使苏维埃教育学适应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类型学校要求的政治责任。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这次部务委员会上，郑重地提出了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进行斗争的问题；谈到必须关心每个儿童、了解每个儿童的心情和要求；谈到要善于激起儿童的兴趣，使他们喜欢学习，并且要这样来组织各种功课，使之能够培养儿童的自觉纪律。会上还谈到了在学校工作的各个部分必须严肃认真地进行教育工作的问題。

学校图书馆的问题毫无疑问地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直接的关系。儿童的阅读是跟每个教师关系最密切的问题。

当我侨居在日内瓦时，我曾经得到允许去参观当地的学校。他们给我一张说明书，上面写着瑞士民主政府为实行普及教育所

做的工作。此外，上面还谈到每一所学校都设有一个儿童图书馆。可是当我到由他们教育部指定的一所办理得很完善的学校去参观时，我请他们领我到学校图书馆去看看，一个女教师却告诉我说：“说老实话，我们学校并没有图书馆，要图书馆干什么？您瞧，我们的教科书多好，是用上等纸印的。”这是1908年的事情。当时瑞士是一个平静的地方，我没有看出当时日内瓦的儿童有任何特别喜欢读书的表现。

至于我们的苏联儿童，他们是非常喜欢阅读的。从白俄罗斯来的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有一个学校的儿童决定自己建立图书馆，因为他们城里没有学校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在中央图书馆设立专门的儿童部之前，他们把各自所有的书收集起来，从自己的同学中选出图书馆管理员。

儿童一再向家长恳求，于是家长们就要求公共图书馆购置儿童图书。儿童图书需要量极大。儿童是否去阅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识字水平。让儿童养成阅读的习惯越早，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也就越快。书籍对儿童的发展和他们的兴趣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有些儿童图书馆办理得很完善，不过这种图书馆为数不多——俄罗斯联邦总共只有512个左右。但是大家对儿童图书馆非常重视。比如说，在莫斯科对此事就很不重视。我曾经到过普希金图书馆，其中附设一个专门的儿童图书馆。普希金图书馆里的人挤得满满的，光线明亮，非常舒适。可是在儿童图书馆里，连炉子也没有生。这时正是儿童的假期，他们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可是书架上一本书也没有。我又走到克鲁普斯卡雅图书馆去，那里有个设备很完善的儿童图书馆，不过四年级以下的儿童图书部没有开放，房子做了师范学校学生的宿舍。据说12岁以下的儿童根本不准到图书馆去，说他们可能在那里得传染病；说他们不必读书，只要休息就行；说12岁以下的儿童主要的是阅读与学习有关的东西，而图书馆也只应该是供应教科书补充读物的地方等等。很

多学校图书馆只借阅教科书，阅览室变成了准备功课的地方，而且学校图书馆的书大部分是供给教师使用的，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许多学校的图书馆经常锁着或者一个星期只开放两个小时，很多学校不愿意开设图书课（这种课的目的在于告诉学生怎样查阅图书目录，怎样借阅图书），这种情况也不是个别的。

不能低估儿童阅读的意义。儿童阅读在教导工作中应该占有比它现在大得多的重要地位。教师应该亲自动手管理这件事情。教师应该像优秀的教育家戈罗云同志^②（他是恰巴柯夫学校的校长，该校图书馆有5,000册图书）那样熟悉儿童图书。戈罗云同志对该校图书馆的每一本书的内容都很了解，他知道某个学生该读哪本书，他对图书馆的工作非常关心。

儿童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之间不应该产生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论。儿童图书馆应该和学校图书馆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帮助他们：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经验，供给流动图书，介绍图书管理的技术。这种联系毫无疑问也会使儿童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得到改进，使他们更加了解学生和他们的学习兴趣。

根据1934年10月1日全国图书目录的材料，俄罗斯联邦13万学校里只有25,658所学校设有儿童图书馆。学校图书馆里的图书在俄罗斯联邦图书总数二亿零九百九十万册中仅占一千六百万零二千六百册。当然，学校的图书目录不完善，因此全国的图书目录的材料可能是不完全的。不错，最近两年来工作已经大有改进，但是儿童图书馆的工作（特别是在乡村、民族地区、小学）仍然是个尖锐的问题。

学校图书馆的问题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切实的解决。在这里需要进行巨大的全面的工作。儿童图书的印数应该增加许多倍，必须设法把这些图书供应给学校图书馆。这就要求国家拨出大笔款项，要求各出版社进行紧张的工作。儿童图书的质量问题也很重要。我曾经看过一份为小学（也就是为12岁以下的儿童）图书馆大量重印的书

籍的目录。在预定重印的100种书里，半数以上都是童话和诗歌。描写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活，描写我们祖国的人民，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工作和学习、他们的斗争、他们的成就，描写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描写这些方面的书籍少得可怜。曾经有一个时期，许多教师对儿童的力量估计过高，他们因此受到了人们的不少指责。但是我们又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我国8—12岁的儿童都是不懂事的孩子。必须供给我国学校一些写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优秀儿童读物。

苏联的作家们，你们在哪里呢？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哪里呢？在这项工作中教师也可以起巨大作用，如果他们能够彻底摆脱儿童学的影响，并且认真地了解儿童，了解他们的兴趣和要求的的话。

儿童图书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快就得到解决。我们的教师和儿童图书馆管理员必须研究苏联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并且从教育家的观点把每一个作家描写儿童的作品挑选出来。这对每一个教育家说来是一个最丰富的宝库，不要只挑选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谢德林、格·乌斯宾斯基和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不要只是挑选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要挑选普通作家的作品，因为几乎所有的作家在提出自传性的材料时都要写到童年的事情。

我国图书馆管理研究人员应该充分研究这个问题，图书馆学研究所应该出版一种图书索引。儿童书籍中应该包括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要特别注意培养儿童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在这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师范学校图书科已经取消。由于教师的工资提高，图书馆管理员的工资比较起来就低了，因此很多受过师范教育的图书馆管理员都离开图书馆工作岗位转到学校去了。仅莫斯科一个地区就有100个图书馆管理员转业到学校教书去了，愿意上图书馆学院儿童图书馆系的教师为数非常少。今年儿童图书馆系甚至不招生了。由于干部缺乏，学校图书馆网的扩展

就受到了影响。

市苏维埃、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各级组织必须重视这项工作，让全社会都来关心儿童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从而来帮助学校搞好教导工作。关心青年一代，授予他们知识——这是我们共同应该关心的事情。

论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

1842年的《莱茵报》上，刊载了马克思早期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话涉及到儿童。我们研究不同年龄儿童思维特点的教育工作者，对这几句话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马克思在文中写道：

“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用自己的名字：‘乔治’等等。”^①

大多数家长都会同意：马克思的这一观察十分正确。

他接着写道：“空间，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东西。空间是小孩在世界上遇到的第一种量，因此，小孩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就是伟人……”^②

我读过马克思这番话之后，看了我国儿童画的一些图画，找到了大量证据来证实马克思的这种观点。群众大会上的列宁、伏罗希洛夫往往被画成高大的伟人，而四周的群众则画得很矮小，是一群侏儒。

马克思注意到儿童往往把“伟大”与“庞大”混为一谈，这要求我们更加注意儿童的图画。谁要看看这些画上所反映的儿童对周围事物的概念，谁都会大为惊讶的。

我曾多次翻阅过七岁儿童、入学前预备班^③的学生的笔记本。儿童在图画中很好地反映了他们对劳动的理解。

头几页画的人，双手交叉在胸前。后来他画的人就已把两手分开了，而且两手都握着不同的东西：有时手里提着桶，有时拿

着扫帚。后来，双手开始出现铲和锹。再过了一段时间，画的是一个站在拖拉机旁，一手握着方向盘。最后，画的是一辆汽车和一个人，这个人坐在车内，双手扶着方向盘，正驾驶汽车。

学龄前儿童图画中所反映的他们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力，往往令人十分吃惊。

学龄前儿童思考事情总是特别具体，他们喜欢通过生动的形象来想问题。他们十分重视颜色。如果您对学龄前儿童讲话，给他讲故事，说有一个小姑娘穿了一件玫瑰色的连衣裙，要是您下一次改口说是穿的天蓝色的，他就会不满意地打断您的话：“不对，不对！她穿的是玫瑰色的，你怎么忘了。”

他们的思想非常具体，这使他们很难理解词的转义。

“妈妈，以前不是说，列宁是红色的吗？”

“是的，是红色的。”

“可我刚才到卡佳那儿去的时候，看见他塑的列宁像，是白色的，用的是石膏。我说，这恐怕不行吧？列宁是红色的，不是白色的。”

不能进行抽象思维是学龄前儿童的某种年龄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喜欢模仿。对学龄前儿童说来，模仿是掌握的手段。同样，学龄前儿童可以多次听同一个故事、同一首诗，而兴趣依然不减。他虽早已会背了，却还要您一讲再讲。

学龄前儿童往往把从大人那儿听来的东西一再重述，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大人们觉得很惊奇，他的孩子怎么能讲得这样有条理，其实大人们是没有察觉，孩子们并不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做父母的尤其察觉不到这点。成年人往往把沉思型的儿童看作水平低下的人，其实这种儿童只是力图把他听来的东西加以思考，而有时之所以未能及时加以表述，只不过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与此同时，人们往往把那些重复别人的讲话却不理解其意的孩子看作聪颖过人的儿童。

这样一来，往往不是对儿童的发展水平估计不足，就是对他

们的力量估计过高。

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教师不了解、不知道如何引导儿童的兴趣，不善于对待儿童，不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不懂得向儿童讲什么、怎么讲，不明白让儿童干什么。

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教师把学龄前儿童与小學生等同起来，向他们讲一些他们根本听不懂的东西。

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我们不懂得学习要有一定的系统性。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我们采用了学龄前儿童接受不了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必须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在组织游戏，安排阅读、旅行和布置劳动时，必须切合儿童的发展水平。

无论是福祿培尔的经验，还是蒙台梭利的经验，还是我们苏联多年的经验，在学习时都要持批判态度，这样才能使拟定的学龄前儿童的教学大纲具有生命力，具有趣味性，并能照顾儿童的知识水平和兴趣。

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要抓紧进行。

论学前儿童的玩具

我们谈论儿童玩具这一问题时，不能从成人喜欢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而应该从儿童喜欢什么玩具和需要什么玩具的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

重要之点在于确定什么年龄的儿童需要什么样的玩具。

最需要玩具的是学前期的儿童。他们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玩具。

年幼的学前儿童还不熟悉周围的环境。他们往往通过观察、摹仿和不断地重复同一动作、词语、游戏的方法来认识周围的环境。我们要注意儿童的主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就给他们一些能够发挥其主动性并把这种主动性引向一定轨道的玩具。

儿童还不会很好地分辨各种颜色。因此应该给儿童一些能使他们学会分辨各种颜色的玩具（在这方面，最好的东西是儿童们可以用来给自己的洋娃娃做衣服的各种布头，以及各色圆圈和盒子等等）。

儿童还不会区别大小，因此应该给他们一些能使他们学会区别大小的玩具。

在这方面，最好的玩具是：各种可以装东西的盒子，儿童所熟悉的大小不同的木制野兽或人像。儿童很可能按高矮大小把这些人像排列起来：两个成年人，两个小女孩，两个小男孩；两个成年人，三个小女孩，五个小男孩等等。人像应该很简单，其式样和颜色不应分散儿童的主要注意力。

儿童还不知道距离的远近，因此应该给他们一块石板和一支

石笔，好让儿童从不同的方面画一些长短不同的线条。这种石板可以擦了再画。

还需用一些软球，这种软球能够上下抛掷、滚转而不会损坏任何东西，也不会打伤什么人。

儿童触觉还在发展，应该让他们什么东西都摸摸。给他们的东西要有硬的、软的、光滑的、粗糙的；要教他们用手摸的方法来区别物体，辨明其形状，从口袋里拿出某样东西。

最好能给学前儿童各种音响器具，如小铃、鼓（当然，这不是室内玩具）。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让儿童有一个普通的、打不破的、非畸形的洋娃娃，要他能给这个洋娃娃洗澡、洗脸、穿衣、脱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系带子、钉扣子。洋娃娃应该是最普通的，最便宜的，但是要非常好看，而且不容易弄坏、变形。

另外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给儿童一个碗，好让他们装沙子、谷粒等等。不一定要把大象、老虎、狗熊这种玩具给年幼的学前儿童玩，因为他们还没有见过活的大象、老虎、狗熊。如果他们喜欢熊这个玩具，那只是因为它很软和，它的脚掌能动。最好是给儿童玩一些软和的猫、狗、马，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活的猫、狗、马，可以对这些动物进行观察。

要给儿童一些积木（大而轻便的）以及其它一些木质材料，好让他们用这些东西堆成各种建筑物。

夏天要给儿童一些木铲子、手推车、小包和可以装各种东西的小筐。冬天应该给他们雪橇。

年龄比较大的学前儿童喜欢哪些玩具呢？

如果说年龄小的学前儿童比较喜欢单独玩，那么年龄较大的学前儿童就喜欢大家一起玩。

如果说年龄小的学前儿童喜欢单个的猫、狗、牛、马、小女孩、小男孩、单个的叔叔和婶婶这些玩具，那么年龄较大的儿童就喜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活动的，都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因而在

这里图片和图片性质的玩具就特别重要了。

年龄较大的学前儿童对周围的人已经开始注意起来。见到母亲，就要看看她在做什么事情；见到父亲，就要看看父亲在做什么事情，还要看看哥哥在做什么事情等等。使他感兴趣的，首先是他最接近、最了解的东西，——他感兴趣的不是外国情调，不是他视野以外的东西，而是他亲眼见到的那种生活，那些人。

在这里，准备一些这种类型的分开的图片是很重要的。从前，常常在硬纸板上画着一个土耳其人坐着抽烟。画着一个老头坐在树桩上。在他旁边的硬纸板上留出一点地方，可以把别的图片放到那里去。“瞧，来了一个小姑娘”——一张画有穿着玫瑰色衣服的小姑娘的图片移到旁边来了。现在，图片的内容当然应该有所改动，但是这种玩具的形式还是可以保留的。如果我们所选择的材料是儿童所熟悉并且理解的，那么这种游戏就会很有意思。

如果你看一看四五岁的儿童所画的图画，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所画的东西和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中。他们还未注意到事物的细节。这个时期是儿童开始学习图画的时期。应该给儿童一些纸和有色的软铅笔。

为年长的学前儿童提供玩具是一个最难的事，因为这个年龄时期儿童的生活环境是极其多样的。而这种年龄的儿童对任何事情都想具体地了解。

所以这个年龄时期的玩具应该有助于儿童了解周围的现实，对于这个年龄时期的儿童来说最好常常带他们到儿童剧院去。比如说，学前儿童非常喜欢傀儡戏，不过傀儡戏的内容应该具体，尽量减少一些臆想成分。有时成年人往往都不明白儿童笑什么怕什么。成年人应该仔细地研究儿童年龄特征。玩具制造者也应该研究儿童的年龄特征，否则玩具就不能为儿童所喜爱，无助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这篇文章只是谈到了几点对学前儿童玩具的意见。不要在玩

具的装潢上煞费苦心，重要的是朴素大方、价廉物美。现在由于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广泛发展，儿童的玩具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对这问题应该好好加以研究。

对学前教育材料的几点意见

我们应使我国幼儿园的小朋友成为幸福的儿童，不仅要考虑到如何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模范学生，而且还要考虑到如何为他们创造一个环境，使幼儿园成为他们自己的家，都愿意上幼儿园。“愉快的童年”可以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而给我的材料中却很少谈到这个问题。

如果认为要使儿童幸福，就得尽量给他们买一些贵重的玩具，吃最可口的点心，每天领他们看芭蕾舞，看戏和电影，穿丝着绸，讲一些荒诞无稽的故事，那就十分可笑了。

谁要是这样想，那就是不了解儿童，就是想把他们培养成地地道道的少爷公子。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深入了解儿童，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要像科特——木尔雷卡^①所说的那样，善于“设身处地，洞察其心”。要了解他们已掌握了什么概念，具备了什么技巧。要了解儿童并理解儿童。只有理解了儿童，才能给他们以真正的慈母般的关怀，使他们成为幸福的人。

我看了这份材料之后的印象是，我们忽视了应该让儿童了解周围的生活，扩大他们的视野的问题；我们只是把他们看作一种教育对象，一团可以随心所欲捏成某种标本的蜡料，甚至是应该砍光削平的一根木头。

我们把学龄前儿童关闭在高墙深院之中，为他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给他们讲一些荒谬的、毫无意义而且不能理解的童

话故事，不让他们去观察生活，只让他们讲讲玩具和童话故事，讲一些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磨平他们的棱角，自以为是地把他们培养成一群供实验用的家兔。

我们应该尊重儿童的权利，首先是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受他们那一年龄阶段所需要的那种教育的权利，让他们触摸每种东西，闻嗅每种东西，反复摆弄它，观察它，反复叫出它的名称，等等。要满足他们通过观察生动的自然界和具体的人以及通过他们的劳动和互助来扩大自己视野的愿望。我国幼儿园在实际工作中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幼儿园里全然不讲具体的人，不讲人的劳动和人们的兴趣所在。这是一大错误。我们不妨看看农村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学会观察人；我们不妨再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幼年的印象往往令人终生难以忘怀。为什么不让儿童去了解人呢？为什么不把儿童带到地里去看看大人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铁匠炉、木工房、厨房去看看呢？为什么不每周用几个钟点安排他们与年龄大的小朋友见面，与男女工人和集体农民见面呢？等等。学龄前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乃是他们认识周围生活环境的权利。

什么是学龄前儿童的劳动权利呢？对学龄前儿童说来，劳动就是做游戏。规定一些具体要求对他们说来还不起作用：开始时他想用粘土捏一个小猫，结果捏出的却是一个人。不过，要教他们从小学会收拾东西，擦掉灰尘，刷洗食具，采摘浆果，喂狗喂猫。不过，儿童很喜欢他熟悉的人指点他。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在缝着什么，她缝了三趟之后就去问奶奶：“奶奶，缝得好吗？”“好，乖孩子，缝得好！”这样，她慢慢就学会了。然后她又没完没了地想把两块布缝在一起。要重视儿童的劳动。孩子们是多么喜欢干各种活儿啊！

休息的权利。小朋友很容易疲乏，因此功课表要尽可能灵活一些。一堂课不要上45分钟，也不要上30分钟，而要在上课中间穿插唱唱歌，让他们在空房间里或室外跑跑，与小狗玩玩，等等。要购置一些轻便小床。不要忘了儿童很容易疲乏，不要带他们参

观展览会和看电影，不要用一些很难的玩具弄得孩子们疲惫不堪。

社会保障的权利，即对贫困儿童的关怀。

各族儿童关心自己的权利。

当然，向儿童讲苏联法律和宪法，那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在这方面要特别慎重，不要过高估计儿童的力量和发展水平而陷入左倾泥坑。这类左倾表现有：讨论学龄前儿童（他们往往没有离开过本村、本条街）中对祖国之爱的问题，而对祖国之爱必须具备地理概念，国家体制概念，本国经济的概念，可是让儿童反复背诵他们不懂的词句是最糟糕不过的。不必向儿童讲什么儿童的种种权利，而是要使整个学前工作符合苏联宪法的精神。

给我的材料中还缺少艺术教学部分。这项工作在教育儿童认识周围现实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至于语言的发展，重要的不仅是不要放过发音错误的地方，而且还要扩大词汇量，避免语言的单调——办法是扩大儿童的视野。

在教学过程中，要用他们熟悉易懂、经常使用的词去教他们阅读。不许用印刷体书写，一开始就要用手写体书写，事先可以搞一些绘画、缝补等活动作为培养书写能力（发展手的功能）的准备。

但是，学前工作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教育，培养儿童友好地生活、游戏和活动的的能力。这首先是一个组织问题。幼儿园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小组来游戏、劳动。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儿童小组由哪些人组成，组成之后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似乎考虑得很少，而这对发展主动精神和组织才干来说，却是一个关键问题。要善于组织全班的集体活动，不过学龄前儿童应广泛开展小组活动，总结并交流经验。

最好通过两三个人的活动来培养儿童从事集体工作的习惯，不过要一步一步地进行，而且要考虑周到。在这方面不要简单地模仿学校。

培养自制能力的游戏很重要。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目的。如果这一目的不明确，如果目的只是培养听话的孩子，就不可能养成自觉的纪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关心家长本人的知识水平，帮助他们进行自学，让他们掌握起码的教育学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幼儿园的实际工作并发动他们参加这一工作。

为什么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蒙台梭利以及西欧和美国的经验“不胫而走”呢？因为对我们很有益处。

对许多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省的工作要采取分析的方法，这个问题很重要，不能放过。

致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书记)①

安德列·亚历山大罗维奇：

昨自洛博夫②同志处获悉，学校是否进行劳动教学的问题将交付表决。有人认为劳动教学毫无补益，一切校办工厂均应停办。

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及《反杜林论》等书中，凡是论及有关教育、学校以及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脱节现象诸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学校必须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只有在未来的学校里，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原则才能彻底实现。他们同时还指出，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工作必须立即着手进行，因此，1866年在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就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必须把儿童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③。这一提案当时就得到通过。

列宁从开始自己革命活动的第一天起就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他在《民粹派空洞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把尤沙柯夫④批驳得体无完肤，因为尤沙柯夫认为在沙皇制度下能够实行这一极其重要的措施，而且他只是想对农民而不是对所有的儿童实行这一措施。

侨居国外期间，列宁曾要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阅读了我写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我们不只一次地谈过这个题目。

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求立即开展此项工作。

我党党纲第十二条对这一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⑤。

关于学校进行劳动教学(不是手工劳动，而是有现代技术高度

的劳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战斗意义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分子作过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曾经同过去文科中学轻视劳动的教师们作过斗争。通过和人民教师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就把他们吸引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来了(1918年,我在莫斯科省许多县里就这个题目做过报告;1919年,我在伏尔加河和卡玛河一带也就这一题目做过多次报告),而且还激发了工农群众对这一工作的强烈兴趣。

在这个问题上,斗争是分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方面,在生产停滞、百业凋蔽的年代,不学现代技术和农业的基本理论,而代之以只学家务劳动,让孩子们干农活(本来应让他们上学的),不把学习与劳动结合起来。这是右倾。另一方面,把儿童与成年人同等对待,让儿童到工厂去堵塞完不成计划的缺口等等。这是左倾。

不过,不管学校里的劳动安排得如何不得当,它总还是能使儿童受到一定的锻炼,能加强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可以问问过去在劳动学校学习的青年(那时他们的年龄在12岁到15岁之间),他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至今还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列宁始终关注这项工作的进行情况。他反对那些用“单一技术教育”即狭义的职业教育来代替综合技术教育的人。

近几年来,学校的劳动教学已不复存在。在学习某种手工“劳动过程”时,教学与劳动完全脱节。

不久就要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取消学校的劳动教学和停办校办工厂的问题进行表决。不是重新安排劳动,而是取消劳动^⑥。对这个问题,没有邀请工程师、农学家、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青年一起讨论。只是邀请了一些老教师,即各学科的教员。

我知道目前时间很紧,组织部和政治局的委员一时还顾不上这些问题。可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呀!

新宪法业已颁布,社会主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已取得胜利。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切前提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的遗训,此时此刻,作出取消学校劳动教学的

决议是不应该的。有些人反对学校进行劳动教学，说什么学校要抓的是学习而不是劳动；说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取消学校的劳动教学；我们不应受人以柄。

当然，我国的学校最终必将成为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⑦，但是不能现在就对这项工作不闻不问。

致共产主义敬礼！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1937年2月9日莫斯科

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

(1937年2月15日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①

同志们，目前，学前教育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现在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已经非常广泛地开展起来了。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但是旧的残余还很多，这种旧的残余在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最为顽强。现在正在大力改造日常生活，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切都不可能自行来到。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刚一建立时就开始了的那一工作，现在要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通过这一工作来提高整个的文化水平。儿童最初获得的印象会使他终生不忘，所以，如果我们要认真地、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培养出能逐年把生活提到更高阶段上的一代人的话，那就应该在儿童生活刚开始的头几年就要非常慎重地对他们进行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应该特别重视儿童，重视学前期。我不是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但是由于学前教育工作是我们整个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所以也需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充分地提出了教育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学习过《共产党宣言》？（大家说：“学习过。”）读的原著吗？（大家说：“读的原著。”）既然你们读的是原著，那你们就知道，那里对家庭、儿童问题的阐述是多么精辟②。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事情：读一点什么东西，读呀读，——似乎是掌握了。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

国家学说课程时所讲的话^⑤。列宁在他第一次讲课的导言中指出，只有从各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把它与建设苏维埃国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才可能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亦即国家问题。

苏联宪法里扼要地谈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多年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再读几遍，想把列宁所说的话再读几遍。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子来说，敌人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想消灭家庭，取消教育，并使妇女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好地回答了这种攻击。他们说，任何社会制度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们意识的变化，但是至今为止在社会制度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都是这样一种变化，即一部分剥削者被另一部分剥削者取而代之；地主被资本家取而代之，一种剥削形式被另一种剥削形式取而代之，因此改革总是很表面的。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要消灭任何剥削现象，那时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会根本改变，对家庭和教育的看法也会改变。

同志们，这一点我们根据经验是了解的。我们知道，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们立即充分地提出了关于家庭和妇女地位的问题，以及儿童的社会教育问题。如果我们看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情形，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学前教育的问题是与妇女的地位，以及和家庭有关的法律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记得，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很多年，幼儿园才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有一个很能干的年轻农妇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习，有一次她说：“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到我们村里来讲起幼儿园有什么作用，可是妇女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阵，接着都走散了，只剩下这个学前教育工作者一个人。她甚至难过得哭了起来。”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农村对学前教育工作者的态度。

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1918年，在高尔基省拉波特卡村，有一个母亲跑来对我说，她想向列宁控诉一下她的儿子。我以为她

的儿子一定是个成人，可是原来是一个5岁的小孩子。她不让他到幼儿园去，可是他偏要跑去。我好不容易才劝住她，花了很长时间向她解释，进幼儿园是一件好事。

最近展开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现代的妇女知识分子）的运动。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从高尔基省索尔莫夫工厂来找我。我给她们讲起了这件事，并且说：“你们在高尔基省附近工作，所以请你们到拉波特卡去看看，现在那里有没有幼儿园，母亲们是否让儿童进幼儿园。”

这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写信告诉我：“现在有学校，校舍很好，幼儿园也有。”不过儿童进幼儿园的有多少，人们对幼儿园的态度如何，这些她们都没有提到。

现在幼儿园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了。不管从哪里来的人都说，他们需要更多的幼儿园。这是因为在这方面文化水平有了变化。

家庭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日常生活问题。同时，使我特别惊奇的是，马克思非常了解学前儿童的情形。他对学前期儿童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和他的小孙儿一块儿玩，注意观察他们的情况。他说：“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总是用第三人称：‘乔治做的这件事’，而不说‘我做的这件事’。”^④

学前教育工作者都很了解，幼童对自己总是用第三人称：“丹尼亚做了某件事”，“瓦夏做了某件事”。

马克思还发现了另一点：“儿童对‘伟大的’和‘高大的’这两个词总搞不清，当他们谈起伟大的人物时，他们总是把这些人画得很高大”。^⑤

在一次学前教育会议上，有人给我看一些儿童画的画——身材高大的列宁在红场上发表演说，周围是一些个子很小很小的人。

不管是马克思或者是恩格斯都很关怀儿童。他们总是把教育问题放在心上。现在，家庭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社会教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我记得也曾经发生过偏差，就是认为只应该进行社会教育。我曾经写文章反对沙布苏维奇，因为他曾经设计怎样建立农业城，而且在这种农业城里，工人住宅里不包括儿童住的地方，所有的儿童都住在一个特别的小城里。对这种主张要认真加以反驳，因为要是这样做我们就剥夺了父母和儿童接触的机会了。于是学前教育处提出了另一种计划：要在父母居住的公寓里给孩子拨出一间最好的、光线充足而且朝阳的房间，同时要安排得能使母亲有机会到托儿所、幼儿园去，帮助料理一下对孩子的工作，不要破坏了同儿童的联系，要把学前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联系起来。

这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争论。现在当然不必谈这件事了，因为我国的学前社会教育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父母要关心儿童的要求。

在学前教育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偏差，就是认为我们的儿童什么都能做，什么都知道。我记得，有些幼儿园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这些标语都是儿童完全不明白的。即使是目前，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往往在这方面还发生了一些偏差。

我常常想起科特—穆尔雷克的一个童话故事以及猫和小孩之间的对话。猫对小孩说：“站在我的位置上，钻到我的肺腑里来。”教师也应该像这样来理解儿童，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应该能够“站在儿童的位置上”并且“钻到他的肺腑里去”。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儿童突然在不适当的地方笑了起来，母亲或者学前教育工作者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开始责骂他。而他之所以笑，是因为不理解问题的本质，他觉得使成人为之激动的事未免可笑。

就拿儿童如何讨论战争来说吧。他们说：“打起仗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当别人把具体事实讲给他听时，他会说：“知道吗，妈妈，我将来可能当一个炊事员。”儿童的思想就是变得这么快。

当然，常常有些印象特别强烈，这种印象能使人终身难忘。

我记得，当我10岁的时候，一个革命者到我父亲这里来。这时他们打发我到别的地方去，以免我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我记得，后来我们在尼古拉大街附近的涅瓦河大道上走着。苏洛夫也夫百货商店就在那里。我记得，当时街灯闪闪发光，父亲和母亲边走边谈。我在前面走着，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公妻制，真是愚蠢。”显然，这个革命者说了些什么。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我读到《共产党宣言》，其中谈到有些空想家^⑨是如何理解家庭的，这时我立即想起了这件事。我眼前立即出现了涅瓦河大道、百货商店、街道以及母亲所说的话。可是当时我一点也不懂，而且多年来一直没有想起这件事。可见童年时代的印象在人的脑子里是多么深刻。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一些儿童不理解的词句和概念硬塞给他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善于对待儿童，而对于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钻到儿童肺腑里去”。

我最近看到这样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孩。人们给她讲了一个有关山羊的故事，这只山羊跑过一道小桥，贪婪地去吃树叶。可是，它刚才已吃饱喝足了啊！这个小女孩以一种接受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山羊原来是一个骗子。因为老太婆喂过它，可它却骗人，装出没有吃过东西的样子。于是老头大骂老太婆，怪她为什么不喂。老头自己去喂，可是小山羊还是跑过桥去吃树叶。这时老头也亲眼看见了小山羊是在骗人。”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小女孩便坐在椅子上，自己在想什么是骗子。她开始感到很沉重，并且说，“我有多么累啊”，接着她又笑着说：“我也是一个骗子！”

值得注意的是，她把这个故事翻译成生活中的语言了。她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骗子。

我们要善于选择一些故事，让儿童读后懂得——比如说——什么才是骗子，而不要跟他们讲一些带有神秘幻想色彩的故事。我们要能够“钻到儿童肺腑里去”，要站到他们的位置上去。

不久前，我们同驻远东的红军指挥人员的妻子举行了一次很

有意义的会议。她们是一些很好的人。她们说，她们需要幼儿园。只不过她们碰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人教她们认真地对待儿童。“哪怕随便给我们派一个教师来也好。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教我们学会如何正确地、认真地对待儿童”。对我们大家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学会认真地对待儿童，更好地想想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以及怎样去做。居民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现在，摆在学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就是怎样尽量地扩大学前教育工作，因为目前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的这种要求极其迫切。

不久前，我曾到过国营农场。那里有200名学前儿童（包括婴儿在内）。可是托儿所只能容纳30人。另外，露天幼儿园能容纳30人。现在正在修建幼儿园，工作进展得很慢，可是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主任说，他们买了一些价钱很贵的玩具：狗熊、布娃娃，而且每个小孩都有一件玩具……大家想想看吧！

目前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学前教育工作，尽量多使一些儿童受到这种教育。目前正在修建幼儿园。这一工作的进行速度很慢，好像乌龟爬行一样。大家都责怪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条战线上远远落后了。但是问题还不完全在于为幼儿园修建一些房子。在这里还需要对工程师进行巨大的工作，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幼儿园，因此也就不知道应该怎样修建。还需要对建筑工人进行巨大的工作。此外，还要使幼儿园适合周围的生活条件。

不久前，我参加了女拖拉机手的会议。在拖拉机手中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巴莎·安杰林娜^⑦。女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开展了拖拉机工作队之间的竞赛。可是她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要设立流动的幼儿园、流动的托儿所，因为他们到拖拉机站去工作，家里没有人照管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和居民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是存在的，目前需要特别注意这件事，要注意倾听居民的要求。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办到的。

我记得列宁有一次回复群众来信的情形。1918年，一群农民写给他一封信，信里谈到了他们的生活情形，谈到了贫农的情形，同时也谈到了“空气”税(系人头税之误)*。列宁并没有在字眼上吹毛求疵，而是认真负责地回复他们说：“至于说到税款，对贫农不应征收。至于对中农的问题，日内将发下文件，其中会详细谈到减免税款的情况。”三天之后文件就发下去了，其中谈到什么人可以减免什么税。减免税款的面很大。在这封农民的来信中还谈到每一个农民需要一头乳牛。这是1918年的事，这一点不能忘记。但是只有目前才能满足这个要求。现在每一个农妇都有一头乳牛和小家畜，而农民还在当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列宁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也提出过，当我现在重新翻阅这些文件时，我就想到这种乳牛在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件事说明，列宁对农民的意见是多么重视。我认为，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注意倾听女拖拉机手的意见，注意倾听各阶层劳动人民的意见，注意倾听女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意见，以便研究怎样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怎样把工作真正做得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我曾经参加了许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家责怪教育人民委员部对幼儿园的修建工作进展缓慢。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各个人民委员部代表的发言。甚至听到有人这样说：“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最好是给工程技术人员妻子的孩子修建幼儿园，而且还要修得比较豪华些。”我认为这种主张完全是不对的，因为现在我们要满足群众的需要，所以要使学前教育运动开展得尽可能更广泛。我们要尽可能广泛地培养干部，更多地修建一些适合当地条件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可是现在我们常常去购置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

你们都是一些斗志昂扬的人，而不是死气沉沉的人。我从前和图书馆管理员常常交谈，听到他们向我发牢骚(图书馆取消了，

* 俄文 воздушный (空气的)与 подушный(人口的)两词发音相近，故有此误。
——译者注

买书的钱也不给)，这时我往往跟他们讲：“要自力更生。你们别给我讲这些，而要谈谈你们是怎样为图书馆而积极工作的，你们取得了哪些成绩。”现在，图书馆管理员首先谈起的，就是他们如何努力使图书馆保存下来，他们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这才是最主要的。需要更加广泛地进行宣传，因为一部分居民完全不了解儿童在幼儿园里干些什么。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有些幼儿园的很多作法很不妥当。例如，有一个幼儿园花了不少钱，被认为是一个办得好的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主任认为，如果一个小孩说话说得不对，或者是玩皮捣乱，就把他放在床上躺一整天。怎么会这样？你们大家都在我们这个高等学校学习，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儿童。我曾经到一个幼儿园去参观，那里的情况使我很不满意：一会儿读这首诗，一会儿又读另一首诗。显而易见，儿童对此感到非常枯燥无味。我们要使儿童对幼儿园感到亲切，使他们愿意到幼儿园来，使儿童在幼儿园里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要给他们买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或者是一些构造很复杂的玩具（他们不会玩这种玩具）。儿童有时想数一数马有几条腿。当列宁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有一次，别人曾经送给他三匹玩具马。他把这些玩具带到一个角落里去，数呀数，怎么也数不清所有的马一共有几条腿。于是他就把这些马都拿来拆坏了，并排放在一起。父母亲走过来了，而他还是坐在那里数。

小孩毕竟是小孩。我们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钻到他们的肺腑里去”，而不要把他整天放在床上。我曾经见过一个乡村的幼儿园。那个幼儿园的主任对孩子很好，给孩子洗衣服，关心他们，可是要对孩子进行些什么工作却不知道，她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干，注意什么问题，怎样组织儿童。我们是知道的，应该怎样对待儿童，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起初是两三个人一起玩，然后集体在一起玩，要使儿童起初学会在一个小组里友好地生活。大家都知道，儿童对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每一句话，总要翻来复去重复几遍。我曾经见到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头一次听到

“立即”这个词，后来在20分钟的时间内，她在谈话中把这个词在一切可以用得进去的句子里重复了好多遍。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儿童，那么就会发现，他们往往要把一个词重复10遍。他还把这个词告诉和他一起玩的别的孩子，也告诉成人。

我们还需要给儿童一些发展自己主动性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培养集体精神，要使他们学会大家一起友好地生活，要给他们一些共同的、能够理解的体验，而不要无休止地带他们去看电影。我认为不能带学前儿童去看电影，他们不明白电影的内容。看电影很容易使儿童的神经系统紊乱。儿童在电影院里背着银幕，回家时大喊大叫，开始变得顽皮起来。我们要给儿童一些使他振奋的东西，而不要给他一些使他涣散的东西。成人不应该用自己的口味来评判儿童的需要。

现在小学正带着儿童去看《青鸟》^⑥。成人对此很感兴趣，可是儿童认为枯燥无味，他们不懂剧情，这种戏太复杂了。我现在很少看戏，不过前些时看了一次木偶戏。

虽然这是木偶，但是对学前儿童来说还是复杂了一些。他们不明白有过哪些沙皇，有过哪些贵族，为什么这些人带那种帽子；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贫农、中农和集体农庄庄员。同时剧里反映了许多非常复杂的东西。当然熊演得很好，兔子的耳朵也能动，表演技术也很精彩。成年人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而且从艺术的观点来看也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我发现儿童坐在那里简直无动于衷。他们没有见过梭鱼，也不明白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此外，一个小孩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也许，他们明白女皇涅斯米扬娜发了脾气，不想吃东西。这是他们能看懂的，可是其余的就看不懂了。这种戏甚至对小学儿童来说都很复杂。在这里，应该先看看一个小组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接受了多少。

有些故事很容易懂，有些却很令人害怕——全是些妖魔鬼怪，等等。有一次我到一所学校去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儿童们立

刻都来照顾我。有一个女孩给我领来一个参加过这种庆祝活动的小女孩，并且用手把她举到我跟前。那里的儿童自己设想了一种鬼出现的场面。他们把它的尾巴、角都拿掉，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儿童们感到很可笑，但是当舞台上出现了鬼的时候，我感到坐在我手上的那个小女孩的脚掌有些发冷……这个鬼给小女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必须在各个重新修建的幼儿园中广泛地展开工作。在这里，经验特别重要，你们不仅要给低年级介绍自己的经验，而且还要给所有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介绍经验，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可以添置售价昂贵的玩具，可以讲一些鬼怪故事，认为儿童如果不听话可以把他放在床上。你们应该讲讲自己教育儿童的经验，讲讲照顾儿童的办法，因为经验具有重大的意义。你们应该把别的幼儿园工作能力较差的青年人邀请来，让他们参观参观，你们要和他们谈谈，给他们一些辅导。

1929年，乌拉尔克拉斯诺波梁斯基区有一个文化馆，它是这样建成的。那里早就成立了公社，周围有30个乡村。这个文化馆起了指导作用。当我们得到了关于这个文化馆的材料之后，我们决定从教育人民委员部派5个人——学前教育工作者、扫盲工作者、政治工作人员、图书馆管理员、农艺师——到那里去几个月。后来，他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文化馆的工作中有趣的事情。他们谈到，文化馆给居民什么问题都讲，特别是农业上的问题。

……在学前教育工作方面，曾经从每个村子找来一些代表，学前教育工作者以幼儿园做例子，告诉大家怎样给儿童洗脸、洗手，怎样照顾他们睡觉，要做些什么；然后到各处检查大家是否照着做了。这种办法具有重大的意义，据说，现在这些村子的学前教育工作做得很不错。所以说，这种示范是很重要的。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将怎样在没有经验的人中间进行学前教育宣传。我们知道，现在要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方面现在将要进行很多很多工作，你们要认真地

对家长进行工作。

……必须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这样，当一个教师懂得什么是火车头时，如果布置学生一个有关火车头的习题，他就不会说这是设计教学法了。他将会懂得生产，了解日常生活而布置一些接近儿童理解力的习题。物理教师将会发现主要应该注意什么。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列宁所一再热情地谈到的问题。他说，旧时学校最坏的毛病就是理论脱离实践。对于你们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说，也许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还不太尖锐，不过你们要了解儿童的生活环境，应该与居民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必须专门对家长进行一些教育幼儿的工作，因为可能在幼儿园里一切都很美好愉快，可是当儿童回家之后，却要挨打，不能按时吃饭。必须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培养我们理想的一代人的保证。

必须避免偏差，仔细观察生活，学会了解儿童，研究儿童，不过不要官僚主义地研究，要考虑到全部经验，集体进行这一工作。不必购置一些奢侈的玩具。我记得，一个女工曾经说，我们幼儿园里在培养一些地地道道的阔少爷。我们不要在那里培养阔少爷，而要培养完全新型的人，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人。此外还要提高自己，以便很好地了解由此可以产生什么结果。其次必须扩大这一工作，尽可能多包括各阶层的居民，还要教育家长，以便把学前教育战线变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战线。一个母亲，如果她会给儿童洗脸洗手，经常开小气窗，按时给儿童吃饭等等，她就能使儿童一生都养成卫生习惯。

最近我曾和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过去领导过我们的儿童之家，现在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省委会工作。他说，我和列宁流放时住过的那个乡村^①已经发生了变化，那里设立了医院、学校，还在进行改建工作，那里修筑了街道，修缮了屋顶，等等。整个村子具备了文化的外貌。那里还有学前教育机关。一个女大学生写信告诉我，她一定要到寿山村去看看那里托儿所的情况。你们也

必须到各地去，看看日常生活是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改造。有些家长经常打自己的孩子，必须对这种作风进行斗争。因为有些地方的人常常说——打打孩子，至少可以使他更守纪律一些。还要善于进行反宗教宣传，把这种宣传与日常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来做很多工作。

……当你们去实习的时候，你们不要只到城市里的幼儿园去，还要到农村去，看看那里幼儿园的情况。可是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往往不了解农村的情形。必须注意地方报纸的报导，以便了解农村的情况。当你们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不应该关起门来，只关心幼儿园的利益，不要觉得好像世界上只有幼儿园一样，而要尽可能与学校、图书馆密切地联系起来。要敦促图书馆管理员，使图书馆能购置一切有关学前教育工作的小册子，并且使居民能阅读这些小册子。要与农村文化室、俱乐部保持联系，把集体组织在幼儿园周围，问问女教师，她的女孩子们是否开始旷课了，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就要利用这一点来开展学前教育宣传。告诉他们：“现在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是您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把您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吧。我们将在这方面帮助您。”这可能对做母亲的人很有影响。

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全都能成为学前教育工作的宣传者，你们要同一切政治教育工作者、图书馆管理员、各种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让他们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而为我们的儿童创造一个幸福的童年。

辅导员应该懂得教育学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儿童的科学。谁都知道，儿童刚出世时是一个什么也干不了的小仔，既不能站，也不会走；既不能思考，也不会说话，对周围的环境毫无辨识能力。要在多年之后，他才能具备正常成年人所掌握的那种技能和知识。我们要为儿童创造这样一种条件，使他能健康成长，成为一个积极有为的人。体力的发展与智力的发展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进行的，教育包括用知识武装儿童，即包括教学在内。

教师首先要懂得的，就是人体的构造和机能，即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以及人体的发育情况。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不能正确地去培养儿童。

现代科学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儿童的天然教师就是母亲、家庭其他的成员：父亲、哥哥、姐姐、保姆、奶奶和周围的孩子。

但是，往往母亲、奶奶以及家里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什么对儿童有益，什么对儿童有害，因此还像过去他们受教育时那样来教育孩子，一点也不懂起码的卫生常识，不明白孩子为什么突然死去。过去常说：“上帝给的，上帝也可以拿走。”革命前，我国出生的儿童未满五岁就夭折了的占五分之四；而活下来的又有多少成了终生的残废啊！即使以后年龄大些了，儿童的机体更强壮一些了。对少年儿童体育教育的基本知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忘了教师必须十分关心儿童的睡眠、休息和饮

食，要交替安排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要使儿童过度疲劳，要让他们多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多多活动，等等。

从前认为体力发展和智力发展是两件不同的事，上帝赋予人体以灵魂，人体是一回事，灵魂是一回事，两者各不相干。“精神发展”与身体发展分了家。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学校的工作就只是管“精神发展”。建筑师为学校修建的校舍往往走廊很窄，没有大休息室，没有场地可以让孩子们在休息时跑跑、玩玩；设计学校的时候，往往没有儿童食堂，于是只好取消学校的早餐，从而影响了学习。有些人往往是知名的专家而不是称职的教师，他们制定的教学大纲使学生负担很重，极易疲劳。可是却有很多教师主张：我们给学生下命令，他们就应该执行。他们忘了教师的命令应该合理。这种情况已是屡见不鲜之事。

另一方面，由于不了解儿童的身体发育情况，体育活动也安排得不合理，过于消耗学生的体力，这对过渡年龄阶段的儿童的发展非常有害。散步，溜冰和滑雪等活动往往与成年人一样，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阻碍广大劳动群众觉悟的提高，就利用体育活动来诱使青年脱离政治，身体过度疲劳之后就会对少年儿童的智力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忘了体力发展和智力发展的联系。

辅导员应该透彻了解教育学上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要了解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否则他就不能合理地安排儿童的日常生活，不能真正帮助他们在身体上和智力上有所发展，而这正是他的职责所在。

但是，如果把教育学仅仅归结为研究儿童的体力发展和年龄特点，那就大错特错了。教育学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封建时期的教育学是一回事，资本主义时期的教育学是一回事，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教育学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封建领主和地主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对愚昧无

知的群众进行残酷剥削的老爷。他们让僧侣和牧师来领导这些群众的教育工作。僧侣和牧师鼓吹“君权神授”，教人们容忍谦让，绝对服从金钱权势；威胁不顺从的人，死后要让他们下地狱；许诺俯首贴耳的人，死后要送他们上天堂；教他们勿抗恶。教育方式也与此相配合，无非是处罚、恫赫。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学，他们对大资产阶级、“工业巨头”的子弟采取的是一种教育方法；对小资产阶级（小业主、职员）的子弟采取的是另一种教育方法；而对工农子弟采取的又是一种教育方法。

为富人的子弟，为剥削者的子弟开设的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特殊学校。在这种学校里，实行的是一种教育学，一种教育方法；而在工农学校里，实行的是另一种教育学，另一种教育方法。在工农学校里，从幼年起就使受剥削人民的智慧迟钝起来，使他们不断受到欺骗，让他们盲目服从剥削者，教他们学会讨好主人，学会忍让。为此制订了相应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养成剥削者所需要的一些习惯。

在我们这个无阶级的社会里，一切剥削现象已经连根铲除，因此实行的完全是另一种教育学。我们是统一的学校，我们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方法与之迥然不同。教学大纲的内容完全不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所讲授的是科学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它授予青年一代的是真正的知识。为全体儿童编写的教科书应能激发他们的思想和首创精神。学校对儿童的组织工作应能使他们友好生活、友好工作、友好学习、互相帮助、彼此尊重，珍惜别人的时间，学会使个人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和深刻的信念。

如果苏维埃教师能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那他就一定能学会认真地教育青年一代。他不仅能从他们的著作中求得对周围生活的理解，懂得社会发展的方向，他还可以从中找到如何安排青年一代教育的大量指示。少去寻章摘句，多去读

一些他们的主要著作。

苏维埃教师应该深入钻研资产阶级教育学，吸取其经验，扬弃其缺点，以便把苏维埃教育学提到应有的高度。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国学校不是一种封闭式的机构；学校的学习、学校的生活应该与周围的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周围生活对儿童具有重大意义。周围的生活安排得越合理，越有组织性，旧的残余越少，越是文明，那么它对儿童的积极影响就越大，就越容易搞好学校的工作，实现既定的目的。

辅导员是教师的助手，不过他所应关心的，不仅是在校内组织儿童，还应在校外组织儿童。他的任务是把儿童培养成社会活动家，使他们从小就能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认真学习苏维埃教育学。

辅导员是儿童的组织者。辅导员的称号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但是，要想成为我国儿童的名符其实的组织者，就必须掌握苏维埃教育学即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学，它可以帮助辅导员洞察旧的残余以及日常生活中敌视共产主义的观点和习惯及对儿童的影响，参加并吸引儿童本人参加与它们斗争，把儿童培养成新人。

与兄弟共和国幼儿园

工作人员的谈话^①

同志们，我首先想讲讲培养各族儿童友谊的问题。

1919年，我乘《红星》号轮船^②巡视，有一次船泊在喀山城郊。我们与当地的同志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我发现鞑靼人非常疼爱孩子。我们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一般都是把孩子们赶走的：男人站在前面，妇女在后面，孩子一般都赶走。可是在喀山则不然：先让孩子们进去，然后是妇女，而男子们站在最后面。后来我在那儿参加了各种会议，我发现：只要一个鞑靼妇女走过，后面就跟着一群孩子——有小有大。有一次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东部许多民族的人，我向他们谈起这件事，惹得他们哈哈大笑。我问：“您们笑什么？”他们对我说：“我们那儿都是如此。”

所以我想说：热爱儿童，关心孩子，这是俄罗斯族要向东部各民族学习的地方。

我常对我国幼儿园工作者说：要善于发动家长参加您们每个学前机关的工作，成立家长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就会主动关心并帮助您们开展工作。这样一来，幼儿园就会大为改观。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目前采取这种做法也有效。可是我们幼儿园往往对家长说：“你把孩子管严一点，他很调皮。”我们至今缺乏那种家长与幼儿园团结一致的气氛，因而幼儿园老师和清洁工就不能很好地听取家长们的意见，幼儿园其他工作人员也不能很好地听取家长们的意见。您要使我国的每一所幼儿园都能引起

社会的关心，这是一项重大工作。

我再举一个例子。直到1925—1926学年，印古谢基那里还有着氏族社会的残余。二级学校的学生家长骑着马把孩子送去上学，然后就在学校看着，不准不同氏族的儿童互相来往。怎样处理这件事，怎样消除这种残余？我们主张：要多给孩子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共同活动，产生共同的感受；比如他们看了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交谈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以此来消除氏族之间的仇恨。

要消除这种隔阂，就得让他们一起做游戏，看电影，共同讨论各种问题。这样一来，孩子们之间的氏族关系就会逐渐改善。要让他们严守纪律，把纪律引上正轨。

一个女大学生向我讲了下面一件事。她曾在阿斯特拉哈尼的一些幼儿园实习。她对一位俄罗斯族的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呢？”这位母亲说：“幼儿园里很多卡尔梅克族的孩子，脏极了。”于是这个大学生就与卡尔梅克族的母亲们个别谈话，告诉她们怎样给孩子洗手洗脸，告诉她们应该常给孩子们换洗衣服。卡尔梅克族的人也是很喜爱自己的孩子的。结果，幼儿园的卡尔梅克族儿童反而比俄罗斯族的孩子讲清洁了。像这样采取分别对待、过细地做工作的态度，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设置了教学法研究室，但这种研究室往往不务正业。而这种教学法研究室应该了解列宁对民族问题的态度，考虑各地区经济政策的各种特点，考虑当地的生活特点。这样就有利于工作的广泛开展。

我认为，幼儿园应该成为一个十分友好和睦的集体。在幼儿园，不仅教养员要做工作，而且全体职员也要做工作。幼儿园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当母亲们来幼儿园等着接孩子回家而与清扫员交谈起来时，如果她要对这位母亲做点工作的话，就可以讲讲怎样教育孩子的问题。

不仅是幼儿园主任或教养员，而且幼儿园全体工作人员都应

关心一件事，就是让家长对孩子们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我们注意到，我国优秀的幼儿园在家长中广泛地开展了工作，向家长介绍教育儿童的方法。

我父亲就很关心让我从小培养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孩子的感情，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他有一段时间在波兰工作。我至今记得，当我们住在华沙时，那时我还只有五岁上下，他总让我到室外与孩子们玩。那里有波兰小孩、犹太小孩、鞑靼小孩。我与一个犹太男孩交了朋友，他请我吃甜面包，后来鞑靼小孩又请我吃马肉。我们大家都在一块玩，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边是犹太儿童，那边是鞑靼儿童，另一边是波兰儿童。

在华沙住所的室外，有一个木棚和木梯。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坐在这木梯上玩。后来我长大了，到加里茨亚或国内去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院子里有这种梯子。我十分高兴，不禁脸都红了：我想起了我与犹太儿童、波兰儿童和鞑靼儿童的友谊以及我们在一起做游戏的情景。

要安排各族儿童经常交往，要使他们从小建立起友谊。

我还要谈谈幼儿园的伙食问题。伙食要简单清淡，而我们为了让孩子们吃得好，往往做些很油腻的点心。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对孩子们也无好处。我们有一个大工厂，名叫“三山”^③。当我从报上读到那儿孩子们吃的是什么东西时，我就在想：这些孩子真可怜，——因为给他们吃的东西都是很油腻、难消化的。当然，饭菜做得很可口，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吃了之后就得病。在这里，问题不在于烹调技术，而在于如何指导。当然，炊事员有时是想把包子做得美味可口，不过应该讨论一下怎样才能使孩子们吃了有益无害。保健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应该做一些工作，而幼儿园主任也要就此问题向炊事员和家长讲清楚。我认为，如果清扫工、炊事员、洗衣工能经常与家长们进行交谈，他们就可使家长们得益不少。我还记得，1919年，一些女工从城里下乡去，有一位女工去帮助一位农妇洗衣服，这位农妇立即觉得这位女

工是自己人，这样，如果这位女工对她讲点什么，她就会相信不疑。

我认为，凡是在幼儿园工作的人，都应该对全体居民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

结 束 语

我曾经看到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选举前运动。我参加了莫斯科家庭主妇的一些会议。家庭主妇有时脱离生活。为了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次选举运动把广大家庭主妇都发动起来了，使她们参加了社会工作。我自己也有这种印象，就是这次选举运动一般说来说明社会工作有了很大提高。我们莫斯科有所谓“百病之源”，这指的是恶劣的居住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家庭主妇开始了对住宅的整理。一般说来，目前正对整个苏维埃工作进行改造，正对官僚主义作风和不关心人的态度进行着严肃的斗争。在这方面，你们全体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卷起袖子，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抓起来。

常常有人说：幼儿园宁肯办得少些，但要办得富丽堂皇些。这话不对。应该是尽量简朴些，不能追求豪华，而要多收一些孩子。当然，幼儿园要搞得舒服些，使孩子们生活起居觉得方便。要清洁干净，而不要追求豪华。

我认为，如果我们都能认真把工作抓起来，那我们下次再开会时，你们将会告诉我在幼儿园工作上取得的很多成绩。最后，祝你们工作顺利。

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

我过去念书的那所学校，有一位优秀的俄语教师斯米尔诺夫。他要我们读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且做笔记，同时还得说出我们喜欢的是什么地方。他还要我们作文，出的题目都要研究了原著才能写得出来。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包括《编年史》、《伊果尔远征记》等这样一些东西。当我们根据《编年史》研究罗斯的洗礼时，我们得知圣弗拉基米尔有妾四百余人。一个同学的母亲非常生气，她认为不应该让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读这些东西，就跑去跟斯米尔诺夫吵了起来。斯米尔诺夫决定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他对我们谈起根据原著学习历史(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意义所在，根据原著学习历史可以启迪思想，使你具体地理解各种史实。他说，原著里有些东西可能惹得某一位母亲恼怒，但他认为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分辨能力，完全能够慎重地对待所学的材料。

后来，我看到列宁经常根据原著来研究某些事实，并且是在认真研究了某一作家的作品之后才来判断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即使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列宁也要把马克思所引用的作品加以研究。

例如，列宁在读完马克思于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①(马克思在这封信里猛烈抨击了拉萨尔写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二卷〕一书)后，就把拉萨尔写的这本书找来读，甚至还做了笔记，然后才据此得出结论说：“总之，马克思的批评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②

从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我们知道列宁希望青年能够理解各种事实，考虑各种事实，学会区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列宁的这一演说要求我们授予我国青年的知识要能使他们会理解各种事实……

历史学习如果安排得当，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问题在于怎样妥贴地安排历史学习。

负责培养教师的单位应该激发青年教师对历史的兴趣。如果能够认真地学习教育史，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教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教育史与一般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是我国教师应该了解的。当他们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例看到教育史与当时的一般历史的有机联系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也为学生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开辟了道路。

列宁说：每一个专家都是通过自己的道路、通过自己的专业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话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应该使教育史跟一般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生通过教育史来学会认识历史的方向，通过历史文献来学会独立地理解这些文献。

个别古典教育学家的专题学术著作在这里极有用处。

根据这一点，康·德·乌申斯基(1824—1870)的专题学术著作由于他所生活和工作的那一时代的特点而具有重大的意义。乌申斯基的世界观形成于尼古拉时代，即垂死的、已经解体的农奴制占统治的时代，而他成为一个教育家是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乍的时期，那时正在准备1861年付诸实行的改革*……1848年，法国、德国都爆发了阶级斗争，接着就开始了法国第二帝国的反

* 指农奴制的废除。——译者

动年代。一方面是拿破仑三世、俾斯麦的势力在德国的巩固以及1866年爆发的普奥战争；另一方面是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女作家斯托的《黑人吁天录》一书的出版，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3年波兰的起义，——这一切都无不影响着乌申斯基的教育观点。这是研究乌申斯基教育思想史的简略资料。

在研究乌申斯基当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这一工作可能会使青年教师很感兴趣，使他们知道从乌申斯基的思想中应该吸取什么、摒弃什么、改造什么。

与此同时，还应对乌申斯基的每一篇文章加以注释。文集应附以俄国和外国的简要年表。序要写得能促使学生去进行科研工作，其中也应该包括研究工作的计划，这种计划难易程度不同，完成的时间也各异。

担心学生会感染乌申斯基的宗教思想或保皇情感，这是非常可笑的。在现代读者眼里，这种思想情感是极其幼稚的。

乌申斯基生于1824年。四十年代初期，他在大学学习；毕业后，从1846年到1848年任雅罗斯拉夫法政学院代理教授，讲授法学通论、国家法、财政(当时叫财政学)。1848年，他发表了关于《财政教育》的演说。这篇演说是对当时尼古拉国民教育部的一个反抗，因为那时的教育部要求教师严格遵照教学大纲规定的时数来教学；要教师写出讲授提纲，千方百计地束缚教授的教学活动。乌申斯基认为，这样做就不可能使教学生动活泼，不可能面向学生而使教学流于形式。乌申斯基因为发表这篇演说而被免职，直至1855年才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我国高等师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如果读了乌申斯基的这篇演说，就能对尼古拉时代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知道怎样由于德国和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于1847年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即使是与革命最格格不入的分子也开始觉察到尼古拉政策的极端反动性，觉察到农奴制的反动性。1848年至1855年，乌申斯基没有从事教学工作，他研究英语；1852年至1854年，他在《现代人》杂志当翻译，

撰写对国外杂志的评论文章。

1855年起，乌申斯基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教育活动。他找到了一个地理教师的工作，随后又在加特钦斯克孤儿院担任学监^③。1857年至1858年，乌申斯基供职于《教育》杂志(杜勃罗留波夫也在该处工作)，撰写了《论教育书籍的益处》、《学校之三要素》、《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北美之教学改革》、《北美学校的内部结构》等论文，并在《祖国之子》杂志上发表了《论通过识字推广教育的种种方法》一文。

1859年，乌申斯基在斯莫尔尼学校任教。他在该校推行了许多新的方法，但1862年初又被迫离开该校。政府假心假意派他出国，为期五年。

1860年至1862年，乌申斯基任《教育部公报》编辑，撰写了许多论文，如：《劳动的心理意义和教育意义》，《论俄国教育中的道德因素》，《星期日学校》，《有关国民学校的几个问题》、《师范学校计划草案》，《祖国语言》，《尼·伊·皮洛戈夫教育论文》等。1861年，乌申斯基出版了他所著的儿童读物《儿童世界》，该书出版的第一年就印了三版。乌申斯基在国外研究了瑞士的学校，并于1862—1864两年内在《教育部公报》上发表了他所写的《瑞士教育参观记事》书信多件。1864年出版了他编写的《国语》教科书(供一二年级用)和教师教学法指南。这套教科书大受读者欢迎。他在国外还着手撰写了《人是教育的对象》这一主要著作。

乌申斯基归国后著述不多，以后所写的两篇论文《首都设立技工学校的必要性》(1868年)和《对于我国设立国民学校的雏议》(1870年)都很有意义，但这段时期他写得很少。精力既已衰退，许多新的问题又摆在他面前，与出国前相比，乌申斯基归国后判若两人：从前他不明白的东西，现在有许多他都很清楚了。

研究乌申斯基的生平和学习他的通俗易懂的著述，可以使每一位教师明确向乌申斯基学习什么，可以使每一位教师能够自觉地对待现代教育学中的各种流派。

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 需要枪炮一样

亲爱的小朋友们！开学已经将近一个月了。最初，当你们领到教科书的时候，当你们很高兴地碰到老同学或者同新教师见面的时候，你们的情绪显得很激动。现在，学校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因此我想跟你们谈谈你们的学习问题。

苏联学校的学生已经不是那种不知道掌握知识的重要性的孩子了。他们了解，知识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们需要丰富的知识，以便了解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能够读一些有趣的书，了解人们的生活情况，了解某些优秀人物如何为大家的富足的、光明的、有文化修养的生活而奋斗，了解列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过去是怎样做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怎样做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飞行员、劳动英雄和战斗英雄是怎样做的。为了真正地过一种光明而又幸福的生活，就应该有丰富的知识，应该反复思考，应该学会用脑子和双手来工作。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

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按时上学，不能旷课。旷课对学习很有影响，旷课以后要补。如果听不到老师的讲解，以后的学习就会发生困难。

在课堂上应该聚精会神地听讲，因为教师的讲解对学习很有帮助。如果不听教师的讲解，以后独立学习就要发生困难。上课

时不准随便讲话，不要淘气，因为这样会妨碍别的同学听讲。

要按时而又认真地完成家庭作业，做家庭作业时要专心，切不可马虎。同样一课书，可以只准备半小时，也可以准备三小时。做功课不可草率马虎，但也不应拖拖拉拉，耽误时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干活时总是聚精会神，非常细心，毫不仓卒，但很迅速。

应该帮助别的同学(尤其是学习落后的同学)学习。如果一个班有几个学习落后的同学，就会影响全班的学习进度。此外，苏联学校的每一个班都应该是一个友好的集体。在旧时代，学习好的学生只是考虑自己的事而不管别人，现在的优秀生应该关心全班的事。

但是，如果认为帮助同学就是给他暗示答案，做夹带，把自己的作业让学习差的同学照抄，那就太可笑了。这不是帮助，这是欺骗。这会使小朋友不去认真读书，非但没有帮助他，反而害了他。

苏联教师努力授予学生知识，把儿童培养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件事并不像许多小朋友想象的那么容易。教师自己要多多学习，互相帮助，交流经验，努力把最重要、最必需的知识授予学生。教师应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白匪曾经监禁并且枪杀了许多男女教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困难年头里，许多教师都义务工作，对儿童们非常关心。

苏联学校的学生应该尊敬教师，协助他更好地安排课堂工作，并且应该爱惜他的时间。

学生对教师的尊敬也应该表现在外表上。不允许对教师采取任何粗暴的态度，同教师谈话时要称教师为“您”，当教师走进教室和离开教室时，全班学生要起立。

必须执行教师的指示，要知道，这些指示对学习都是有帮助的。

苏联学校是一个巩固的苏维埃组织。我们看到，工厂、集体

农庄、红军等等各个单位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都按时上班，按计划工作，执行指挥员、厂长及其副手的指示，每个人都能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并且尽力把它做好。应该使学校里的一切也都井井有条，使学校成为有组织性的典范。

首先需要建立外部秩序。学生上课不能迟到，要按时出席，听见铃响就走进教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未经教师允许，任何时候都不能随便出入教室。

要及时把上课所必须用的东西（文具、教科书、学生个人记分册）准备好。当教师要的时候就交给他。

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要发言的时候，应该得到教师的允许。要发言应该先举手。

在实验室、小型工厂活动时，在食堂里，在参观和休息的时候，都应遵守秩序。

但是问题不只是注意外部秩序。

应该共同地安排工作，应该让全体同学都关心整个学校生活的安排，使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成长，使每个人都变得更自觉。应该使每个人都热爱学习，使他感到自己在逐渐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有益的人。

应该戒除骂人、胡闹，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吵架以及闲扯等等坏习惯，而最主要的，是要成为列宁所希望的那种社会活动家。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曾向共产主义青年团谈过。应该帮助图书馆、幼儿园、红角做些工作，帮助把整个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应该互相商量一下：要做些什么事情，怎样去做，哪些事情是力所能及的，哪些事情是不会影响学习的。

有些小朋友常常在想，应该让他们过得更舒服一些，应该让他们经常看电影、看戏、娱乐。实际上不能这样。电影和戏是应该看的，但应该看好的，而且是偶尔去看。否则样样都要吃一点，结果弄得索然无味。经常看电影、看戏会影响学习。

在和睦的气氛里学习和进行社会工作会有很多收获，能使每

个学生觉得自己是集体的一员。

苏联学校应该成为友好而又团结地进行工作的典范。

祝你们好，亲爱的小朋友们！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标题或署名）

（此处为大量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信件或演讲稿的正文部分）

应当学会动脑和动手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农奴制时代有两个主要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占有土地，农民从早到晚为地主干活，从幼年开始，直至老死为止。地主是剥削阶级，农民是被剥削阶级。

地主向来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被看作是“粗活”。我国许多优秀作家都描写过地主和农奴的生活，你们不妨去读读这些作品，如：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谢德林和其他一些描写过农奴制的作家的作品。地主们即使在家里也是什么事都不做的。他们自己连穿衣梳头都不会，雇了许多女仆、厨娘、奶妈和女裁缝等等。老爷们也学学读书写字，稍微从事一点脑力劳动。他们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便于统治别人，为了消磨时光。后来，修筑了铁路，使用了机器，开办了各种工厂，资本家阶级逐渐巩固了，他们开始剥削起工人来了。

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靠工人的劳动发财致富。资本家同地主一样，也从事脑力劳动，以便统治别人，支配别人，同时也是为了消遣。而工人同农民一样，从事着体力劳动，也就是干“粗活”。当时的分工情况是：狼狈为奸的地主和资本家只从事脑力劳动，而让工人和农民却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地，以便于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农民和工人（被剥削阶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稍为深奥和重要一些的知识他们就学不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隔着一道鸿沟。

当时所设立的学校也是不同的：给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开设了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在这些学校，他们掌握了一些日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需要各种职员——技术员、技师、会计、医士、教师以及各种官员，他们必须掌握从事脑力劳动的一定知识。工程师、医生和农艺师这类高级职员主要是为资本家和地主服务的。这类职员里面，大多数是破落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只有极个别的人是工农子弟。

体力劳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卑下粗野的工作，人们只是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才去从事这种劳动。

现在，我国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剥削现象也消灭了。能够很好地从事体力劳动已经成了一件光荣的事。当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一种荣誉。苏维埃政权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态度跟前完全不同，这些人经常受到提拔重用。

此外，由于科学和技术上的种种发明，现在体力劳动的性质已经有所改变。过去是赶马车，现在是驾驶汽车和轮船；过去是坐在小窗下摇纺车，现在是看管几十台纺纱机；过去是用木犁耕地，现在是用拖拉机耕地；过去的体力劳动和今天的体力劳动已经是两回事了。无论是司机、纺织厂的女工或拖拉机手，虽然他们都应该有一双能干的双手，但是他们还需要有知识，他们应该学会动脑和动手。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经常谈到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劳动教育，谈到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知识授予群众！我国已经实行了普及教育，对学校教学工作也很重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些少爷：不会钉大衣钮扣，不会烧牛奶，不会刷皮鞋，不会打电话，不知道怎样开汽车，不知道照看马匹。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少爷。在日常生活和各种工作(其中包括技术工作)中需要有一双能干的手。

难道不爱干粗活的人能够成为巴巴宁队员吗？有一些小朋友不久前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谁都不需要做工作。不对，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工作，不过这种劳动不同于从前的劳动，它要轻松得多，有意思得多，而且效果也大得多。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不过从事这种劳动要有知识，要能把这些知识用于生活，要能使用各种工具，会操纵机器。既需要知识，又需要踏实的劳动技巧。

……你们应该成为组织得很完善的社会主义劳动的自觉的工作人员。要学会去做一个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那样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

但是你们都知道，资本家仇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妄想消灭我国，企图通过间谍来更多地搜罗一些像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这样的叛徒。他们妄想奴役我们国家，但是他们未能得逞。叛徒只是一小撮，千百万群众却是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紧密地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敌人胆敢来犯，他们定要反击……

谈 家 长 用 书

1. 现在，劳动人民极其关心教育问题，因此，目前特别需要为家长编写一批儿童教育问题的书籍。这里所说的儿童，当然包括各个边区和省以及不同民族的男女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孩子。

2. 对这种书籍的要求：

1) 售价低廉，字号要大，不用插图，特别重要的字句加着重点；

2) 通俗易懂，不要用过多的教育术语，因为术语一多，解释就会冗长，反而分散了注意力。这种图书应该与生活，与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的实际保持密切联系；

3) 这种图书对儿童劳动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这样一些为家长们关心的问题不能“避而不提”；

4) 这种书籍应贯串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具有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高度。

3. 这种书应由什么人撰写？

承撰人应是实际教育工作者，他们对儿童的了解不是从教育书籍的本本出发，也不是以分数的优劣为依据，而是源于日常对孩子进行的教育工作；承撰人应是洞悉生活情况的教育工作者，应是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事社会活动的教育家。

4. 这种书的写法：

1) 全书的写作计划和各个章节都应城乡各种干部家长，与各民族家长进行讨论；

2) 个别情况下可以吸收学生本人(要有普通学生,而不只是优等生)参加讨论;

3) 还可以吸收个别科技专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讨论。

从上述观点出发,应该说,目前的编辑成员多不合适(都是教育科学博士和行政负责人);家长只有两人(男女各一);回避了社会环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的社会工作(对孩子们来说——包括八岁的孩子,这一工作显然被“保持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所取代)等等问题;没有涉及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也未谈到许多最重要的教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

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科书的出版以及联共(布)中央关于对出版这一教科书而展开宣传的决定^①，使全体文教工作者无不深受鼓舞。这一决定促使我们对我国的文化工作进行一番认真的检查，看看我们是怎样培养学生的，我们是怎么帮助他们独立工作、独立扩大他们的知识面的。

学校工作和校外工作是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能把这两个概念截然分开。我国的学校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学校。我们希望并且力求在学校培养出一代新人，这代人要具有共产主义道德，他们对待一切问题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

现在，只要我们深入实际生活一看，就会看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几位母亲的来信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一位母亲的儿子掉在水电站的水库中淹死了，她来信说：“请采取一些措施，把各地的水电站都围起来。”另一位母亲的儿子生病住院，病势垂危，她很担心，可是她在这时写来的信却是说，我国的假期与复活节、圣诞节总是碰在一起，这很不妥，因为乡村的神甫挨家挨户动员孩子们颂赞基督，然后就发给他们糖果吃。她的儿子一病不起，但她想到的却是全体儿童，关心他们不要受到神甫和宗教的影响。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碰到这种关心社会集体的母亲们。

我们经常谈到我国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不只是飞行员，英

雄人物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工厂干活，与同志们并肩劳动。他所考虑的，是怎样搞好自己的工作，同时又要使同志们的工作也干得出色。

我们有时做得未免过分了，给孩子们讲的主要是外国人的事迹。于是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想出国，都想远走高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大善于向孩子们讲述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共产党员要时刻准备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而献身，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应为党的利益而做一些默默无闻的繁杂的日常工作。可是我们却不善于培养儿童的这种品质。培养孩子们将来能英勇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能临危不惧去救列车，这固然很好，但同时也应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才能使我国过上新生活，即有组织的生活，共产主义的生活。

学校目前还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学校过于注意让学生接受现成的东西。有时就像小鸟进食一样，孩子们张着嘴，教师把一切嚼现成的东西塞给他们。孩子们记忆力很好。大人们一下子记不住的东西，他们可以整段背下来；他们的知识往往使家长大为惊奇，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却很少教他们学习认真思考问题和独立工作。因此，孩子们往往不会认真地独立工作，离开了别人的指点就提不出问题，即使他们关心的问题也提不出来。这种现象在高等学校也存在。

许多学校的孩子只会呆读死记，而不理解其涵义。如果他们不学会思考，如果他们不能透彻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们又怎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呢？

校外工作与校内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有些校外机关却不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们不是去帮助儿童，去给他们指点，而只知道把他们严加看管。我不久前参加了莫斯科市国民教育局的一次会议，议题是儿童阅读问题。许多同志的发言使我大为惊奇，因为他们对儿童阅读作了种种限制。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要是有人这样来管我，不让我读我想读的东西，而规定我要读哪些书，那我就一本书也不会去读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曾送我一本书——是他的著作摘录，其中有《杜勃罗夫斯基》。小说在发现杜勃罗夫斯基根本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之处中断了，正是最精彩之处，却没有下文了。我跑遍了所有的图书馆，想找到这本书把它读完。我还记得，我那时对莱蒙托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跑到一个角落里，朗诵一段莱蒙托夫的作品（少年儿童都很喜欢这么做），如果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你别读莱蒙托夫的作品，读克雷洛夫的就行了”，我就会连克雷洛夫的书碰都不会去碰一下的。

儿童都有自己的兴趣，不要压抑儿童的个性。有些教师的讲话令我吃惊，他们学校图书馆按时令借阅图书：春天读有关阳光的书，冬天读有关严寒的书。这种对待儿童的做法是不对的，也是违反教育学原则的。人们对每本书都要进行思考，他在阅读时往往会产生一些新的思想。还有的在学校图书馆举行比赛，看谁的书读得多。要教育孩子们读书不要囫囵吞枣，而要对所读的东西认真加以思考。

有一段时期，去少先宫活动的只限于有天才的学生，优等生。与此同时，我们却看到一些孩子满街闲逛，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醉汉，看着一些大人的流氓行径。现在，许多少先宫还规定凭票入内。

校外活动应能吸收全体儿童参加，既包括被学校开除了的，也包括那些只会捉迷藏的孩子。有人会说：“文化宫怎么能让他们进去？他们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坏的。”如果到少先宫去的孩子能让任何人把他带坏，那么那儿究竟还有什么教育工作可言呢？要懂得怎样引起儿童的兴趣。要了解一个不守纪律的少年对什么感兴趣，然后让他参加这方面的工作。要给他布置一些独立的工作，这样，他很快就会由一个淘气的孩子变成积极向上的孩子。

可是，我国的一些少先宫往往成了享有特权的儿童机构。两

年前我曾到莫斯科少先宫去过，我感到惊奇的是，少先宫的活动不过是校内学习的继续，在上地质学课、矿物学课、文学课、舞蹈课、歌咏课。总之，课程繁多，都列入了课表。这完全是学校学习的继续，而不是合理地安排儿童的课外时间，好让他们学会按新的方式生活，学会集体地工作、讨论问题、观察生活、干预生活。

当然，少先宫容纳不了全体儿童——没有地方。不过我认为，不能只吸收优秀学生，不能把没有加入少先队的学生拒之门外。

教师对少先队员还有一个不正确的态度：他们把少先队员突出出来，使他们处于特权地位。

有一次，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从外地一所学校来了一批儿童，要给他们授奖。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地注视着谁得奖了。我就问：“有这个小女孩吗？”“有她。”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个小女孩虽然与别的少先队员一起来到莫斯科，尽管她也学得很好，但却没有得奖，因为她不是少先队员。

要做到：吸引男女儿童加入少先队的，不是因为少先队组织是一个“特权阶层”，而是因为少先队的丰富多彩，很有组织性。

各个少先队之家、文化馆和一切从事校外活动的机构都肩负着重大的教育任务。校外工作应该激起儿童新的兴趣，它应该从组织性上对他们进行教育。

我国旧的残余还很严重。旧社会的情况是，工人的子弟从早到晚干活，而地主资本家这些富豪人家的孩子却游手好闲，只是让他们成天玩乐。我们开始时让孩子们玩得太多，这是不对的。不应娇惯孩子。当然，小学生们需要看电影、看戏，不过要有节制。要弄懂到底什么才是幸福的童年。所谓幸福童年，绝不是把儿童当作资本家的儿子，一味要人伺候。童年的欢乐在于，我们的生活是集体生活，而不是孤独的生活。集体生活更为充实、全面、深刻。如果儿童对一切感到厌倦，他们就会变得寂寞无聊。

而我们往往过份使儿童去从事文娱活动。

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让儿童们担任一些力不胜任的社会工作，完全不考虑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也各有不同。有一段时期，曾经强令儿童收集废品。我记得，“狄纳莫”工厂的一个女孩曾讲过她们收集了多少废品。为了收集废品，她们必须到无数的房子里去。要是这么干，那孩子们就没有时间学习，没有时间读书了。可是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工作。就拿那些经常去居民住宅红角的少先宫的孩子作例子吧。他们在那里能够熟悉生活。他们可以看到别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需要在哪些方面帮助这些孩子。再比如，有的人喜欢画地图：他要画一幅西班牙地图，做一些剪报工作。如果他把这地图和剪报资料都送给半文盲小组，这就是一项很好的社会工作，于是孩子们就会努力画得更好一些，绘画的过程对他说来就更有意思了。

我想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1年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我们有三大敌人——文盲，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和贪污。^②

少先队员中常常有一些孩子非常自负。有的少先队员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做报告的专家。有的女少先队员学了两天音乐，就认为自己才华出众。我们要注意，不要让有才华的儿童冲昏了头脑，要让他们全面发展。

少先宫能够和应该发现并培养新的天才。这是毋庸置疑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篇名作，描写一个女学生始终沉默不语，什么也不会回答，可是当她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时，就突然站起来，开始说话了。于是托尔斯泰写道：“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我看到了一朵鲜花如何开放一样。”^③

善于激发儿童新的兴趣，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所有儿童教育工作者的任务。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共产主义道德可以给人巨大的力量和无比的欢乐。我们应该使我国儿童具备这种道德，

把他们培养成社会活动家。校外工作不能放任自流，而我们往往撒手不管，听之任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工作内容，而且要考虑如何安排休息，如何才能真正把儿童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列宁主义者。

我们无论对校内还是对校外的工作都管得过多，应该纠正这种做法。要让孩子们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极为重要。苏维埃学校一定要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但不是管得过死，而是要善于引导儿童的兴趣和思想。

儿童的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对待儿童兴趣绝不能采取公式化的千篇一律的态度。有一次我到少先宫去，发现女孩子坐在一边，男孩子坐在另一边；女孩子在学刺绣，男孩子在听象棋规则的报告。除了两个女孩之外，其余全是男孩。有些人认为，下象棋是男人们的事，而唱歌跳舞则是妇女们的事。一群女孩子在唱歌，一个男孩子为了怕被人发现，躲在一个角落伴唱。我国的男孩子认为唱歌有损自己的尊严。他们说：“让女孩子去唱吧！”这种男女孩子分工的做法就是旧的残余。

校外工作应该更加重视艺术，要使艺术成为学校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要竭尽全力，把孩子们培养成列宁主义者。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各种条件。

凡是善于正确安排休息、妥善支配空闲时间的儿童，他们在学习上必将与别人有所不同。他们不需要列宁戏称之为“级任老爷”的那种教师。

注 释

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在全俄扫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1页）
这篇演说发表于1926年1月20日。第一次载于《教师报》（1926年2月4日）。

① 全俄扫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20日至24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对农村和各民族共和国的扫除文盲问题以及扫除妇女中的文盲问题特别重视。

《扫除文盲》自愿协会（简称《扫盲》协会）成立于1923年，至1936年撤消。该会在扫除成人文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协会主席为加里宁。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③ 同上书，第691页。

④ 同上书，第710页。

⑤ 同上书，第683页。

⑥ 同上书，第684页。

⑦ 同上书，第687页。

⑧ 同上。

⑨ 俄罗斯联邦各工业省普通教育会议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1926年1月20日至2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

⑩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

论电影（第4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1期）。

工人大学(第6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6年2月26日)。

① 工人大学成立于1925年,附设在一些高等院校和大型工业企业之内,系为培养工人积极分子而设,学习期限两年至三年。工人大学学员可以不脱离生产而受到普通教育和一般技术训练。到1931年,工人大学即已停办。

② 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指省政治教育工作委员会。

政治教育工作委员会是根据1920年2月23日的命令设立的,附属于地方(乡、县和省)国民教育局。地方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受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局(局长为克鲁普斯卡雅)领导。1930年,该局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群众工作部。

③ 国立第二莫大(国立第二莫斯科大学)系1918年在莫斯科高等女子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1930年,在该校的基础上建成了目前的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皮罗果夫第二医学院和罗蒙诺索夫轻化工学院。

④ 指国立莫斯科高等工艺工厂。1926—1927学年改组为高等工艺学院(直到1930年撤消)。

⑤ 莫斯科达尔文博物馆建于1913年,系A·Φ·科特斯教授创立。科特斯担任该馆馆长,直到1964年。

⑥ 工农速成中学建于1919—1920年间,附设于高等院校之内,其宗旨是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工农青年尽快升入高等学校;学习期限三至四年。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可以优先升入高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存在于1919年至四十年代初期。

⑦ 苏维埃党校系培养党、苏维埃和共青团基层干部的学校,学习期限一至二年。苏维埃党校存在于1920年至1934年期间。

⑧ 指俄国技术协会(1866—1920),其任务为促进俄国技术和工业的发展。该会除按口设部之外,还有一个技术教育常设委员会,该会在各工厂企业开办普通教育和专业学校及短训班,召开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会议,出版《技术教育》杂志。

⑨ 吉·巴·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1870—1948)系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校外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为克鲁普斯卡雅),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

政治教育系主任。

在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第10页)

演说发表于1926年3月15日。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莫斯科,1959年。

① 全俄学前教育第三次代表会议于1926年3月15—20日在莫斯科召开。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在代表会议上致了开幕词并做了《论农村的学前教育》报告。

② 有关儿童学问题可参见本书《在第一次儿童学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①。

③ 指妇女工作处。俄共(布)各级地方党委的妇女工作处建于1919年,其任务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劳动妇女并发动她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29年,俄共(布)中央发布决定,撤消妇女工作处。

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学(1926年3月2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部会议讨论会的报告和发言)(第14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5—6期),据该刊印出。

① 1925年至1930年期间,俄罗斯联邦中学8年级和9年级实行职业训练,分为:师范、合作化、行政管理等专业。

② 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他是苏维埃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1918年至1932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和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

③ 季·伊·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系历史学家,贵族君主派的政论家,承撰官方的历史教科书,该书在革命前俄国中小学广为发行。

④ Б·Н·日阿沃龙科夫著有社会学科教学法方面的著作多本(出版于二十年代),系学校工作教学法研究所研究人员。

⑤ О·В·特拉赫杰别尔格(1889—1959)系苏联哲学家,二级学校社会学科教科书的作者。

⑥ 有关教学大纲的结构问题请参阅《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⑦ Г·列列维奇(生于1901年)系《岗位》和《十月》杂志主编(1923—1925),文学团体《岗位》的组织人之一。

论学校的社会公益活动(第19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3期)。

① 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22页)

① 演说发表于1926年5月9日。第一次全文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7—8期)。

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5月9日至13日在莫斯科召开。

大会讨论了如下问题:根据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的新教科书;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的教学用书;供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科书;对教科书的卫生要求,学校教科书的供应;儿童文艺读物和科普读物;教师参考书,等等。大会的决议经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批准。大会材料见,《向苏维埃学校提供新教科书》,第7—8期,别姆、斯维尔德洛娃、舒里京等主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

② 指1925年1月11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

③ 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④ 指涅克拉索夫的诗《学生》。

⑤ 指安德烈耶夫斯卡雅和波尼亚柯夫主编的《我们的攀登》。(参见本书《普通学校的教科书》一文)

⑥ 系莱蒙托夫诗。

⑦ 拉霍斯·皮埃尔(1817—1875)系教师和词典编纂家,法国大百科全书(十五卷集)的出版人(1865—1876年出版)。

⑧ 职业教育管理总局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21

年，负责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文化部门培养专业技术工人和专家。1930年，由于职业教育机关转隶于有关部门，该局遂告撤消。

⑨ 有关教学大纲的结构可参阅《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⑩ 原字为法语译音。

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第35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6年6月24日)。

本文所指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制定的普通教育学校教学大纲，出版于1924—1925学年。这套大纲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彻底更新了教学内容，确立了学校密切联系生活和革命改造的方针，力图让学生了解各种现象之间的最重要联系，努力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发动他们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在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里，教材不是依靠个别的课程组织起来，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来联结的，即通过一组单元材料来联结的(例如：《乡村冬日的生活和劳动》，《乡村和家庭的保健》，《城市的生活》等等)。每一单元主题都从三方面进行研究：1)自然界及其资源和力量，2)人类对这些资源的利用，3)社会生活。

在二级学校里，保留了课程教学，但这种教学也要从属于共同的综合性主题。

我们原以为，采取单元的办法安排教材，可以使儿童逐步掌握并加深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保证他们在各种生活现象的联系中去认识这些现象。

但是1924—1925学年执行大纲的结果，却发现大纲的结构在很多方面有问题：学习个别的单元材料往往使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没有必要的连贯性、系统性和继承性。人为的“联系”往往代替了各种现象之间复杂的辩证联系。“这种单元材料没有揭示现实的、基本的联系，没有扩大儿童的视野，相反，这种人为的单元材料提供的是人为的联系，增加了学生理解现实的难度。”——早在1925年，克鲁普斯卡雅就说了这番话(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3卷，第147页)。

1927年春，发布了新的《统一劳动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法要点》，其中总结了1924—1925学年执行原大纲的经验，在教师会议和教育报刊上对原大纲

进行了批判。

本文指出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的教育学价值。克鲁普斯卡雅在本文以及其后的文章和讲话中都着重指出,必须把教学大纲的内容与大纲结构上所采用的单元形式加以区别,不能借口批评单元教学法而否定了大纲的革命内容。

① 原字为德语,意指变戏法,玩魔术,搞新花样。

② 指1861年俄国取消农奴制的改革前的学校。

③ 指年级或班级。

④ 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②。

⑤ 巴黎教师国际,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教育工作者团体,存在于1922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宗旨是团结全世界教师,使他们在为学校民主化而进行的斗争中互相帮助,同时为改善教师物质待遇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国际教育工作者团体重新组建,采用了国际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的形式(简称国际教联)。

⑥ 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国际改良主义工会团体(1919—1945)。

谈流氓行为问题(第39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6年9月24日)。

① 乡执委会——指乡(区)执行委员会。

② 农互会——指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

③ 统消社——指统一消费合作社。

④ 群众文化馆——革命前俄国一种俱乐部类型的文教机构,通常设有图书阅览室,茶馆和剧院,演讲厅等等。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还存在。

⑤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400页。

苏维埃和学校公益工作(第43页)

第一次载于《教师报》(1926年10月2日)。

①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5月13—20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号召要特别重视发展重工业,扩大农业合作社并巩固财政。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④ 工厂艺徒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同时授予七年制中学普通教育的知识。

工厂的七年制中学(第46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10期)。

① 七年制普通教育中学与工业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1925年至1934年期间称为工厂七年制中学。这种学校在教学和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让学生一般地熟悉与该校建立联系的企业的生产过程，有计划地在企业进行参观活动，依靠企业的帮助建立校办工厂和学校实验室，在安排学生的教育工作和社会公益活动时尽量考虑并反映企业劳动集体及其社会组织的生活特点。1934年，工厂七年制中学改为不完全中学。

② 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是党的高级师范学校(1923—1935)，培养中学社会学科教员以及教育学、政治教育工作专家、国民教育系统的领导干部。

③ 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第51页)

演说发表于1926年11月5日讨论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报告的会议上。第一次全文载于《教师报》(1926年11月13日)。

① 指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

③ 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②。

④ 识字委员会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建于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等城市，创办者系一些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在成人教育、图书馆工作、帮助自学方面做了大量组织工作、文教工作。

⑤ Я·А·雅柯夫烈夫(艾普斯坦)(1896—1939)系党和国家活动家。1921—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9年任《农民报》主编，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以后，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部长。

⑥ 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谈儿童读物问题(第55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11期)。

论普及教育(第61页)

写于1926年(更准确的日期难于判定)。

第一次编入《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279—282页)。

① 党纲(1919年)规定,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而实现这一要求的第一阶段,就是实行普及的义务初等教育。早在1919年1月,在各省国民教育处长会议上,就已讨论了制定俄罗斯联邦普及初等教育计划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内战争方酣,经济备遭破坏,饥荒十分严重,因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推迟到了国内经济开始恢复之际。1923年8月,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立即着手拟定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十年计划。时隔两年,即1925年8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实行普及初等教育和建立学校网》的决定,并且规定了以十年的期限作为实现这一计划的最大期限(1927年10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了这一期限)。1927年4月13日,授权地方苏维埃在个别边区、县、地区、乡、城市以及条件具备的个别居民点实行初等义务教育。据1927—1928学年的统计,八至十一岁儿童的入学率,在苏联已由1914年的大约50%增加到75.7%。

1925—1926年期间,教育人民委员部公布了三集《俄罗斯联邦实行普及教育的准备工作》,在1926—1929年期间,公布了四集《普及教育问题》,1928年出版了俄罗斯联邦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综合计划。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了上述出版物的一部分版本,其上有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眉批和统计数字。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国民经济远景规划时,认为文化战线的首要任务乃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开展群众性的职业技术教育,而1929年5月召开的全苏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认了党的这一指示。1930年6月召开的第16次党代表大会承认了文化

建设的步子不快,提出要加快步伐,并把实行普及初等教育和扫除文盲当作党在近期的战斗任务。党中央在1930年7月2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8月14日先后通过决议,自1930—1931学年起(即比预定时间早了四年),对八至十岁儿童普遍实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并要加速十一岁至十五岁少年在一年制和二年制学校义务教育的步伐。同时准备在城市、工厂区和工人居民点实行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尽管当时困难重重(校舍不足,教员奇缺,没有教科书),但是低年级学生数仅在1930—1931学年一年中就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从1927年到1932年的五年间,几乎增加到800万,而到1932—1933学年,则已达到1760万。

③ 指我国一些具体地区的建立学校网的计划。

④ 俄罗斯联邦各工业省普及教育会议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1926年1月20—2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

④ 农民之家系城市里的一种政治教育机关,其任务是对进城来的农民提供物质服务和文化政治服务,向他们宣讲苏维埃政权为了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

少先队运动和学校(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的报告)(第64页)

这篇报告是1927年5月8日—22日期间所作。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7年第7—8期)。

① 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于1927年5月8日—22日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讨论克鲁普斯卡雅这篇报告和艾普斯坦关于社会教育的报告之外,还讨论了学校少先队工作、城市和农村学校社会工作和辅导员工作等有关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五十位代表了解了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区许多少先队的工作情况,参观了一些企业、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关。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

③ 指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

④ 安·格·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系二十年代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1925年起任该会副主席),《农村阅览室》、《成人学校》杂志以及《农民报(普及版)》的主编,撰有多本有关政治教育问题的著作,致力于克鲁普斯卡雅教育遗著的研究。

⑤ 参见《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一文注①。

⑥ “儿童之友”系1924年于俄罗斯联邦成立的一种自愿团体，宗旨是发动社会各界关心保护儿童的工作，消灭儿童流浪现象并组织儿童的校外工作。1935年，随着国内儿童流浪现象的消灭，该团体即解散。

⑦ 拉萨尔·费尔基兰(1825—1864)系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德国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时，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主张工人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驳了拉萨尔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⑧ 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7—298页。

⑨ 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71—395页。

⑩ 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5页。

⑪ 尼·米·克利波维奇(1856—1920)系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九十年代曾任教于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

⑫ 资产阶级国家的儿童组织。

⑬ 指柯里佐夫的诗《庄稼人之歌》。

⑭ 指乌申斯基编的教科书《国语》。

⑮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系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

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第74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7年，第10期)。

① 列宁的父亲伊·尼·乌里扬诺夫(1831—1886)于1869年至1874年任督学，1874年至1886年任辛比尔斯克省国民学校校长。由于他的努力，当时开办了450所农村学校。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

③ 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12—19日召开(代表共222人)。会议的主要议题为成立教师群众性的职业组织。列宁于1月18日的会上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改造整个国民教育事业，必须“……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尽可能把一切教师包括在内的教师联合会”(《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7页)，国际主义教师协会也应该成为统一的教师工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组织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联合会以团结这方面的各种工

作人员。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红军中的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城市学校的生产劳动问题等等。

-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6页。
- ⑤ 同上书，第387页。
- ⑥ 同上书，第388页。
- ⑦ 同上书，第389页。
- ⑧ 同上。
- ⑨ 同上书，第387页。
- ⑩ 同上。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第77页)

第一次载于《少先队员》杂志(1927年，第20期)，标题是：《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观点》。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9页。

国民教育的十年(第78页)

第一次载于《农村阅览室》杂志(1927年，第19期)。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435页。
- ② 扫盲站——扫除文盲站，负责成人文盲的识字教学，由国民教育局、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建立。刚开始时，学习期限为三个月，后来改为识字学校，学习期限为十个月。

③ 指1926年的全苏人口登记。

④ 农民短训班是农村对成人进行普通教育和农业技术训练的一种短期学习班。

⑤ 参见《工人大学》一文注①。

⑥ 参见上文注⑦。

⑦ 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十月革命后，这一要求通过1918年1月20日发布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法令得以实现。

庆祝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演说(第82页)

这一演说是1927年11月1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召开的庆祝大

会上发表的。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7年,第11—12期)。据下书排印:克鲁普斯卡雅著《列宁的文化方针》,莫斯科,1934年。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1—275页。

② B·A·阿瓦涅索夫(1884—1930)系苏维埃国务活动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③ 指1921年。

④ 指列宁《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一文中谈书报分配问题的那一部分(《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2—122页)。

⑤ 同上书第31卷第365—367页。

⑥ 全苏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即各级苏维埃委员代表大会(代表人数逾千)于1927年10月10—16日举行。这次大会是由联共(布)中央妇女部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的。大会决定采取措施全面吸收广大劳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⑦ 指列宁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写于1897年末。

⑧ 参见关于列宁1918年8月28日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的报导(《真理报》,第184号,1918年8月30日)。

⑨ 参见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这次会议的演说,载《国民教育》杂志,1927年,第11—12期。

⑩ 引文不准确。列宁的原文是:“我们比我们的父辈奋斗得好。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奋斗得更好,他们一定会胜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8—229页)。

⑪ 指列宁的《日记摘录》一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

⑫ 指1927年10月16日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纪念会做的报告《苏联文化建设的十年总结》(参见《卢那察尔斯基论国民教育》,莫斯科,1958年,第369—393页)。

⑬ 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②。

在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88页)

演说发表于1927年12月27日。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7年12月29日),据该报刊印。

① 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系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联合在莫斯科召开的，时间为1927年12月27日至1928年1月4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与来宾约2500人。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谢马什科（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和克鲁普斯卡雅都讲了话。大会分七个分组：教学法研究组，学前教育组，学龄前组，学龄一组，学龄二组，难教儿童组和教学大纲组。

儿童学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指研究儿童的科学，然而，它实际上是研究儿童发展的心理学、解剖生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一些观念的机械总和。

二十世纪初叶，出现了最早一批儿童学性质的著作（在国外有霍尔、波东、梅曼等人的；在俄国有B·M·别赫杰列夫、Г·И·罗索里摩、А·П·涅恰耶夫等人的）。到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儿童学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儿童学机构（实验室，研究室，咨询处）纷纷建立，许多师范学院也设立了儿童学的科系，陆续出版了一些科研著作、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先后召开了儿童学会议（1927年）和代表大会，并且出版了《儿童学》杂志（1928—1932）。

儿童学家的宗旨是对儿童进行综合研究，企图把心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教育学以及其他科学材料融于一体。他们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儿童发展问题。

但是，尽管苏联儿童学家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儿童科学”，他们始终未能确定儿童学的对象和特征，因为这门学科不能纳入几门科学混杂的内容。他们只不过是把这几个学科简单地揉合在一起而已。在儿童学的研究成果中，正在发育成长的人的本质特征变成了一种生理上的表述，对环境的“社会学”研究取代了对儿童个性的研究。

1936年7月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儿童学的错误表现的决定》，对儿童学家们的错误立场进行了批评。

应该指出，在M·Я·巴索夫、巴·彼·布朗斯基、Л·С·维戈特斯基、Н·М·谢洛瓦诺夫等人的儿童学著作中，除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之外，也确有许多有用的实际材料，堪称为儿童发展知识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克鲁普斯卡雅赞成这样的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儿童科学，对儿童的研究采取全面的态度。她强调指出，为了对教学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进行

科学的说明,一个唯物主义教师必须了解年龄特征,因为考虑年龄特征是教育工作中极重要的一点。但是,还在二十年代末期,克鲁普斯卡雅就对儿童学家们的某些错误立场表示担心。这些错误立场是:力图把测验当作研究儿童的主要方法,对客观观察估计不足,企图把集体看作一个社会机体,把劳动教育归结为获得劳动熟巧,脱离教学和教育的实际任务,对儿童在学龄前阶段的发展可能性估计过高等等。克鲁普斯卡雅还认为,不能一般地研究年龄的心理特征而不考虑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时代特点;不考虑当代少年儿童在道德和社会政治面貌方面,和他们的视野、兴趣、情绪和理想方面的重大变化。(参见:《对全苏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几个报告提纲的意见》,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0卷第246—249页;《对扎尔肯特同志关于〈儿童学战线的现状和现阶段儿童学的任务〉报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儿童学讨论会资料。载《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2年,第6期,第39—43页;《学前工作中的错误现象》,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第326—333页)。

② 参见《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释。

少先队的纪律(第90页)

第一次载于:克鲁普斯卡雅著《少先队运动的道路》文集,莫斯科,1927年。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71—395页。

论培养劳动力问题(第92页)

第一次以《论培养劳动力》为题发表于《真理报》(1928年10月5日)。

二十年代后期,为了实现工业化并创造条件向集体化的大农业过渡,迫切需要具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并注意对新干部的培养。由阿·卡·加斯帖夫领导的中央劳动研究所拟定了培养工人的独特方法,即通过坚持不断的训练,逐渐加强负担,准确地找出最经济的运动因素,形成劳动熟巧。但是这种方法忽视普通教育训练和综合技术训练,忽视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理解。加斯帖夫正是想通过这种途径培养新型工人。他得到了经济组织和工会某些代表人物的支持,但克鲁普斯卡雅、卢那察尔斯基和共青团的代表人物却反对这种片面的、“事务主义”的态度,反对“加斯帖夫习气”。这反映在本文和克鲁普斯卡雅其他论著(如:《论培养具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

《论新型工人》等等)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页。

② 同上书，第533—534页。

③ 同上书，第534—535页。

④ 同上书，第535页。

⑤ 同上书，第533页。

⑥ 指列宁所写《生产宣传提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5—367页)。根据这一文件，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政治教育委员会关于《生产宣传》提纲的草稿，载《真理报》1920年11月27日。

⑦ 这一提纲是克鲁普斯卡雅为准备向第一次党的教育会议(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作报告而撰写的，但她因病未能在会上宣读。这一提纲有两种版本，标题各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和《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提纲》，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本)第2卷第69—73页。

⑧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559页。

⑨ 阿·卡·加斯帖夫(1882—1941)系俄罗斯苏维埃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1920年至1938年期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劳动研究所组织者和领导人。撰有多本研究劳动组织的著作。

⑩ 指各部培养具有专业技术工人的协作委员会，参加该协作委员会的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计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的代表。它经常讨论有关工厂艺徒学校和中央劳动研究所训练班在培养劳动力总计划中的作用和比重问题，讨论各种工厂艺徒学校的学习期限问题。该委员会设置于1927年至1928年，主席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亚·伊·多加多夫。

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第97页)

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9年，第3—4期)。该杂志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于1918—1930年的月刊，封面上印有“国民教育的政策和组织问题”字样。

由于预定在1929年4月召开第二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因此，1929年2月15—2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是，文化革命形势下教育工作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国民教育的五年计划，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在2月15日讨论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报告和2月17日讨

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报告时发了言。

① 政保局，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② 工厂艺徒学校系1920—1940年培养工人干部的一种形式，除进行职业教育外，还进行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③ 青年农民学校系农村一种三年制的普通教育学校，由共青团倡议于1923—1924学年在一级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直至1934年。除了进行七年制学校那种普通教育训练之外，还授予学生农业基础知识。

④ 指1925年1月11—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教师代表大会。

⑤ 共青团圣诞节活动系二十年代盛行的一种反宗教宣传形式（每逢圣诞节时，共青团员们举行游行狂欢活动，手持反宗教的标语牌，唱着反宗教的歌曲走向教堂）。

⑥ 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系农村阅览室（农村的一种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起着图书馆馆员和文化组织者的作用。

⑦ Д·А·阿夫克申基耶夫斯基（1885—？）系国民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1925—1926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实验示范学校处处长；1928—1930年任中央黑土地带省国民教育局局长。

⑧ 列宁格勒省成立于1927年，包括现在的列宁格勒省、穆尔曼斯克省、诺夫戈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省的疆域和加里宁省的部分疆域。

⑨ 指中央黑土地带省（存在于1928—1934年，包括现在的沃龙涅什省、库尔斯克省、奥尔勒省和唐波夫省的疆域，以及梁赞省和土拉省的部分疆域）。

⑩ 现土拉省扎阿克地区。

⑪ 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系杰出的苏维埃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国民教育方面的活动家，科学院院士；1918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19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

⑫ А·К·加斯帖夫（1882—1938）系无产阶级诗人，劳动合理化和劳动力培养方面杰出的活动家；他创办了全苏总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劳动研究所并任所长。

中央劳动研究所1921—1940年附属于全苏总工会中央理事会，研究劳动过程的心理生理分析问题和个别劳动业务的教育方法问题。加斯帖夫认为，在培养专业技术工人时，可以只限于完成合理的动作并达到快速的工作。克鲁普斯卡雅尖锐地批评了中央劳动研究所领导人的立场，认为他们是把

“按自己的方法进行训练”与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对立起来。

⑬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560页。

⑭ 工农速成中学系学制为三年的普通教育学校，从1919年附设于一些著名的高等学校，培养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工人和农民使之尽快升入高等学校。

⑮ 职业技术教育总会全称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技术教育总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29日的命令成立，直至1930年。职业技术教育总会辖：工厂艺徒学校，职业学校和训练班，中等技术学校，工农速成中学，高等学校。1928年，培养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干部的工作改由有关部委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只管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学校。

论综合技术教育(第106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9年，第2期)。该刊系教育科学月刊，出版于1922年至1933年间(1930年第6期以前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机关刊，以后系教育人民委员部和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机关刊，1933年则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机关刊，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系该刊主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8页(信致瓦·博尔吉乌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收件人误作施塔尔肯堡)。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3—434页。

③ 同上书，第465—466页。

④ 同上书，第36卷第557—558页。

⑤ 同上书，第558页。

⑥ 指1926—1933年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版。

⑦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6页。

⑧ 同上书，第475页。

《论综合技术教育》报告提纲(1929年5月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第113页)

① 国家学术委员会是1919年至1932年期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教学法科学领导中心，下设科教部、科技部、政治科学部等。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系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科教部主任系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页。

教育机关的阶级斗争(迎接党的国民教育会议)(第116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9年6月8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② 被剥夺公民权的分子系指由于社会出身和过去从事过反人民性质活动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后,不再根据社会地位或出身而剥夺选举权。

- ③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系1923—1934年党和国家的检察机关。

- ④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页。

论中学(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提纲)(第120页)

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革命》杂志(1929年,第14期)。

- ①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②。

- ② 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12月10—24日召开。

③ 青年农民学校可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③。

七年制工厂学校是1926—1934年在城市和工人区开办的一种普通教育学校。七年制工厂学校与各工业企业保持直接联系。它们培养学生对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有一个一般的了解,并且经常组织学生去这些企业参观并在企业的帮助下建立本校的工场和实验室。它们力图在安排教育工作和学生的社会公益活动时考虑并反映企业及其社会组织的劳动集体的生活特点。1934年,七年制工厂学校改为不完全中学。

④ 指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

- ⑤ 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文化建设计划。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与第一届全苏少先队会议的代表们的联席会议上的演说)(第127页)

这篇演说是1929年8月20日讲的。第一次以《我们正在前进》的标题编入《新学校的少先队员》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

- ① 指1918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教育工作第一

次代表大会。

②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克鲁普斯卡雅系根据《真理报》所载报导摘引的（见该报1918年8月30日，第184号）。

培养新生活的建设者（在全苏少先队代表会议上的演说）（第132页）

这篇演说是1929年8月21日讲的。第一次编入克鲁普斯卡雅所著《革命的孩子》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

① 全苏少先队代表会议于1929年8月20—22日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来自各共和国、边区、省、州的一千多名代表。在讨论了少先队中央局的总结报告《苏联少先队运动的现状和任务》之后，大会分为十二个分组会，讨论少先队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②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⑨。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75页。

教育咨询（第138页）

第一次载于《论我国儿童》杂志（1929年，第7—8期）。

论培养教师（在高等学校校长会议教育分会上的报告）（第140页）

报告作于1930年1月11日。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0年，第3期）。

① 全俄高等学校校长会议于1930年1月10—13日召开。会议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关于改进培养新的专家的工作》的决议和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1929年）《关于国民经济干部的决议》等问题。与会者还讨论了高等学校新章程草案。

② 文化战士系自愿的社会工作人员，他们参加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开展的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

③ 集体农庄（亦称农村、农民）大学系培养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干部的一种函授学校。第一所为期四个月的农村大学是在萨拉托夫开办的。

④ 苏维埃党校系二十年代创办的专门学校，其宗旨是培养苏维埃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干部，包括：村镇和区一级工作人员，政治教育工作者，

宣传员，党的工作的负责人以及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建设的负责人。

⑤ 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成立于1919年，1920年以前叫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学院，1920—1924年叫社会教育学院)系一所高等教育和教育科研学校，其宗旨是培养国民教育领导干部，教学法专家，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类中等学校教员。1936年改组为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直至1941年。

⑥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⑫。

⑦ 政教总局全称为全国政治教育工作总局，根据1920年11月12日人民委员会命令成立，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它负责全部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成人的群众教育以及党的教育工作。它工作中的思想内容问题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该局直至1930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后才撤消。政治教育工作总局主席为克鲁普斯卡雅。

⑧ 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最老的国民教育工作者，1921年起在政治教育总局工作，曾在许多杂志社任主编；1925年起任政治教育总局副主席；1943年起在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担任科研工作。

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会议上的发言) (第149页)

第一次载于《改造时期的国民教育制度》，莫斯科，1930年。

① 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系根据联共(布)中央1929年8月5日作出的《关于国民教育领导干部的决议》建立的(见《真理报》，1929年11月5日)，存在于1930—1935年。协会主席为克鲁普斯卡雅。

② 文化进军系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其宗旨为在苏联实现文化革命。1928年下半年由共青团发起，进行扫除文盲和半文盲的进军；以后转变为日常文化性生活的、为发展学前教育机构和学校以及扩大群众图书馆网点而斗争的进军。

③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⑨。

④ 参见上文注③。

⑤ 指1929年5月20—28日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3)。

⑥ 指1930年1月22—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少年自然科学家协会、

生物学实验所、农业基地和儿童农业站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所属儿童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共同发起召开的。

⑦ 参见《论中学》一文注③。

⑧ 劳动人民委员部(1917—1933)负责劳动法令的执行，采取措施调整工资和保护劳动，实行社会保险，等等。

⑨ 《统计评论》月刊，系苏联中央统计局机关刊，出版于1927—1930年，后与《计划经济》杂志合并。

⑩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系1924—1932年全国工业管理中心。1932年1月，在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三个人民委员部。

⑪ 全苏少先队员第一次集会于1929年8月18—25日在莫斯科召开。

⑫ 1930年8月1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改组二级劳动学校》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至少有40%的中等技术学校高年级改由相应的部委管理。

⑬ 详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3卷，第437—438页，俄文版。

⑭ 指由于T·赫越辛、Л·沙布索维奇和A·扎连柯教授所写的公开信《停止个人安乐窝的建设，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日常生活》而引起的讨论。该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12月15日。公开信说：“目前，重新修建的城市应以充分为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需要服务的社会形式为原则，同时也应对儿童进行充分的社会主义教育为原则。”

《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在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建议对所提出的问题广泛的讨论，同时也对所提出的安排日常生活、建设新城市和改造旧城市的意见进行广泛的讨论。

⑮ M·B·克鲁平尼娜(1882—1950)，苏维埃教育家，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教授，从1921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学校工作研究所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⑯ 参见《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一文注②。

⑰ Л·Г·沙皮罗(1888—1957)自1902年以来一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统一学校处和政治教育工作总局工作(1920—1921)，以后在莫斯科一些高等学校任教。

⑱ 指1930年4月26—30日召开的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

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在全苏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第169页）

这是1930年4月27日在讨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H·A·斯克雷勃尼克的报告《苏联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时的发言。第一次载于《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1930年4月29日），标题是：《综合技术教育与马克思主义锻炼同等重要》。

① 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于1930年4月26—30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是：苏联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新教学法和文化工作的统一计划，改组国民教育机关等等。

克鲁普斯卡雅在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可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7卷，俄文版，莫斯科，1959年。

② 社会教育局全称为社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总管理局，1921—1930年设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该局所辖单位为：学前教育机构、中小学、幼儿园，同时负责保护儿童的权利，提高全体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③ 鲍曼区指莫斯科市鲍曼区。

下伏尔加区（边区）包括现在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尔梅克省、阿斯特拉罕省、伏尔加格勒省、萨拉托夫省的疆域以及古比雪夫省的部分疆域。

④ 国家学术委员会系1919—1932年俄罗斯联邦教学法科学领导中心，下设科学政治部，科学教育部，科学技术部等部。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是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科学教育部主席是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⑤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⑬。

⑥ 参见上文注②。

⑦ 《友好儿童》系农村儿童杂志，共青团中央少先队中央局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刊，出版于1927—1953年。

⑧ 全俄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8月10—16日召开。

⑨ 参见《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一文注⑩。

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在保卫儿童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75页）

① 参见《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的五年》一文。

②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②。

③ 设在科斯金纳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办的学校是未成年犯罪分子的教育机关，位于莫斯科省布尔什沃火车站附近，通称《布尔什沃公社》。影片

《走向生活的通行证》(1931年)艺术地表现了该校的活动情况。

④ 技术心理学系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为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劳动心理学问题)时的心理状态。

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在综合技术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报告和闭幕词)(第187页)

三次讲话分别作于1930年8月10日(开幕词和报告)和8月12日(闭幕词)。

第一次全文以专著发表,即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开幕词,报告和闭幕词。》莫斯科,1930年。

① 《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

② 同上书,第35卷,第467—468页。

③ 同上书,第36卷第557—560页,第32卷第112—122页。单一技术教育是一种狭隘的专业化,它使普通教育从属于职业培训。

④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②。

⑤ 克鲁普斯卡雅报告的摘要,发表在《共产主义教育》报(1930年8月12日),标题如下:《国民经济的改造和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把每一台拖拉机,每一个电站变成技术宣传站!》

⑥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71—395页。

⑦ 同上书,第382页。

⑧ 同上书,第26卷第452页。

⑨ 《在计划工作战线上》(1929—1931)系双周出版的政治经济杂志,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主席团机关刊。

⑩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5—367页。

⑪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21页。

⑫ 《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49页,俄文版。

⑬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14—215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9页。

⑮ A·П·绍辛(1901—1941),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二十年代初期为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工厂艺徒学校和农民学校的组织者之一;1929—1932年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2—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工作人

员，1934—1937年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全俄第一次综合技术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学校集体化的途径和形式》(1930年8月11日)。

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问题(第210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0年第8—9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21页。

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期间对文化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言论(第213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1期)。本文手稿完成于1930年12月10—12日。

① 列宁有关国民教育问题言论的专题文集，从三十年代开始曾多次出版。例如：《列宁论教育》，第三版，莫斯科，1973年(中学校长丛书)。

② 指1925—1932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二版前三卷。

③ 《列宁全集》第2卷第65—68页。

④ 同上书，第53—59页。

⑤ 同上书，第402—431页。

⑥ 同上书，第1卷第109—309页。

⑦ 同上书，第3卷第5—558页。

⑧ 同上书，第2卷第404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书，第405—406页。

⑪ 同上书，第408—409页。

⑫ 同上书，第28卷第67—70页。

⑬ 参见《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63页。

⑭ 《列宁全集》第3卷第746—747页。

⑮ 同上书，第2卷第413页。

⑯ 同上书，第413—414页。

⑰ 《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64页。

⑱ 同上书，第2卷第57—58页。

⑲ 《列宁全集》第2卷第414页。

⑳ 同上书，第426页。

- ⑳ 《列宁全集》第2卷，第422页。
- ㉑ 同上书，第447页。
- ㉒ 同上书，第388页。
- ㉓ 同上书，第1卷第155—156页。
- ㉔ 同上书，第3卷第499页。
- ㉕ 同上书，第2卷第193页。
- ㉖ 同上书，第3卷第485页。
- ㉗ 同上书，第527页。
- ㉘ 同上书，第528—529页。
- ㉙ 同上书，第2卷第347页。
- ㉚ 同上书，第348页。
- ㉛ 同上书，第1卷第227页。
- ㉜ 同上书，第3卷第57页。
- ㉝ 同上书，第1卷第214页。
- ㉞ 同上书，第177页注。
- ㉟ 同上书，第4卷第133页。
- ㊱ 同上书，第131页。
- ㊲ 同上书，第81页。
- ㊳ 同上书，第1卷第324页。
- ㊴ 同上书，第248页。
- ㊵ 同上书，第478页。
- ㊶ 同上书，第480页。
- ㊷ 同上书，第479页。
- ㊸ 同上书，第481页及注。
- ㊹ 同上书，第261—262页。
- ㊺ 同上书，第264—265页。
- ㊻ 同上书，第2卷第13—52页，第228—271页。
- ㊼ 同上书，第34卷第6页。
- ㊽ 同上书，第1卷第140—141页，第165—166页。

㊾ 工业党，1928年前为《工程师组织协会》，是一个反革命破坏组织，由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上层分子和资本家组成，1925—1930年间活动于苏联。工业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得不到支持，就主要指望国外的帮

助和其他反革命地方组织的支持（其中包括所谓“劳动农民党”的支持，这个党的领导人是农业经济学家康德拉提也夫）。1928—1930年间在许多工业省和运输部门发现了这一破坏组织。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对工业党进行了审判。

⑤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272页。

⑤② 同上书，第271—274页。

⑤③ 同上书，第398—400页。

⑤④ 同上书，第2卷第289页。

⑤⑤ 同上书，第4卷第246页。

⑤⑥ 同上书，第221页。

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第235页）

写于1931年1月18日。第一次载于《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0卷，莫斯科，1962年，第377—378页。

① 全俄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于1930年8月10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材料分载于以下两个文集：《全俄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决定》莫斯科，1930年；《全俄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论文、决议及其他材料》，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

② 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364页。

③ 七年制工厂学校系1925年至1934年间的一种普通教育类型的学校。这种学校附设于工业企业之内并与这些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教学和教育工作过程中了解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在企业里进行系统的参观学习。学校在企业的帮助下设置了车间和实验室。自1931年起，这种学校成了城市和工人新村普通教育学校的主要类型。

1934年，由于建立了中小学的统一结构，七年制工厂学校改成了不完全中学或一般中学（见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1934年5月15日决定）。

④ 青年集体农民学校（1930年以前叫青年农民学校）是在四年制初等教育的基础上设置的三年制普通教育学校，始建于1924年。这种学校把七年制学校的普通教育与对农业的理论和实际学习结合起来。从1934年起改成了不完全中学。

儿童读物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第237页)

第一次载于《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1931年2月2日),标题是《供应孩子们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图书》。

本文写于1931年2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全俄儿童图书第一次代表会议之前,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如下问题:改造时期的儿童图书,综合技术教育和儿童图书,教科书和学校的儿童图书。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参见《争取共产主义报》(1931年2月5日)和《少先真理报》(1931年2月5日)。

① 指伊林所著:《伟大计划的故事》,莫斯科,1930年。伊林系雅·马尔夏克的笔名。

论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第241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2期)。

① 第一次全俄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1930年8月)闭幕之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准备制定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这个法规的草案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制定(委员会的主席是安·谢·布勃诺夫),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该委员会(参见她1930年10月18日在该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四卷第341—343页)。法规草案未经政府讨论,故未获通过,但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曾通过了一项关于把学校附属于工厂和国营农场的专门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拟定了示范合同,规定经济机关要帮助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化:给校办工厂提供工具、车床,组织学生生产实习,协助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社会各界都参加了签订这种合同和整个综合技术教育化工作。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534页。

③ 同上书,第534—535页。

④ 同上书,第535页。

⑤ 同上书,第19卷第35页。

⑥ 同上书,第23卷第530页。

⑦ 同上书,第535页。

⑧ 参见《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一文注③。

提高学校工作质量(在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46页)

这篇报告是1931年2月22日做的。第一次全文单独出版: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提高学校工作质量》,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

①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2月19—25日)是根据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全国普及教育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在大会召开之前,各企业和集体农庄党、团和工会都召开会议讨论了儿童普及义务教育问题。这次大会的材料参见:《全俄普及教育代表大会决议和决定》,莫斯科,1931年。

1931年3月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又召开了各地区的普及教育代表大会。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6页。

③ 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364—365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页。

⑤ 同上书,第558页;第33卷,第214—215页。

⑥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系监察国家机关执行党和政府决定的机构。该部设有与各人民委员部对口的处或组。国民教育处(或组)督促党和国家有关国民教育决定的执行。

⑦ 参阅《苏共中央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8版,第2卷,莫斯科,1970年,第48页。

⑧ 教育委员会系管理学校的机构,成员包括教师、学生代表和社会团体代表。

⑨ 即机器拖拉机站。

⑩ 指1931年2月在莫斯科市列宁区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工人代表会议。克鲁普斯卡雅在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4卷,第356—371页。

⑪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页。

⑫ 工厂艺徒学校系共青团倡议于1919年至1920年建立的。它作为培养专业技术工人的一种群众形式,其发展始于1921年。起初,工厂艺徒学校招收受过初等教育的少年工人,学习期限三至四年,教学计划包括七年制学校普通教育的内容以及社会政治教育、一般技术和职业的理论训练和生产教育。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急需干部,学习期限缩短为二年,削减了普通教育课程,增加了招收七年制学校毕业生的人数。由于

必须为那些没有开设工厂艺徒学校的企业培养干部，因此1940年建立了国家劳动后备军的学校系统，大多数工厂艺徒学校改成了这种学校。到了六十年代，劳动后备军系统改成了城乡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期限不等。到了七十年代，中等生产技术学校有了飞速发展。这种学校以八年制学校为基础，学习期限三至四年。

⑬ 参见《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一文注③。

⑭ 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142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6—367页。

⑮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9页。

⑯ 促进委员会系学校附设的社会组织，由普通学校的家长大会选举产生。促进委员会的任务是从物质上帮助贫困的学生。促进委员会积极参加了学校教育工作的安排。

⑰ И·И·巴尔苏柯夫(1899—1940)，国民教育工作人员，1929年至1932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兼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司副司长；1935年至1937年任齐良宾斯克省国民教育局局长。

⑱ 指东西伯利亚边区土龙斯克区尼基塔耶沃小学校长施韦尔斯基赫的信(来信见克鲁普斯卡雅的回信，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第686—687页与第272页)。

⑲ 参见本文注⑩。

论儿童的学前教育(在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第259页)

演说发表于1931年7月5日。第一次全文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论儿童的学前教育》，莫斯科，1931年。

① 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由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于1931年7月5日召开。

② 中央黑土地带省存在于1928年至1934年，包括目前沃龙涅什、库尔斯克、奥勒尔、唐波夫等省的疆域以及梁赞和土拉省的部分疆域。

③ 《共产主义教育》杂志系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政治教育总局机关刊，出版于1920年至1936年(刊期不同)。

④ 《走向新学校之路》系教育科学刊物(1922—1933)，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机关刊，1930年起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机关刊。该刊宗旨为困

结全体教师，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制定建立苏维埃新学校的措施。参加该刊工作的有И·П·布朗斯基，С·Т·沙茨基，М·И·皮斯特拉克，М·В·克鲁平娜，В·И·舒里京等人。主编为克鲁普斯卡雅(自1922年起)。

⑤ 文化进军是为实现苏联文化革命而开展的一项广泛的社会运动，是1928年由共青团倡议的，其主要宗旨是扫除文盲，后来转为提高日常生活的文明水平、发展和扩大学前机关网点、学校和群众图书馆网点的运动。

⑥ 卫生部即卫生人民委员部。

医卫工会即医疗卫生工作者工会。

教育工会中央即教育工作者中央委员会。

⑦ П·Э·奥尔洛娃(1890—1975)，苏维埃教育家，1918年至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学前教育处处长，后来担任国民教育方面的行政、党和科研工作。

⑧ А·Г·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国民教育工作者。1921年起任职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局(从1925年起任副局长)，先后担任《农村阅览室》、《成人学校》和《农民报(初级版)》的主编。后来在国立列宁图书馆工作，撰有许多有关政治教育和图书馆工作的著作。

《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与莫斯科教育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第272页)

报告载于1931年9月12日。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10期)。

① 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系根据联共(布)中央1929年8月5日《关于国民教育领导干部的决定》而成立的(1930年至1935年)，附设于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其宗旨是对教育学、教育和教学等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反对敌视和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潮，协会下设教学法理论部，综合技术教育部，学前教育部，民族部，政治教育部和外国教育部。协会主席为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② 指联共(布)中央1931年9月5日发布的《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参见：《苏联的国民教育。文件汇编。1917年—1973年。》莫斯科，1974年，第156—160页)。

③ 中师系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员和幼儿园教养员，始办于1920

年(1937年改为师范学校)。

④ 基础学校是一种普通教育学校，它是附近各小学的教学法中心。高等师范院校、教学法科研机关都广泛利用基础学校进行实习。

⑤ 实验示范学校建于1918年，其宗旨是通过实践检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理论原理，通过实验提出教育和教学的新形式和方法，向群众学校推广自己的经验和成果。1922年3月，为了领导这些学校的工作，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总局成立了实验示范学校工作处。1937年4月2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实验示范学校改为群众学校。

⑥ 即机器拖拉机站。

⑦ 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规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加强对他们的教学法指导(成立模范学校，建立视导员、教学法专家工作组，提高教学法刊物的质量，等等)，大量培养新的教师干部。

⑧ 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指出：“……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反对教育工作中机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歪曲党的政策的表现。只有加强对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加强对‘学校消亡，理论和贬低教师作用的言论的斗争，才能保证与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道路上的主要危险进行的斗争取得胜利，才能保证与歪曲党的政策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进行的斗争取得胜利，因为这种错误言行反对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妄图保存旧的等级学校，使理论学习与实际严重脱节”(《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60页)。

⑨ 指所谓的学校消亡论，这种理论二十年代末在苏联教育界颇为流行。它是学校工作方法研究所的领导人B·H·舒尔京和M·B·克鲁平尼娜提出的。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学校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青年一代的教育和教学将通过不同形式的校外工作来实现。联共(布)中央在1931年至1932年发布的几个决议中揭露了学校消亡论反科学的实质，强调指出了学校和教师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不断加强。

⑩ 列宁的这段演说是克鲁普斯卡雅据《真理报》(1918年8月30日，第184号)的原文摘引的。

⑪ 《列宁选集》，第3卷，第746页。

⑫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1页。

⑬ 同上书，第28卷，第67—70页。

⑭ 林奈·卡尔(1707—1778), 瑞典自然科学家, 植物和动物分类体系的创始人, 反对有机界历史发展的思想。

⑮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于1891年至1896年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工人星期日夜校任教。

⑯ 克鲁普斯卡雅和列宁于1898年至1900年在叶尼塞省舒申斯克村流放。

⑰ 设计教学法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盛行于美国。在采用这种形式时, 由学生自己定出计划去完成某些实际作业(设计)而在此过程中掌握知识、获得熟巧。这种学习制度导至狭隘的实用主义, 对学习过程中理论材料的意义估计不足, 不能保证牢固地、系统地掌握科学基础。克鲁普斯卡雅在探讨把设计教学法用于苏联学校这一问题时, 不止一次地谈到在采用这种方法时要取批判的态度, 并且指出了把这种方法当作学校教学中万灵方法的错误思潮。联共(布)中央1931年9月5日《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对设计教学法作了批判。

⑱ H·M·杜拉柯夫(1875—1938)系苏维埃科学家, 干旱土壤学专家, 教授, 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

⑲ 参见《列宁全集》, 第33卷, 第389页。

⑳ 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0卷, 俄文版, 第139—142页, 第311、331页。

为建立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奋斗(第290页)

① 参见《苏联国民教育》, 第156—157页。

② 参见《关于中小学的决议》注⑧和注⑨。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和学前教育的任务(1932年5月7日报告摘要)(第296页)

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 第246—255页。

①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1932年1月30日至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 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指令。

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决定(第305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2年,第8期)。

本文所说系指联共(布)中央1932年8月25日《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制度的决定》(参阅《苏联国民教育》,第161—164页)。

- ① 《列宁文选》,第3卷,第746页。
-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452页。
- ③ 指《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参见《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56—160页)。

④ 指分组实验法——一种教学形式,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盛行于苏联普通教育学校、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在采用这种方法组织教学过程时,全班分成若干组,独立钻研所分配于一个较长时间(由两周至两月不等)要学习的教材;教师一般只作答疑。分组实验法不能保证学生牢固地、系统地掌握知识、技能和熟巧,并且降低了教师的作用。

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第313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2年第4期)。

-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60页。
- ② 同上书,第32卷第82—83页。
- ③ 同上书,第3卷第5—558页。
- ④ 见本书《关于中小学的决议》一文注⑭。
- ⑤ 见本书《论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法规》一文注⑩。
- ⑥ 指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参见《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56—161页)。
- ⑦ 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481页;第2卷第432—474页。
- ⑧ 同上书,第23卷第317—350页;第31卷第250—266页。

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第321页)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3年第1期)。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84页。
- ② 同上书,第3卷第3—535页。

③ 俄语和文学、数学、生物、历史、地理教员会议于1935年在莫斯科和许多省城(罗斯托夫, 诺沃西比尔斯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举行。

④ 巴乌斯托夫斯基所撰《卡拉——博加兹海峡》一书出版于1932年。不久, 即1933年1月5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即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书评, 题目是《这种图书很需要》。

⑤ 指普列汉诺夫所著《我们的民粹派小说家》, 谈乌斯宾斯基、卡罗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纳乌莫夫等人的创作(参见普列汉诺夫《文学和美学》, 第2卷第220—340页, 莫斯科, 1958年)。

⑥ 拉德松: 诗集, 莫斯科, 1962年, 第169页。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第327页)

悼词作于1934年1月3日。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34年第1期), 标题为: 《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①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 苏维埃国家和社会活动家, 社会主义文化的杰出建设者, 俄罗斯联邦首任教育人民委员(1917—1929),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1929—1933)。著有文化、国民教育、文学、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无神论方面的著作多本。院士(1930年起)。

② 《前进报》——布尔什维克秘密出版的周报;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至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

③ 显系指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概论》为题发表的一组文章, 载于1905年1月—5月《前进报》。

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日—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

⑤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1906年4月10日至25日(4月23日至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⑥ 1908—1910年,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站到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 领导了“造神说”学派。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结合。列宁揭露了卢那察尔斯基的错误观点, 并在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

⑦ 1917年3月以后, 在芭蕾舞演员克谢辛斯卡雅私邸的旧址, 设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 许多工会

的管理机构，阅览室和士兵俱乐部。

⑧ 格·阿·阿列克辛斯基(1879—?)最初从事政治活动时系社会民主主义者。1905年至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系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反动年代系召回派分子，反党派别“前进”派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7月，他诬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伪造文件说他们是德国间谍。1918年4月逃往国外。在国外侨居时，投靠了极端反动的阵营。

⑨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37页，俄文版。

⑩ 工农速成中学系三——四年制的普通教育学校，创办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旨在加速培养工农升入高等院校。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创办于1919年2月2日，附属于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1932年，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已达34万人。后来，随着中学数量的增加，工农速成中学有所削减，至1940年全部停办。

⑪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杰出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院士。莫斯科市苏维埃首任主席(1917—1918)。1918年至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19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曾担任许多科学机关的领导人：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29年起任院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阶级斗争》杂志主编。著有许多苏联史著作。

自学须知(第334页)

脱稿日期不晚于1934年4月20日。第一次载于《提高文化》杂志(1934年，第3期)。

斯塔尼斯拉夫·杰阿费洛维奇·沙茨基(第336页)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34年11月1日)。

① 斯·杰·沙茨基(1878—1934)杰出的苏维埃教育家，俄国儿童校外机关(1905年的儿童俱乐部，1911年至1919年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工学团)最初的组织者之一。1919年，他建立了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实验站，即城乡幼儿园和学校体系。1921年至1933年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2年至1934年任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实验室主任。

② A·Y·兹艾连柯(1871—1958)苏维埃教育家和建筑家,是革命前莫斯科儿童校外机关的组织者之一。1929年至1933年是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1947年起是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艺术教育学院科研人员。

Л·К·斯列格尔(1863—1942),苏维埃教育家,自1903年起,为学前教育活动家。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工作人员,致力于识字教学法和幼儿园大班工作特点的研究。

Е·Я·福尔通拉托娃(1882—1965)农村小学教师。1905年至1925年与沙茨基共事。晚年是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教学内容和教学法研究所小学教学法研究室高级科研人员。

③ 瓦·尼·沙茨卡雅(1882—1978),苏维埃教育家,教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正式委员(自1950年起)。她与斯·杰·沙茨基一起组织了《朝气蓬勃的生活》儿童工学团(1911—1919)和国民教育第一实验站。1932年起在师范院校和音乐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曾倡议在各音乐学院建立音乐师资系。1947年至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

④ 国家学术委员会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教学法领导中心(1919—1932)。下设以下各部:科学政治部,科学技术部,科学艺术部,科学教育部。科学教育部成立于1921年6月,由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负责。该部的任务是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问题,制定中小学教学大纲、教学参考书和教科书。科学教育部出版了《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1930)。

列宁论儿童和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第338页)

第一次载于《警钟》(1935年1月21日),谢尔普霍夫市委和区执委会机关报。据该报印出。

在《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1935年1月22日)上,本文发表时所用标题为《列宁论儿童》(略有修改)。

①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八版,莫斯科,1970年,第2卷,第48页。

② 参见:《苏联国民教育》,第343—344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344—345页。

④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8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15页。

⑥ 同上书,第32卷,第154页。

⑦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09页。

⑧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八版·莫斯科，1970年，第2卷，第48页。

⑨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9页。

⑩ 同上书，第31卷，第257页。

⑪ 同上书，第261页。

⑫ 谢·米·基洛夫(真姓科斯特里科夫)(1886—1934)，党和国家杰出的活动家。1923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书记，1930年起任政治局委员，1934年起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

谈自觉纪律(给少年少先队员和学生们的一封信)(第342页)

第一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35年4月6日)。

① 指巴·科诺索夫的来信。

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第345页)

载于《革命和民族》杂志(1935年，第5期)，《民族教育》杂志(1935年，第5期)。

共青团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部分(第350页)

第一次载于《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35年，第8期)。

① 指高尔基的短篇小说《结论》。

谈学校图书馆(第357页)

第一次载于《消息报》(1936年9月21日)。

① 就字面而言，儿童学是研究儿童的科学。儿童学力图从整体上对儿童进行研究，亦即企图把有关人的发展的许多科学材料加以综合，但是，儿童学实际上只是儿童发展的心理学，解剖生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概念的简单总和。儿童学家在有关遗传作用和环境影响的问题上，有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他们贬低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意义，对20年代到30年代的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他们不加批判地利用测试来确定学生的所谓智商，结果歪曲了儿童发展水平、成绩和行为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学校工作受到一定损害。

② H·M·戈罗云(1889—1954)，苏维埃教育家，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自1943年起)。1908年起他任教于雅罗斯拉夫省，从而开始了教育活动。1914年至1951年，他在雅罗斯拉夫省土塔耶夫区恰巴柯夫学校工作，后来在恰巴柯夫师范学校工作。

论学龄前儿童的年龄特点(第362页)

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学前工作》文集，莫斯科，1938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③ 预备班：为升入一年级的七岁儿童开设的教学班，设置于1926年—1927年；1929年8月16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指令使之合法化，一直到30年代中期。

论学前儿童的玩具(第365页)

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教育报》(1936年12月18日)

对学前教育材料的几点意见(第369页)

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莫斯科，1959年。

1937年2月7日，沃尔柯娃领导的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学前教育处的教学法专家编撰的这份材料，由她交给了克鲁普斯卡雅。意见就是对这份材料而提的。

① 科特-木尔雷卡系H·П·瓦格涅尔(1829—1907)的笔名。他是动物学教授，研究白海动物区系。他用这个笔名在七十年代写了以善与恶斗争为题的25篇童话，内容带有寓言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引起了教育刊物的讨论。

致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书记)(第373页)

写于1937年2月9日。第一次载于《苏维埃教育学》杂志(1961年第11期)。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此信的内容,与她1936年所写的如下几篇有关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状况的便函和文稿有着密切的联系:《致联共(布)中央学校处马雷雪夫同志》,《致联共(布)中央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草稿》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所提出的若干问题》(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六卷)。

① 安·亚·日丹诺夫(1896—1948)党和国家活动家,1912年参加革命运动,1915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在沙德林斯克、特维尔、下诺夫戈罗德、列宁格勒等地从事党和苏维埃工作。193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39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时期任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И·Г·洛博夫(生于1895年),当时(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学校工作处处长。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6—218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

谢·尼·尤沙柯夫(1849—1910),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之一。二十二卷集的大百科全书的主编(1900—1909)。《俄国财富》杂志领导人之一。他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

⑤ 参见《苏共历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卷第48—49页。

⑥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取消学校劳动教学》的命令系1937年3月4日发布的。根据这一命令,校办工厂的全部设备移交着儿童之家。各加盟共和国当时也下达了类似的命令。

⑦ 1952年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大会在对1951—1955年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令中提出:“为了提高普通教育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意义并使中学毕业生有条件得以自由选择职业,应立即着手在中学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并采取措施向普及综合技术教育过渡”(参见《苏联国民教育》,第45页)。1954—1955学年普通教育学校教学计划中已在各年级安排了劳动教学并开始筹建校办工厂。

1956年,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指出必须“切实使学生参加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验田和校办工厂的劳动”(同上书,第46页)。

1961年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党纲宣称，“中等教育应当保证人们获得牢固的科学基础知识，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原则，保证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提高的水平，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以及学生的才能和志愿进行劳动和综合技术的训练，保证健康的正在成长的一代受到道德、审美和体育的教育”（参见《苏联国民教育》，第69页）。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1973年）规定，“普通中等学校……是对儿童和青年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统一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同上书，第97页）。

新宪法（1977年）确定了苏联公民在教育与生活、与生产联系的基础上有权享受普及中等义务教育。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进一步完善普通教育学校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并培养他们参加劳动》的决定，再一次强调指出：“普通教育学校是真正全民的、一贯执行列宁原则的、统一的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参见：《真理报》，1977年12月29日第一版）

目前，苏联普通教育中学广泛地采用了以下形式来组织学生的劳动教学和教育，并使之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结合起来：校办工厂（联合工厂，木材加工，金属加工，缝纫工厂，电机工厂，等等），校际教学和生产联合体，教学车间，企业的工段，农业试验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学生生产队，学校育林区，城乡中学高年级的生产教学，学习自动操作、开拖拉机 and 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农业机器，高年级学生在暑假参加生产实习，中年级和高年级学生参加各种劳动联合体（例如修建队）。

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1937年2月15日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第376页）

第一次系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莫斯科，1937年。

① 与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系1937年2月15日进行的。该学院现为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6—488页。

③ 指高级党校，即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1919年7月11日，列宁曾在该校作《论国家》第一次讲演（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8—444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6—488页。

⑦ 巴·安格林娜(1913—1959)系乌拉尔第一批妇女拖拉机队的组织者(1933年)。她发起了青年妇女掌握这一专业的群众性运动(1938年)。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她是第五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年入党。

⑧ 《青鸟》——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据梅杰尔林克剧本演出的剧目。

⑨ 指舒申斯克村。

辅导员应该懂得教育学(第388页)

第一次载于《辅导员》杂志(1937年，第8—9期)。

与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第392页)

第一次载入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学龄前儿童教育》文集，莫斯科，1939年。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与苏维埃各兄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谈话是1937年12月26日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的。

② 1919年6月至8月，《红星》号宣传轮沿伏尔加河和卡马河航行，行经不久前从高尔察克反革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一些地区。“《红星》号轮的任务就是，在白匪盘踞过的地区开展宣传工作，贯彻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巩固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第58页)。克鲁普斯卡雅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的身份，在《红星》号轮上工作了一个半月。这段时期，她多次在工人、农民、士兵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参观学校和文教机关，与教师和其他国民教育工作者见面，接见妇女和青年代表团。此行归来后，克鲁普斯卡雅于1919年8月2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上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省的国民教育工作情况》。

③ 莫斯科市捷尔任斯基“三山”纺织厂(即从前的普罗霍罗夫工厂)系苏联最老的纺织企业之一(创办于1799年)。

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第396页)

第一次载于《苏维埃教育学》杂志(1940年,第2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2—265页。

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其立场是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主张工人与资产阶级国家和解,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拉萨尔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2页。

③ 乌申斯基在加特钦斯克孤儿院担任俄罗斯文学和地理学教员(1954年末)。

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第400页)

第一次载于《少先真理报》(1938年9月22日)。

应当学会动脑和动手(第404页)

第一次载于克鲁普斯卡雅著《给少先队员的信》文集,莫斯科,1938年。

读家长用书(第407页)

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57年第10期)。

1938年末,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研究所拟定了一份家长教育用书书单,征询克鲁普斯卡雅的意见,本文即为此而写。

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第409页)

第一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39年,2月18日)。

本文系克鲁普斯卡雅根据她1938年12月14日在全俄校外工作会议的讲话写成。

① 指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4日《关于开展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工作的党的宣传的决定》。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60页。

③ 参见《列夫·托尔斯泰教育文集》,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60页。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

生平事迹年表

2月14(26)日*

1869年

克鲁普斯卡雅诞生于俄国彼得堡(现名列宁格勒)的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军人家庭。

9月

1881年

克鲁普斯卡雅先入公立学校,以后转入私立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学习。

春

1886年

克鲁普斯卡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转入该校附设的师范班学习。

11月至1891年8月

1887年

克鲁普斯卡雅从师范班毕业,获得家庭教师资格证书。她担任了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的辅导教师,同时又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当一些学生的辅导教

• 括号外为俄历日期,括号内为公历日期,十月革命后统一。

师。其间，克鲁普斯卡雅曾在彼得堡高等女子学校学习(1889年9月至1890年1月)，并经常到彼得堡市立小学观摩，听有经验的教师讲课；1889年秋，她和米·伊·勃鲁斯涅夫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1890年初，她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为了学习《反社林论》，她开始学习德文。

1891年

克鲁普斯卡雅主要是在彼得堡涅瓦关卡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教书，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1894年2月底，克鲁普斯卡雅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会议上第一次同列宁见面，不久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895年秋，她参加了列宁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为该协会的核心成员；1895年12月8日，列宁被捕入狱，克鲁普斯卡雅同狱中的列宁继续保持联系，执行他委托的一切任务；1896年夏，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彼得堡三万纺织工人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

1896年

因“斗争协会”问题第一次被捕，9月10(22)日获释后，继续坚持斗争。

第二次被捕入狱，1897年3月获释，但行动受警察局特殊监视。

8月至1896年夏

8月11(23)日夜

10月28日(11月9日)

12月底

1897年

克鲁普斯卡雅被判决到乌法省流放三年，根据她自己和列宁的申请，沙皇政府同意她到列宁的流放地(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村)去服刑。

5月7(19)日

1898年

克鲁普斯卡雅同母亲一起来到舒申斯克；1898年7月10(22)日，她同列宁结婚，此后，她从各方面协助列宁工作。

秋天

根据列宁的建议，开始撰写一本描写俄国劳动妇女状况的书，该书于1899年脱稿，取名《女工》。这是克鲁普斯卡雅撰写的第一本小册子，也是俄国的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妇女问题的专著，它于1901年2月在慕尼黑的《火星报》印刷厂第一次印刷出版，以后又被多次印行，成为俄国工人运动中宣传鼓动家的重要参考材料。

1月29日(2月10日)

1900年

列宁流放期满，克鲁普斯卡雅和她的母亲同列宁一起离开舒申斯克流放地。

2月6(18)日

克鲁普斯卡雅和她的母亲同列宁一起来到乌法，克鲁普斯卡雅还要在这里服刑一年。

1900年2月至

1901年3月初

在乌法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进行大量的革命活动，同时加紧学习外语，又为谋生而从事教学工作。在这段

时间里，她写了三篇以教育为主题的文章：第一篇以《优秀教师的典型》为题，发表在《教育》杂志1900年第10期，其余两篇《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学校与生活》都发表在《萨马拉报》上（1901年1月17日和2月16日）。

1901年

3月11(24)日
至13(26)日

克鲁普斯卡雅结束流放生活，离乌法经莫斯科、彼得堡出国，她将母亲暂时留在彼得堡。

4月初

克鲁普斯卡雅来到慕尼黑列宁侨居处，她担任列宁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

9月20—22日
(10月3—5日)

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

9月22日或23日
(10月5日或6日)

参加《火星报》、《曙光》杂志小组和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成员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她后来被选进该同盟的领导核心。

1902年

3月30日(4月12日)
至4月初(中旬)

同列宁一起离开慕尼黑，迁居伦敦（因俄国警察局在国外的侦察机关掌握了关于《火星报》所在地的情况）。

1903年

4月底至5月初

克鲁普斯卡雅和列宁迁居日内瓦（因《火星报》迁到此地出版）。

7月17(30)日至
8月10(23)日

参加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1月22日(12月5日)

由于孟什维克把持了《火星报》编辑部，克鲁普斯卡雅拒绝继续担任该报编辑部秘书的工作。

不迟于8月1(14)日

1904年

参加22名布尔什维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列宁写的《告全党书》。根据列宁的委托，《告全党书》立即被发往俄国。

9月底(10月中旬)

参加布尔什维克(22人会议的参加者)会议，会上拟定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编辑部和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成员。

11月至1905年5月底

担任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编辑部秘书。

4月12(25)日至

27日(5月10日)

1905年

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她担任大会的秘书，并作了多次发言。

4月27日(5月10日)

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秘书，同时担任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秘书。

11月初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结束第一次在国外的侨居生活(将近五年)，先后回到俄国。

11月下半月至1907年底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担任秘书工作。

12月10(23)日

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战斗和联合军事组织活动家会

12月12—17(25—30)日

1月至12月

4月10(23)日至
4月25日(5月8日)

1月至12月

12月17(30)日或20
日(1908年1月2日)

12月25日(1908年
1月7日)

2月13(26)日以前至
1909年11月(不
迟于28日)

8月11(24)日以前

议，会上讨论了支持莫斯科武装起义的各种措施。

参加在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

1906年

在彼得堡进行秘密工作，掌管着布尔什维克的住址和秘密接头地点，同列宁保持着秘密联系。

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把持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梗，克鲁普斯卡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她在大会上提出了书面抗议。

1907年

在彼得堡和紧靠俄国的芬兰边境地区继续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

克鲁普斯卡雅来到斯德哥尔摩，列宁已先期到达这里。由于俄国政治形势恶化，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在1907年12月初已决定将《无产者报》转移到国外出版。

同列宁一起来到日内瓦，开始了持续将近十年之久的第二次侨居生活。

1908年

担任《无产者报》编辑部秘书、《信箱》部的领导人。

被布尔什维克中央选进财政委员

不早于9月

12月1(14)日

夏初

6月8(21)日至
17(30)日

1909年末至1910年

1月至12月

9月2(15)日以前直
至1912年7月30
日(8月12日)

春夏

会，这个委员会管理党的经费、交通和出版事业。

克鲁普斯卡雅考察日内瓦学校的组织情况。1908年或1909年，她在考察的基础上写出《在瑞士学校(个人印象记)》，批评瑞士学校不注意启发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为《无产者报》迁移到巴黎出版，克鲁普斯卡雅和母亲同列宁一起迁居巴黎，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1912年夏。

1909年

克鲁普斯卡雅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的秘书，为召开《无产者报》扩大的编辑部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参加《无产者报》扩大的编辑部会议，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她被选入布尔什维克中央书记处和经济委员会。

克鲁普斯卡雅写了《男女合校》、《论自由学校问题》和《是否应教男孩做“女人家的事”》等三篇以教育为主题的文章。

1910年

克鲁普斯卡雅每星期到巴黎“高等社会知识学校”去听课和参加讨论会。

任布尔什维克《工人报》的秘书。

1911年

克鲁普斯卡雅在布尔什维克组织的

- 党校中给学员们讲授新闻业务知识、出版秘密报纸的经验和进行秘密工作的方法。
- 6月
在《自由教育》杂志上发表《论学校法庭问题》一文。
- 7月
《自由教育》杂志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论文：《学生中的自杀问题与自由的劳动学校》。
- 1911年12月至1914年
6月
在1911年
在布尔什维克举办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杂志《教育》编辑部当编辑。
- 克鲁普斯卡雅还撰写了《论学校自治》和《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均发表在《自由教育》杂志上。
- 1912年
- 4月22日(5月5日)
至1914年7月
克鲁普斯卡雅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与《真理报》编辑部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
- 6月27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以《国民教育的改革》为题的论文。
- 9月19日
《真理报》刊载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无产阶级的儿童》。
- 12月26日(1913年
1月8日)至1913
年1月1日(14日)
参加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会议。
- 1913年
- 3月
克鲁普斯卡雅在《自由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以《柏林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的劳动学校问题》为题的文章。
- 秋天
克鲁普斯卡雅为出版布尔什维克的

- 妇女杂志《女工》作了细致的筹备工作。
《女工》杂志于1914年正式出版发行，由她担任主编。
- 9月 《自由教育》杂志发表克鲁普斯卡雅
的以《家庭与学校》为题的文章。
- 9月23日(10月6日) 参加在波罗宁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
至10月1日(14日) 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第二次会议，担任大会秘书，并作了中央委员会
财政情况报告。
- 11月 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杂志发表克鲁
普斯卡雅的文章：《关于北美和西欧的
国民教育工作(迎接第一次全俄国民教育
大会)》。
- 在1913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在布尔什维克的报
纸《无产阶级真理报》上发表了四篇论
文：《学校工作的组织方法》、《马克思
论教育》、《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党
外学校》。
- 1913年底至1914年初 克鲁普斯卡雅为第四届国家杜马的
布尔什维克代表写了有关教育问题的发
言稿。列宁为这个发言稿加了《关于国民
教育部的政策问题》的标题，它首次发表
在1963年第七期的《国民教育》杂志上。
- 1914年
- 年初 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杂志刊载了克
鲁普斯卡雅写的《国民教育代表大会的
总结》。
- 7月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的家中集会，讨

8月24—26(9月6—8)日

论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伯尔尼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对待战争态度的报告，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策略口号。

2月14(27)日至
19日(3月4日)

1915年

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在伯尔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布尔什维克支部代表会议。她在会上作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是阐明列宁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观点。她被选为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委员。

3月13(26)日至15(28)
日

克鲁普斯卡雅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在伯尔尼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宣传列宁关于战争、和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观点，她参加起草代表会议的呼吁书。

在1915年

克鲁普斯卡雅完成了她的最主要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她同列宁曾讨论过该书的写作计划。列宁阅读了她的手稿，并曾于1916年2月初致书高尔基，向他推荐此书和请他设法协助出版。

2月至6月

1916年

帮助列宁搜集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资料。

在1916年

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关于统一学校

和它的发展前景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布列明斯克小组主办的理论周刊《工人的政策》上展开的。克鲁普斯卡雅于1917年2月17日在该刊上发表了题为《谈谈关于普及统一学校的问题》一文。

1917年

克鲁普斯卡雅制订了出版《教育辞典》或《教育百科全书》的计划。列宁于1917年2月18—19日曾向住在彼得堡的马·季·叶利札罗夫写信，表示支持克鲁普斯卡雅的这个计划，并请他设法找到出版者。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克鲁普斯卡雅从事更紧迫的任务，这一计划当时未能实现。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得知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息。他们当天就与侨居各地的布尔什维克取得联系，准备起程回国。

同列宁一起回到彼得堡，结束了长时期的侨居生活。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出版局工作。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四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

克鲁普斯卡雅受列宁委托，拟定了党纲中与国民教育有关的条款的修改草案。

为《士兵真理报》写了一篇题为《俄

2月5—6(18—19)日

以前

3月2(15)日

4月3(16)日

4月至5月

4月24—29(5月6—

11)日

5月初

5月13(26)日前

4月至6月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的一页》的文章，揭露资产阶级针对列宁取道德国回国所散布的谣言。列宁看过这篇文章的原稿，并作了修改和补充。

《真理报》发表了克鲁普斯卡雅的一系列文章：《青年团》、《为争取工人青年而斗争》、《工人青年应当怎样组织起来？》，等等。《真理报》还刊登了克鲁普斯卡雅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拟定的《俄罗斯工人青年团章程》草案。

5月5(19)日

《真理报》1917年第49号刊载了克鲁普斯卡雅撰写的《市立学校纲领》。

5月底

克鲁普斯卡雅在《士兵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给备受压迫者指明道路》的文章。

6月4(17)日至
10月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提名，克鲁普斯卡雅被选为彼得格勒（即二月革命前的彼得堡，列宁逝世后改名列宁格勒）维堡区杜马成员。她领导维堡区杜马议会会的文化教育司。

7月2(15)日

克鲁普斯卡雅参加彼得格勒市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她作了关于组织青年的报告。

7月26至8月3日
(8月8—16日)

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她参加青年工作小组的工作。

8月至10月

克鲁普斯卡雅负责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工

10月25—27日(11月
7—9日)

作(列宁因形势险恶避居拉兹里夫)。

参加全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1917年10月25(11月7)日清晨宣告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组成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苏俄人民委员会。

11月1日(11月14日)

苏俄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她在这一个岗位上任职到1920年中。

12月30日(1918年
1月12日)

苏俄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3月6日至8日
3月9日

1918年

参加俄共(布)第七次临时代表大会。

由于决定将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教育人民委员)奉命暂留彼得格勒，苏俄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驻莫斯科的副教育人民委员。两天之后，她作为苏维埃俄罗斯政府的成员迁居莫斯科。

5月23日

根据克鲁普斯卡雅个人的请求，人民委员会解除了她的副教育人民委员职务。

从春天至10月

参加《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的制定工作；参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1918年6月26日苏

- 俄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决定》(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10月31日通过)等文件的拟定工作。
- 6月25日 全俄执行委员会选举克鲁普斯卡雅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正式成员。
- 7月 参加全俄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作了报告。
- 8月26日至30日 参加全俄第一次国民教育代表大会，以《新制度下的社会教育》为题作了报告，并致闭幕词。
- 9月下半月 参加全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第一次代表会议，以《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为题作了报告。
- 10月29日以前 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倡议，为召开全俄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组织局，克鲁普斯卡雅领导这个组织局。
- 11月6日至9日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11月16日至21日 参加全俄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将每天的情况向列宁作报告。
- 在1918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例如，发表在《国民教育》月刊上的有《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论世俗学校》和《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有《论废除童工问题》(2月20日)；发表在《消息报》每周附刊上的有《教师联合会和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职业教育的任务》，等等。

1919年

3月18日至23日

参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积极参加了有关战争形势、军事政策、农村工作、党和苏维埃建设以及无产阶级妇女和青年工作等问题的讨论, 还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党纲委员会组织的有关党的纲领的讨论, 特别是对有关国民教育的条文作了审查。

5月6日至19日

领导和主持了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 作了报告。

春天

为制订教育人民委员部6月14日批准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教育事业组织条例》付出了大量劳动。

6月27日至8月13日

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红星》号宣传鼓动船沿伏尔加河和卡玛河航行, 向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女教师和工人作了34次报告或讲话。

10月5日至8日

参加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 并致贺词。

10月5日至9日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 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从1919年至1932年秋

克鲁普斯卡雅是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教学法中心——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是该委员会科学教育组主席。

1920年

3月29日至4月5日

参加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7月19日至8月7日

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7月

参加国际女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

苏俄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妇女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工会中央理事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表组成常务会议。克鲁普斯卡雅为常务会议成员，在制定扫盲的基本文件和组织扫盲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12日

苏俄人民委员会批准《关于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法令，由克鲁普斯卡雅担任总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一工作岗位上做到1930年为止。

在1920年

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题名为《关于社会教育事业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的小册子。该书于当年出版，其中指出各级社会教育管理机构要集中力量提高群众对待劳动和工业组织问题的自觉性，用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武装工农大众。

在1920年

克鲁普斯卡雅参加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她写的《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进一言》刊载于《共产主义教育》杂志1920年11—12月号。

年末

克鲁普斯卡雅为俄共(布)党的第一次国民教育会议(它于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准备

了两份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提纲。她预备到会上作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由于患病，没有能做这个报告。列宁就克鲁普斯卡雅的提纲写了著名的评述。

1921年

年初

发表《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一文(《女共产党员》杂志1921年1—2月号)。

2月27日

《真理报》刊载克鲁普斯卡雅的《论妇女的职业教育》一文。

3月8日至16日

参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就讨论宣传鼓动工作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活动的报告作了发言。

6月22日至7月12日

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6月28日

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的会议上提出《论学校建设》的报告，该报告的提纲于1921年7月4日通过，成为国家学术委员会对各科学研究所下达指示的根据。

9月21日至28日

参加全俄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就学校教育问题作了报告，号召共青团员充实教师队伍。

10月17日至22日

领导和主持全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工作。

12月23日至28日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2月

参加全俄苏维埃党校和高级共产主义学校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演说。

1922年

2月

参加全俄扫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

- 3月27日至4月2日
 参加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被选为有关报刊和宣传问题的委员会和
 小组成员。
- 5月
 在《青年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我
 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文。
- 10月11日至19日
 参加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
 表大会，致祝词并讲了话；在代表大
 会的政治教育工作小组会议上作了有关青
 年自学问题的演说。
- 11月5日至12月5日
 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
 了题为《关于共产党在群众教育和培养
 方面的工作》的报告。
- 11月27日至12月1日
 领导和主持了全俄政治教育总委员
 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 12月23日至27日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
 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12月30日
 参加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当选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在1922年
 根据列宁的建议，克鲁普斯卡雅被
 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审查一长制问题的委
 员会委员。
- 从1922年至1930年
 克鲁普斯卡雅是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教育》杂志的负责
 人。
- 从1922年至1932年
 克鲁普斯卡雅是《走向新学校之路》
 杂志的责任编辑。
- 在1922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几篇重要的
 教育论文：《论青年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在1922年

1月至3月

4月11日至15日

4月17日至25日

5月20日至26日

10月22日

11月29日

12月初

《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22年，第8—9期）、《一级学校的任务》（《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年7月号）、《谈教学大纲问题》（《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2年9月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真理报》，1922年10月28日）。

克鲁普斯卡雅还撰写了《组织自学》的小册子，是作为《读什么和学什么》丛书的分册出版的。

1923年

克鲁普斯卡雅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关于国内政治教育统一的系统材料，她又是党内和群众宣传、学校工作方法提纲起草委员会委员。

参加全俄苏维埃党校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参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参加全俄第二次扫盲代表大会。

进入列宁研究院院务委员会。

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国民教育局长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关于俄罗斯联邦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报告，该报告的提纲发表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3年11月号上。

参加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会议，就苏联国民教育体制问题作了报告。

在1923年

克鲁普斯卡雅在报刊上还发表了下列教育论文：《与儿童流浪现象作斗争》（《真理报》，3月7日）、《谈教育家》（批评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观点，见3月27日《真理报》）、《论高等院校的改组问题》（《真理报》，6月3日）、《改革教师培养工作》（《真理报》，7月11日）、《社会教育》（《走向新学校之路》，一月号）、《谈学校的目的问题》（《走向新学校之路》，五月号）、《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论外语教学》（《走向新学校之路》，七至九月号）。

1924年

1月21日

列宁逝世，克鲁普斯卡雅守在他的身旁，直到他停止呼吸。

1月21日至27日

在列宁灵柩旁守灵。

1月26日

在纪念列宁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追悼会上讲话。

1月29日

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克鲁普斯卡雅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2日

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克鲁普斯卡雅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10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必须这样做》，该文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写的。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年参加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委员会的工作，她为宣传列宁及列宁主义做了许多工作。

3月底

参加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

5月23日至31日

参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被选入主席团, 在讨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时发言谴责挑起争论的托洛茨基分子, 建议停止争论, 并作了关于农村文化工作的补充报告。

6月8日至13日

参加第三次全俄扫盲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6月17日至7月8日

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7月7日至11日

参加全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作了报告。

7月9日

俄共(布)中央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中央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

7月11日至18日

参加国际女共产党员第三次代表大会, 被选入主席团, 作了关于对妇女进行社会教育的任务问题的报告。

7月12日至18日

参加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 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作了题为《培养列宁主义者》的报告。

10月15日至21日

参加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 作了《发动群众参加学前教育工作》、《农村与学前教育》两个报告。

10月21日至24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农村支部组织书记会议, 作了关于农村政治教育工作的报告。

12月15日至21日

参加全苏工人教育代表大会, 作了报告。

12月16日

《真理报》刊登了克鲁普斯卡雅《关

在1924年

于十月教训问题》的文章，文中批评托洛茨基的观点和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

《真理报》和其他报刊刊载了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列宁《从侨居到彼得堡》的回忆录及关于列宁的生活与工作的纪念文章。克鲁普斯卡雅还撰写了《列宁在国民教育方面的遗嘱》一书，该书于当年出版。

在1924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如《论儿童之家问题》（《走向新学校之路》，7—8月号）、《学什么和怎么学》（《共产主义教育》杂志，9—10月号）、《学校与少先队运动》（《辅导员》杂志，第6期），等等。

1925年

1月5日至12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农村妇女工作会议，作了报告并致闭幕词。

1月12日至17日

克鲁普斯卡雅领导和主持全苏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题为《苏维埃学校》的报告，作了关于同儿童流浪现象作斗争的讲话，致大会开幕词并作总结报告。关于这次会议，她还给《真理报》和其他报纸写了一些文章。

1月24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题为《合作制与广大群众》的讲话。

1月下半月

发表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和讲话。

1至2月

应少先队员的请求写了《我的生活道路》。

2月26日至3月6日

参加全苏农业工作者会议。

5月7日至16日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被大会选举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13日至20日

参加全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建立文明的新国家而斗争》的报告，大会选举地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5月末

参加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的报告并致闭幕词。

10月10日至14日

参加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召开的全苏第一次自学会议，以《计划性与自学》为题作了报告。

12月5日至13日

参加莫斯科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并讲了话。

12月18日至31日

参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在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的报告时作了三次发言，在会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在1925年

克鲁普斯卡雅就列宁在1898—1901、1901—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在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之后、在1905年侨居国外以及1917年回国等时期的活动撰写了回忆录。

在1925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文，如：《论培养熟练劳动力问题》（《真理报》，3月4日）、《少先队运动》（《国民教育》杂志，第3期）、《农村青年学校的教育》（《教师报》，6月18日）、《学校里的列宁和列宁主义学习》（《真理报》，7月21日）、《职业选择》（《走向新学校之路》，第4期）、《学校自治》（《走向新学校之路》，第4期）、《论艺术教育的任务》（《一级学校的艺术教育。编写教学大纲的资料》，莫斯科1925年出版的文集）。

1926年

1月18日至24日

参加全俄扫除文盲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月20日以《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为题发表演说，这个演说发表于2月4日《教师报》。

3月11日至22日

参加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作有关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的报告。

3月15日

参加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会议，致开幕词并以《论农村的学前教育》为题作报告。

3月24日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的会议上作《谈七年制学校的历史教学和文学教学》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上发表。

5月9日

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5月20日

克鲁普斯卡雅宣布全俄政治教育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她为大会提供了在工人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材料。

5月30日至6月4日

参加全俄农民互助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8月24日至27日

访问特维尔(现加里宁市)，给工人和教育工作者作了报告。

11月5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就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报告作了发言，她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教师报》上(11月13日)。

11月25日

参加全苏农村青年文化教育工作第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从1926年秋至1927年

克鲁普斯卡雅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以《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为题进行了一系列讲课。

在1926年

致力于《列宁回忆录》的撰写工作。该书的第一和第二部于当年出版。

在1926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下列谈论教育的文章：《工人大学》(《真理报》，2月26日)、《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大纲》(《真理报》，6月24日)、《谈流氓行为问题》(《真理报》，9月24日)、《苏维埃和学校公益工作》(《教师报》，10月2日)、《论电影》(《走向新学校之路》，第一期)、《论学校的社会公益活动》(《走向新学校之路》，第三期)、《工厂的七年制中学》(《走向新学校之路》，第十期)、《谈儿童读物》(《走向新

- 在1926年
- 1月24日
- 1月
- 3月26日
- 4月10日至16日
- 4月18日至26日
- 5月8日至22日之间
- 5月20日
- 5月21日
- 7月2日
- 学校之路》，第十一期）、《论二级学校的文学教学》（《走向新学校之路》，第十二期）。
- 克鲁普斯卡雅还写了《论普及教育》、《谈编写小学劳动教学大纲》，时间不详。
- 1927年
- 在儿童和学校电影工作会议上作《论学校电影的任务》的报告。
- 在农村青年学校学生代表会议上作《学校里的集体工作》的报告。
- 参加全苏教育工作者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政治教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问题讲了话。
-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就俄罗斯联邦国民教育总情况的报告发了言，在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参加全苏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在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发表题为《少先队运动和学校》的演说。
- 《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必须保持党的统一的一封信。
- 参加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少数民族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国际和民族文化问题作了报告。
- 参加全苏学校工作者会议，就工厂艺徒学校的教育发表了演说。

7月29日至8月9日

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她发言表示支持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批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

9月6日

《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关于培养训练熟练工人的文章。

9月15日至17日

到布良斯克参加该州的群众宣传、文化和政治教育工作者扩大会议,会见了男女工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10月14日至15日

参加全苏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作了报告并致闭幕词。

10月

参加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纪念会,以《走过的道路》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11月14日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为纪念该部成立十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发表演说。

11月

参加莫斯科省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发言批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党立场,谈到加强党的纪律的必要性。

12月2日至19日

参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农村工作》报告发了言,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12月27日

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召开的儿童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真理报》12月29日发表了她的演说辞。

在1927年

莫斯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的文集:《少先队运动的道路》。

在1927年

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关于列宁1917

年回国和列宁撰写最后几篇著作的回忆录。

在1927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如下的一些教育论文：《教师的教育作用》（《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期）、《作为教育学问题的少先队运动》（《教师报》，4月9日）、《苏维埃学校与自然科学》（《走向新学校之路》，第5—6期）、《列宁论教育和国民教师》（《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0期）、《国民教育的十年》（《农村阅览室》杂志，第19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少先队员》杂志，第20期）。

1928年

1月上半月

参加全苏改善东方妇女劳动条件和生活习惯会议并讲了话。

1月20日

《教师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列宁论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

1月21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列宁的科学工作方法问题》。

1月23日至24日

参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研究少先队运动问题的党的会议以《少先队工作的深刻内容》为题作了报告。

1月23日

在全俄俄语和文学教师代表会议上作《共产主义教育与文学》的报告。

3月15日至20日

参加全苏第一次电影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4月22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第二次侨居国外（1908—1917年）》。

- 4月28日 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做《国民教育诸问题》的报告。
- 5月5日至16日 参加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5月14日作《共青团在儿童中的工作》的报告，15日作结束语。
- 5月30日至6月3日 参加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会议，发表了演说。
- 6月前半月 参加工人大学会议并发表演说。
- 6月22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工人大学》。
- 8月21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经济基础与文化生活、上层建筑》。
- 9月17日至30日 参加儿童图书馆管理员学习参观会议，以《儿童图书馆的作用和当前条件下的图书管理员》为题作了报告。
- 9月 曾到乌里杨诺夫斯克市，在纪念国际青年节的群众大会上和在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乌里杨诺夫斯克红旗步兵学校指挥员毕业晚会上讲了话。
- 10月5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培养劳动力的问题》。
- 10月28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努力完成列宁的遗训》。
- 11月7日 《教师报》发表她的《谈苏俄统一劳动学校章程》。
- 11月26日 在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题为《列宁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演讲。
- 12月3日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扩大的部务会议

- 12月10日
12月下半月
- 在1928年
- 在1928年
- 1月25日至28日
- 2月15日至20日
- 3月11日
- 4月23日至29日
- 5月9日
- 5月10日至18日
- 上发言(讨论舒里金的“学校消亡论”观点)。
- 参加全苏东方妇女会议并讲了话。
- 在联共(布)党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作了一些报告,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25周年。
- 克鲁普斯卡雅的《伟大的周年纪念》一书出版。
-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以下一些教育论文:《教师的教育作用问题》、《学校的组织影响和教育影响》、《论列夫·托尔斯泰》、《社会公益劳动的方法学》、《论国民教育制度》、《教育》(前几篇依次发表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8年第3期、第5—6期、第9期、第10—11期,发表在第12期和1929年第1期上的《教育》系克鲁普斯卡雅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写的辞条)。
- 1929年
- 参加苏联“扫盲”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 参加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并讲了话。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克鲁普斯卡雅劳动红旗勋章。
- 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
- 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上作《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报告。
-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四次代表大

- 会，发表了演说并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5月20日至28日 参加全苏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6月8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教育机关里的阶级斗争》。
- 8月前半月 同玛·伊·乌里扬诺娃一起到萨尔斯克市和罗斯托夫访问。
- 8月18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少先队运动的道路》。
- 8月18日至21日 参加全苏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会。其间，于8月20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第一届少先队会议的代表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的演说。8月21日，又在少先队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培养新生活的建设者》的演说。
- 8月22日 在全苏少先队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以《培养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为题发表演说。
- 10月8日 参加改善妇女劳动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全苏会议。
- 10月15日 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副教育人民委员。
- 12月8日 参加全苏突击队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 12月22日 参加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集体农庄的文化工作作了报告。
- 从1929年12月31日 克鲁普斯卡雅任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至1935年2月
在1929年

协会主席。

克鲁普斯卡雅在出版和宣传列宁遗著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她写了《对出版列宁选集(五卷本)初步计划的意见》;参加苏联境内各列宁博物馆工作人员会议;为出版《帝国主义战争时期通信集》中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本人的信件写序言;给1929年出版的《列宁与教育》一书写序言。

在1929年

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的《反宗教宣传》文集。

在1929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以下一些教育论文:《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教育通报》,第二期)、《论综合技术教育》(《走向新学校之路》,第2期)、《论中学》(《共产主义革命》杂志,第14期)、《企业附属七年制学校》(《走向新学校之路》,第7—8期)、《苏维埃学校与少先队》(《走向新学校之路》,第9期)、《论职业选择》(《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2期)。

1月9日

1930年

《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

1月10日至13日

参加全俄高等学校校长会议,11日在师范组以《论教师的培养》为题作了报告。

1月15日

在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的

- 1月16日
在莫斯科莫斯科河外区工人大学会议上以《改造时期的工人教育》为题发表讲话，并作了总结发言。
- 1月18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儿童的日常生活》。
- 不早于1月20日
参加全俄少数民族教育委员会会议并讲了话。
- 1月
曾到梁赞去参加梁赞州国民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集体农庄学校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发表演说，出席了梁赞州庆祝农业集体化大会，对工农和红军战士讲了话。
- 2月6日
《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以《工人学习的联合学校》为题的文章。
- 2月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的会议上以《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为题发表演说。
- 2月
参加全苏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 2月26日至3月5日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关于普及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时发了言。她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3月9日
发表《列宁论儿童营养》的文章（《真理报》）。
- 3月8日至17日
参加全苏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4月20日 参加政治教育总局召开的工人教育会议，以“工人教育制度”为题发表讲话。
- 4月26日至30日 参加党的第二次国民教育会议。4月27日，在讨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H·A·斯克雷勃尼克的报告时，她以“当前技术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教育”为题作了发言。
- 5月10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课本？》
- 5月11日至16日 参加全俄第二次教科书问题讨论会，5月11日，她在会上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科书》为题作了报告，并由她作了会议总结。她的这些讲话在1930年曾以单行本发行。
- 5月26日 在第三次保卫儿童代表大会上以《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为题作了报告。
- 6月26日至7月13日 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发了言，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 7月12日至15日 参加全俄师范专科学校代表会议，以《师范专科学校的当前任务》为题作了发言。
- 7月23日 发表《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真理报》)。
- 8月10日至16日 领导和主持了全俄第一次综合技术教育大会，致开幕词，作了报告并作会议总结。这些讲话于1930年以《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综合技术教育》为题出了单行

- 9月18日 本。
- 由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就完成五年计划第三年的任务发表了号召书,克鲁普斯卡雅就此撰写了《群众文化工作——为响应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号召而服务》的文章。
- 10月2日 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为纪念列宁发表《青年团的任务》十周年而举行的莫斯科团员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演说。
- 10月17日 参观奥列沃-祖耶沃市的图书馆和儿童设施。在该市教育工作者党的会议和为发展文化而举行的市苏维埃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 10月18日 参加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法规起草委员会的会议,就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法规草案发表意见。
- 10月21日 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普及教育委员会会议。
- 11月13日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发表题为《教育干部的综合技术教育修养》的报告。
- 12月1日至5日 参加全俄博物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了话。
- 12月10日至12日 撰写了《列宁在彼得堡工作时期以及在监狱和流放时期对文化教育问题发表的言论》,该文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1年第1期上刊登。
- 12月29日 在国家学术委员会第三次常委会作

- 了《将教学法工作提到更高的阶段》的报告。
- 克鲁普斯卡雅发表的重要教育论文还有：《论民族文化问题》（《民族教育》杂志，第3期）、《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问题》（《走向新学校之路》，第8—9期）、《学校的儿童自治》（《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0期），等等。
- 克鲁普斯卡雅撰写了《列宁关于集体农庄和小农经济的论述》一书，该书于当年出版。
- 1931年**
- 克鲁普斯卡雅为《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写了前言。
- 参加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演说。
- 克鲁普斯卡雅被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参加者选为科学院名誉委员。
- 《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儿童读物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
- 《争取共产主义教育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题为《为学校的学习质量而斗争》的文章。
- 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谈自己对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普及教育和学校综合技术教育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 参加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

在1930年

在1930年

1月18日

1月16日至26日

2月1日

2月2日

2月6日

2月9日

2月19日至25日

- 2月26日至3月5日
 会。2月22日，她以《提高学校的工作质量》为题作了报告。
- 3月8日至17日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在讨论普及教育和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时发了言，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4月16日
 参加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并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4月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教学法理论组的会议上发表关于学校自治问题的讲话。
- 6月28日至7月4日
 参加全苏科学规划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
- 7月5日
 参加全俄师范教育会议，以《必须掌握技术》为题发表演说。
- 7月11日至8月3日
 在全苏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论儿童的学前教育的演说”的演说。
- 8月初
 参加全俄生产教育代表会议。
- 8月10日至15日
 参加全俄边区和省教育局国民教育负责人及自治州和自治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实行普及教育而召开的。
- 9月12日
 参加全俄第一次工厂七年制学校生产教学会议，作了报告并作了讨论总结。
-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和莫斯科教育工作者联席会议上作了贯彻联共

- (布) 中央《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
 (“九·五决定”)的报告。
- 10月17日 在马克思主义者教育家协会的晚会上作题为《列宁在第二次政治教育代表大会上讲话以来的十年》的报告。
- 12月17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注意学校里的造型艺术教育》。
- 12月31日 克鲁普斯卡雅给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写信谈职业教育问题。
- 在1931年 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的《论学校自治》(文集)。
- 在1931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以下一系列重要的教育论文：《论综合技术教育法规》(《走向新学校之路》，第2期)、《理论与实践》(《走向新学校之路》，第4期)、《儿童共产主义道德训练》(《辅导员》杂志，第24期)、《为建立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奋斗》(《青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3期)、《党的最重要的决定》(《人民教师》杂志，第9期)，等等。
- 1932年**
- 1月24日 在《少先队真理报》发表《“我的”与“我们的”》一文。
- 1月30日至2月4日 参加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指令。
- 1月 对《综合技术学校儿童自治章程》草

- 案提出意见。
- 3月8日 以《将资产阶级作风从苏维埃学校中清除出去》为题发表文章(《少先队真理报》)。
- 3月8日 对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关于学校俄语教学的教学法信札》手稿提出书面意见。
- 3月14日 对《关于学校数学教学的教学法信札》手稿提出书面意见。
- 4月1日至8日 参加全苏教育工作者第八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 4月8日 对师范专科学校的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提出书面意见。
- 5月7日 对学前教育工作者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决议与学前教育的任务问题。
- 5月20日 在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作关于列宁《怎么办?》一书出版三十周年的报告。
- 5月23日 《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纪念少先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文章。
- 5月23日 《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她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与少先队组织》一文。
- 6月14日以前 写《工厂史——阶级斗争史》一文。
- 7月12日 写信给A·T·雅沃尔斯卡雅(克鲁普斯卡雅少年时在农村遇到的女教师，对她热爱教育工作产生过影响——编者)。
- 9月底 为放映有声影片《我们的高尔基》发

- 表演说。
- 10月9日 《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论国际儿童周》。
- 10月14日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谈示范学校的任务。
- 10月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0期发表克鲁普斯卡雅以《从无产阶级革命十五年看文化革命(某些总结)》为题的文章。
- 11月23日 《文学报》发表她撰写的《我们的儿童需要怎样的书?》一文。
- 11月29日 对中央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所拟订的“关于少先队在企业和集体农庄的某些社会工作的教育价值”课题的调查报告提出意见。
- 11月 参加全苏工程技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综合技术教育制度小组的工作。
- 12月11日 在共青团中央所属儿童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全体会上发表题为《为知识而斗争是少先队组织最重要的任务》的演说。
- 12月20日 参加全俄文化战士代表会议并讲了话。
- 12月 参加全俄边区和省国民教育局负责人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议并讲了话。
- 在1932年 克鲁普斯卡雅在《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上还发表了下列教育论文：《论文学教学》、《论儿童百科全书》、《有关教学法的几点意见》、《职业选择》、《列宁论

青年》、《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评价教师的标准》(以上文章分别发表在第1期、第4期、第5期、第6期、第8期、第11—12期);在《接班人》杂志上发表了《我们的经典作家作品是研究现实的武器》(第2期);在《为共产主义教育而斗争》杂志上发表了《列宁在为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作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9期)。

1933年

1月

参加北部边区文化工作者会议并讲了话。

2月17日至19日

参加全苏集体农庄突击手第一次代表大会。

3月7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克鲁普斯卡雅列宁勋章。

3月15日

对《列宁儿童共产主义组织章程》草案提出意见。

5月11日

《文学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谈中学文学教学的文章。

7月30日

一些报纸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三十周年的文章。

8月8日至12日

全国各采煤区的报纸刊登她致“开始向文化生活进军的矿工妻子们的信”。

10月11日

在为举办国际儿童周而组织的晚上发表题为《为国际主义教育而斗争》的演说。

10月19日

《文学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的文

- 10月
- 11月15日至17日
- 11月17日
- 11月20日至23日
- 11月23日
- 11月26日至28日
- 12月5日
- 在1933年
- 章：《我们的儿童需要能够将他们培养成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书》。
-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诞生十五周年，克鲁普斯卡雅写文章和贺词。
- 参加全俄校外工作会议，15日发表题为《我们的接班人应得到全面发展》的演说。
- 参加莫斯科少先队辅导员集会，以《辅导员必须是怎样的人》为题发表演说。
- 参加全俄托儿所管理局领导人会议并讲了话。
- 《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给少先队员的信。她号召少先队员到图书馆去，阅读书籍，向列宁学习如何利用图书馆并成为推广好书的助手。
- 参加全俄图书馆工作人员会议，26日发表演说。
- 《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致少先队员的信，号召少先队员爱护图书，建立“少先图书馆之友”小队。
-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下列重要教育论文：《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布尔什维克》杂志，1—2期）、《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期）、《给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以优秀的教科书》（《走向新学校之路》，第1期）、《马克思论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布尔什维克》杂志，第5期）、《党的纲领与

- 在1933年
 在1933年
 在1933年
 1月3日
 1月26日
 1月26日至2月10日
 不早于2月19日
 不早于2月21日
 不晚于4月20日
 7月10日
 10月12日
- 国民教育》《宣传家》杂志，13—14期）。
 继续致力于有关列宁的书和文章的整理工作。
 参加文化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在该委员会历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克鲁普斯卡雅还对小学的一些教科书手稿提了书面意见。
- 1934年**
- 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的卢那察尔斯基追悼会上发表《悼卢那察尔斯基》的演说。
 给下契尔斯克儿童之家的学生写信，勉励他们多读些书，互相帮助，友好相处。
 参加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发了言，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给《少先队员》杂志写信，祝贺该杂志出刊十周年。
 给“新生活”劳动公社的学生写信。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女生。克鲁普斯卡雅勉励她们上进。
 写《自学须知》，该文载于《提高文化》杂志1934年第3期。
 参加关于扫除文盲和半文盲问题的俄罗斯联邦少数民族共和国和州的会议并讲了话。
 《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

- 10月26日
 11月21日
 12月26日
 在1934年
 1月10日
 1月15日至23日
 1月21日
 1月28日至2月6日
 1月至4月
 2月10日
 2月14日
- 的文章：《论共青团员的家庭》。
- 参加各人民委员部女领导工作人员会议并讲了话。
- 参加少数民族苏维埃党校校长会议，就党校的国际主义教育问题讲了话。
- 就“扫盲法令”发表十五周年作了广播讲话。
- 克鲁普斯卡雅的《列宁回忆录》第三部分出版。
- 1935年**
- 《消息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题为《有效的方法》的文章，指出电影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 参加全俄苏维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就苏联的民族政策和鞑靼地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问题讲了话。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警钟》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列宁论儿童与培养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
- 参加苏联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并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发表了纪念列宁的文章。
- 《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给少先队员的信：《论对小朋友的工作》。
- 参加全俄集体农庄突击手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妇女自由和男女平等问题发

- 了言。
- 2月 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举行集会庆祝克鲁普斯卡雅65岁诞辰。她收到许多贺信。
- 4月6日 《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谈自觉纪律的信。
- 4月22日 参加全俄教师突击手会议并讲了话。
- 5月22日 发表题为《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和它的建设者》的文章（《为共产主义教育而斗争》）。
- 5月23日 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任命克鲁普斯卡雅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苏维埃副主席。
- 7月1日至4日 参加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全苏青年妇女代表会议并讲了话。
- 7月25日至8月25日 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 9月30日以前 向少数民族共和国劳动青年妇女代表大会致贺词。
- 10月2日 发表以《行动的指南》为标题的文章（《共青团真理报》）。
- 在1935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发表了以下一些论文：《论教育工作》（《辅导员》杂志，第4期）、《小学儿童的国际主义教育》（《革命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教育》杂志，第5期）、《论自学》（《青年共产党人》，第5期）、《共青团工作的重要部分》（《青年共产党人》杂志，第8期）、《十月革命与

- 儿童》(《辅导员》，第11期)。
- 1936年
- 1月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刊登克鲁普斯卡雅回忆列宁的文章。
- 2月1日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最高鉴定委员会授予克鲁普斯卡雅教育科学博士学位。
- 4月9日 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学校部负责人М·Л·马累舍夫(Малышев)，对学校劳动大纲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 7月 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写报告，谈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她着重指出，联共(布)中央1931—1932年决议中有关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指示落实得不好，还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
- 11月17日 在文化工作者会议上以《为了使文化教育同党的政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题讲了话。
- 11月25日至12月6日 参加苏联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通过了苏联宪法。
- 12月16日 参加全苏图书馆学和图书馆理论问题讨论会，以《履行列宁对图书馆工作的指示》为题讲了话。
- 不迟于12月 写报告给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和安·安·安德烈也夫，提出为成年人中等学校编写劳动组织课本问题，对讲授这门课程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 在1936年 莫斯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的《学前教育工作》文集。

在1936年

克鲁普斯卡雅给许多科学家写信，请他们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撰写科普读物，她撰写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需要科普读物》一书出版。

在1936年

《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克鲁普斯卡雅的下列文章：《论友谊》(2月21日)、《伊里奇的理想实现了》(5月17日)、《谈职业选择》(6月26日)；《消息报》发表了她撰写的论述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文章(9月21日)。

1937年

1月22日

《为共产主义教育而斗争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伊里奇与学校》。

2月9日

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安·日丹诺夫，反对取消学校里的劳动教学。

2月10日

写信给弗罗洛夫不完全中学女教师K·阿克谢诺娃，谈如何保持良好的课堂纪律问题。

2月15日

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会见，向学生作了《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的谈话》。

2月17日

写信给科姆帕纳伊镇(哈萨克共和国卡拉干达区)的儿童之家的校长阿尔希波夫，谈儿童教育问题，特别强调了生产劳动的教育意义和儿童之家与周围居民生活的联系。

3月下半月至5月初

参加成人学校教师会议，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7月8日

《少先队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给少先队员的信，谈正确安排夏令营的生活。

7月27日至30日

参加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苏维埃会议，在发言中强调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9月至10月

为青年报刊写文章，论述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精神。

12月4日

给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提尤尔金写信，请他注意解决超龄生问题、在农村中学设置集体宿舍问题和改善少数民族学校的俄语教学问题，并设法维护由居民和社会团体设置的校外教育机构（儿童活动室、文化红角、学生学习之家，等等）。

1937年秋至12月12日

苏联劳动人民提名克鲁普斯卡雅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她在谢尔普霍夫向选民发表讲话；她被一致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2月18日

写信给博古舍夫斯克镇（白俄罗斯共和国）中学二年级教师扎哈尔丘克，指出搞好课堂纪律的关键是要激发儿童的兴趣，将课堂教学安排得引人入胜，还要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

12月26日

与非俄罗斯民族各加盟共和国幼儿园工作人员代表座谈。

12月30日

《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以《各民族人民兄弟般的团结》为标题的文章。

在1937年

苏联报刊还发表过克鲁普斯卡雅的以下教育论文：《关于反宗教宣传的几点意见》（《消息报》，4月27日）、《列宁论外语学习》（《真理报》，9月5日）、《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共青团真理报》，10月2日）、《苏维埃教师的光荣任务》（《教师报》，11月19日）、《论教学大纲的内容》（《成人学校》杂志，第3期）、《要关心儿童的全面发展》（《辅导员》杂志，第6期）、《辅导员必须懂得教育学》（《辅导员》杂志，8—9期）、《列宁与国民教育问题》（《初级学校》杂志，第11期）。

在1937年

克鲁普斯卡雅还写了《论学前教育中的曲解》和《谈谈学习教育史的问题》，当年没有发表。

1938年

1月2日

写信给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院士、书记А·М·德波林(Деборин)，支持查尔诺卢斯基(В·И·Чернолуцкий，1865—1941)关于在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设立教育学与国民教育的专门研究机构的意见。

1月12日至19日

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月21日

《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的以《干部的学习》为标题的文章。

1月至6月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9、12期刊登克鲁普斯卡雅回忆列宁的文章。

春天

同莫斯科图书馆学院的学生和工作

9月22日

人员会见并讲了话。

《少先队真理报》刊登克鲁普斯卡雅给少先队员的信，强调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她指出：“生活需要知识，正如战争需要枪炮一样”。

10月30日

写信给莫佐列夫小学校长达维多夫，要求谨慎对待开除学生的问题。

10月底

参加成人学校、农村阅览室和文化官工作者联席会议并讲了话。

11月27日

参加全俄儿童参观站工作人员会议，以《尽力扩大儿童的眼界》为题讲了话。

12月14日

参加全俄校外工作会议并讲了话。

在1938年

克鲁普斯卡雅的《给少先队员的信》一书出版。

在1938年

苏联报刊还发表了克鲁普斯卡雅的以下文章：《怎样向学生讲述列宁的事情和讲些什么事情》（《教师报》，1月22日）、《要使学习接近周围的生活》（《共青团真理报》，4月16日）、《论文学课本》（《文学报》，7月5日）、《培养无愧于接班人称号的人》（《辅导员》杂志，第5期）、《马克思的学说是苏维埃教育家的行动指南》（《苏维埃教育学》，第5期）、《伊里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2期）。

1939年

1月13日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接见了农业机务人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同他们讨论

- | | |
|---------|--|
| 1月16日 | 了农村政治教育工作。
同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各区以及工厂报纸的编辑谈列宁。 |
| 1月至2月 | 发表文章和作报告纪念列宁。 |
| 2月16日以前 | 给少先队员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以《应当珍惜自己和别人的时间》的标题发表。 |
| 2月18日 | 《共青团真理报》发表克鲁普斯卡雅的文章：《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
| 2月23日 | 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就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计划要点发了言。 |
| 2月26日 | 《真理报》刊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祝贺克鲁普斯卡雅70岁诞辰的贺词。 |
| 2月27日 | 克鲁普斯卡雅病逝。 |

(吴式颖编写。在克鲁普斯卡雅的政治活动方面，参考了根·奥比契金等著：《克鲁普斯卡雅传》)